

傳播文化與政治

ISSN 2411-4006

第13期 2022年6月



專題論文

- 數位時代下的新公共廣播服務：以台灣《公視+》串流平台為例
- 在傳統和數位之間擺盪：台灣公視的全媒體轉型
- 性別文化空間、影像與公共性：以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與衍生文化產製品
- 臺灣的東南亞族裔地景與媒體再現

研究誌要

- 媒介化理論與政治經濟學的思考對話：以學術傳播的媒介化為考察場域

歷史與現場

- 烏克蘭的軍事情境
- 不實資訊、廣場事件與戰爭究責：理解烏克蘭

書評書介

- 評析《運動—批判社會學的視野》

傳播文化與政治

2015年6月創刊

半年刊，6、12月出刊

出版：2022年6月 第十五期

主辦機構

媒體改造學社

編輯顧問

卜衛	中國社會科學院
井迎瑞	台南藝術大學
王春泉	西北大學
王嵩音	中正大學
王毓莉	文化大學
史安斌	清華大學(北京)
吳予敏	深圳大學
呂新雨	華東師範大學
李金銓	政治大學
林元輝	政治大學
林東泰	臺灣師範大學
林靜伶	輔仁大學
邱林川	新加坡國立大學
胡光夏	世新大學
胡泳	北京大學
倪炎元	銘傳大學
展江	北京外國語大學
翁秀琪	世新大學
張志安	中山大學(廣州)
張裕亮	南華大學
張錦華	台灣大學
張國良	交通大學(上海)
郭良文	交通大學(上海)
陳衛星	中國傳媒大學
單波	武漢大學
曹晉	復旦大學
劉海龍	人民大學
黃煜	香港浸會大學
趙月枝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Canada)
蕭蘋	中山大學(高雄)

編輯委員會

主編	羅世宏	中正大學
編輯委員	林富美	世新大學(執行編輯)
	馮建三	政治大學
	陳光興	交通大學
	洪貞玲	台灣大學
助理編輯	劉忠博	華南理工大學

出版

發行人 媒體改造學社

地址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102 號
3 樓之 3

電話 (02)25221499

傳真 (02)25224970

E-mail: editor.2015ccp@gmail.com

本刊網址: <http://ccp.twmedia.org/>

ISSN: 2411-4006

封面提字 黃勻祺

封面設計 馮議徽

訂閱

零售：每期新台幣 500 元

個人訂閱：國內一年兩期 1000 元

海外一年兩期 1500 元(或 50 美元)

機構訂閱：國內一年兩期 2000 元

海外一年兩期 3000 元(或 100 美元)

以上均含掛號郵資

郵政劃撥戶名 社團法人媒體改造學社

郵政劃撥帳號 50313103

本刊採用創意公有授權條款，如下



目次

編輯室報告：.....i

專題論文

數位時代下的新公共廣電服務：

以台灣《公視+》串流平台為例.....林玉鵬、蔡蕙如/1

在傳統和數位之間擺盪：台灣公視的全媒體轉型.....羅慧雯/29

性別文化空間、影像與公共性：

以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與文化產製品為例.....孫嘉穗/67

台灣的東南亞族裔地景與媒體再現.....張春炎/87

研究誌要

媒介化理論與政治經濟學的思考對話：

以學術傳播的媒介化為考察場域.....劉忠博、沈楚橋/113

歷史與現場

烏克蘭的軍事情境.....馮建三譯註/139

不實資訊、廣場事件與戰爭責任：理解烏克蘭.....馮建三/161

書評書介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十五期
2022 年 6 月

評析《運動—批判社會學的視野》.....陳子軒/203

稿約

稿約詳情請見 <http://twmedia.org/archives/502>

編輯室報告：

當數位依賴已成為當代生活的日常，透過媒介中介所架構的符號意義與邏輯，或恐已如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所述「擬像真實」已取代真實，成為比真實還真實的「超真實」。

對閱聽人來說，這種看似為「自由意識選擇」下的「擬像」接收，或恐能讓其情不自覺，或無法自拔的深陷於一種「擬真」的敘事套路，讓真實或虛假，逃離理性的規範，取而代之的是媒體建構下的符號意義的情感認同。

是以，無論野心勃勃的政客或奉資本累積為圭臬的資本家，理當不會坐視這種披著「自由意識選擇」的外衣，實則足以召喚普羅大眾沉浸於符號拜物主義的非理性行為。因為這種非理性的認同，一旦成為信仰，其匯聚的集體行動，往往成為其可以收編與收割的權力或商機。對心有所懷的他們來說，若能順勢擾動，讓其自然而然，順勢成「潮」，沛然成為「主流」，進而讓個人或群體，找到「我群」與「他群」的劃界認同，更是額首稱慶。

若主流成為政經脈絡下被操縱的假象，則堅持與被視為「少數」、「不同意」，「非主流」的媒體結構與內容文本，或恐才是改變與捍衛多元公共價值的關鍵。當擬真邏輯與符號消費已滲透推展至政治、商業、藝術、性別、族群乃至於恐怖的戰爭報導時，捍衛多元公共價值的公共電視的發展，就變得格外重要。

承上，本期的專題旨在探討數位變遷下，有關多元公共價值的努力與體現。共有四篇：第一篇是由林玉鵬、蔡蕙如老師所撰寫的〈數位時代下的新公共廣電服務：以台灣《公視+》串流平台為例〉。該文分析公視+面對 OTT 的挑戰，除了扮演產製優質「電視」節目外，如何維持其公廣服務與普及性原則公共價值；第二篇則由羅慧雯老師所寫的〈在傳統和數位之間擺盪：台灣公視的全媒體轉型〉，該文以策略管理學的意義建構理論，探討公視管理階層如何認知全媒體轉型的意義，如何透過轉型來實踐公共電視理念，並檢討其轉型困境；第三篇則由孫嘉穗老師所撰寫的〈性別文化空間、影像與公共性：以阿嬤家博物館與衍生文化產製品為例〉，該文以台灣的慰安婦博物

館「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與其衍生之紀錄片為例，討論性別文化空間與影像，如何展現公共性、乘載記憶文化，建構性別網絡，展現其公共價值與理念；第四篇則由張春炎老師所撰寫的〈台灣的東南亞族裔地景與媒體再現〉，該文運用數據說明，在台灣，東南亞移民／工，如何透過人數的增加，建構成為東南亞族裔消費地景。藉由東南亞族裔地景的多元意義，反思其作為新文化公共領域的可能性。

本期研究誌要是由劉忠博、冼楚橋老師所撰寫的〈媒介化理論與政治經濟學的思考對話：以學術傳播的媒介化為考察場域〉乙文。該文主張，近年有關媒介化理論的研究，研究者常有意或無意地將政治經濟的因素，排除於理論的建構過程，造成媒介化理論與政治經濟學的聯繫被忽略。其間有關應納入以學術傳播的媒介化為考察場域，就學者、圖書館、大學機構與政府單位等行動者，探討其形構知識生產的認證歷程的研究建議，十分中肯。

本期的歷史現場的內容，更是十分難得與精采。面對本世紀很難想像的俄烏戰爭，相關媒體報導，充斥著大美國主義的「擬真」敘事時，馮建三老師頂著酷暑，為期刊翻譯了由包亞克（Jacques Baud）所述之〈烏克蘭的軍事情境〉相關事件與論述。

包亞克是瑞士參謀本部的退役上校，曾經擔任瑞士戰略情報分析工作，蘇聯解體後，參與了歐洲與俄羅斯軍方及情報官員的最高層之討論工作，堪稱東歐專家。其書寫，我們有幸能透過馮老師的翻譯，讓我們重新檢視非美國主流傳媒下，有趣、重要且有爭議的視野。誠如馮老師所言，該呈現，雖不一定能「真相大白，水落石出」，但文章內容所披露的事情與觀點，與歐美主流明顯不同，或許能化解單極世界的可怕與誤解，讓世界平衡一些。

對此一正在進行的事件與現場，馮建三老師更鼎力相助，撰寫了一篇〈不實資訊、廣場事件與戰爭責任：理解烏克蘭〉。該文通過「布查鎮」屠殺疑雲，對「廣場事件」進行真相的探討。也同意烏裔加拿大學者的「廣場」分析，是有特定力量刻意轉和平示威為血腥事件，對這場戰的原因與問責，提出了看法，不同於那些經濟學人的論述，令人敬佩。

本期的書評，是由陳子軒評介由 Richard Giulianotti 著（劉昌德譯）的《運動—批判社會學的視野》。該書的書寫與論述，架構於理論與議題間，立論

紮實，論述精闢，案例貼切合宜，可以被視為是台灣運動社會學中重要的入門書。

有趣的是不同於許多教科書採取較為中立、「平衡報導」的摘要式寫法，Giulianotti 在書中，對近年在北美運動研究社群興起的身體文化研究(Physical Cultural Studies，簡稱 PCS)，不吝宣稱其立場，大力抨擊。突顯運動社會學與 PCS 兩派的爭辯，十多年來，一直沒變，讀來令人莞爾。

或許每一個人與生俱來就有不同的世界觀，但造成社會的兩極化的極端思維與認同，卻可能是人為的。自由、民主，重要的就是溝通、聆聽；而媒體的公共價值就在呈現社會多元的視角與關懷。期待本期的專題、研究誌要、歷史現場與書評，能拋磚引玉，激起更多的真知卓見與討論。

《傳播文化與政治》編輯委員會

2022 年 6 月 29 日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十五期
2021 年 6 月

數位時代下的新公共廣電服務： 以台灣《公視+》串流平台為例

林玉鵬、蔡蕙如*

本文引用格式

林玉鵬、蔡蕙如（2022）。〈數位時代下的新公共廣電服務：以台灣《公視+》串流平台為例〉，《傳播、文化與政治》，15:1-28。

投稿日期：2021 年 4 月 26 日；通過日期：2022 年 2 月 9 日。

* 作者林玉鵬為國立聯合大學台灣語文與傳播學系助理教授，e-mail:yupenglin@nuu.edu.tw
蔡蕙如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助理教授，e-mail:hjtsai@ntnu.edu.tw。

《摘要》

平台化時代的新挑戰，當大多數的觀眾都在少數幾個平台（例如 Google，臉書與 Youtube）進行各種日常活動、接收資訊與娛樂。平台化世代的新收視習慣對公共媒體產生影響，導致公共媒體面臨創新平台公共服務的新挑戰。本研究將以數位時代下的公共媒體的影音串流媒體平台為出發點，並進一步分析解釋，公共廣電服務除了扮演產製優質「電視」節目之外，如何在影音串流平台發展數位時代下的公廣服務。本文回顧相關文獻釐清各國公共廣電服務在數位時代下的轉型策略，再以下列二個面向探究公視+在 OTT 時代下的挑戰與如何維持公共價值（特別是普及性原則）（一）《公視+》串流平台的發展方向，試著從《公視+》和公眾連結的機制和內容編排方式討論；（二）台灣公視於國內外串流平台合作發行播映節目策略。思考在與跨國串流媒體平台合作影視內容創作與播映之外，公視+的定位和發展的模式會有何種可能？

關鍵詞: 公共廣電平台策略、公視+、串流平台、台灣公視、數位策展

壹、前言

全球公共媒體服務都面臨平台化時代的新挑戰，當大多數的觀眾都在少數幾個平台（例如 Google，臉書與 Youtube）進行各種日常活動、接收資訊與娛樂。而巨型娛樂串流平台的興起帶來新的收視情境，閱聽人的收視習慣已大幅改變。「看電視」這件事，不只是坐在電視機前面隨機或等待節目播出，越來越多人選擇隨時隨地透過各種載具與平台 app，以更多元方式收看各種影視內容。然而，平台化世代的新收視習慣，更對公共媒體產生新影響，公共媒體將思考如何透過創新平台公共服務，重回大眾閱聽人的視野。

2021 年四月立法院第 10 屆第 3 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 11 次全體委員會議針對「公共媒體法推動進度與我國公廣集團面對全球數位化之發展規劃」進行報告與質詢（2021 年 4 月 14 日）。其中《公視+》成為質詢重點之一。會議上針對平台使用率、內容多元性與操作使用度進行討論。文化部是否提出積極政策，媒合更多優質內容上架《公視+》也成為議題核心。公視串流影音平台《公視+》的推出因應數位潮流，面對的公眾不再僅限於電視機前的觀眾，而是擴大至這些使用「非傳統媒體」的新觀眾。進一步來說，公共廣播服務正轉型為公共服務媒體（public service media），這裡指的「媒體」意謂著不只是原本單向的傳輸內容至觀眾，還有在串流平台時代的雙向互動。公共媒體可以透過閱聽眾的數位行為（點擊次數、停留時間）理解公眾的需求，並做為往後收視評量的指標，也可以藉此思考多元的內容，以策展式內容連結，達到更多元性的目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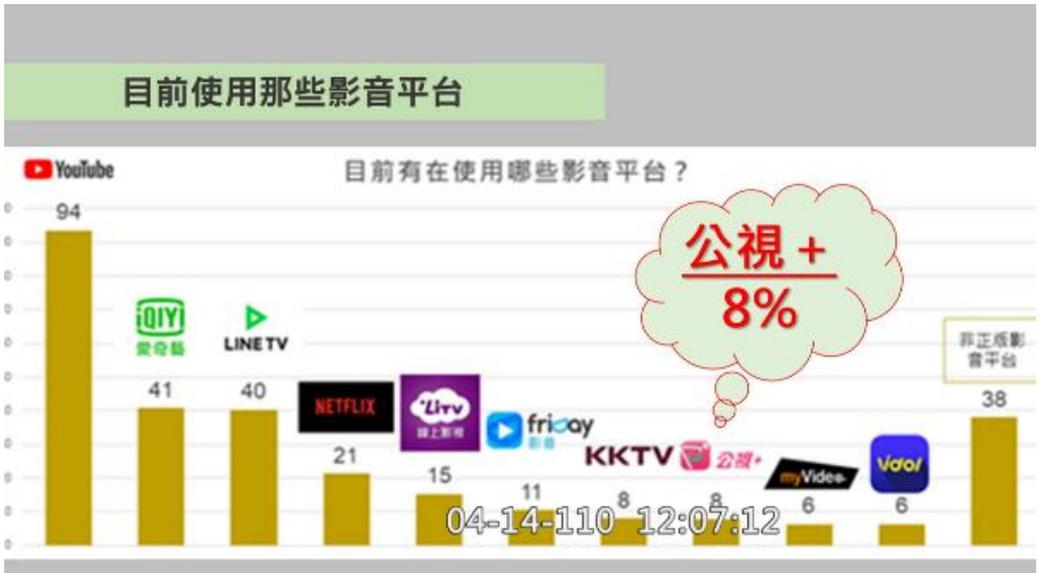
這樣的轉變呼應了公共媒體中一個很重要的公共價值——普及性（universality），相較於傳統定義的地理覆蓋普及，和節目設計上的普及，串流平台的推出，更能服膺於此公共價值。透過各種不同管道觸及最大的公眾，以及不限於線性安排、展現彈性的多元節目，重新創造新的普及公共價值，這些都是公共電視在推出串流平台後的關注焦點。

再者，公視長期持續產製優質影視內容節目，但面對平台時代下的國際影音市場競爭，國際串流平台 Netflix、愛奇藝與 LINE TV 在台灣高市佔

率現況（如圖一），如何在數位時代下發展公共媒體新的公共服務策略，實為一大挑戰。事實上，台灣公共電視與國際串流影音平台已有些合作經驗，例如 Netflix、CATCHPLAY 與 HBO Asia 等串流平台合資合製優質電影電視劇集。無論是【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通靈少女】或是【我們與惡的距離】早已是討論度極高並且收視率不錯的電視劇，都是近年來與知名國際串流媒體平台（HBO Asia 和 Netflix 等）合作的成功國際案例，並適度地增加台灣影視產品的國際能見度。也就是說，公視除了在發展《公視+》成為一個新的串流服務新品牌外，也積極地與國際串流平台合作，尤其是在播送流通的合作，更已成常態。然而，在這類合作上，但在公共服務、普及性、內容多樣性、本國自製比例、平等的國際影視內容交流等議題上，已逐漸浮出各種討論的聲音，如何兼顧以上公共價值與原則，並且創造平台化時代下的新公共服務，實為公共電視所面臨的新課題，同時也是本文關注的焦點。

因此，本研究將以數位時代下的公共媒體的影音串流媒體平台為出發點，並進一步分析解釋，公共廣電服務除了扮演產製優質「電視」節目之外，如何在影音串流平台發展數位時代下的公廣服務。本文先回顧相關文獻釐清各國公共廣電服務在數位時代下的轉型策略，再以下列二個面向探究公視+在 OTT 時代下的挑戰與如何維持公共價值（特別是普及性原則）（一）《公視+》串流平台的發展方向，試著從《公視+》和公眾連結的機制和內容編排方式討論；（二）台灣公視於國內外串流平台合作發行播映節目策略。思考在與跨國串流媒體平台合作影視內容創作與播映之外，公視+的定位和發展的模式會有何種可能？

圖一：公視+的市佔率



資料來源：立法院議事轉播 IVOD 第 10 屆 第 3 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賴品好委員質詢影片截圖，取自 <https://ivod.ly.gov.tw/Play/VOD/129555/1M/N>

貳、文獻回顧

串流影音媒體平台化這幾年迅速發展，加上這兩年疫情影響，使得串流媒體的市場幾乎取代電視和電影的地位。特別是 Netflix 的成功，帶動了其他串流媒體平台產業，在學術上的相關研究不少是以 Netflix 為主軸 (Hallian & Striphas, 2016; Jenner, 2018; Lobato, 2019; Wayne, 2018)，主要聚焦於 Netflix 本身的運作，或是對各國影視產業發展的影響 (Lobato, 2017; Lotz, 2021; Rios & Scarlata, 2018) 等，或是針對閱聽人行為和理論的反思 (蔡蕙如, 2020; Jenner, 2017)。進一步而言，這波學術研究風潮，也有串流媒體抽象層次的探討，例如整理串流媒體研究的「類型」 (Spilker & Colbjørnsen, 2020)，或是「概念化」流通經濟等較為理論層次的研究 (Colbjørnsen, 2021)。

公共廣電的數位轉型一直是重要的議題。即便大型的公共廣電媒體如英國廣播公司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很早就發展類似的數

位平台 BBC iplayer，已成公共廣電媒體數位轉型的典範，但在面對這波串流平台大戰時，仍無法輕忽，並積極調整策略¹，近來甚至和 ITV、Channel 4 聯手組成「OTT 國家隊」（Over-the-top media services，意指直接透過網際網路給觀眾的串流媒體服務）和 Netflix 對抗（Waterson, 2019 November 6）。近期的英國通訊管理局（Office of Communications, Ofcom）（Ofcom, 2019, 2020）報告也提出類似的觀點和提醒。目前有關串流平台相關研究的面向，反映學術社群較關注在串流媒體時代下所帶來的創新趨勢，包括其新的產製流程、新的閱聽人體驗與新的消費模式等議題。然而公共廣電媒體受到串流平台趨勢影響甚鉅，針對如何在串流平台時代維護其公共服務、普及性、多元性、民主等功能並且創新加值，需要更多關注與研究（d'Arma, Raats & Steemers, 2021）。以下針對公共服務媒體在平台時代下的創新策略進行兩個面向的文獻回顧與反思：（一）數位時代下的公共媒體策略：普及性 VS 個人化；（二）公共媒體的平台化的新策略。

一、普及性原則 vs 個人化策略

普及性原則一直是公共廣電服務中重要的價值之一，這是公共廣電對於社會中的每個人都能提供內容與資訊的職責，不論時地，讓公眾能近用公共資訊進而參與民主社會。普及性可分為內容和近用兩個層面：（一）內容：公共廣電必須提供和服膺各式品味和多元利益的群體；（二）近用：公眾是否皆能近用公廣媒體內容，不會因為年紀、性別或非主流而受到歧視無法近用（Van den Bulck & Moe, 2018, p.877）。然而，隨著數位科技和串流影音平台的影響，公共廣電的普及性原則受到挑戰，在平台化媒體的時代，最常運用的演算法以達到「個人化」的內容，公共媒體能否運用，又是否因此違反普及性原則？這是近年研究公共媒體的重要課題，也以普及性做為主要框架，試討論在平台化時代，公共媒體如何調整或因應這個變局。

Hilde Van den Bulck 和 Hallvard Moe（2018）的研究，討論以演算法為

¹ 今年（2022），BBC 更宣示要將 BBC 4、CBBC 和 Radio 4 Extra 轉至線上，並且要縮編 500 人，全力發展成為數位優先的公共廣電媒體（Waterson, 2022, May 26）。

基礎的媒體個人化，如何影響公共媒體的普及性原則。並以挪威公共廣播媒體 *Norsk rikskringkasting*（以下簡稱 *NRK*）和比利時佛拉蒙區公共廣播媒體 *Vlaamse Radio- en Televisieomroeporganisatie*（以下簡稱 *VRT*）做為個案分析，從三方面——推薦系統、登錄系統、隱私和安全性，討論個人化策略和普及性原則的關係。研究指出，*NRK* 認為演算法和編輯團隊的結合，是可以為觀眾帶來好的推薦方式。甚至希望公共媒體平台的登錄系統也能全部整合（使用同一組使用者名稱和密碼登錄），以方便節目的推薦系統更有效地推行，然而，對於隱私權的問題，*NRK* 會堅守不將使用者資料商業處理的原則。至於 *VRT*，雖然不至於完全反對個人化策略，但仍有所保留，指出演算法的運用是否會導致多元性的傷害（只給觀眾看想看的節目）？再者，無論觀眾是否註冊登錄系統，都會提供同樣好的服務，不因此有所差別。至於隱私權的問題，因為這涉及公眾的信任和安全性，*VRT* 認為這必須要非常的謹慎小心處理，同時也是對普及性最大的障礙。因此，總結來說，*NRK* 於數位時代的個人化策略，帶點科技決定論、樂觀的態度，肯定有助於普及性原則；而 *VRT* 則是有科技焦慮感，雖然這些個人化策略能幫助和改善公共廣播服務的目標和觀眾需求，但潛在的資安、同溫層問題仍待解決。最後指出，其實大部份的公共服務媒體，在面對新興的個人化策略，都以新的方式詮釋普及性原則，也漸漸將個人化服務整合進組織的新政策。作者認為公共廣播媒體需要的是「公共服務」演算法，應該更能兼容普及性和公共服務責任。

Erik Nikolaus Martin 的研究（2021）則是針對公共媒體如何與「矽谷」科技公司（新媒體平台）競爭。研究中提到普及性和演算法之間的問題是重要討論面向。英國和美國的公共媒體提出了對演算法的以下幾個論點，*BBC* 平台所採取的演算法仍是以公共服務為主，而且即便使用演算法，也不代表要捨棄人工編輯過程，應採取「混合式」的策略，追求演算法策展和人工策展的平衡。而美國的公共媒體（*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 PBS*）和國家公共電台（*National Public Radio, NTR*）則認為必須思考個人化之於公共媒體的意義，公共媒體要創造公眾的熱情和興趣，並成為一個受信賴的來源，成為強而有力、有別於商業平台的公共媒體平台，然而這些目標，觀眾的洞察力和數據是非常重要的資料。再者也主張，若能將現行的公共電視和公共廣

播，能整合為同一登錄系統，如此就可以這些資料，轉化成理解公眾對公共媒體的興趣和改進公共媒體、個人化體驗等的依據。

整體而言，多數研究對於演算法的態度，仍期待公共媒體能以公共價值發展、並有別於商業媒體的「公共服務演算法」。公共媒體運用演算法，推薦觀眾節目（或相關節目），目的並非方便廣告的使用，而是為了促成主題和觀點的多元性，也能以其平台擴大服務更多的公眾，以促成健康的民主社會。相較於前面兩個研究提出「公共服務演算法」的概念，台灣公共電視全媒體中心負責人李彰（Lee, 2018）則以實務經驗的角度，討論台灣公共電視的普及性和串流媒體平台間的關係。將《公視+》的經營模式納入「商業模式」，從公視本身較為少見的「付費制」，討論【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的發行策略。就普及性原則的觀點來說，付費制反倒成為新興的商業模式，除了在公視本頻道播出外，在 LINE TV 和 Netflix、《公視+》三個平台播出。在前兩者平台上的表現亮眼，也成為該劇主要的收入來源。研究指出，公共電視的普及性可從多平台管道發行達成。這個研究將普及性原則更往前推進，除了公共廣電媒體本身對於個人化（演算法）和普及性的矛盾外，對外則可思考和商業串流媒體平台的關係和可能性會是什麼？《公視+》做為公共廣電服務的串流媒體，普及性原則的實務經驗，也會關係著本研究另一重要提問：公視的發行播映策略。

二、平台化的流通策略

本節聚焦公共廣電服務的節目發行（流通）策略如何改變的相關研究與理論回顧。主要為比較型研究，大部份較集中在北歐、比利時這類較小市場的公共廣電的發展，這對於台灣而言也較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也可以此對應目前《公視+》的發行播映策略。除了在策略上可供參考，同時再思考串流媒體時代下公共廣電服務的普及性原則。

學者 Karen Donders (2019) 的研究以公共廣電服務在轉型至公共服務媒體（public service media，以下簡稱 PSM）時，參照公共服務媒體的特性，面對串流媒體平台時代競爭下的流通策略。公共服務媒體中的「媒體」

(media) 代表了「不限於」廣播和電視、而又具公共價值的媒體形式，並且更加強調公民的角色。Doners 指出 PSM 的特性有：（一）超越傳統線性廣播電視的多平台策略；（二）在國際集團或是傳統電視發行公司所掌控的媒體環境下，仍可以將提供所有公民公共服務；（三）在內容和流通策略上仍堅守公共價值；（四）內部組織的重整以適應新的環境（Donders, 2019, pp.1104-1105）。Donders 以此四個面向比較公廣媒體：英國的 BBC，荷蘭國家電視台（Nederland 1, NPO），和愛爾蘭的國家廣播公司（Irish broadcaster Raidió Teilifís Éireann, RTE）和前述的比利時佛拉蒙區的 VRT，研究它們如何在日趨國際化的市場所採取的流通策略。研究指出，這些公廣媒體的節目發行和流通策略已經明顯地產生變化，也勢必會向多平台的方向發展。競爭環境的複雜、預算壓力和組織結構等都會影響政策的發展。和商業平台合作（例如 Netflix）可能會影響普及性原則，但並不代表公共媒體受到經濟趨力的影響。在作者所蒐集的資料顯示，這樣的合作關係反而更顯示強烈的公共意識，也意謂著公共精神和整體預算間的摩擦。雖然目前這些公共媒體面對平台化競爭環境的定位仍不甚明確，部門協調度也不足，不過這些情況在現今複雜多變的媒體環境，都尚屬正常，所有媒體公司都要不斷地調整戰略以適應多變的環境（Donders, 2019）。

Alessandro d'Arma, Tim Raats & Jeantte Steemers (2021) 則從 Philip Napoli 的框架討論公共廣播服務在串流媒體時代的回應。同樣也是比較研究，以 BBC, VRT 和義大利的公共廣播機構（Radiotelevisione Italiana, RAI）三個公廣媒體為主要案例分析，從 Philip Napoli 所提出的媒體組織在面對新科技時的媒體演化反應的四個模式，（一）自信（complacency）：不在乎新科技所帶來的競爭威脅；（二）抵抗（Resistance）：會以各種方式（遊說、拒絕版權銷售）維持自身的地位；（三）差異化（Differentiation）：轉型為與競爭者有明顯差異的定位；（四）多元化／模仿（Diversification／Mimicry）：活動擴展至多平台，並開始會採用新（威脅）科技的核心特色（d'Arma, Raats, & Steemers, 2021, pp.685-686）。除了這四種模式外，亦提出了「合作」（collaboration）的可能，有二種可能的合作式，第一個是將節目的版權直接賣給串流媒體平台（例如 Netflix 和 Amazon Prime 等），第二種則是採用

合製播出的模式 (d'Arma, Raats, & Steemers, 2021, p.686)。

研究分析指出，雖然案例顯示或多或少都有經歷過上述四個階段，但並非一定呈現線性歷程，基本上還是取決於各國公共廣電媒體的政府政策（支持程度和規範）、文化因素、定位和市場規模。例如英國節目的內容有語言優勢（英語）而有國際合製的優勢，比利時荷語區的 VRT 雖然 Netflix 會購買其高品質的戲劇，但則可能因語言、市場規模等，很難受到 Netflix 合製的青睞。多元性的內容和服務則仰賴政府或政策的特別支持，例如英國因為有提供串流媒體製作的賦稅減免。研究也指出，公共廣電服務對於隨選視訊串流平台發展的回應，漸漸從短期的排斥到較務實的態度，不過合作的形式亦有可能使公共廣電邊緣化。然而公共廣電服務的轉型雖然持續地致力於和商業媒體區隔，但許多問題仍待解決，例如政策、資金和觀眾問題 (d'Arma, Raats, & Steemers, 2021)。

歐洲廣播聯盟 (European Broadcasting Union, 以下簡稱 EBU) 於 2021 年所出的產業報告中，也提到歐洲公共廣電在串流媒體時代所面臨的難題，將焦點放在戲劇。EBU 報告指出，戲劇同時具備公共價值市場價值，前者代表了多元文化、生活經驗，後者意謂著觀眾也期待能在其他國際 OTT 平台上看到公共電視的戲劇。進一步來說，公共廣電媒體除了建置自身的串流平台外，更必須思考如何讓自己的戲劇作品出現在國際串流平台 (李彰, 2021)。然而，「小市場」的公共服務廣電的電視戲劇產製，串流媒體、平台化的轉變帶來不小的壓力，這類小市場的國家的特質是：競爭者少、市場高度集中化、以及公共廣電很大程度仰賴公共資金，但該機制長年也維持高品質的戲劇產能。

Raats 和 Jensen (2020) 指出數位化和匯流時代已改變了媒體產業的經營模式，傳統媒體一方面要面對來自原本傳統媒體間的競爭，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新興國際 OTT 平台的壓力，因此對於小市場的戲劇產製，有四項主要的變化：（一）觀眾的收視習慣從線性變為非線性，例如訂閱制；（二）這些新興的 OTT 不僅改變舊有的觀看模式，也會投資原創內容，不過目前 Netflix 對於大市場國家的投資興趣，遠比小市場高；（三）廣告往這些新興媒體平台移動，例如臉書、谷歌等，根據歐洲視聽觀察報告指出，2018 年的

線上廣告就有 56% 流向臉書和 Youtube；（四）歐洲公共廣電的財政支援逐年下降，例如 2018 年就下滑 2.8%（Raats & Jensen, 2020, pp.837-838）。以比利時荷語區的 VRT 和丹麥公共電視台（Danmarks Radio, DR）為例，在面對來勢洶洶的全球競爭和既有市場的挑戰，這類小市場所仰賴公共資金的公共媒體究竟如何維持電視戲劇的產能。Raats 和 Jensen（2020）研究指出，VRT 和 DR 雖仍是該區主要電視產製的中心，但面對國際化的市場仍採取不同的策略。VRT 仰賴國內的公共財政支持，重心也放在國內市場。事實上，比利時佛拉蒙區的整體電視市場，有意識到 Netflix 或「外國」（主要是美國）內容為共同的競爭對手，也萌生合作的想法，但目前為止尚未形成確實的合作。雖曾一度提出公私媒體共組 Flemish Netflix 的構想，不過由於利益交織和成本問題難以落實（Raats & Donders, 2020）。DR 相對而言較重視國際市場，積極出售國際播映權。不過 VRT 和 DR 的策略並非截然二分，兩者模式近年也互有重疊。Raats 和 Jensen 在文末指出，國際 OTT 的興起，對於公共廣電的戲劇產製帶來了三方面挑戰，第一個是公共服務廣電應和這些 OTT 有一定程度的合作，但又必須冒著品牌認同被傷害，以及侵蝕自身的節目和串流平台服務的風險；再者則是關乎公廣服務投入付費平台機制的程度，雖然可能獲得更多的高品質戲劇製作預算財源，這又會牽涉公廣角色（近用性）的問題，第三則是和 DR 較有關係，究竟公共廣電如何能在革新之餘，仍能保持其獨特性，又能立足國際，實為重要課題（Raats & Jensen, 2020, pp.851-852）。公視資深研究員何國華在 2019 年〈合作與協作 讓線性廣電得以永續〉一文中亦提出北歐公共廣電的思考，他指出，對於北歐這些小市場的廣電媒體，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能提出合作、協作，並擴大內容聚合夥伴關係。因此，在戲劇的產製和流通上，小市場的公共廣電媒體勢必會碰到國際影音串流平台的競合問題。

參、案例分析：《公視+》串流平台公共服務

以廣義的串流媒體形式來看，台灣公共電視的串流媒體服務可以追溯

至公視於 2007 年所成立的 Peopo 平台，是鼓勵公民製作「公民新聞」並上傳至此平台，為一種使用者生產內容（User generates content）的平台，另外會精選一些內容在主頻道播出，搭配客座編輯，算是串流媒體形式在公視播出的「基礎原型」。

圖二：《開鏡》廣告頁面主打全新公視+影視平台服務上線的資訊。



資料來源：《開鏡》第二期（2017 年 10 月，第二期）

公共電視在 2016 年推出公視+7 的影音串流平台，配合當日傳播統電視

排播，隔日播出，可以回看 7 天的服務。事實上，台灣的 OTT 市場在 2016 年已漸熱絡，2016 年甚至稱之為 OTT 元年（顏理謙，2016）；2017 年時，已有 15 家 OTT 平台業者，主要的訂閱者以年輕人為主（CASBAA, 2017）相較於這個趨勢，2017 年的尼爾森收視調顯示，公視的觀眾群年紀始終偏高，大概在 55 歲左右（Lee, 2018）。因此，一方面公視希望能因應年輕觀眾新的（網路）收視習慣，另一方面也因為市場的原故，公視+ 於 2017 年轉型升級為公視+ OTT 的服務，不限 7 天的收看期限，也加入過往節目，強調「地表最強串流影音服務和超過 800 小時影音」（圖二）另外除了能收看市場原有的標準（SD）與高畫質（HD）節目外，更支援超高畫質（4K）播映。就整體介面和播放品質來看，是合乎新媒體潮流的設計（如圖三和圖四）。接下來即針對《公視+》進行兩個主要面向分析：（一）串流平台的發展方向；（二）發行播映節目策展策略。

圖三：公視+ 的電腦介面



資料來源：公視+網站

圖四：公視+ 的手機介面



資料來源：公視+ app

一、註冊會員制度和策展式內容的流通策略

《公視+》的觀看方式主要為註冊會員制，無論是從《公視+》平台，或是透過 app，都需要先註冊為會員才能觀看《公視+》所提供的節目，在部份節目採收費制外，其他節目都是免費收看，由於節目版權的關係，國外

的觀眾無法註冊。2019 年 1 月《公視+》網站改版並同時推出 Android 版 APP，以更貼近數位時代下的觀眾觀影需求，同年 3 月由於新影集《我們與惡的距離》開播，甚至一度吸引超過 11 萬人登記註冊使用，6 月的會員人數已達到 46 萬人。《公視+》後臺所檢視的收視指標有三：「節目點擊次數」、「桌機/PC 累積觀看分鐘數」與「Android APP 累積觀看分鐘數」，2019 年前半年的統計顯示這三項指標都穩定成長（李彰，2019）。未來這些數據資料都將納入公視節目收視評量指標，藉以衡量並發揮公視串流影音服務的多元價值。

如前所述，在 Van de Bluck 和 Moe（2018）談及公共廣電、演算法和普及性的關係時，登錄服務（Log-in Service）是其個人化服務核心之一，用於「節目推薦」和「理解公眾樣貌」兩個目的。公視+的機制，必須要先註冊成會員才能在平台觀看節目，藉以能將觀眾的樣貌和觀看行為，更能清楚地記錄下來，例如常看的節目是哪一類型？是否會看到一半就不看？又常會在哪裡停住不看等。再者，透過觀眾登錄裝置的分析，也能瞭解觀眾多螢幕（手機、平板電腦和電腦）的收看方式比例，這個部份可以對公視的串流平台發展政策和節目內容行銷有很大的幫助，前面可以往加強基礎建設的方向，後者則是節目文本增加多媒體敘事的可能性。因此，登錄系統的機制看似限制公眾的文化近用，但實則不然，因為得到的資訊會以公共服務的原則和價值，更能精確地理解公眾對於公共電視的需求和興趣，公共電視也能以此調整至數位串流平台時代的多元內容。然而，在目前《公視+》的發展，還未充份運用演算法的階段，而是以「人工策展」為主的節目編排，以主題策展方式，擴大公眾對於節目「參與」的形式。

策展一詞本源自博物館研究用語，近年因為數位內容資訊龐大，將這類能將數位內容分類、選擇再組織進而呈現的過程稱之為「數位內容策展」，而判斷最終呈現的結果是依據人工方式判斷，而非依照所謂的人工智慧、演算法、大數據等工具（Rosenbaum,2011；黃貝玲譯，2012）。《公視+》平台即有針對節目內容主題式選取的編排，也如同「策展」一樣，希望將在主題下的相關內容賦予意義，以符合主題的價值。公視+的內容策展主要分為二種形式，第一種為一般「策展主題」的推廣，另一種則是較以時效性為主

的內容策展。前者如圖五所示，在公視+網站頁面的選項為從頻道選單下拉至「人為什麼要爬山？」，《公視+》即將目前正在播映的群山之島紀錄片為主軸，搭配其他相關且曾經播出的紀錄片或節目，如 2019 年柯金源導演的《神殿》紀錄片，或是同樣於 2019 年播出的台灣國家公園紀錄片，這些「舊節目」不見得在主頻道（電視頻道）有隨時播放的機會，但在這類策展式的安排下，會讓觀眾和收視群更能清楚公視+策展的邏輯。至於後者，會因應「時事」（例如議題、得獎回顧或是和外部影展合作）而做出立即性策展，例如每年總是在金鐘獎能獲得眾多獎項的戲劇節目，在金鐘獎隔天後即會安排所有得獎相關節目上線。

圖五：「人為什麼要爬山？」



資料來源：公視+網站

在前面的文獻提到「公共服務」演算法的概念，會強調公共廣電媒體的一大特色就是會維持人工編輯，而不會將全部的編排交給演算法，即便是全由演算法排序，仍必須以公共價值為主。《公視+》一方面發展出線上主題的策展編排（人工節目編輯），從節目主題發散其他相關的節目連結，如此亦可強化過往節目的公共性，同時發揮串流平台媒體的特性，與電視頻道節目的線性邏輯不同。線上策展可將舊節目的公共效益最大化，也能透過節目

的彼此連結，讓公眾對於文化內容的想像和詮釋擴大。

因此，相較於一般 OTT 較常採用的「圖書館」、「資料庫」策略和介面（片量愈多愈好），在國際串流平台更為明顯，《公視+》採取了另一條的新路線——內容策展路線，提供觀眾對於 OTT 平台的另類想像，透過這類內容策展安排，不是由演算法決定觀眾看什麼，而是透過文化連結和想像重新編排，提供公眾更多的文化節目，可以是新時代下的普及性原則重新界定《公視+》的內容策展屬性。雖然《公視+》平台介面仍有許多不足之處，也因為平台系統問題，暫時並未很能精確地使用大數據和演算法等數據，若未來能搭配適合的演算法，節目的流量和數據，也許更能強化公共服務和普及性的精神。

二、《公視+》的發行策略

公視在面對平台化媒體時代，戲劇的發行流通，基本上和其他小市場公共廣播媒體的處境類似，也採取了和商業媒體競合的方式。表一整理了自《公視+》開播以來所運用此合作策略的公視戲劇，可以看出公視自 2018 年開始逐漸展開與其他獻上平台合作播映的模式。由於國際知名串流平台的效應（例如 HBO 和 Netflix），讓更多觀眾透過新聞報導與相關平台效應，除了原先在國際平台收視的觀眾之外，也因為戲劇品質優良口碑極佳，讓更多觀眾回到《公視+》收看，並且因此進一步使用其他的平台服務。而這種公共電視與商業串流平台合製／合播的方式，有機會促進民眾對於公共電視的認識與戲劇品牌的忠誠度。公視與其他串流平台有不同的合作模式，例如：（一）與公視主頻道同時播出；（二）同一天稍後播出；（三）隔日之後播出等模式。2021 年 8 月底推出的影集《斯卡羅》則是近期表現極佳的主頻道與商業串流平台合播的成功案例，相關報導（鍾智凱，2021 年 8 月 16 日）指出《斯卡羅》為公視開台 21 年來首播收視紀錄，首播收視率也是當日全部頻道戲劇類節目第一名，合作播映的平台，例如 LIVE TV 首播 2 小時內排名第一名；myVideo 上也是戲劇類第一名；在 Netflix（台灣）也是前五名。

這個策略一方面擴大內容能見度，同時也拓展平台公共服務被近用的可

能性。公視在面對影音串流平台化環境新挑戰，除了主頻道收視頻道和《公視+》，也思考平台化媒體的整體策略。這裡的「平台」，並不僅限於自身的公共平台服務，也擴及於公共內容於商業平台露出，因此甚至能增加國內外的知名度。

公視選擇和任何具有聲譽且創新商業影音串流平台合作，都可使公共電視產製的高品質戲劇，在數位時代下擴大觀眾的收視，突破傳統受地理限制的普及性原則。另一方面也透過版權販售增加收入，這是公共廣電媒體和商業串流媒體平台合作的收益之一。公視總經理徐秋華也指出「公視的迷你劇因製作成本高，過去往往無法完全回收成本，但如今透過 OTT 平台積極購買版權合作，已經有三部作品達標 100% 回收率：《我們與惡的距離》、《麻醉風暴 2》，以及年底（2021）才上映的電視劇【返校】。」（文化內容策進院，2021）。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過往的經驗研究較少提到「播映時間」的合作。

此外，《公視+》在戲劇的收視上，2018 年 6 月大膽啟用付費制的方式，首推【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以 99 元隨選觀看兩個月的付費方式，這類新的商業模式對於公共廣電媒體是很大的挑戰，一方面初期使用者的公視影音平台經驗並非完善，且缺乏「獨家」才有的節目，因此內部評估有很大的失敗風險，再者面臨法源的挑戰，公視徵詢文化部的意見，指出公視法第 28 條同意公視可以從公共電視文化基金會相關的商業活動或其他來源取得收入，因此文化部同意這個新商業模式（Lee, 2018）。以結果來說，這個試水溫的新制度表現不俗，在自家的《公視+》和商業平台都有不錯的表現。例如在 Line TV，【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是自開播後截至 2018 年 9 月，平台流量排名前三的劇集節目，單一集的瀏覽量已破 130 萬（唐子晴，2018）。這個成功模式繼續延續到【我們與惡的距離】，這次合作的對象是台灣本土 OTT 影音平台 Catchplay，亦有投資該劇。同樣在公視+採取付費的方式，採用 3 個月付費 130 元的方式，可以觀看系列全集，由於該劇造成極大迴響，公視的收入破 400 萬，Catchplay 的會員更在一個月增加 22 萬新會員，付費會員也增長了一倍（唐子晴，2019）。在原本公視的市佔率就比較小的情況下，選用戲劇做為付費模式的試金石，也同時嘗試和商業影音平台

合作，藉此增加公共影視內容的曝光度與額外影是產製的收益。《公視+》以公共價值為基礎的新商業合作模式，是讓在台灣公共電視資源不足與平台化閱聽人的時代下，一種可持續觀察的創新合作方式。

不過在過往的討論中，很容易沉浸在「成功經驗」裡，往往會忽略成功模式下的缺失，在此也一併提出幾個思考方向。在這波戲劇合作發行的策略裡，較為嚴重的問題首推公視+本身的基礎建設是否能跟上「最大化觀眾」的策略。以最受歡迎的【我們與惡的距離】，在《公視+》的播出就因承受不了過多的觀眾同時上線因而當機，或許之後推出的戲劇未再出現類似的情況，這仍涉及普及服務原則（蔡蕙如、林玉鵬，2019年4月22日）。也可以進一步去觀察《公視+》在整體公共廣電的定位，包括預算和資源等，也就是前面所提及的政策工具，都會影響《公視+》的發展。

第二個問題，則是即便合作策略成功、也在多串流影音平台播出，誠如 d'Arma、Raats 和 Steemers (2021) 指出，公共廣電媒體在評估整體利大於弊的情況下，若販售播放權給平台業者，或是和這些平台業者合作，可以提升製作成本和能見度，但相對而言，也可能會有失去品牌和主導權的可能性。這個問題在 Netflix 原創 (Netflix original) 這個「品牌」日趨強大，因而忽略真正的製作單位（公視）必須注意。如同在前述文獻的討論，較為小市場的公廣媒體，在面對國際影音平台的合作時，就會有邊緣化的問題(Raats & Jensen, 2020)。

《公視+》因為新的商業模式，更能掌握付費會員的資訊。如前所述，更有助於節目的規劃；付費會員制也強調收視數據精準的預測。然而以上兩種數據應用的方式，是否能符合數位時代下公共服務精神，則值得進一步觀察。例如，如何服務數位時代下的未付費的線上觀眾需求？以及「精準收視數據」是否真能未提供又優質且符合多元公共價值的節目設計，也必須進一步討論。此外，選擇使用付費機制的戲劇標準為何？是否有可能會因宣傳資源、演員陣容等而造成不同的效益？在串流媒體時代下，公共服務媒體的新挑戰不單服膺數位時代下的收視趨勢，也審視創新服務與公平性和普及性的原則，特別是以台灣為小公視小市場的特殊脈絡，如何掌握與國際影視平台之間的競合關係，並且擴大公視的數位公共服務優勢，以達公共廣電服務

真正的意義。

表一：公視+上線以來所推出的付費戲劇

公視主頻播出時間	劇集	其他播出的商業平台
2018/7/7 每周六 21:00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Netflix Line TV MyVideo
2019/10/6 每周六 21:00	通靈少女 2	HBO HBO GO 和 HBO 隨選視訊服 (HBO on Demand) 全亞洲同步首播
2019/2/16 每周六 21:00	魂囚西門	Netflix Hami Video
2019/3/24 每周日 21:00	我們與惡的距離	CATCHPLAY HBO Asia
2019/6/8 每周六 21:00	噬罪者	Netflix 愛奇藝台灣站 FriDay 影音 LINE TV KKTV MyVideo
2019/11/16 每周六 21:00	糖糖 Online	Netflix
2020/5/16 每周六 21:00	路~台灣 Express~	CATCHPLAY LINE TV friDay 影音 中華電信 MOD HamiVideo

		MyVideo
2020/ 12/5 每周六 21:00	返校	Netflix
2021 /1/2 每周六 21:00	大債時代	Netflix
2021/2/20 每周六 21:00	天橋上的魔術師	Netflix MyVideo
2021/5/1 每周六 21:00	火神的眼淚	MyVideo Netflix
2021/8/14 每周六 21:00	斯卡羅	LINE TV Netflix MyVideo Hami Video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除了受重視的戲劇類型外，最後提出在《公視+》，仍有一些新的「自製」節目嘗試，自《公視+》2017年成立以來，共計有三部：【博恩在脫口秀的前一天爆炸】、【百年未來】、【懂了也沒用的台灣史】，共有特點都是以短影音節目，同時適應串流平台和網路型態。【百年未來】另有搭配360度全景技術的【未來百年】網站，讓公眾參與總統府的歷史。這類新媒體科技的運用，也出現於【返校】、【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的行銷策略（公視全媒體專案中心，2021）。換言之，《公視+》也可視為是台灣公共媒體平台公共服務的創新實踐。

這個公共實踐擴大「觀眾」的傳統想像，也改變「線性」觀看模式。《公視+》透過新媒體科技，將所謂前述的 PSM 中的媒體特性發揮，前面提到的迷你影集【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另外開發線上遊戲《KIDZ 孩子》，更因此得到2018年新加坡亞洲電視學院獎之最佳電玩獎。台灣公視除了思考戲劇內容貼合社會親子議題與時事脈動，更透過多元內容與介面，

親近不同世代的閱聽人，特別是該影集觸及親少年生活與升學相關議題，而透過線上遊戲設計的形式，某個程度上也拉近了「網路原生代」的青少年們。

另一個創新的案例是公視【返校】影集，原本【返校】已是解謎式恐怖冒險類線上遊戲（2017），並於 2019 年被改編為電影。2020 年公視不僅改編成電視劇，更同時利用跨媒體敘事策略進行宣傳。原本電影和電玩的名氣就已具知名度，公視推出【返校】影集時，利用新媒體和影音平台的特性，採用另類實境遊戲（alternative reality game）的行銷和推廣方式，採用了商業媒體較少使用的所應用的跨媒體的敘事和行銷方式，運用平台包括臉書、Line、BBS 和【返校】等，利用【返校】故事，串起各社群媒體平台間的互動、新觀眾的加入（公視全媒體專案中心，2021）。公視新媒體部對於未來的公視影音內容的公共服務策略時，更投入開發觀眾、貼近更多不同類型的數位時代下的網路使用者，嘗試以創新的社群媒體節目宣傳、互動式體驗遊戲與跨平台合作放映形式，服務更多觀眾。

因此，就公共廣電媒體在串流媒體時代的發展，如何能在競爭激烈的 OTT 市場中明確定位，為未來的重要課題，策展型內容導向和新媒體試驗是目前較清楚和可行的方向；再者，串流時代下的普及性原則也需要再思考，如何妥善運用串流平台時代的數據化和個人化功能，發展出不同於商業串流影音平台的可能；然而，公共廣電服務與商業串流的競合關係會更加複雜，公共和商業也很難再涇渭分明，誠如公視前執行副理謝翠玉在公視《開鏡》週刊表示，公視+在未來不只服務公視，只要政策許可，亦可服務其他業者甚至進行版權處理或者商業營運（公共電視，2019）。然而，合作關係是否讓公共廣電的品牌受到影響，也是未來值得觀察的方向。

肆、結論

本研究觀察當代的公共串流媒體平台的公共服務的發展趨勢，以及其所面臨的困境，探究公共廣電服務，從扮演優質內容提供者的角度，如何在串流時代下，掌握平台通道，強化數位時代的公共媒體服務效能。

公共電視季刊《開鏡》於 2017 年 7 月創刊後，可見公視對於國際串流趨勢的關注與反思，了解公視對於串流平台公共服務的想像、設置與發展。例如多篇文章探討公共廣電與國際串流平台之間的競合關係。有關國際平台對公共廣電的威脅，不同的公共媒體採取不同的策略，但無論處於大或小市場的公共媒體，都仍備感威脅，而成為數位變革策略的契機之一，無論是針對公共媒體本身的策略，或是對於該國影視政策的改革。公視研究員王菲菲（2017，頁 113）曾指出澳洲保護本土影視產製政策，面臨國際串流平台來襲，應重新調整政策內容的問題。公視副研究員王如蘭對於台灣公視的串流發展也提出看法：

雖然如 Netflix 與 HBO 多已經開始製作所謂的台灣本土內容，但是終究是純粹的利益考量，委製內容數量與時數均不多，台灣業者是否只是一個代工的角色？能有多少自身的創作理念與台灣價值在其中？建議政府應積極鼓勵業界整合一有頻寬、技術與內容力的國家隊，提供以台灣原創內容為主的 OTT 服務。並依羅世宏教授建議，政府可以借鏡德國、法國以及加拿大等國的立法行動，對境外 OTT TV 平台課徵特別稅，用以挹注並扶植本國優質自製影視內容。避免台灣在全球眼球競爭大戰中逐步消失產業競爭力與文化主體性（開鏡 2019, no.8, 頁 127）。

公共廣電在激烈競爭的串流媒體市場中的新策略，透過國際的公共廣電的在不同市場類型中的競爭策略，並且回應當目前串流平台研究社群缺乏有關公共廣電的回應策略與創新，並從普及性、多元性、近用性思考數位時代的公媒責任，與創新策略如何因應商業平台的競爭與合作，同時不失去公共價值。《公視+》目前的發展仍屬初步階段，資源仍不足。另一方面，《公視+》維持原本的節目規劃，創新利用平台化媒體的特性，公共服務媒體對於數位時代下的文化的參與形式，不僅只限於「線性觀看具有公共意涵的文

本」，而可是透過更多元平台服務與連結、創新內容策展體驗，增強數位時代下文化公共增值服務。台灣公視推出《公視+》之後，在數位時代下開創新的平台服務，更貼近了閱聽人的新收視與體驗資訊的習慣，也達成公共服務媒體的普及性原則。公共模式的改變，回應前述的《公視+》相關系統設計，例如：登錄系統、付費模式等，則回到以公共服務為前的資料收集與公開說明的方式，以更能清楚、多元、公共的方式展現「公共服務演算法」，或許能突破既有的「公共」想像，而有更多創新的數位平台公共服務。再者，在內容的編排上，透過編輯主題策展，結合公共議題與時事，讓平台閱聽人可以以更迅速的方式接收資訊，這種內容策展方式改善原先在網路平台上各種以商業或私利為目的雜亂的資訊洪流，透過結構化與系統化的主題策展，讓網路使用者可以更有效的方式近用資訊。《公視+》在創新和數位公共服務的平台策展與設計，重新定位公共服務媒體創新服務，也帶給平台閱聽人新的新內容與新的參與。

參考書目

- 文化內容策進院 (2021)。〈當串流文化轉型已成趨勢，面對韓流侵襲、Netflix 等國際巨頭… 本土業者該如何因應？- OTT 產業諮詢交流會〉。
取自 <https://taicca.tw/article/851f68e5>
- 王如蘭 (2019)。〈Disney+ 將展開全球眼球攻霸戰〉，《開鏡》，8:127。
- 公共電視 (2019)。〈公視準備好了!〉，《開鏡》，9: 102。
- 公視全媒體專案中心 (2021)。〈返校影集-- 行銷與 ARG 結合時〉。取自 <https://reurl.cc/RrIL2n>
- 王菲菲 (2017)。〈澳大利亞主張「說自己的故事」〉，《開鏡》，1:113。
- 何國華 (2019)。〈合作與協作 讓線性廣電得以永續〉，《開鏡》，8: 128。
- 李彰 (2019)。〈打造公共串流媒體 公視+收穫滿滿〉，《開鏡》，8。
- 李彰 (2021)。〈因應串流時代，歐洲公共媒體建立戲劇合製新局〉。岩花館。取自 <https://rnd.pts.org.tw/Home/Article/FL20210330135718>
- 唐子晴 (2018)。〈《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爆紅後，LINE TV 加倍購買版權，揭露流量勝出兩關鍵〉，《數位時代》。取自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0742/line-tv-ott>
- 唐子晴 (2019)。〈打敗 Netflix 奪下《我們與惡的距離》版權，CatchPlay 讓「台劇之光」躍上國際〉，《數位時代》。取自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3576/the-world-between-us-and-catchplay>
- 蔡蕙如 (2020)。〈串流媒體時代下的閱聽人商品觀點再檢視：以傳播政治經濟學觀點分析 Netflix 追劇勞動〉，《中華傳播學刊》，37: 83-112。
- 蔡蕙如、林玉鵬 (2019)。〈蘋論：《與惡》風光結局「公視+」須創新局〉，《蘋果日報》。取自 <https://tw.appledaily.com/forum/20190422/7R2T4C4S56S4R7M3GOQA6O OKL4/>
- 顏理謙 (2016) 〈內容決勝負！台灣 OTT 百家爭鳴〉，《數位時代》。取自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1346/taiwan-ott>
- 鍾智凱 (2021 年 8 月 16 日)。〈《斯卡羅》首播奪冠！收視破公視開台 21 年紀錄〉，《自由時報》。取自 <https://ent.ltn.com.tw/news/breakingnews/3640078>
- Colbjørnsen T. (2021). The streaming network: Conceptualizing distribution economy, technology, and power in streaming media services. *Convergence*. 27(5):1264-1287.. doi:10.1177/1354856520966911
- d'Arma A, Raats T, Steemers J. (2021). Public service media in the age of SVoD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SM strategic responses in Flanders, Italy and

- the UK. *Media, Culture & Society*. doi:10.1177/0163443720972909
- Donders K. (2019). Public service media beyond the digital hype: distribution strategies in a platform era. *Media, Culture & Society*. 41(7):1011-1028. doi:10.1177/0163443719857616
- Hallinan B, Striplas T.(2016). Recommended for you: The Netflix Prize and the production of algorithmic culture. *New Media & Society*. 18(1):117-137. doi:10.1177/1461444814538646
- Jenner, M. (2018). *Netflix and the re-invention of television*.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 Jenner, M. (2017). Binge-watching: Video-on-demand, quality TV and mainstreaming fando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0(3), 304-320.
- Lee, Y. (2018). Public service online video achieve universalism? An overview and discussion on Taiwan PTS+ and its business model. Presented at Revisionary Interpretations of the Public Enterprise in Media (RIPE, 2018). Retrieved from https://info.pts.org.tw/open/paper/2018/doc2018/2018_021.pdf
- Li, N. (2021). Netflix Has Invested \$700 Million USD in Upcoming Korean Content. *Hyperbeat*. Retrieved from <https://hypebeast.com/2021/1/netflix-700-million-usd-korean-content-investment-info>
- Lobato, R. (2017). *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TV flows research in the age of Netflix*. *Television & New Media*, 19(3), 241-256.
- Lobato, R. (2019). *Netflix nations: The geography of digital distribution*. New York, NY: New York University.
- Lotz AD. (2021). In between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Mapping the geographies of Netflix as a multinational servi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4 (2) :195-215. doi:10.1177/1367877920953166
- Ofcom. (2019). *Media Nations*. UK: Ofcom. Retrieved from <https://www.ofcom.org.uk/research-and-data/tv-radio-and-on-dem-and/media-nations-reports/media-nations-2019>
- Ofcom. (2020). *Small Screen: Big Debate Consultation- The Future of Public Service Media*. UK: Ofcom. Retrieved from <https://www.smallscreenbigdebate.co.uk/consultation>
- Martin, E. M.(2021). Can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survive Silicon Valley? Synthesizing leadership perspectives at the BBC, PBS, NPR, CPB and local U.S. stations. *Technology in Society*, 64. doi.org/10.1016/j.techsoc.2020.101451
- Raats, T. & Donders, K. (2020). Television Distribution in Flanders: Who Takes the Lead and Is Content Always King? In Petr Szczepanik, Pavel Zahrádka, Jakub Macek, Paul Stepan (eds). *Digital Peripheries- The Online Circulation of Audiovisual Content from the Small Market Perspective* (pp.125-144).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 Raats T & Jensen PM. (2020). The Role of Public Service Media in Sustaining TV Drama in Small Markets. *Television & New Media*. 22(7) :835-855. doi:10.1177/1527476420913398
- Rios S, Scarlata A.(2018). Locating SVOD in Australia and Mexico: Stan and Blim contend with Netflix. *Critical Studies in Television*. 13(4):475-490. doi:10.1177/1749602018798158
- Spilker HS, Colbjørnsen T. (2020). The dimensions of streaming: toward a typology of an evolving concept. *Media, Culture & Society*. 42 (7-8) :1210-1225. doi:10.1177/0163443720904587
- Van den Bulck H, Moe H. (2018). Public service media, universality and personalisation through algorithms: mapping strategies and exploring dilemma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40(6):875-892. doi:10.1177/0163443717734407
- Wayne, M. (2018). Netflix, Amazon, and branded television content in subscription video on-demand portals. *Media, Culture & Society*,40(5), 725-741.
- Waterson, J. (2019, Nov 6). Channel 4 to join new UK streaming platform BritBox. *The Guardia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tv-and-radio/2019/nov/06/channel-4-to-join-new-uk-streaming-platform-britbox>
- Waterson, J. (2022, May 26). BBC announces raft of closures with CBBC and BBC Four to be online only. *The Guardia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2022/may/26/bbc-announces-raft-of-closures-cbbc-four-online-only>

New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in the digital era: The case of PTS+ in Taiwan

Yu-Peng LIN & Hui-Ju TSAI

ABSTRACT

In this era of platformization, when the majority of viewers rely on a few platforms (such as Google, Facebook, and YouTube) to perform various daily activities and receive information and entertainment, global public media services face new challenges. The new viewing habits of the platform generation have an impact on public media, leading to fresh demands for platform public services to be more innovative. This research will start from the video streaming platforms of public media in the digital age and further analyze and explain how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beyond producing high-quality television programs, can develop and produce public service programming in the digital age of streaming platforms. The first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al direction of the Taiwan PTS+ streaming platform, discussing the mechanisms of this service and how the offered content is curated. The second perspective examines how Taiwan PTS cooperates with domestic and foreign streaming platforms to distribute their television dramas. The study also attempt to asks this question: what are the possibilities for the positioning and development of PT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digital curation,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streaming platform, Taiwan PTS+

*Yu-Peng Li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aiwan Languages and Communication, National United University.

Hui-Ju Tsai,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Deaprtment of Adult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在傳統和數位之間擺盪： 台灣公視的全媒體轉型

羅慧雯*

本文引用格式

羅慧雯 (2022)。〈在傳統和數位之間擺盪：台灣公視的全媒體轉型〉，《傳播、文化與政治》，15:29-65。

投稿日期：2022 年 3 月 2 日；通過日期：2022 年 5 月 4 日。

*本文完成於 2021 年 10 月，文中數據即依當時，未再更新。作者羅慧雯為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助理教授，曾任公共電視第六屆董事。
e-mail：hwlo@mail.shu.edu.tw。

《摘要》

在使用者紛紛轉向網路和行動載具的趨勢中，公共廣電如何轉型以因應使用者行為變化，是許多國家公共廣電的重要課題。

台灣公視於 2017 年宣布全媒體轉型，成立全媒體專案中心和「公視+」線上影音平台，2018 年公視新聞部也成立 P#新聞實驗室，不定期推出數位專題策展。公視為何一改過去對新媒體的保守態度開始進行轉型？公視如何轉型？本研究以策略管理學的意義建構理論、主導邏輯概念，和深度訪談法、次級資料分析法，探討公視管理階層如何認知全媒體轉型的意義，如何透過轉型來實踐公共電視理念；也分析公視目前的全媒體轉型策略和主導邏輯，最後檢討轉型困境，期使研究成果對台灣公共媒體未來發展有所助益。

關鍵詞：公共服務媒體、公共電視、主導邏輯、全媒體轉型、意義建構理論

壹、前言

公共廣電制度出現已近百年，近四十年來，隨著媒體環境變化，公共廣電存在的必要性屢屢受到挑戰。公共廣電在過去被認為是民主社會的重要基石，提供公眾資訊、促進公共事務討論、實踐公共領域、滿足教育文化等多元需求。如今網路提供更多資訊和更多討論空間，是否還需要公共廣電來達成公共領域？在使用者紛紛轉向網路和行動載具的趨勢中，公共廣電該如何轉型以因應使用者行為的變化？成為許多國家公共廣電的重要課題。

台灣公視從 1980 年時任行政院院長孫運璿倡議公共電視算起，歷經十八年艱辛的建台歷程。1992 年 9 月行政院始將公共電視法草案送至立法院審查，耗時四年多後，終於在 1997 年三讀通過。立法階段的主要爭議在於如何透過制度設計來維持公視獨立性，例如董監事選任須達審查委員四分之三同意的高門檻、經費來源的公共性¹等等。為防止政府干預新聞，立法院還通過附帶決議，明定 2002 年 7 月之前公視不可製作每日新聞。然而媒體作為公共領域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提供資訊，這樣的決議導致公視在關鍵的品牌形象建立時刻與每日新聞脫鉤，使得公視不提供每日新聞的印象深植人心，後來即使公視推出每日新聞，表現也較不受外界注意。加上公視新聞部採製作人制²，也導致新聞部較難產生整合性策略來回應變化中的社會需求。此外，戲劇或藝文等其他類型的節目也無法跟上使用者閱聽行為的劇烈變化，因為

¹當時立法院曾討論過經費應來自三家無線電視台營業額或稅後盈餘的一定比例，因無線電視台反對，公視經費才改為由政府捐贈。公視建台歷程之崎嶇，參見魏玠、林麗雲（2012）。

²公視自開台起，每屆總經理都和公視新聞部簽訂新聞製播公約，公約中明訂「公視新聞部採製作人制，製作人在新聞部編輯方針指導下，為其製作節目的決策者，對節目內容負全責」。製播公約中也規定「董事會、總經理、經理等主管，不得以任何有違新聞專業精神的理由，干預新聞專業和自律空間」（公視製播公約：https://info.pts.org.tw/open/data/prg/2004news_produce_rule.pdf）。製作人制旨在維護公視新聞和新聞性節目的專業自主，但在實際運作中卻被過分強調，導致新聞部經理從指揮官的角色淪為行政。最典型的例子是早中晚三節新聞各有一個製作人，新聞部經理卻不介入統合三節新聞的調性。

法定預算僅有九億元，資源多集中在電視製作，導致公視拓展新媒體或多媒體平台的能量不足。在這樣特殊的歷史背景與組織文化下，台灣公視仍在 2017 年宣布全媒體轉型，不僅成立「全媒體專案中心」和「公視+」線上影音平台，2018 年新聞部還成立「P#新聞實驗室」，不定期推出數位專題策展。這樣大幅度的轉變顯然不同於公視過去較保守的新媒體策略，為何公視會出現全媒體轉型？公視管理階層如何認知轉型的意義？如何轉型？轉型是否成功？是本研究最初的問題意識。

策略管理學者認為管理階層對環境變化的感知能力、管理階層的思維是組織變革或轉型成功與否的關鍵。本研究以意義建構理論、主導邏輯概念，和深度訪談法、次級資料分析法，探討公視管理階層如何認知全媒體轉型的意義，及如何透過轉型來實踐公共電視的理念；也分析公視目前的全媒體轉型策略和主導邏輯，最後檢討轉型的困境，期使研究成果對台灣公共媒體未來發展有所助益。

貳、文獻檢閱

一、從公共廣電（PSB）到公共媒體（PSM）

世界最早的公共廣電機構是英國的 BBC，其第一任總經理 John Reith 擘劃「告知、教育、娛樂」三大任務，為 BBC 的發展奠下良好基礎，其理念也影響世界各國公共廣電。公共領域也是公共廣電正當性的理論依據，哈伯瑪斯是最早清楚論述媒體和公共領域關係的學者，雖然哈伯瑪斯並未直接論述過公共廣電和公共領域的關係，但有許多學者引用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概念來探討公共廣電，Garnham 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1986, 1992, 2003）。他主張自由民主社會必須有公共領域，由於公共廣電實踐平等、正義等普世價值，和哈伯瑪斯提出的公共領域的理想非常接近，因此他支持公共廣電。後續也有許多傳播政治經濟學者（例如 Curran, 2002; Murdock & Golding, 1989），也都指出公共廣電（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簡稱 PSB）是最能體現公共領域的媒體制度，公共廣播讓所有人平等地獲得廣泛且多樣的資訊、娛樂、文化服務，這是民主社會中重要的公民權利。

80 年代後，公共廣播的正當性逐漸受到挑戰。首先是衛星和有線電視的興起，瓦解了頻道稀有性的神話，因為商業性質的新興頻道也提供豐富的新聞資訊和多元節目，財源來自國家或公眾的公共廣播，其存在之正當性遂受到質疑。進入數位時代後，網路提供更多資訊和更多討論空間，是否還需要公共廣播來達成公共領域、促進民主？也成為重要議題。如今是觀眾碎片化的時代，觀眾可在各種數位平台上消費隨選視訊，內容豐富多元，公共廣播的必要性更成為各國傳播政策論辯之主題（Larsen, 2014）。

進入 2000 年後，國外陸續有許多專家學者呼籲將公共廣播 PSB 轉型為公共服務媒體 PSM，提供多平台服務，並與閱聽人有更多的互動與溝通。這樣的呼籲與媒體環境丕變有關，Coleman（2004）以三個特徵來描述當時公共廣播所面對的環境變化，從傳輸到互動（from transmission to interaction）、從地方到空間（from place to space）、從距離到審議（from distance to deliberation），強調數位時代的公共媒體除了服務範圍擴大之外，還有更深的民主意涵。Bardoel & Lowe（2007）則主張公共媒體必須從「供給導向的公共廣播文化」轉型為「需求導向的公共服務媒體文化」。另外也有許多學者聚焦在「公共」，主張公共服務媒體的責任就是將閱聽人視為公民，鼓勵閱聽人互動參與，以閱聽人為中心（Walvaart, 2019）。

倡導公共媒體的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於 2007 年的建議案中正式採用「公共服務媒體」（Public Service Media，簡稱 PSM）此一用語，強調公共服務媒體依循科技中立原則，應在不同平台提供不同的服務（Aslama, 2008）。此外，每兩年舉辦一次研討會的 RIPE 網絡，旨在推動學界與實務界討論公共媒體的重要議題，亦自 2008 年開始皆以公共服務媒體為主題，取代以往所使用的公共服務廣播（胡元輝，2020）。

但從公共廣播到公共服務媒體，價值理念並沒有太大的差異。根據世界廣播與電視理事會（World Radio and Television Council）2001 年所

出版的《公共廣電：為何？如何？》（*Public broadcasting: Why? How?*），公共廣電應具備四項原則：首先是「普及」（universal），讓公眾得以接近使用，不受階級或收入影響。再者是「多元」（diversity），公共廣電應達成節目類型、閱聽眾類型，討論議題等三面向的多樣呈現。第三是「獨立」（independence），公共廣電是意見自由表達的場所，促成各種資訊、想法與批評的自由流通，不受特定群體或力量的干涉。第四是「獨特性」（distinctness），公共廣電的獨特性能使大眾區分其服務和其他業者的不同，公共廣電必須產製其他業者不感興趣的節目，也必須服務被其他業者忽略的閱聽人。公共廣電應勇於創新、創造新節目、新類型，以帶動整個產業。

至於公共服務媒體的核心價值，根據歐洲廣電聯盟（European Broadcasting Union, 2012）³公布的文件（*Empowering Society: A Declaration on the Core Values of Public Service Media*），PSM 的核心價值簡述如下：

（一）普及（universality）：提供內容至社會的各個角落，不排除任何人、任何地方。強調觀點和意見多元的重要性，我們創造一個公共領域，公民可在這公共領域中形成他們自己的意見和想法。我們的目標是凝聚社會。我們是多媒體平台，以各種形式分享我們的內容，也讓每個人都能接近使用，我們啟發閱聽眾參與民主社會。

（二）獨立（independence）；我們不偏不倚，不受政治、商業和其他因素或意識形態影響。在節目製播、編輯決策、人事等方面都保持獨立自主。

（三）卓越（excellence）：節目專業且成為業界標竿。我們賦權和啟發觀眾、豐富他們的生活。觀眾參與我們的活動，觀眾也是新聞和節目的協力者。

³「歐洲廣電聯盟」（European Broadcasting Union, 簡稱 EBU）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公共廣電聯盟。

(四)多元 (**diversity**)：致力提供多樣和多元的節目給不同的世代、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主流或弱勢。促成一個包容的、較少分裂的社會。

(五)問責 (**accountability**)：開放並傾聽閱聽人，持續進行有意義的辯論。公開編輯準則，解釋並修正錯誤。報告我們的方針、預算、編輯選擇。資訊透明並誠心面對公眾的檢驗，期待閱聽眾瞭解公共服務媒體的運作。也依據良善治理的原則有效經營。

(六)創新 (**innovation**)：豐富媒體環境，成為創新與創意的驅動力，發展新的節目形式、新技術、連結閱聽眾的新方式。訓練員工一起型塑數位的未來，服務公眾。

比較上述兩份資料得知，無論環境和科技如何變化，普及、多元、獨立、獨特和創新，都是公共廣電和公共服務媒體的核心價值，但公共服務媒體更強調問責，也更強調利用多媒體平台和公眾互動、和公眾之間的連結、鼓勵公眾的協力或參與。就如 Bardoel 與 Lowe (2007) 所指出的，多媒體時代中，PSM 必須超越既有的服務和營運模式，提供更多服務給公眾，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公眾不應是目標 (**target**) 而是伙伴 (**partner**)。Clark 與 Aufderheide (2009) 也主張參與式公眾 (**engaged publics**) 是新型公共媒體的核心。學者 Jakubowicz (2010) 將 PSM 的概念定義為「PSB + 所有相關的平臺 + Web 2.0」，意指公共廣電必須朝向多媒體 (**multimediality**) 發展，並於多媒體平台提供服務。

PSM 利用多平台提供服務、讓公眾有更多的參與，除了發展自身的多媒體平台 (例如網站、App、OTT) 之外，利用第三方平台也是方法之一。根據路透社研究員 Sehl 等人的研究，許多歐洲國家的公共媒體都利用社群媒體平台 (例如 Google, Facebook, Twitter, YouTube)，觸及年輕閱聽眾及潛在閱聽眾。這樣的策略雖然可擴大公共媒體的影響力，但也有很多風險。一來是社群媒體的運作並不透明，也無法預測，將 PSM 的數位策略依附在其他平台上，會有受制於人的風險。再者，社群媒體使內容和閱聽人都碎片化，容易形成過濾泡泡 (**filter bubble**) 或同溫層現象 (**echo chamber**)，難以達成公共媒體藉由多元內容促進溝通的使命。更重要的

是，閱聽人若藉由社群媒體接觸公共媒體的內容，可能無法辨識出內容是由公共媒體所提供，影響到閱聽人對公共媒體的品牌認知。因此實務上，各國公共媒體大多採取多管齊下的策略，既發展自己的網站和 App，也利用第三方平台觸及年輕閱聽眾（Sehl et al. 2016: 32-37）。

二、全媒體轉型

「全媒體」一詞在台灣學術研究中並不常見，陳順孝（2018）提出「全媒體」的定義，他認為「公共服務媒體」（PSM）是「全媒體」在公共廣電領域的說法，而「全媒體」是新媒體的最高境界，代表在內容開發（主要指的是內容不受固定篇幅或時段限制）、敘事形式（利用多樣媒材敘事，超連結、相互混搭、開放互動）、傳送模式、用戶關係、營運創收等五個面向都有創新。陳順孝也強調新舊媒體並不是截然二分，而是光譜的概念，越能開發新內容、發展新敘事形式、跨平台傳送訊息、與用戶共舞、拓展新營收模式的媒體越新，反之則越舊。

游梓翔（2017）也說明「全媒體」的意義，他說「今日的新媒體，未來必將變舊」，因此「新媒體」一詞並不適當，「全媒體」最適合來描述目前的現象。他指出，「全媒體」包含有兩個意義，第一是科技帶來媒體的融合或匯流，導致單一媒體包羅萬象的現象。例如報紙有影音連結，電視也有文字平台，所有媒體都有互動成分。第二個意義是閱聽眾也能參與內容產製，使用者成了「產用者」（producer），這些產用者又藉由「群媒」相連，這種共寫共創共享的現象，無論稱為用戶生成內容（UGC）或是同儕共創（peer production），都是「全媒體」。由此可見，游梓翔所說的「全媒體」是一種包括媒體、閱聽人、內容變化的社會現象，而陳順孝所說的「全媒體」主要是著重在媒體端五個面向的變化。

觀察近年來台灣公共電視公開資料（例如年度報告、公視《開鏡》季刊），「全媒體」一詞約出現於 2017 年之後，2017 年 3 月 16 日第 6 屆第 8 次董事會通過的三年計畫中包括有「完成公視全媒體產製流程修

訂」(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2018, 頁 5)。從脈絡來看, 相當於國外所稱之「公共服務媒體」, 如陳順孝所指出的, 「公共服務媒體」是「全媒體」在公共廣電領域的說法。由於公視對外與對內文件, 都使用「全媒體」而非「公共服務媒體」, 因此本研究題目也使用「全媒體」, 但並不探討游梓翔所說的全媒體現象, 而是聚焦於媒體端的變化。

國外學者探討公共廣電的轉型, 主要聚焦於多平台發展策略的探討。例如 Klein-Shagrir 與 Keinonen (2014) 比較芬蘭和以色列兩國的公共電視如何發展多平台 (multi-platform)。研究發現, 兩國的公共電視都試圖在科技變遷的環境中, 維持公共媒體的正當性、公共媒體與人的連結。兩個公視也都將多平台視為可使 PSB 的內容觸及更廣的機會和必要手段, 也都認定多媒體會成為人們媒體消費的新習慣。另一方面也都擔憂利用數位平台和商業服務 (例如 Facebook 和 YouTube) 雖可觸及更多年輕閱聽人, 卻可能因此無法貫徹普及服務的使命, 甚至可能因此受制於其他平台而影響公共媒體的獨立自主。研究也發現芬蘭的公共電視 Yle 較以色列的公共電視 IBA 積極, Yle 強調改革、活化組織, 也積極和閱聽人互動。而互動的意涵廣泛, Yle 鼓勵觀眾利用手機參與現場節目的投票活動、觀眾建議節目主題或來賓名單、甚至提供節目點子, 都算是互動。

Sehl 等人 (2016) 研究六個歐洲國家 (芬蘭、法國、義大利、英國等國) 的 PSM 如何在數位環境中提供新聞服務, 研究發現英國的 BBC 和芬蘭的 Yle 這兩家公共媒體的數位轉型最為成功。該研究指出 BBC 與 Yle 的成功主要表現在三方面: 持續的組織變革、對行動裝置的服務進行投資、重視社群媒體策略。該研究也指出 BBC 和 Yle 的成功有外部和內部因素。外部因素有四個, 首先是它們都處於網路和智慧型手機普及的環境中; 其次是財源也較為充裕; 第三、組織管理的特色是跨媒體平台的整合且集中式的管理; 第四、較不被政治力干涉, 免於頻繁應付政府和國會, 得以進行較長期的公共服務規劃。內部因素主要指的是「接納數位化」的組織文化, 管理階層清楚的公開強調, 必須進行改革來因應數位環境, 即使必須裁員或砍掉舊服務的經費 (Sehl et al. 2016, p.39)。

有關台灣公共電視轉型的研究並不多，陳雅萱（2012）以英國BBC的轉型經驗來反思台灣的公共電視，指出台灣的公共媒體政策消極，政府補助預算不足，最重要的是董監事選任的高門檻，導致董監事難以選出，延任的董事會也就難有突破性的發展，影響到公視的轉型。

徐福德（2017）的研究主要是透過對台灣公視（PTS）核心管理階層與部門員工的深度訪談、以及公共電視年度報告等次級資料的分析，探討台灣公視在邁向公共服務媒體（PSM）過程中主導邏輯之演進。該研究指出2017年的主導邏輯是「凝聚內部整合，推動新媒體研發與實驗基礎」，由於成文時間的關係，尚未探討2017年至今的轉型過程。

綜上所述，公共廣電的全媒體轉型，並不只是將內容從廣電媒體延伸至其他媒體、讓閱聽人在新興數位平台上也看得到公共廣電的內容而已，而是連組織、管理思維、內容敘事、閱聽人關係都有所轉變。本研究參考上述英國BBC和芬蘭Yle的成功經驗，以及陳順孝（2018）提出的全媒體定義，歸納公共廣電的全媒體轉型至少要包含以下三個重要面向：組織改造、發展多媒體平台、社群媒體策略，本研究主要從這三個面向來探討台灣公視的全媒體轉型。

三、意義建構與主導邏輯

組織變革或組織轉型都是非常複雜的過程，牽涉到很多不同層級的行動者，策略學者最關注的是管理者的角色（Walsh, 1995; Augier & Teece, 2009; Kaplan, 2011）。因為管理者是策略的主要發動者（initiator）與執行者（carrier），也是外部環境和外來資訊的最終詮釋者，其感知與詮釋的能力至關重要，關係著整個組織變革順利與否，也關係著競爭力的維持（Gioia & Chittipeddi, 1991; Kaplan, 2011; Maijanen, 2015a）。

意義建構（sense-making theory）和主導邏輯（dominant logic）是許多策略管理學者探討組織轉型時經常使用的概念，其聚焦於管理者的感知詮釋能力和管理者思維，以下簡述這兩個概念的意義與應用。

(一) 意義建構 (sense-making theory)

當組織成員遭遇動盪不安或不確定性狀況時，會藉由萃取或詮釋環境中的線索，以釐清究竟發生什麼事，並使用理由來建立秩序，對發生的事情「建構出意義」，如此才能安身立命，組織管理學者稱上述的過程為「意義建構」(Weick, 1995)。

「意義建構理論」強調人們所建構的意義是一種行動、選擇和解釋的持續過程，包含認知、情緒、行動等面向。意義建構也有強加秩序、抵抗偏差、簡化、和連結等四種功能 (Weick, 1995, p. 82)。

以 Weick 為首的組織管理學者提出意義建構過程具有七種特性，分述如下：

1.以認同建構為基礎：Weick 引用 Mead 的理論，指出人們透過與他人的互動，建構出不同的自我或認同；在與他人互動中，持續重新定義和調整自我，而組織也有相同的特性 (Weick, 1995, p. 22)。組織認同被視為組織的基礎，它描述出組織的特色，「我們是誰」的想法決定了人們如何行動和詮釋，也影響別人如何看我們 (形象)、如何回應我們，這些都會威脅或確認我們的認同 (Weick, 1995)。

2.具有回顧的特性：Weick引用Schulz「有意義的生活經驗」的概念，主張意義建構具有回顧性。我們能觀察到的所有事情都已成歷史，即使它短暫出現，在我們意識到之前它已成為我們記憶中的一部分。過去的事件提供人們發掘現今發生事件的意義，過去的事件在現今回顧時被重新解釋，雖然過去的事件和現今事件不一定相同，但人們可能有相同的感受 (Weick, 1995, pp. 23-25)。

3.行動者開創所察覺的環境：意義建構是一種行動與認知的結合，當人們創造環境，也是在理解自己所處的環境，就是在做意義建構。透過和其他意義建構者共同建構的過程，個人也成為環境的一部分。這就是為什麼意義建構不僅是詮釋、或理解文本，也包含創造文本 (Weick, 1995, p.31)。

4.意義建構並不只是一種個人的活動，也是社會性的活動：我們的想法、感情和行為往往會視別人而決定，雖然不必然要他們實際出現才能建構意義，僅是對他人的想像就會對我們的行動和詮釋造成影響。Blumer指出符

號互動是一種發生於內在的社會性互動，他人實際上並不存在。意義建構從來不會發生在與他人隔離的狀態，聽眾總是存在的，即使唱獨角戲（Weick 1995, p.76）。

5.具有持續進行的特性：意義建構是一個持續的過程，沒有清楚的起點或終點。但當我們注意或只標出期間的某些片段，就像是有一個清楚的起點與終點。我們能從中萃取特定的線索，並且創造出意義（Weick, 1995, pp. 42-43）。

6.具有聚焦和萃取線索的特性：雖然意義建構是一個無所不在的過程，但它經常快速到我們無法目擊到意義建構的過程，而僅能看到結果。要了解更多的意義建構，Weick 建議觀察那些意義建構過程延伸的狀況，例如兩難困境或矛盾。包括人們如何注意、萃取線索、美化他們所萃取的，都特別重要。人們認為他們所萃取的線索相當於獲得這些線索的情境。再者，這些線索也凸顯出原始材料中的特定意涵（Weick 1995, pp. 49-50）。

7.意義建構偏重合理性而非正確性：人們從事意義建構時只要言之成理，即使不正確也無所謂，因為不可能掌握所有的事實（Weick, 1995, p.56）。

Lowe 與 Maijanen（2019）指出，如今是媒體環境動盪的時代，以意義建構理論來了解策略管理者的工作，此其時矣。特別是傳統媒體要面對全球競爭和閱聽人偏好的反覆無常、使用者行為的碎片化，管理者的工作更具挑戰性。意義建構理論最適用於探討組織策略的變革，Gioia 與 Chittipeddi（1991）就曾以意義建構理論研究公立大學的策略變化；Maitlis（2005）探討英國交響樂團的意義建構模式；Lüscher 與 Lewis（2008）做丹麥樂高的研究（轉引自 Lowe & Maijanen, 2019）。Lowe 與 Maijanen（2019）也強調認同建構的必要性，媒體策略管理者必須持續更新「我們是誰」的說法，以回應變遷中的市場需求和客戶。特別是以公共服務為使命的公共媒體，更需要認同建構。

（二）主導邏輯（dominant logic）

Prahalad 與 Bettis (1986) 最早提出主導邏輯的概念，將其定義為「管理者概念化經營的方式，以此決定技術、產品開發、流通、廣告或人力資源管理上關鍵資源配置之決策」。也可說是「管理者的思維與世界觀」，透過其經營與管理工具所概念化而成，以實現其經營目標與經營決策」。在管理認知研究領域中，「主導邏輯」被視為是群體層次的心智模型知識結構，或高層管理團隊的認知地圖，其作用在於將複雜的實存簡化為普遍化的模式 (Prahalad & Bettis, 1986; Bettis & Prahalad, 1995; Walsh, 1995)。

Daft 與 Weick (1984, pp.285-86) 將組織定義為一種詮釋系統，「高層」的管理者為這個系統蒐集和詮釋資訊。雖然組織的其他部分或層級也處理資訊，但管理者終究是組織中最終詮釋資訊的人。Daft 與 Weick 定義此處的「詮釋」為，「說明事件並在高層管理者中發展出共識和概念結構的過程」。這是源於行為理論的說法，因組織或決策者資訊處理能力有限，因此他們需要簡化才能更好的因應複雜的世界和資訊。

Kor 與 Mesko (2013, p.235) 指出主導邏輯的重要性，「主導邏輯代表管理者對經營環境的世界觀，也代表應該做什麼事情」。主導邏輯中最重要的是對核心價值和信仰的共識，因為它們建立組織的正當性 (Bettis & Wong 2003; Eggers & Kaplan, 2013)。主導邏輯是組織本來就具有的成分，根深蒂固在組織的結構與過程和常規中，就像是其他常規行為一樣，是一種很深的路徑依賴 (path-dependent)，很難改變 (Nelson & Winter, 1982)。但主導邏輯並不是不會改變，特別是組織在經歷巨大改變時，既有的主導邏輯就容易被挑戰被質疑，從而組織認同和組織目的也變得不穩定。這是一個充滿辯證的過程，源於變革和延續現狀這兩種壓力間存在著緊張關係 (Balogun, 2007; Bartunek, 1984)。現行的主導邏輯會妨礙新邏輯的學習，因此管理者和組織會傾向以舊的策略框架機制繼續去形塑和解決問題 (Bettis & Wong, 2003)。

出身於芬蘭公共媒體 Yle 的學者 Päivi Maijanen 多年來以組織、策略管理等理論研究歐洲公共媒體和組織變革。她曾使用主導邏輯的概念和內容分析研究法，分析芬蘭公共電視 Yle 歷年的年報，探討 1976 年至 2012 年這四十多年來 Yle 的管理思維和主導邏輯之變化 (Maijanen, 2015b)。Maijanen 將主導邏輯分為五類，分別為 Yle 的使命、科技、競爭者、閱聽人關係、內容。

並依主導邏輯的變化將上述的研究期間區分為五個階段：道德監控期（1976-1980）、防禦期（1981-1984）、反擊期（1986-1993）、科技承諾期（1994-2004）、開放期（2005-2012）。主導邏輯在「防禦期到反擊期」以及「科技承諾期到開放期」這兩個期間出現轉捩點。以後者為例，此時管理者認為與其他組織或企業的合作，可提供 Yle 更多發展機會與策略選項，並且在內容與服務方面，管理者強調 Yle 必須以閱聽人為導向，增進與閱聽眾之間的關係。Maijanen 認為無論在哪個時期，管理者的共同認知都是公共服務的使命，這也是 Yle 主導邏輯中最重要且穩定的成分，但不同時期「公共服務」被以不同的方式強調和詮釋，例如早期 Yle 的使命是維護芬蘭文化，現在則是創造芬蘭文化。

Maijanen 也曾和 Lowe 合作，以主導邏輯與意義建構兩個理論探討歐洲四個公共廣電媒體如何轉型為公共服務媒體（Lowe & Maijanen 2019）。研究對象是芬蘭的 Yle、德國的 NDR 和 RB、瑞典的 SVT 這四個公共媒體。作者對這四個媒體裡的高階管理者做深度訪談，探討媒體組織如何面對市場競爭和年輕閱聽眾流失的兩大挑戰，並釐清傳統公共廣電媒體的公共服務使命（public service mission）如何在轉型過程中被重新定義。研究結論為傳統公共媒體的公共服務理念雖然被認為是有用的，但要落實普及服務使命卻是個難題。再者，在轉型過程中，傳統廣電的主導邏輯與數位傳播邏輯在管理階層的工作中被並認為同等重要，管理者必須在改變和延續的兩種壓力下取得平衡。

胡元輝（2020）也應用主導邏輯的概念比較日本公共廣電 NHK 與美國芝加哥公視的 WTTW、聖保羅-明尼亞波利斯雙子城的 TPT，研究發現日本 NHK 現階段的主導邏輯仍相當程度停留在傳統的廣電邏輯。相對的，美國 TPT 與 WTTW 的組織變革則顯得積極，主管們對於邁向公共服務媒體的轉型都有高度認知，並願意透過組織變革來引導轉型。

綜合上述文獻檢閱結果，本研究以意義建構和主導邏輯兩個概念探討台灣公視的全媒體轉型，提出以下三個研究問題，並在結論中總結轉型的困境。

（1）公視的管理階層如何認知全媒體轉型？

- (2) 採取什麼樣的轉型策略？
- (3) 轉型過程中的主導邏輯為何？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取深度訪談法，輔以次級資料分析法，分析的次級資料有，公視董事會會議紀錄⁴、出版品（公視之友、開鏡）、網站、YouTube 頻道、粉絲專頁。

深度訪談對象主要是和內容產製決策相關的管理階層，包括前任總經理曹文傑⁵、節目部經理於蓓華、新聞部經理蘇啟禎、全媒體專案中心召集人李珩、P#新聞實驗室負責人卓冠齊。全媒體專案中心、P#新聞實驗室是公視因應轉型所設立的兩個組織，兩位小主管如何建構轉型的意義、做出轉型的策略，也關係著轉型成功與否，因此列為受訪者。訪談採用半結構式訪綱，由於研究旨在探討公視管理階層如何建構「全媒體轉型」的意義，並分析組織的主導邏輯是否轉變，因此訪談過程中提示受訪者意義建構理論，引導受訪者申論公視全媒體轉型的意義，並分析轉型策略，最後請受訪者歸納公視的主導邏輯。

訪談日期和進行方式如下表：

⁴ 也參考〈公視基金會新媒體諮詢委員會工作備忘錄〉。公視新媒體諮詢委員會由陳順孝董事於 2017 年 3 月召集成立，旨在推動公視的全媒體轉型，該委員會在 2019 年原定董事會換屆日期前即完成備忘錄，於 2019 年 10 月 17 日第六屆第 39 次董事會提出。備忘錄紀錄公視所有參與全媒體轉型的節目或專案，目的在將經驗傳承給下一屆董事。本研究參考這份備忘錄做轉型策略之分析，備忘錄是董事會會議附件資料，公眾都可調閱。

⁵ 總經理曹文傑於 2020 年 7 月 29 日因文化部委託公視國際影音平台前導計畫執行事件程序爭議問題而辭職，總經理一職由企劃部經理徐秋華代理，公視至今尚未遴選新任總經理。職是之故，本研究訪談對象為前任總經理。

表一：深度訪談名單

受訪者代號	職稱	訪談日期	訪談方式
A	總經理（前任）	2021 年 6 月 1 日	因疫情因素改以電話訪問。
B	節目部經理	2021 年 6 月 28 日	因疫情因素改以電話訪問。
C	新聞部經理	2021 年 2 月 23 日	因疫情因素改以電話訪問。
D	全媒體專案中心召集人	2020 年 12 月 17 日，2021 年 7 月 4 日	第一次於公共電視會議室中面訪，第二次電訪。
E	P#新聞實驗室負責人	2021 年 1 月 21 日，2021 年 7 月 3 日	第一次於公共電視會議室中面訪，第二次電訪。

肆、研究發現與討論

一、為因應使用者行為變化和實踐公共服務理念而轉型

公視為何進行全媒體轉型？公視管理階層如何認知全媒體轉型？對公視管理階層而言，全媒體轉型的意義為何？受訪者大多從環境中萃取線索來回應這些問題，主張是因為「使用者行為發生變化」，所以必須轉型，也強調基於對公視的組織認同，促使他們採取轉型策略來做好公共服務。受訪者對於意義建構理論的其他特性，例如回顧性、持續性等等，較少提及，因此

以下主要運用意義建構理論中的「萃取線索」和「組織認同」這兩個特性，分析公視管理階層對全媒體轉型的意義建構。

受訪者主要從個人經驗或調查資料來申論使用者行為的變化，受訪者 A、D 偏向個人的經驗與觀察，受訪者 B 除了個人經驗外，也因為出國交流，看到國外公共媒體的轉型經驗和作品，更感受到轉型的急迫性。受訪者 C、E 則是以調查資料來佐證。

受訪者 B 提到幾次出國參與 INPUT（世界公視大展，International Public Television Screening Conference）⁶帶給她的震撼。她說許多國家的公共媒體都在 INPUT 會議中提出觀眾已離開電視的警告，並說明他們的電視是拿來宣傳其他平台用的，在電視上告知觀眾到 YouTube、Facebook、或 Twitter 上收看節目首播。B 說，這樣的改變等於是宣告「主戰場都在新媒體上」。B 強調，看到國外經驗，再加上周遭許多人（包括公視員工）都已經是新媒體的重度使用者，感覺新媒體的轉型非常急迫。《青春發言人》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於 2016 年誕生，這是公視第一個在 FB 上首播的節目，也是受訪者 B 認定的第一個做數位轉型的節目。該節目受到 INPUT 會議中德國公視二台的「社群優先、電視第二」策略啟發，一推出就是「網路先播電視再播」的策略。所有影音先於《青春發言人》Facebook 粉絲專頁和 YouTube 專頻播放，再集結精華於電視播出⁷。

受訪者 A、D 則以自己的經驗來說明使用者行為的改變。

我們必須轉型，是因為觀眾收視行為已經改變，連我自己都不看電視，我來公視工作後才刻意看公共電視的電視頻道。現在人都很少看電視，生活文化的變化很大，看電視也不按照節目表看。我們（公

⁶ INPUT 成立於 1977 年，1978 年開始在不同國家舉辦年度世界公視大展，大展中放映世界各國的優秀節目，鼓勵公共電視的發展。

⁷ 《青春發言人》是一個以 13 至 18 歲青少年為目標觀眾的節目，為了配合行動裝置的播出型態，每則影音不超過 10 分鐘，電視則每集播出 15 分鐘。製作單位也利用 Facebook、YouTube，以圖文互動工具和觀眾溝通，讓公眾透過社群媒體加入討論。

共電視)若能提供給人隨時隨地都能看到的內容,不是很好嗎?(受訪者 A)

「我看到大家都到網路上,不看電視,所以我認知我的工作就是去服務那群在網路上的人。」(受訪者 D) 受訪者 C 則根據收視率調查的資料指出,「公共電視的主頻(CH13)是 44 歲或 60 歲以上的觀眾在收看,現在年輕人都使用網路而不看電視,公視一定要藉由網路轉型來擴大公共服務,要服務到年輕族群」。C 也提到各國公共媒體的做法,「不僅發展出更多網路服務,也將內容『一源多用』(同一套內容放在不同平台上),讓既有的資源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受訪者 E 則提到因為公視的一份內部報告,讓她意識到閱聽人的媒體使用行為已經出現天翻地覆的變化。這份報告是公視於 2018 年所出版的《新媒體收視使用行為研究報告》,報告中指出多數人使用手機瀏覽公視新聞網,公視新聞網是公視子網域中最多人跨網域造訪的地方。E 說,這份報告讓她進一步思考使用手機造訪公視網站方便嗎?公視新聞網對網路使用者友善嗎?新聞網的內容足以應付使用者需求嗎?

由上述的訪談得知,公視管理階層從環境變化中萃取出公視應該轉型的線索主要是「使用者行為的變化」,意義建構的內容則是主張公視要配合使用者的習慣,提供適合放在網路或社群媒體、其他平台的內容或服務。也如同意義建構理論指出的,意義建構包括有「行動者開創所察覺的環境」、「社會性」等特性,受訪者也藉由對其他人的觀察與互動,共同建構意義,使其產生公視應該要轉型的想法,創造出「意義的文本」。

下面以受訪者 D、E 的說法為例,看其如何說明全媒體轉型的合理性。「所謂全媒體轉型,我認為不只是電視規格變成網路規格而已,而是一種內容上的轉型,包括文章、迷因、梗圖、影音……。我們現在也做《觀點同不同》的網站,這是個和『公視+』連動的網站,我們在那裡設定議題、po 文章、放公視的節目。我們希望能引領公眾討論,發揮公視的影響力」。

受訪者 E 也強調，現在的使用者都習慣看整理過的「懶人包」、看網路直播，但公共電視提供的仍是傳統電視規格的內容，公視再不轉型，使用者會嚴重流失。

由此可知，受訪者對轉型意義建構的合理性，還包括製作「符合使用者習慣閱聽的內容」，因此除了將內容放到其他平台之外，公視也必須做內容的轉型。

各個受訪者不僅描述感知到使用者行為變化之外，也都強調公視必須進行全媒體轉型，才能服務更多閱聽人。由此可見，服務公眾是公視管理階層的共同理念。然而，「服務公眾」的意涵是什麼？誰是「公眾」？受訪者普遍提到公視的價值是《公視法》中所明定的「彌補商業之不足」。也就是說，商業媒體基於利潤考量，不做沒有收視率或點擊率的內容；但公視經費主要來自國家，不依賴廣告收入，可服務更多對象，包括弱勢、少數族群。

受訪者 B 說：

我最認同《公視法》的部分就是《公視法》第一條的「彌補商業台之不足」，這是公視很重要的功能。舉例而言，《誰來晚餐》每一季都有同志的故事，每次播這樣的故事收視率就會掉，我們很清楚這是商業台不會做的題目，所以我們一定要做。商業台也不做身心障礙者的節目，我們也做。

受訪者 A 主要從多元性來論述公視的價值。

我認為公視的主要價值就是做全民的媒體，為公共服務。例如同志議題，公視只要播出這議題都會被罵，但我認為就是該做，堅持要做。又例如《藝術很有事》，這是個藝文節目，雖然只有少數人在看，但我很鼓勵。我們做商業台不重視的藝文類型，就是在彰顯公共價值。我很同意公共電視法中說的「補商業之不足」，但覺得可以講得更好，是「照顧別人照顧不到的」、「服務別人服務不到的」。

受訪者 B 藉由疫情嚴峻時期公視在節目方面的應變，說明在人心不安時給予公眾情感上的支持、正確的知識、即時的新聞，也是公共媒體的價值。

公視的價值在這一波疫情中更顯現出來。公視受公眾所託付，服務公眾是我們的職責所在。尤其當社會有急難、人心不安時，更需要媒體提供新聞、資訊、知識，或心理衛教、娛樂、故事或不同角度的觀點。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今年（2021 年）五月多一發布第三級警戒，我就給公視的製作人、編導寫信，要大家想想公共媒體可以為台灣社會多做點什麼？身為公媒的內容產製者，可以為台灣社會、為公共、為他者，多做點什麼？

我建議大家的攝影機要打開來，去紀錄現在。我們的器材都是納稅人給的，要有責任感。只要有適當的點子，我們（管理階層）就可以想辦法提供防疫設備和資源去完成（受訪者 B）。

在這樣的理念下，《誰來晚餐》關心三級警戒下的偏鄉孩子能否順利遠距學習，做出了《撐五百萬大雨傘遠端上課！台灣三仙台的好學男孩》影片，這是節目企劃打了四百多通電話才找到的故事。講述一位台東三仙國小的學生，每天必須由媽媽騎機車載到三仙台隧道附近的高台，才能收到網路訊號，連上學校的遠距課程。該影片上傳到 YouTube 後，反應非常好，觀看次數很快就到數萬次。

三級警戒中公視發揮安定人心功能的節目還有《我又在市場待了一整天》（《我在市場待了一整天》的第二季），該粉專也在疫情中發揮安定人心的作用，邀請上過節目的市場工作人員，以疫情對市場工作的影響、他們在疫情中的心情為題，自拍影片上傳。

從這些節目單位對疫情的即時反應，可以看到各製作人對公視的組織認同，以及公視如何在疫情時期利用社群媒體實踐公視理念。

綜上所述，公視管理階層認知使用者行為發生大幅變化，因而主張公視必須以轉型來因應，而轉型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能持續貫徹公視服務公眾的價

值理念。本文文獻檢閱中提及芬蘭 Yle、德國 NDR 和 RB、瑞典 SVT 等四個公共媒體，其管理階層認知的環境變化主要是市場競爭和年輕閱聽眾流失，與之相較，台灣公視管理階層對環境變化的認知主要是使用者行為的變化，雖然也包括年輕閱聽眾不看電視，但公視管理階層並不特別重視市場競爭的問題。究其原因，在於台灣公視的定位主要在補商業之不足而非與商業媒體競爭，這樣的定位也導致公視對市場較不敏感，影響轉型策略。

二、轉型策略

本研究將全媒體轉型分為三個面向來觀察，分別是組織改造、發展多媒體平台、社群媒體經營。在組織改造方面，公視目前僅新設全媒體專案中心、P#新聞實驗室兩個組織來因應全媒體轉型。多媒體平台方面主要是發展公視自己的 OTT 影音平台「公視+」，由全媒體專案中心負責營運。社群媒體經營策略則由各節目製作單位各自經營，並沒有專責組織負責，沒有一致的策略。

（一）組織改造：成立創新團隊

公視具體規劃全媒體轉型是在第六屆董事會上任後（根據受訪者 A、受訪者 B），2017 年 3 月 14 日公視董監事暨主管策略會議決議，公廣集團願景為「建立公共服務媒體平台，看見台灣更美好的未來」，使命包括「1.以創用者為導向，進行多平台傳播」、「2.以實驗創新精神，帶動影視音產業」，三年目標包括「4.完成公視全媒體產製流程修訂」，具體策略也包括「5.成立新媒體諮詢委員會，廣納各方人才凝聚智慧及人脈」⁸。此決議經 2017 年 3 月 16 日第六屆第八次董事會確認通過，該會議中也通過新媒體諮詢委員會名單⁹，此後新媒體諮詢委員會針對公視新媒體業務之規劃與營運現況提供專業意見（新媒體諮詢委員會 2019）。

⁸ 該會議決議全文公布在公視網站的「公開資訊」。

⁹ 公視諮詢委員會制度源於公共電視法第 15 條第 10 項，「董事會可設置各類諮詢委員會，以制度化方式進行社會溝通，作為營運參考」。第六屆新媒體諮詢委員會名單

在董事會和新媒體諮詢委員會的積極運作下，公視有了初步的組織改造，但幅度並不大，僅在新媒體部¹⁰之下成立全媒體專案中心，新聞部之下成立 P#新聞實驗室。以性質來說，這兩個組織屬於創新團隊，類似英國 BBC 的 News Lab、芬蘭 Yle 的 Kioski，但規模卻遠遠不及。以下分析這兩個組織的定位與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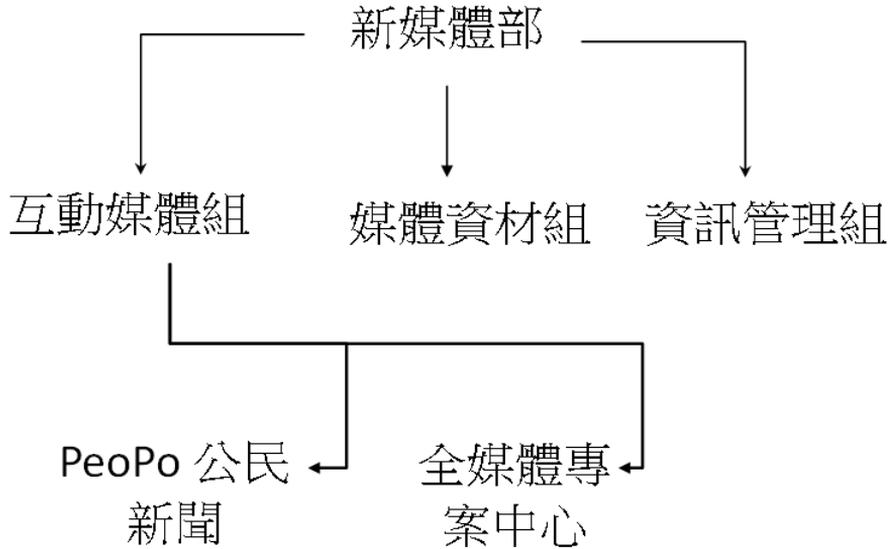
1. 媒體專案中心的定位與功能：2017 年 6 月 15 日，公視董事會決議成立全媒體專案中心，規劃由全媒體專案中心發揮編輯平台兼示範中心的功能，以使用者體驗為導向，發想並實驗各類專案。全媒體專案中心總監由執行副總經理謝翠玉擔任，新媒體部李彰擔任召集人，共有六個工作人員，其編制在新媒體部之下的互動媒體組¹¹，組織圖詳見圖一（新媒體諮詢委員會，2019）。

如下：公視董事有陳順孝（召集人）、馮小非、張天立（2019 年初請辭董事）、張玉佩、舒米恩魯畢；外部委員有，資料視覺化領域與網頁技術專家吳泰輝、社群經營專家李全興、時任 Yahoo! 奇摩媒體資訊事業部資深製作經理李怡志、作家黃哲斌、關鍵評論網內容總監楊士範、鏡周刊 READr 團隊總編輯簡信昌、PanSci 泛科學總編輯鄭國威、曾任公視紀錄片導演王瓊文(歿)。

¹⁰ 新媒體部的前身為資訊部，其定位為後勤單位，目前共有 58 人，除了「互動媒體組」之外，都是負責資訊管理與網頁設計、網頁維護業務的人員，並不能獨立產製數位內容，也不具備數據分析能力。

¹¹ 互動媒體組之下除了全媒體專案中心，還設有公民新聞平台，負責 PeoPo 公民新聞的營運。互動媒體組編制人數共有 33 人。

圖一：新媒體部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全媒體專案中心提供

全媒體專案中心第一年的運作方式是和各部门或製作單位互相接洽並討論可行的合作專案，各部门亦自行規劃執行專案。但專案中心成立第二年起，就無法發揮原定的「編輯平台兼示範中心」的功能，主因是全媒體專案中心在公視的組織架構中的位階太低，以及節目部和新聞部都各有內容專業，不容易溝通，尤其是新聞部，因恪遵新聞專業與獨立自主，並未與全媒體專案中心合作，僅有經驗的分享與交流（受訪者 D）。因此公視的全媒體轉型，就從原定的「全媒體專案中心主導」，轉為各部门各自經營的方式（新媒體諮詢委員會 2019）。

全媒體專案中心完成的著名專案有《博恩在脫口秀的前一天爆炸》，《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的電玩遊戲，《返校 ARG 線上解謎》。這些創新都使

公視原本的內容或新製內容得到更多的關注。此外，全媒體專案中心也經營「公視+」，《觀點同不同》網站、《劇夠》網站。

2.P#新聞實驗室的定位與功能：依 2018 年 9 月 20 日第六屆第二十六次公視董事會之決議，新聞部規劃「台灣公廣新聞網建置三年計畫」，並於當年 12 月成立「公廣新聞網全媒體實驗平台」(簡稱「全媒體實驗平台」)，2019 年 5 月，全媒體實驗平台正式定名為「P#新聞實驗室」，專網也同時上線¹²，以專題策展式新聞網站，提供每日新聞策展及數位敘事專輯，也經營社群媒體。「P#新聞實驗室」(以下簡稱實驗室)在官網上說明「#」的意義(如下圖)，「#」代表多元，也代表關鍵、數位，這些就是實驗室的工作內容。「以聚合公廣集團新聞資源為目標，採全媒體形式於多平台實驗，提供新一代的新聞資訊服務，啟動視網整合新聞數位轉型。」(受訪者 E)。

圖二：P#新聞實驗室的工作內容



資料來源：<https://newslab.pts.org.tw/about>

¹² 專網網址為：<https://newslab.pts.org.tw>

實驗室的具體發展方向是在新聞諮詢委員會¹³中由外部專家和新聞部人員一起腦力激盪後才確定的。實驗室初期設定的目標有三個，第一是將既有的影音加值，第二是數位專題策展，第三是做最小可行性產品（受訪者 C）。

在實驗室成立之前，新聞部針對網路使用者所提供的服務，僅有公視新聞網和「PNN 公視新聞議題中心」¹⁴。《我們的島》、《獨立特派員》、《有話好說》等個別節目雖有各自成立的 YouTube 專頻和 Facebook 粉絲專頁，但整體而言，公視新聞並沒有整合性思考，直到 2017 年新聞諮詢委員會成立後，才有公視新聞部全媒體轉型的具體方向（受訪者 C）。

實驗室成立之初為 7 人編制，包括製作人、數位編輯、社群企劃、視覺編導、美術編輯、前端工程師、以及 3 位實習生。2020 年 3 月和「公視新聞網」整併後人力編列為 14 人，同步進行「公視新聞網」改版，但技術創新團隊資源仍有限，例如編制內的前端工程師僅一人。從團隊編制來看，明顯與傳統電視製播的職務分類不同，「數位編輯、美術編輯、視覺編導、前端工程師」等職務顯現數位敘事、專案策展已打破傳統的新聞編採觀念（受訪者 E）。

打響 P#新聞實驗室知名度的是 2019 年 5 月起在 YouTube 專頻上架的《記者真心話》系列影片，該系列主要探討台灣媒體問題，第一集主題是「台灣媒體是怎麼爛掉的？」，甫推出就創下近百萬觀看次數的紀錄；第二集也是一推出觀看次數就破百萬，並且因為主題是「紅色滲透」，還遭片中指涉的紙媒以頭版來大張旗鼓的批評。《記者真心話》系列由台大新聞所研究生方君竹和實驗室合作完成，敘事風格與影片長度都類似時下的 YouTuber，節

¹³ 根據 2017 年 4 月 20 日第六屆第 9 次董事會的會議紀錄，新聞諮詢委員會成立的目的為，「引進外部專家智慧，協調資源分配，在既有基礎上強化公視新聞的質量，並積極拓展多元新聞內容與平台、服務國內各族群閱聽眾、擴大社會影響力，以落實公視作為一公共服務媒體（public service media, PSM）的重要使命」。諮詢委員會由兩位董事擔任召集人，邱家宜與羅慧雯，外部委員有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羅世宏、政大新聞系教授劉昌德、台大新聞所教授林麗雲、風傳媒副總編輯閻紀宇、天下雜誌資深研發長兼編輯部總主筆蕭富元。新聞諮詢委員會也曾就教中央廣播電台的經驗，促成公視東南亞語新聞的製播。

¹⁴ 「PNN 新聞議題中心」網站主要關注司法與人權新聞，在網路上提供有別於電視新聞的網路原生報導。

奏、語言、幽默感也都貼近現在的年輕人，有別於嚴肅的電視新聞專題。但新聞部內部也有批判聲，「有記者認為這樣的呈現違反公視原本客觀中立的原則，公視怎麼能走網紅路線？但不能否認的是，這樣的方式引發更多人來關心以媒體識讀為主題的公共議題」（受訪者 C）。

（二）發展多媒體平台：公視+的成立

公視於 1998 年開播，開播後就有網站服務，2007 年為落實公民近用媒體權，推出「PeoPo 公民新聞平台」，提供公民記者新聞報導的平台。2007 年起公視也在 YouTube 影音平台上建立公視的專頻。2010 年，公視新聞部建置「PNN 公視新聞議題中心」的部落格網站，提供民眾即時新聞資訊，有影音與文字，並與 Facebook 等社群網站連結，增加與閱聽人的互動。2015 年推出公視新聞網，也因應智慧型手機的普及，推出公視 APP（受訪者 C，受訪者 D）。

近年來公視在多媒體平台方面最大的進展是成立「公視+」。「公視+」的前身是「公視+7」，成立於 2016 年，主要服務對象是錯過公視節目的網路使用者，其作法是配合公視電視節目表安排隔日跟播，並提供網路限時回看七天的串流服務。2017 年 10 月，公視正式推出 OTT 影音平台「公視+」，提供更多電視節目表之外的內容。除了原有跟播公視電視頻道上的新製節目外，也將過去公視經典節目轉檔上傳供使用者隨選，包括戲劇、紀錄片、兒少、生活、藝文等類型。2019 年 1 月，「公視+」也推出 Android 行動 App，2019 年 10 月推出 iOS 的 App，服務更多不同族群。APP 的操作介面中有「觀看紀錄」、「節目收藏」與「螢幕投放」等功能。根據「公視+」提供的資料，公共電視的服務已穩定觸達網路世代，「公視+」的使用者也年輕化，主要集中在 25-34 歲，其次為 35-44 歲與 18-24 歲之觀眾。「公視+」的內容以免費為主，只有少數高人氣戲劇採用「單部付費」，例如《我們與惡的距離》。「公視+」2020 年總會員數突破 61 萬，2021 年 8 月會員數已超過 70 萬（受訪者 D）。

（三）社群媒體策略

許多國家的公共媒體都利用社群媒體（例如 Facebook, YouTube, Twitter）與閱聽人互動，鼓勵閱聽人參與（Sehl et al., 2016），台灣公視主要也是利用 Facebook、Instagram 和 YouTube 等第三方平台經營社群，但並沒有整體的社群經營策略，由節目單位各自經營，負責經營社群媒體的「小編」之間也少有交流。

公視主要發展社群媒體的節目有節目部的《青春發言人》、《誰來晚餐》、《藝術很有事》，新聞部的《我們的島》、《獨立特派員》、《有話好說》。新聞部還有 P#新聞實驗室開發具互動性的數位內容專案，實驗室本身也有 FB 粉絲專頁（受訪者 B、受訪者 C）。全媒體專案中心除了有《觀點同不同》、《劇夠》網站之外，也經營 FB 粉絲專頁「公視影音網」（受訪者 D）。

社群的經營策略也包括和外部的積極合作，一方面是借重外部人員的經驗和專業，一方面也可藉此擴大觸及率，發揮品牌加乘效果。

「在既有資源的限制之下，我們鼓勵各節目和外部合作，電視人需要數位原住民來幫忙。例如《青春發言人》就和《台灣吧》合作，講置入性行銷（業配文）的那一集就是用台灣吧的方式來講，這樣也可利用台灣吧的名氣和人氣，把觀眾吸引過來。另外也和「視網膜」、《法律白話文運動》合作過。」

「作為電視台，必須要 and KOL（關鍵意見領袖）做跨平台的合作，《誰來晚餐》和很多 YouTuber 合作，它的內容二創也會和 YouTuber 討論。此外，因為人力不足，也用外面的社群小編（以承攬契約），《公視表演廳》、《誰來晚餐》都是用外面的社群小編。」（受訪者 B）

新聞部中最積極進行轉型的是《我們的島》，該節目探討環境議題，以數位敘事和經營社群媒體兩種方式來進行轉型。該節目最著名的例子是 2017 年 12 月 26 日於粉絲專頁發表即時現場「澳洲聖誕島海龜困在垃圾堆」¹⁵的短片，震撼畫面在臉書發表後立即在網路發酵，高達三萬多次分享，這則影片後來被 BBC 重新製作，擴散至全球。

在內部缺乏社群媒體相關規範與訓練之狀況下，公視的社群媒體經營偶發爭議。2019 年公視台語台粉絲專頁的台語教學，將「番薯粉」發音標明「韓

¹⁵影片紀錄的是澳洲聖誕島小海龜在塑膠垃圾海灘中誕生的過程，由台灣生態學者劉烘昌在澳洲聖誕島進行陸蟹研究時意外拍下。

極混」，遭網友指責此舉在嘲諷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有違公視客觀中立的立場。

2020 年 9 月公視新聞網的粉絲專頁中，小編貼了一則公視新聞報導，講述中共製作以新疆為題的大外宣紀錄片，貼文中引用中共大外宣紀錄片的說法，維吾爾人烏蘭「在南京電子廠一個月賺取 5000 多元人民幣，她說寄錢回老家，旁人會羨慕」。貼文搭配的圖片則是該部央視紀錄片《我們來自新疆》裡四個維吾爾人笑容滿面的截圖。小編這樣的處理被眾人批評僅引用中共大外宣說法，卻沒說明維吾爾人被中共迫害的真相。

2021 年 3 月《主題之夜 SHOW》粉絲專頁貼了梗圖，引用紀錄片《藥命俱樂部》中主角說的「一顆要價一千元的藥丸實際成本不到五十分錢...，每年仍有近四十萬人持續死於 C 型肝炎」，這張梗圖導致台灣醫藥界一片譁然，認為公視立場偏頗，無視開發新藥的成本，也把病人不治的責任歸咎於藥價太高。

上述社群經營的案例都顯示公視對於社群媒體生態的掌握不足，社群媒體中的人們耐心很有限，快速滑手機的習慣往往導致閱聽人只看圖片、或小編評註與標題，不點擊貼文所附的新聞連結，因此對小編的圖片與文字就產生難以抹滅的第一印象，導致更加斷章取義。公視在這些事件後也重修節目製播準則，並在準則中加上社群媒體專章，其中也包含社群小編的相關規範。

三、變化中的主導邏輯

芬蘭學者 Maijanen 將主導邏輯分為科技、競爭者、閱聽人關係、內容、公共媒體的使命等五類，本研究則從訪談資料中歸納出台灣公視目前的主導邏輯主要是科技、閱聽人關係、公共媒體的使命。目前台灣公視還在數位科技、閱聽人關係，和傳統電視邏輯中擺盪，但如前所述，公視管理階層具有很強的組織認同，「公共媒體使命」的主導邏輯維持不變，仍佔優勢。

受訪者 A 以對外徵案方式的改變來說明公視與閱聽人關係正在改變中。

過去徵案是用類型來訂主題，我來之後就不訂題目，因為我認為創作者有他們本身關心的東西，公視如果訂題目，不見得是創作者正在做的。……只有百花齊放的情況下才會有漂亮的景色。這也是公視與閱聽人關係的改變，讓我們的劇和內容都更貼近閱聽人。

受訪者 B 以疫情時期的公視應變來說明如何加強觀眾的參與感，強化與閱聽人的關係。

《公視表演廳》將表演者、表演團體的自拍畫面後製包裝後放在臉書上，他們因疫情無法演出，我們用這樣的方式連結觀眾和表演者。《藝術很有事》則是呼籲因疫情不得不待在家的小朋友多創作投稿給節目單位。這些節目都發揮節目品牌原本的優勢，讓觀眾來參與，給大家互相加油打氣，這是我們公共電視發揮公共責任的時刻。

在科技方面，公視的主導邏輯已有從傳統電視思維轉向數位邏輯的傾向。例如受訪者 B 要求製作人提新節目企畫案時，都必須附上新媒體的設計，其中也要包含如何和觀眾對話與互動。但受訪者 B 也強調並不認同公視現在的轉型策略，她主張公視的首要之務是做全媒體內容，而非「公視+」線上影音平台。

當然做了「公視+」還是不錯，因為公視本身有豐富的影音資料庫，但我預期的是內容的轉型，西班牙、義大利等國家，兒少、戲劇都有全媒體內容了，公視目前都只有單點經營，轉型尚未全面開始。

其實現在製作人都知道，你必須在新媒體上才會被看見。但公視的問題和其他組織一樣，都有本位主義，我們不是有新媒體部嗎？轉型是他們要做的吧？或說，臉書是用來宣傳的，宣傳不就是公行部（公服暨行銷部）應該做的事情嗎？這就是本位主義。多數人的想法是，我的專長是影像和電視，新媒體並不是我的專長。

我認為轉型是非常困難的，大家對頻道的認知還很傳統，有些員工是要資源才肯做，有些是需要教育訓練。轉型也需要人才，我們部門的人都四十多歲了，要引進新血才行。(受訪者 B)

受訪者 A 同樣提到本位主義的問題，「我們要在『公視+』放節目，傳統電視人是很排斥的，怕影響到電視的收視率，後來看到對收視率有幫助，才願意接受」。

受訪者 A 卻認為公視的全媒體轉型算是成功的，「要全面大翻轉是好幾個世代以後的事，目前這樣算成功的」。她提到公視轉型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組織的老化」。

全媒體的轉型也有技術上的升級要克服。公視組織的老化是主因，我們有很多攝影師、剪接師都已經五十多歲了，他們連 HD 要轉 4K，都很困難，年齡會造成學習新技術的能力問題。但這樣的員工我們也要讓他們在組織內能發揮所長。

受訪者 D 說，其實公視並非所有部門主管都是數位邏輯，以電視為中心的思維還是存在。

我認為公視最主要的問題還是電視思維，因為公視主要在賣的還是節目，所以很多決策是繞著能不能讓節目賣出去，其他的價值都是次要。這也是我做新媒體的挑戰，要能和電視人溝通。電視思維是看劇本、製作、電視的美感，網路的價值觀是不同的，網路是要能激起討論。比如我想在《觀點同不同》討論《斯卡羅》裡的李先得有沒有賣台，但電視人說不喜歡，他們認為要正面行銷這個劇，不要太碰觸衝突的議題。

如同芬蘭的 Yle、德國的 NDR 和 RB、瑞典的 SVT 等四個公共媒體的個案，其公共服務使命 (public service mission) 在轉型過程中被重新定義，台

灣公視的公共服務使命也被重新解釋為，擴大原本的電視服務至其他平台的使用者。管理者所認知的不變的使命則是補商業之不足，以及提供多元的內容。考量到既有人力和資源的限制，台灣公視管理階層將傳統廣電主導邏輯與數位傳播邏輯並列為同樣的重要，此外，管理者在變化的環境中，提出加強閱聽人關係的策略。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從意義建構和主導邏輯兩個概念來探討台灣公視的全媒體轉型。研究發現，公視受訪的管理階層都認知到轉型的必要性與急迫性，也都有強烈的組織認同，都認同必須轉型才能持續落實公共服務的理念。但從轉型成果來看，無論是組織改造、多媒體平台、社群媒體等面向，公視都尚未走向全面的全媒體轉型。特別是參與轉型的節目也只是少數，整體的資源分配仍是電視架構下的決策，因此台灣公視的主導邏輯仍是以電視為中心但帶有數位邏輯的管理思維。

組織管理學認為管理者對環境變化的感知能力以及對轉型意義的認知，是組織轉型能否成功的重要關鍵。本研究經過深度訪談得知公視管理階層的轉型認知雖然強烈，但主導邏輯卻尚未完全轉為數位邏輯，為何會出現這樣的矛盾？本研究分析主要是以下兩個原因造成公視全媒體轉型的困境：

一、法定預算過低，經費不足

根據公共電視法，政府每年捐贈給公視的經費僅有 9 億元，又根據公視管理階層表示，公視人事支出就高達 7 億多元，因此每年都需要另外靠政府專案補助¹⁶，才能達到 25 億元左右的營運規模，製作出優質豐富的節目並提供公共服務。以 2020 年為例，公視年度支出總計約為 25 億 5 千 9 百多萬元，

¹⁶例如 2019 年廣受好評的公視戲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就是由「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補助 4 千 300 萬元。

年度收入總計為 23 億 5 千 6 百萬，其中來自政府每年固定的補助除了依《公視法》編列捐贈之 9 億元之外，還有來自自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捐贈的 9 千 9 百多萬¹⁷。這兩筆金額合計 9 億 9 千 9 百多萬，占公視 2020 年收入的 42.4%。而 2020 年政府的專案補助金額就有 11 億 2 千 7 百多萬，占比 47.87%（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2021：41-42）。由此可見，來自政府專案的補助比政府每年固定的捐贈還多，但專案補助的金額卻不穩定，因此公視的財務體質可說是極為不穩定。在這種情況下，要投入更多經費與人力在全媒體轉型上，有相當大的難度。如前所述，英國 BBC 和芬蘭的 Yle 能成功轉型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經費充足且穩定，台灣公視要解決轉型困境的首要之務就是修法增加政府每年捐贈給公視的經費。

二、核心能力轉換不易

公共電視本業是電視台，其資源和人力都以電視節目製作為主，全媒體轉型需要的是大量的資訊工程人力資源，公視原本這方面的人力就很少。第六屆董事會決議朝向全媒體轉型後，陸續招募人力，但因公視的薪資不如業界，人才招聘不易，又有組織老化的問題，最終核心能力仍不足以應付轉型。資源都集中在電視製作，就意味著資料分析能力尚未進化到全媒體時代。公視多數網站雖有 Google Analytics 追蹤碼設定，蒐集使用者的基本瀏覽資料（如性別、年齡、登入時間），但因人力與能力限制，並無法深入探討更深層的使用者轉換行為，也就難以制定更好的策略來服務使用者。

回到本研究在理論方面的意涵，意義建構與主導邏輯理論都主張管理者思維是轉型成功的關鍵，但台灣公視個案反映的是轉型成敗維繫在更大的結構，以及組織內部的本位主義或資源問題，這是理論本身的侷限性。此外，

¹⁷ 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45 條規定，系統經營者應每年按當年營業額百分之一之金額，提繳至中央主管機關成立之特種基金，基金中的百分之三十捐贈給公共電視。2020 年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捐贈 9908 萬 5944 元。

要讓管理者思維能在組織內部落實，加強員工對轉型的認同、優化管理工具和合理的獎懲制度，誠屬必要。若能有更全面的研究，釐清以上問題，方能解決台灣公視全媒體轉型的困境。

參考書目

- 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2018）。《2017 公視基金會年度報告》。台北：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 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2021）。《2020 公視基金會年度報告》。台北：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 李彰（2018）。〈公視+迎接時代挑戰：公視新媒體部沿革與現況〉，《公視開鏡季刊》，3:12-17。
- 徐福德（2017）。《台灣公共電視邁向公共服務媒體的組織認知研究》。中正大學電訊傳播所碩士論文。
- 卓冠齊（2019）。〈為何此刻做新聞還需要實驗？公視公廣新聞網全媒體實驗平台〉，《公視開鏡季刊》，7:68-69。
- 胡元輝（2020）。〈公共服務媒體的建構與挑戰—以日本、美國公視的組織變革為例〉，《中華傳播學刊》，37:227-258。
- 游梓翔（2017年3月28日）。〈「愛慕你，梅地亞」，全媒體是什麼東東〉。取自 <https://forum.ettoday.net/news/892780>（上網日期：2021年6月28日）。
- 陳雅萱（2012）。《向數位轉！從公共服務廣電（PSB）到公共服務媒體（PSM）：英國廣播協會（BBC）與台灣公共電視（PTS）之比較研究》。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順孝（2018）。〈公視前進「全媒體」。從「新媒體」的五個創新談起〉，《公視開鏡季刊》，3: 8-11。
- 張錦華（1997）。《公共領域、多文化主義與傳播研究》。台北：正中。
- 曹衛東、王曉珏、劉北城、宋偉杰譯（2002）。《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台北：聯經。（原書 Habermas, J. [1990].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Berlin, Germany: Suhrkamp Verlag.）
- 新媒體諮詢委員會（2019）。《公視基金會新媒體諮詢委員會工作備忘錄》。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 魏均、林麗雲（2012）。〈三十年崎嶇路：我國公視的演進、困境與前進〉，媒體改造社、劉昌德（編）。《豐盛中的匱乏：傳播政策的反思與重構》，

頁 1-30。台北：巨流。

- Aslama, M. (2008). Policy of inertia or innovation? European public service in transition from PSB to PSM. (McGannon Center Working Paper Series. Paper 23). Retrieved from http://fordham.bepress.com/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22&context=mcgannon_working_papers
- Augier, M., and Teece, D.J. (2009).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the role of managers in business strateg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Organization Science*, 20(2), 410–421.
- Balogun, J. (2007). The practice of organizational restructuring: From design to reality.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25(2), 81–91.
- Bardoel, J. and Lowe, G. F. (2007). From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to public service media: The core challenge. In G. F. Lowe & J. Bardoel (Eds.), *From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to public service media*, 9-26. Göteborg, Sweden: Nordicom.
- Bartunek, J. M. (1984). Changing interpretive schemes and organizational restructuring: The example of a religious order.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9(3), 355–372.
- Bettis, R. A., & Prahalad, C. K. (1995). The dominant logic: Retrospective and extensio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6, 5-14.
- Bettis, R. A., & Wong, S. (2003). Dominant logic, knowledge creation, and managerial choice. In M. Easterby-Smith & M. A. Lyles (Eds.),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pp. 343–355).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 Bulck, H. V. d., Donders, K., & Lowe, G. F. (2018). Public service media in the networked society: What society? what network? what role? In G. F. Lowe, H. V. d. Bulck, & K. Donders (Eds.), *Public service media in the networked society* (pp. 11-26). Göteborg, SE: Nordicom.
- Clark, J., & Aufderheide, P. (2009). *Public Media 2.0: Dynamic, engaged publics*. Retrieved from http://archive.cmsimpact.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ages/publicmedia_2.0.pdf
- Coleman, S. (2004). From service to commons: Re-inventing a space for public communication. In D. Tambini & J. Cowling (Eds.), *From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to public service communications* (pp. 88-98). London, UK: Th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 Collins, R. (2007). Public value and the BBC: A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work foundation's public value consortium. Retrieved from http://www.theworkfoundation.com/assets/docs/publications/174_publicvalue_bbc.pdf
- Curran, J. (2002). *Media and Power*. London, UK: Routledge.
- Daft, R. L., & Weick, K. E. (1984). Toward a model of organizations as interpretation system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9(2), 284–295.
- Eggers, J. P., & Kaplan, S. (2013). Cognition and capabilities: A multi-level perspective.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7(1), 295–340.

- Ericson, T. (2001). Sensemaking in organizations-toward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under standing strategic chang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Management*, 17, 109-131.
- European Broadcasting Union. (2012). Empowering Society: A Declaration on the Core Values of Public Service Media. Retrieved from https://www.ebu.ch/files/live/sites/ebu/files/Publications/EBU-Empowering-Society_EN.pdf
- Garnham, N. (1986). The media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Golding, P. Murdock, G. and Schlesinger, P. (Eds.), *Communicating Politics – Mass Communication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 Garnham, N. (1992). The media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Calhoun, C. (Ed.)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Garnham, N. (2003). A Response to Elizabeth Jacka's 'Democracy as Defeat'. *Television and New Media* 4(2), 193-200.
- Geigle, S. L. (1997). *Schemas and sensemaking during radical organizational chang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 Gioia, D.A. and Chittipeddi, K. (1991). Sensemaking and sense giving in strategic change initiatio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2(6), 433–448.
- Habermas, J. (1984).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1: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Boston: Beacon Press.
- Habermas, J. (1989).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e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Translated by T. Burger, Polity Press, Cambridge.
- Jakubowicz, K. (2010). PSB 3.0: Reinventing European PSB. In P. Iosifidis (Ed.), *Reinventing public service communication: European broadcasters and beyond* (pp. 9-22).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 Kaplan, S. (2011). Research in cognition and strategy: Reflections on two decades of progress and a look to the futur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48(3): 665–695.
- Klein-Shagrir, O., & Keinonen, H. (2014). Public Service Television in a Multi - Platform Environment. *VIEW: Journal of European Television History & Culture*, 3(6), 14–23.
- Kor, Y. Y., & Mesko, A. (2013). Dynamic managerial capabilities: Configuration and orchestration of top executives' capabilities and the firm's dominant logic.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4(2), 233–244.
- Larsen, H. (2014). The Legitimacy of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Case of Scandinavia. *Nordicom Review*, 35(2), 65–76.
- Lowe, G. F., & Maijanen, P. (2019). Making sense of the public service mission in media: youth audiences, competition,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of Media Business Studies*, 16(1), 1–18.
- Lüscher, L. S., & Lewis, M. W. (2008). 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managerial sensemaking: Working through paradox.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1(2), 221–240.

- Maijanen, P. (2015a). Cognition as a driver and barrier of strategic renewal: Case of the Finnish Broadcasting Company. *Int. J.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Research*, 9(3), 351-374.
- Maijanen, P. (2015b). The evolution of dominant logic: 40 years of strategic framing in the Finnish Broadcasting Company, *Journal of Media Business Studies*, 12(3), 168-184.
- Maijanen, P., & Lowe, G. F. (2016). Manager perceptions of the public service mission in the emerging networked socie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RIPE@2016 conference, Antwerpen, BE.
- Maitlis, S. (2005). The social processes of organizational sensemaking.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8(1), 21-49.
- Murdock, G. & Golding, P. (1989). Information Poverty and Political Inequality: Citizen in the Age of Privatized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9(3): 180-195.
- Nelson, R. R., & Winter, S. G. (1982).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rahalad, C. K., & Bettis, R. A. (1986). The dominant logic: A new linkage between diversity and performanc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7(6), 485-501.
- Sehl, A., Cornia, A. & Nielsen, R.K. (2016). *Public Service News and Digital Media*. Oxford: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 Sehl, A., Cornia, A. & Nielsen, R.K. (2017). *Developing Digital News in Public Service News*. Oxford: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 Valerie Belair-Gagnon, Jacob L. Nelson & Seth C. Lewis. (2019). Audience Engagement, Reciprocity, and the Pursuit of Community Connectedness in Public Media Journalism, *Journalism Practice*, 13(5), 558-575.
- Vanhaeght, A.-S. (2019). Audience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service media: From a media-centric to a society-centric approach. The Monitor: A best practice of the Dutch Public Broadcaster Npo. *VIEW: Journal of European Television History & Culture*, 8(16), 1-14.
- Walsh, J. P. (1995). Managerial and organizational cognition: Notes from a trip down memory lane. *Organization Science*, 6(3), 280-321.
- Walvaart, M.te (2019). Translating PSM Policy into Production Practices: Studying Newsroom Management Strategies towards Audience Engagement. *VIEW Journal of European Television History and Culture*, 8(16), 88-97.
- Weick, K. E. (1995). Sensemaking in organization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 Wilson, S.-A. (2020). Public service media, an overview: Reflecting on news and trends. *Interactions: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 Culture*, 11(2), 253-259.
- World Radio and Television Council. (2001). Public broadcasting: why? how? Retrieved from <http://web.pts.org.tw/~web01/input2006/Documents/WRTVPSBWhyhow.pdf>

A Swing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Digital Paradigm: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 Public Television Service

Huei-Wen Lo

ABSTRACT

While users are turning to the internet and mobile device, how the Public Broadcasting System starts thei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responding to these user behavior chang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many countries.

In 2017, Taiwan Public Television Service announced a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stablishing the Public Service Media Project Center and the "PTS Plus" online audio-visual platform. In 2018, the news department also established the P# News Laboratory and launched digital thematic curations from time to time. Why did PTS start these transformations? How does it transform? This research uses the theory of sense-making for strategic management, the dominant logic concept, the in-depth interview and the secondary data analysis to explore how the PTS managers recognize the meaning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is research also analyzes how PTS managers practice the concept of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through transformation, presenting the current omni-media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and dominant logic of PTS. This research discusses the transformation dilemma, hoping the results will contribute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public service media.

Key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ominant logic,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public service media, sense-making theory

* Lo Huei-Wen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s Management of Shih Hsin University, and she was the sixth board member of Taiwan Public Television Service Foundation. email: hwlo@mail.shu.edu.tw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十五期
2022 年 6 月

性別文化空間、影像與公共性： 以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與文化產製品為例

孫嘉穗*

本文引用格式

孫嘉穗（2022）。〈性別文化空間、影像與公共性：以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與文化產製品為例〉，《傳播、文化與政治》，15:67-86。

投稿日期：2022 年 2 月 9 日；通過日期：2022 年 5 月 4 日。

* 作者孫嘉穗為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教授，e-mail：
suncs@gms.ndhu.edu.tw

《摘要》

本文以台灣的慰安婦博物館「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與其衍生之紀錄片【蘆葦之歌】為例，探論性別文化空間與影像如何展現公共性、乘載記憶文化，以及建構性別網絡。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不僅展現不義歷史的記憶文化，讓慰安婦得以發聲，更讓受害者的個人故事轉化為性別教育的公共資產。透過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及其相關影像，慰安婦的個人生命故事從私領域到公領域，透過博物館和影像在公共領域與公眾進行溝通，讓身處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的參與者能深刻體認壓迫的形成，並召喚參與者及閱聽眾的情感共鳴，使更多受不同形式壓迫的阿嬤與女人得以反抗受迫的處境。經由博物館和影像，慰安婦的生命故事與相關經驗得以與社會交織，並串聯多元的性別網絡，以及展現公共價值與理念。

關鍵詞：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慰安婦、公共價值、性別、公共性

本文以台灣的慰安婦博物館：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與其衍生文化產製品為例，探論性別文化空間與影像如何展現公共性、乘載記憶文化，以及建構性別網絡與轉型。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不僅展現性別地景，更構連不同世代關切的性別議題及性別文化團體與組織，公共空間更透過舉辦不同活動與網絡串聯成為不同論述與行動的辯論場域，並提供性別文化之公共議題激盪與落實為行動倡議。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不僅展現不義歷史的記憶文化，更成為轉變受害者以己身經驗成為性別教育賦權者的療癒空間。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透過影展與不同形式的策展召引多元的參觀者，讓影像成為溝通媒介與大眾在此公共場域交流，相關的策展與博物館展覽之呈顯，在國族脈絡下同時展現人權的伸張，也讓事件中涉及的性別與族群等議題能在此公共空間中，經由持續的討論延展出性別教育的多重面向與多元可能。

婦女救援基金會附設之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於 2016 年 12 月 10 日正式成立，收錄台灣 59 位慰安婦阿嬤的生命故事，是台灣展示女性人權議題的重要地標，透過博物館的策展以及不同形式的網絡串聯，成為性別教育的重要基地。儘管因為虧損加上疫情的衝擊，使得位於大稻埕的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於 2020 年 11 月閉館，和平與女性人權館接續透過募資平台發起群眾募資活動，並於 2021 年 11 月 26 日另覓新址重新開幕，而此公共參與的方式也展現了公眾對慰安婦博物館之關注。

本文所論及之性別文化空間乃指涉可展現性別文化，與召引性別討論和促發性別意識之文化空間，在此文化空間中可透過公共敘事展現性別文化公共性之意涵。本文不僅是以博物館與衍生之媒介視為文化空間為討論基礎，更以文化空間本身具有的政治性與能動性，來討論博物館如何重新問題化性別與權力關係。文章的論述主軸強調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如何藉由「博物館」機制，透過展覽、媒體影像、阿嬤生命故事展現等過程，讓慰安婦議題被公共化，也牽動相關性別議題重新被問題化。

而選擇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與紀錄片【蘆葦之歌】，乃基於在當前台灣的社會，阿嬤家博物館是少數以性別為主軸的文化空間，透過慰安婦的故事呈顯性別文化地景，而慰安婦的個人生命故事如何經由博物館的展示，

影像的詮釋與再現，呈顯私人到公共的歷程，以及顯現多元向度與視角，乃是本文所欲探究之處，同時也探討性別與國族、歷史及文化的意義與特殊性。本文透過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的文化空間與【蘆葦之歌】的媒介展現，探究與深化性別文化公共性之相關議題。

慰安婦的歷史經歷報導、跨國求償與政治折衝與不同權力的挪借及收編等各式歷程，與各種論述及各式權力互相衝撞，然而在慰安婦議題挪借為各方勢力的公共討論與介入中，慰安婦的個人生命樣貌與故事又如何在公共化的過程中找到主體意義，而非只是被詮釋與挪借議題的客體，由私到公的過程有那些問題？又彰顯了什麼樣的性別文化？本文藉由下列之梳理呈顯性別文化公共性之樣態。

本研究聚焦於下列研究問題：

- (一) 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展現了甚麼樣的性別文化公共性？
- (二) 性別文化公共議題的再現方式與公/私領域議題的跨越
- (三) 【蘆葦之歌】如何展現不義歷史與記憶文化？
- (四) 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促進公共參與的價值與目的為何？
- (五) 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媒體與公共網絡的串聯為何？
- (六) 公共倡議如何透過性別符碼再現與創新？

本文涵納博物館與其具代表性的性別影像之文化空間分析，並就其公共性之展現、網絡構連、文化記憶與符碼的轉型與文化消費等梳理性別文化之公共面向。

壹、何謂公共性與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的公共價值與理念

哈伯瑪斯 (J. Habermas) 提出公共領域、溝通理性以及審議民主等概念，關切如何建構具解放意義的溝通模式 (Habermas, 1984；張錦華，2014，頁

50)，哈伯瑪斯批判當代的公共領域常被商業和政治利益控制，因而提出溝通理性之概念，關切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免於系統性壓迫，並能經由有效溝通過程，追求理性與互為主體的共識（Habermas, 1984, p.5；張錦華，2014，頁50）。那麼，將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與紀錄片【蘆葦之歌】視為性別文化空間與可資溝通交流的公共領域，博物館與紀錄片展現了哪些努力與試圖增進參與者與閱聽眾對慰安婦議題的了解與溝通，又如何促發反思與行動，以展現公共性之意涵，遂成為本文所欲探究之處。

何謂公共性？顧忠華在論及知識的「開放性」與「公共性」時，主張其意味「共通的普遍質素，讓知識可以更為靈活地與社會交織，並產生改善人類生活的效益」，顧忠華也主張社會科學知識的公共性可以轉換到學術外受眾或公民觀點，須受到受眾或公眾的肯認（顧忠華，2005，頁2-15）。而陳逸淳（2012，頁33）則指出公共性指稱意義具備了多重的歧異性，含括集體、國家、政府、社會，甚至是公眾、大眾等範疇。

而吳介民、李丁讚（2005）批判性地指出哈伯瑪斯的公共溝通概念乃基於理性的溝通模式，但缺乏對情感層面和身分認同差異的關照，而公共修辭需透過個體或團體間的生活經驗召喚和串連以形成共同經驗和達致公共感受，且溝通方式同時需要構連閱聽眾的主動參與和情感共鳴（張錦華，2014，頁52）。

那麼透過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及其相關影像，慰安婦的個人生命故事如何從私領域到公領域，如何透過博物館和影像的文化空間與公共領域進行溝通，並召喚參與者及閱聽眾的情感共鳴，以及博物館和影像所乘載的相關經驗如何展現公共性，與更為靈活的與社會交織，受到公眾的肯認，並展現公共價值與理念，遂成為本文聚焦之處。

在戰爭下被剝奪的生命尊嚴與社會壓力下的失語及壓迫，失聲的慰安婦如何透過慰安婦博物館和影片發聲，將私領域的個人生命經驗轉化為公領域的展示，這些進程為何？如何進行溝通又化為行動？本文關切慰安婦的噤聲失語及反抗如何轉化，如何奪回主權與公共發聲，以及慰安婦被剝奪的青春與由自卑到尋回自信的過程，是如何與博物館及影像呈顯交織，由私到公領域的過程也彰顯公共化歷程中藉由溝通到尋找共識的歷程，而如何溝通？如

何串聯？以召引觀眾參與而進行，皆呈顯性別文化空間與慰安婦的生命歷程交織而由私領域到公領域的多元面向。

那麼，透過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與衍生之影片【蘆葦之歌】與公眾的溝通交流所形構的共識為何？又串聯與召喚了觀眾哪些面向的思考與成果？首先，博物館展現了戰爭下的性別處遇，以及慰安婦所遭受的性別暴力，公眾進入博物館的性別文化空間，透過慰安婦的生命經驗展現，未曾經驗戰爭洗禮的公眾進入慰安婦遭難的時空，體察每一位受暴女性的生命經歷，以及各種遭受歧視的樣態，從而激發反性別歧視的情感共鳴，與進而召喚公眾主動參與反制性別暴力的共同行動。其次，慰安婦由噤聲到勇於發聲的過程，召喚了身分各異，卻在不同情境下同樣遭逢性別暴力卻怯於發聲的人，在參展與觀影過程中得以療癒與獲得發聲的勇氣。參與的公眾也能重新省視性別暴力運行的外在結構，並進而檢視身處的環境，思索改善尚待努力的性別處遇，慰安婦的故事從而與社會不同處遇的性別壓迫經驗交織，並進而成為促發公眾共同改善性別環境之動力。

貳、性別文化公共議題的再現方式與公/私領域議題的跨越

由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到阿嬤的故事【蘆葦之歌】紀錄片，不僅展現性別文化公共議題的再現方式，也呈顯公／私領域議題的跨越與轉化過程。從個人的生命故事到公共敘事，公共化的慰安婦影像故事成為性別教育資產的過程需經過對結構與壓迫形制的反省，並進而反抗與拆解壓迫形構，方能彰顯性別文化公共領域之價值與意涵，而厭女情節的諸多社會成因使得慰安婦在艱困處境中噤聲不語，在其個人生命經驗故事由私領域轉為公共化的過程中展現對壓迫形制的反抗，本段因而由愛女/厭女之情感與性別再現梳理此公共化過程中公／私領域之跨越，與對不義歷史與記憶進行轉化。

與台灣慰安婦相關的歷史與故事，發展出哪些新的文本、形式與再現？從阿嬤的故事【蘆葦之歌】紀錄片到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不僅展現愛女／厭女之情感與性別再現，更顯現了從個人的故事跨越到公共領域而展現

公共性的多重面貌。

阿嬤的故事【蘆葦之歌】紀錄片呈顯的慰安婦故事，不僅承載著故事背後的國族印記，更深刻的刻畫著受壓迫女性的噤聲與發聲歷程，不同阿嬤的故事呈現不同種族、階級的女人，經歷時代的悲情，卻又被污名化而的人生，與當中面對不同形式親密關係的斷裂與重構。本文首先析論影片中顯現的愛女/厭女情結，以及不同慰安婦在不同形式親密關係中遭逢的壓迫，與被親人排拒的處遇。而後梳理厭女情感的生成，與拆解壓迫的成因，進而探究慰安婦個人處遇的生命故事，透過影像與博物館成為不同形式的文化空間與公眾互動與溝通時，什麼樣的公共性呈顯於其中。

本文將媒介和博物館皆視為為性別文化空間，檢視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如何再現慰安婦的噤聲與發聲歷程，又如何詮釋其中的愛女/厭女情結，與誰來詮釋？同時，承載著故事背後國族印記的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與進入參觀者進行了甚麼樣的互動，而進入其中的參與者在博物館中生產與消費了什麼樣的情感，又如何反思厭女情結在不同時期社會的展現，皆是本文所欲探究之處。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再現慰安婦生命故事的同時，博物館的文化空間扣連不同的社會網絡，讓身處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的參與者能深刻體認壓迫的形成，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成為平台，重構親密關係的連結，以使更多受不同形式壓迫的阿嬤與女人都得以回家。

參、慰安婦博物館與【蘆葦之歌】展現的不義歷史與記憶文化

慰安婦的生命經歷呈顯多重的壓迫與歧視，而厭女症的生成源於社會系統性的壓迫，因而如何對不義歷史進行反抗與翻轉記憶文化，是慰安婦故事公共化過程中彰顯性別意識的重要途徑。而梳理博物館與紀錄片參與慰安婦生命故事公共化的過程，可呈顯性別文化空間在公共化歷程中如何重新問題化性別與權力關係。

儘管世界文化遺產委員會（World Heritage Committee）對「負面遺產」（Negative Heritage）仍未有明確定義，然「負面遺產」可意指「可彰顯負

面教訓與紀念集體記憶的地方」（黃龍興，2011），保留「負面遺產」並非要彰顯仇恨，而是要和解與避免世人不要犯同樣的錯誤，而因歧視或偏見所造成的創傷記憶，得以有所警醒（黃龍興，2011，頁 75）。而單德興以越戰將士紀念碑召喚越戰逝者與觀看者的互動與溝通，使參訪者成為參與者，認為遺產「提供一個記憶與反省的場域，讓人如實面對自己和歷史的創傷，透過真誠的感受與剝切的反思，逐步療傷止痛，以史為鑑」（單德興，2008，頁 161）。而「阿嬤家博物館」也讓駐足其中的人反思性別處遇，讓慰安婦與曾受性別歧視與暴力之人得以療傷，也召引參與者共同努力改善性別環境。

紀錄片【蘆葦之歌】中每一個慰安婦的故事皆承載著生命沉重的壓抑，也深刻的刻畫著受壓迫女性的噤聲與發聲歷程，而紀錄片中展現的愛女/厭女之情感，也揭示著不同阿嬤的故事，呈現不同種族、階級的女人，經歷時代的悲情，卻又被污名化的人生，與當中面對不同形式親密關係的斷裂與重構。

慰安婦的故事不僅承載著故事背後的國族印記，更有著每一個阿嬤和個人及家族面對遭難的情感掙扎。當陳桃阿嬤費盡千辛萬苦回到自己的家，以為回到所愛之人之處時，卻是遭到自己的叔叔將行李箱扔出門外，並對著她說：「姓陳的沒有你這樣的賤女人」，影片中對著攝影機的阿嬤數度說不出話，停頓數次後只能再一次的說著被叔叔說是賤女人的痛楚，以及抗辯著自己並非自願而是被抓去的處境。在阿桃阿嬤的境遇中，呈現慰安婦的印記對其家人而言是個恥辱，因而寧可將親情斷裂也不要讓慰安婦的印記影響到家裡的其他人。女性的身體與性不僅在戰爭中被剝削，女性的心靈更在更大社會的厭女情結下遭逢更大的羞辱與啃蝕著受壓迫女性的尊嚴，因而在重新尋回自我尊嚴的過程中，慰安婦的生命不僅需要和自我的過去和解，更需要解構社會的厭女情節與直視參與其中的男性暴力，並從而翻轉社會價值與正視對受害者的處遇並給予尊重，因而理解厭女情節的生成，與從戰爭與災難中省視受難女性的處境。

阿桃阿嬤在紀錄片中說著曾經希望自己成為老師的夢想，而在受難成為慰安婦返回之後，不僅二十五歲的年紀在當時已經無法再唸書，曾經的夢想也成了無法完成的想望，在紀錄片【蘆葦之歌】中當她悠悠說著一輩子就此

毀了的悲涼，讓觀者看到人的生命個體在戰爭、國族、性別暴力下交織的滄桑與多重的無奈，曾經可能美好的生命，在時代的悲涼處境中奪去的不僅是女性的身體與尊嚴，更是無法回復的生命想望。因此，從厭女到愛女的修復過程，也須檢視不同層次厭女情結與不同層次的修復過程。

慰安婦阿嬤的處遇也顯現了療癒與修復的過程涵蓋了與自己的、家庭以及與社會不同層次的情感接合，厭女情結的解構與修復也包含了不同社會脈絡之影響與生命主體的重構。【蘆葦之歌】中的一幕，呈顯了在療癒工作坊帶領中，慰安婦阿嬤畫出的自己都是年輕的少女，彷彿時光停在未曾受傷之前的年代，不忍再檢視受難為慰安婦之後的人生。

【蘆葦之歌】揭示不同慰安婦的故事，也刻畫著一個一個的生命傷痕，包含不敢和家族後輩揭示的過去，因成為慰安婦而不能生育只能領養後代的身體，歷經三次婚姻的經歷，被賣掉而成為慰安婦的過去，老年孤單無伴的人生，在豆蔻年華無法實踐生命願望而背負著遺憾和受著屈辱生活的人生，厭棄作為女人的身體和生命，而療癒與修復以及和自己、家庭與社會的情感重新接合並非只是慰安婦阿嬤自己的事，更是其所身處的家庭與更大的社會架構需進行去汙名化的過程，以及尊重受害女性的身體和心靈，唯有如此，慰安婦阿嬤才能和自己和解，以及和家庭與社會進行情感的重新接合。

親密關係的重構須由自己開始，慰安婦阿嬤和自己的和解以及重新和自己產生情感構連，須由自己諒解過去的自己，不再受到既有社會框架看待有著慰安婦標籤的生命，也不再厭棄自己。然則情感的重新接合涵蓋複合的層次，厭女情節的生成在慰安婦阿嬤自身，部分因根源於厭棄無法反抗日軍的命令，而只能屈從以性的服務生存的女性身體；家族的厭女情結則不願連構汙名化的慰安婦標籤，以讓家族其他人與之隔離，而無視於受難者的情感，以厭棄的方式拒絕慰安婦阿嬤和家族的連結；而更大的社會則無視戰爭暴力下的女性屈辱，在各種對慰安婦的刻板化印象和汙名化情境中，讓受壓迫的女人受到更大的傷害，無法坦然面對受迫的過去，也無法昂然向前瞻望未來，並因此產生與各種不同層次情感關係的斷裂。

因而理解慰安婦阿嬤的處遇，可協助每個人反身檢視自身對於性別與社會關係，以及對於受壓迫者是否同理與尊重的社會轉機。當慰安婦阿嬤可以

面對影像，讓自己的故事為人知曉，面對過去挺身而出時，阿嬤們的故事就成為性別與人權教育的重要指標，展現公共性中與大眾的溝通並將個人的生命故事串聯到更大的公共網絡，協助公眾理解受害者的處境，阿嬤們也不應背負社會的汙名與成為可憐與同情的對象，阿嬤們敢於挺身而出，要求歷史正視與平反，並讓後代知曉當時環境下的生命境遇，也彰顯了要求尊重的自信，與對生命的重新掌握。

正視受女／厭女的多重樣貌與討論，讓博物館與影像成為透過公共辯論拆解厭女現象與反性別歧視展現公共性之文化空間與影像中介。透過不同的媒介，故事重新被述說，也重新面對不同的權力角力，譬如日本、韓國、台灣與中國都以不同國家的不同立場與觀點，重新述說著慰安婦的故事，也各自以不同的媒介影響述說涵蓋國族、階級與族群的故事。

Hepp 與 Hasebrink (2014；方念萱，2016) 強調的社會互動概念，認為媒介化研究關注當媒體科技成為社會不可少的一部份，並關注社會互動會如何發生與如何轉變。而在慰安婦博物館的各國運作中，可見到慰安婦故事媒介化的現象，慰安婦故事被以不同媒介不斷的再製與轉述，也進行社會互動連構到不同的網絡。

女性作家瓊·史密斯 (Joan Smith) 在《厭女症》(Misogynies) (2013) 一書中指稱厭女症 (misogyny) 常表現於文學、藝術和各種意識形態表現形式之中，展現對女性相關事務的厭惡，並把婦女的性視為死亡和痛苦而非生命和快樂的象徵。

Gilmore (2005) 推論，厭女現象其實源於男性高度依賴與需要女性的心理，當依賴與需要的程度過高引發了焦慮與恐懼，反而演變極度貶抑與憎恨女性的心態。

上野千鶴子 (楊士堤譯，2015) 在論及慰安婦時則指出下列現象：

這裡的性滿足指的是男人的性滿足，因此男人不需要去在意女人的性滿足。這時就讓人不禁想到，「慰安婦」的確是一種十分恰當的稱呼。「慰安」指的只是男人方面的「慰安」，但對「慰安婦」而言，這卻是一種有如地獄般的奴隸勞動。因此，有許多的倖存者都陸續地

出面表示「我們不是慰安婦」，並且斷然地拒絕這種稱呼方式。

陳蓮花阿嬤被送到菲律賓，太魯閣族阿嬤林沈中被騙到部落山洞，吳秀妹阿嬤由童養媳又被舅舅賣去當慰安婦，不同女人的生命境遇面對戰爭、貧窮與性別各種面向的壓迫，交織為慰安婦不得已面對的生命情境。如同林沈中阿嬤在片中所陳述的現象，不時有人當面問她，擔任慰安婦時共服務了多少人？幾次？她回應說自己不是不知檢點的女人，而是在當時的情境下，無法反抗日本人的命令，部落的人才不再說話。而林沈中阿嬤在片中能指出並說明當時原住民婦女受害的地點，說明自己的經歷，也展現了勇敢面對過去，並體現了能捍衛自己的尊嚴的努力。

戰爭的軍國主義下，女人沒有主體，女人的身體只是被用來當作為軍國服務的工具，當女人的身體為男性所操控，女人不僅沒有了身體的主控權，在精神與心靈上也喪失了自我，而產生厭惡自己身體和心靈的狀態，而這樣的解離，需要情感上和自己的和解，方能重新扣連自我的主體性，而面對媒體與大眾揭露自己的經驗，更是奪回自主權的具體展現，宣告受害者不應躲藏，加害者才應道歉尋求諒解，受害者更不應被排除在文化系統之外。而把女人當性客體與他者化的加害者與歷史，也應重新檢視，並讓往後的人因理解真相而能正視慰安婦所處的歷史與當時情境，如此，也當能破除厭女情節的生成，與歸還給慰安婦阿嬤應有的尊重與展現正義。

肆、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公共參與的價值與目的

當慰安婦個人的生命經驗挪借為公共議題時，甚麼樣的權力競逐存於其中呢？慰安婦個人故事公共化的過程中也須面對不同權力的競逐，慰安婦議題的發聲主體未必是女人，相關議題常被挪借為不同政黨或國族彼此競逐的工具，在以慰安婦之名發聲獲利或者立像的同時，卻可能只是挪借慰安婦議題作為政治競逐，甚或國族競爭的籌碼。雖以慰安婦之名發聲，實際上卻可能使慰安婦噤聲並且失去主體性，男性政治人物以慰安婦之名疾呼，卻可

能只是想要以此行動來對正在進行中的轉型正義提出反制，慰安婦雕像在台灣立碑，卻弔詭地反而是消費了慰安婦議題，以正義之名發出為慰安婦爭取權益，背後卻另有政治盤算與收編了慰安婦議題為男性競逐的政治目的服務，慰安婦議題在不同時空的框架下，有時非但未能展現性別主體，反而成了另一個被剝削的議題，或被其他政治目的收編為籌碼與藉口。失卻主體性的過程，非但未能展現正義，反而更顯不公，也未能顯示尊重。

媒體中展現的慰安婦女性經驗經常在傳媒的論述空間被扁平化與單向化描述，而未呈顯其多元複雜的樣態，慰安婦在新聞再現中經常是可憐與悲情，或因要求日本補償的議題而上新聞。慰安婦議題也經常被不同政治議題所收編，或挪借成為國族或政黨的操作議題。

那麼，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致力於公共參與的價值與目的為何？除了如其名的希望給慰安婦阿嬤們一個安身立命與被關愛的家，在記錄與展示其受壓迫的歷史與面對生命遭難的故事勇敢新生的故事外，這些逐步轉化的歷程，更是實踐正義與性別教育的重要資產，讓慰安婦阿嬤們的生命故事不只是戰爭下的女性遭難故事，而能成為建設性的性別教育珍貴素材。進入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的參與者，在此性別文化空間中不僅閱覽著戰爭下無辜女性生命被捲入的戰爭印記與事件，更能深刻反省自身如何看待慰安婦，以及省視更廣泛的受壓迫女性的社會處境，進而期盼參與者無論男女皆能成為現有社會結構下以愛與尊重反轉厭女情境結構的一方，或至少不再以歧視態度看待慰安婦及其相關議題。而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的性別空間，也就能成為持續性的公共性別教育平台，讓受壓迫以及受暴婦女的經驗能經由此得到安全與生命反轉的可能，也讓進入空間的參與者不僅是在情感上消費慰安婦的故事，而是能參與其中，並省思既有的性別偏見與促發不同形式的性別正義行動。

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再現慰安婦生命故事的同時，博物館的文化空間扣連不同的社會網絡，讓身處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的參與者能深刻體認壓迫的形成，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也成為平台，重構親密關係的連結，以使更多受不同形式壓迫的阿嬤與女人都得以回家。

伍、隨著慰安婦的故事巡走：博物館、媒體與公共網絡的串聯

公共化的過程需要召引公民的參與，透過博物館和紀錄片的文化空間與公民進行溝通，以及以不同文化形式進行性別文化的表達，並包含對情感層面和身分認同差異的關照，而博物館不同形式的策展也經由連構參與者生活經驗的召喚，透過慰安婦故事的巡走與串聯進行溝通，並進而轉化與形成性別意識之提升。

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的空間與再現如同其策展的「安妮與阿嬤相遇：看見女孩的力量」活動，透過國際與在地的串連，共同關切不同形式的性別議題，並使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的文化空間成為對話、交流與女力網絡串連的平台。

慰安婦的故事不僅標示著受害者的處境，慰安婦所面對的壓迫、歧視、暴力與難於言說的經驗更呈顯著人類所共同面對的脆弱性，然而慰安婦並非僅能被動的接受保護，在慰安婦的行動倡議中，也不時展現受害者奪回主體發聲，與彰顯能動性的具體行動。

重新理解受害者的過程，需隨著慰安婦的故事巡走，如同 Stringer (2014) 試圖轉換視受害者為缺乏能動性及需要保護之負面意義，並關注受害者如何發聲與行動主體如何開展，因而成為在既有架構中突圍的重要面向。而階級、族群、國族與資本主義的擴張等因素形構了脆弱性在不同歷史時空下的不同面貌，理解慰安婦在其中的掙扎與突圍，有助於翻轉性別處遇及呈顯能動性之開展，並打破脆弱與能動作為對立的思考框架(Butler 2016)。

而公共性之檢視也可由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媒體再現與慰安婦故事所延伸的多元網絡探看脆弱性與能動性之轉換。隨著慰安婦的故事巡走，以探究博物館與媒介的文化空間如何中介慰安婦的故事，並解析什麼樣的結構形構了受害者的處境，重新檢視脆弱性，並反思受害者的位置。

透過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的網絡串連，展現公共領域的溝通型態，慰安婦故事延展串聯了安妮日記的展覽，壓迫與重生的影展，更透過台灣、日本與韓國青少年共同參觀韓國慰安婦博物館的活動，串聯起理解受害者，

以及看見受害者能動性的網絡，脆弱身體的文化政治因而重新被探看與連結不同世代，不同國家形構下的脆弱性與抵抗策略在跨國交流中也呈顯受害者位置之翻轉，以及展現能動性。

慰安婦博物館透過展覽與網絡連結，將慰安婦的故事延展至性別教育與串聯多元的網絡，而媒體不僅在展覽中扮演重要角色，更在跨國串連中連構了多元形式的性別機構與社群。

隨著近年來各國慰安婦的逐年凋逝，慰安婦博物館終將會面對慰安婦逐年減少與凋零的景況，為著慰安婦爭取權益與去除汙名的初衷，將會逐漸擴展為防治性別暴力與連結到各種性別議題的性別空間與中介機構，在析論慰安婦議題、博物館與媒體間的關係時，由台灣及韓國的慰安婦博物館之案例探看博物館與媒體形構出的網絡串連，可呈顯公共性之網絡形構。

關於慰安婦的相關議題，大多數的人並未親身見證慰安婦，而是透過博物館的展示與與不同媒體的再現與詮釋認識慰安婦與其故事。因而博物館與媒體遂成為重要的中介，形構與再現不同的慰安婦故事，也詮釋慰安婦相關議題，並連構到不同形式的人群、活動、組織與機構。

台灣的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之公共性展現，由博物館並非僅是呈顯慰安婦受害者的圖景與其脆弱性，而是彰顯了慰安婦阿嬤們從壓迫中之抵抗，透過藝術作品療癒，以及用生命展現能動性與成為性別教育重要象徵的過程。

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曾舉辦的「安妮與阿嬤相遇：看見女孩的力量」特展、各種性別影展與慰安婦相關講座，運用的大量的媒介影像，也將慰安婦議題構連到相關攝影者、導演與不同形式的創作，更由慰安婦議題延展至性別暴力防治等不同社會網絡。

而阿嬤家博物館的跨國路徑展現公共性的跨國連結，跨國慰安婦博物館的網絡，將各國的慰安婦故事文本串連為更大面向的公共性別教育網絡，並與多元的文化空間銜接。

如以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所參與的「日本軍慰安婦歷史解決及為亞洲和平國際青少年大會」為例，即增進了跨世代理解慰安婦故事文本與跨國、跨世代的行動連結。那麼，跨國的交流串連了什麼樣的網絡？以及參與

活動又增進了青少年對慰安婦什麼樣的理解？曾任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帶隊參與活動的展覽與教育組專員王力緯表示，在帶隊前往韓國的觀察中，發現在第一屆的活動中安排了讓慰安婦阿嬤對青少年說故事，讓青少年親身接觸受害者，透過此規劃使青少年對慰安婦議題有更強的連結，而在活動結束前安排慰安婦和青少年一一擁抱，更強化雙方的理解與療癒。

陸、公共倡議與性別符碼的再現與創新

博物館的影片與文創產品做為一種消費型制，又是如何透過產品傳遞性別意識？抑或反轉偏見？首先，文創產品需要納入慰安婦議題所在之文化與社會脈絡，其次，文創產品如需進入常民的日常生活，與傳遞情感，文創設計須符合常民日常生活所需，並有其相連的標示系統與符碼。文創產品可作為捐助者與支持者的行動串聯標示，因而須有清楚的符碼設計與串聯系統。

以韓國首爾的戰爭與女性人權博物館為參照案例，博物館使用了許多不同媒介的展示來呈現慰安婦相關議題，博物館一樓的展示邀請觀賞者在入門處在黑暗中觀賞短片並參與互動，體會慰安婦在黑暗中生存的禁錮，以及體會化為彩蝶重獲自由的意象。

而其中的慰安婦相關文創產品，不僅成為運動倡議的流動商品，也將藝術家的主動參與化為培力行動，讓認同相關倡議的群眾得以透過流動的文創商品標示認同，並匯聚為更大的支持力量。館長金東姬於訪談中表示館中販售的紀念品和館中展示的照片許多皆由參與示威者和藝術家主動提供，相關文創品與相關意象與符碼仍須經過國家政策相關單位的檢視與認可方可在博物館流通與販售，而相關文創品的收入則反饋給博物館以增加其收入和維持營運，如標示有慰安婦意象的小物與別針在年輕人中即受到好評。

博物館的二樓除了有多年來的慰安婦運動相關抗爭照片與紀錄片，更有著製做成動畫的【her story】，以媒介轉譯慰安婦的生命史，並以較親近人的動畫方式召引參觀者駐足觀賞，博物館參觀者中可見到外國夫妻推著嬰兒

車看著動畫影像，沉重的場景與故事在媒介轉化下吸引著不同年齡世代與不同國籍參觀者的關注，而展現其公共性。

台灣與韓國慰安婦博物館在公共化的過程中，透過不同國家的社會脈絡，與文化及社會運動的既有經驗，再現慰安婦的生命情境，與對公眾倡議性別議題，並運用創意建構性別符碼與設計性別文創品，以增進對社會與大眾的溝通與傳佈相關理念。

儘管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透過不同的嘗試在此文化空間中和不同的參與者進行溝通，企圖透過展示與影像進行情感的交流，以召引共感，然而博物館的經營不易，尤其以慰安婦的歷史經歷與抗爭作為主要募款訴求以維持經營的博物館勢必須要重新思考其定位與轉型意義，以及思索作為性別文化空間的公共化意義。

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於 2020 年已經歷過休館暫別，到群眾募資另覓他址，並於 2021 年重新開幕等過程，博物館的公共化也面臨轉化、重新定位與調整與公眾的溝通模式以展現其意涵。而在台灣與各國慰安婦逐漸凋零後，一個公共化的慰安婦博物館也必須要重新思考當不再有在世的慰安婦時，慰安婦博物館如何轉化與保存負面文化遺產並成為重要的性別教育資產，以及透過何種形式持續和公眾進行溝通，以讓搬遷後的文化空間仍能成為性別公共領域，召引閱聽眾的同情共感，讓不同的弱勢者能在此空間中發聲與透過不同行動參與防治性別暴力，以及促進性別意識的提升，皆是性別文化空間彰顯公共性價值所需思索之處。

而遺留下來的故事也可能不斷透過不同形式媒介的轉化，讓觸動人心的故事不斷激發反思戰爭下的性別處遇，以及由國族、族群、階級等多元視角反思受壓迫的性別處境，並形成共識召引更多人反轉歧視，與讓公共化的性別故事激發行動力量，與促發公民理解與溝通。

透過阿嬤家博物館的文化空間與參與者的持續溝通，嘗試以影展、戲劇、讓青少年跨國和慰安婦的親身交流等不同形式的扣連，以及與性別團體、其他人權博物館合作交流，也進行移動展覽至台灣文學館展出等嘗試，展現了博物館的文化空間由靜態展示，進而透過網絡延展與公民持續對話溝通的努力，而不同形式持續召引參與者由理解進而參與慰安婦生命故事的歷程，深

化性別議題，並拓展對不義歷史的抗爭，在跨國求償與在政治與權力的折衝間，慰安婦個人生命歷史的轉化也在此文化空間中進行療癒。

柒、結論

慰安婦故事透過博物館與媒介的重塑，連構到不同的網絡，然則在權力交錯的縫隙中，媒介化的慰安婦故事固然拓展其影響力，構連網絡與增進反性別暴力與反性別歧視的能量，卻也仍需警醒的避免慰安婦故事主體被各種機制與利益收編而失卻原有自主性。各國慰安婦博物館的組織各有宗旨與目的，在構連不同網絡時，應不要忘卻慰安婦主體，以及檢視媒介化過程中的慰安婦故事變貌，並展現更為靈活地與社會交織與產生改善人類生活的效益之公共性。

【蘆葦之歌】紀錄片和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開展了不同形式的性別文化空間，以多元管道促發溝通交流的多樣可能。由慰安婦的單一議題，透過跨國合作的串聯，在性別文化空間中串連更大的網絡，共同關注戰爭、暴力下的性別處遇，並展現女性主體之能動性，進而發展成為不同情境與社會下的性別教育培力案例。在跨越國界與實體文化空間的同時，形構共同的情感空間，而進入博物館的參觀者，能在多媒體的情境表達中認識與理解慰安婦阿嬤心中的情感掙扎與奮力爭取尊嚴的歷程，並理解當時的歷史脈絡，性別文化空間與國際串連的策展，帶領參觀者回到重現的文化脈絡。而回到日常生活的慰安婦也須經歷內/外連結的情感，與家族、社會重構並進行情感的接合。

台灣的阿嬤家博物館呈現了受害者場景的媒介地圖，博物館和媒介轉換了受害符碼成為能動主體，也轉化脆弱性為能動性。人們透過媒介化的慰安婦故事理解慰安婦，博物館透過媒體賦權和藝術創作展現慰安婦的能動性。然而符碼化和商品化的慰安婦意象是在流動中拓展性別倡議的能量，還是在符碼化的過程被不同的力量收編，在公共化的故事中需要更嚴謹的檢視。博物館和媒介將受害者的故事轉化為性別教育與群眾性別增能的公共素材，從

慰安婦個人經驗延展而成的故事在公共化的博物館與媒介再現中，召引參與者重思人權與正義，在由慰安婦為自己發聲的影片與其得以療癒的博物館空間中，彰顯性別突圍的故事與幽暗中的微光。

慰安婦故事成為文本，以不同的形式再現，並串聯不同形式的公眾，以讓性別議題與公共倡議可持續不斷發聲，也呈顯了媒體、博物館文化空間、網絡串連與公共性交織的多元可能。

參考書目

- 楊士堤譯（2015）。《厭女：日本的女性嫌惡》。台北：聯合文學。
- 何雯琪譯（2005）。《厭女現象》，台北：書林。（原書 Gilmore, D.D. [2001]. *Misogyny: The male malad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USA.）
- 方念萱（2016）。〈媒介化、行動化：媒介化理論與行動者網絡理論的對話〉，《傳播、文化與政治》，4:55-83。
- 吳介民、李丁讚（2005）。〈傳遞共通感受：一個地方公共領域的公共修辭〉，《臺灣社會學刊》，9: 119-163。
- 張錦華（2014）。《多元文化主義與族群傳播權—以原住民族為例》。台北：黎明文化。
- 黃龍興（2011）。〈於負面遺產中重構創傷記憶—從奧斯維辛博物館到景美文化人權園區〉，《文化資產保存學刊》，17:73-88。
- 陳逸淳（2012）。〈博物館面對當代藝術的兩難—從「公共性」談起〉，《博物館學季刊》，26(2): 31-47。
- 單德興（2008）。《越界與創新—亞美文學與文化研究》。台北：允晨文化。
- 顧忠華（2005）。〈論社會科學的開放性與公共性〉，《臺灣社會學刊》，35: 1-21。
- Habermas, J.(1984).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 vol. 1: Reason and realization of society*. Boston, MA: Beacon Press.
- Hepp, A., & Hasbrink, U. (2014). Human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ve figurations.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atized cultures and societies. In K. Lundby(Ed.), *Mediatization of communication*(pp.249-272).Boston, MA: De Gruyter.

- Butler, J. (2016). Rethinking vulnerability and resistance. In J. Butler, Z. Gambetti, & L. Sabsay (Eds.), *Vulnerability in resistance* (pp. 12-27). London, UK: Duck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J. (2013). *Misogynies*. London, UK: The Westbourne Press.
- Stringer, R. (2014). *Knowing victims: Feminism, agency and victim politics in neoliberal times*. New York, NY: Routledge.

Gender Cultural Spaces, Documentary Film and Publicity: The Comfort Women Museum and Cultural Products

Chia-Sui Sun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Taiwan Comfort Women Museum, Ama Museum, and its accompanying documentary "Song of the Reed" as examples to explore how gendered cultural spaces and films show publicity, carry memory culture, and construct gender networks. The Ama Museum not only displays the memory culture and history of injustice, allowing comfort women to speak out, but also transforms the victims' personal stories into public assets for gender education. Through the Ama Museum and its related film, the intimate life stories of the comfort women go from private matters to public domain, and communicate with the public through the museum and film to allow participants in the Ama Museum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formation of oppression, to emotionally resonate with the participants and the audience, and to enable more women to resist oppression in its many forms. The museum and film interweave with society, the full life stories and experiences of comfort women to connect diverse gender networks, and demonstrate public values and ideas.

Keywords: Ama Museum, comfort woman, public values, gender, publicity

* Chia-Sui Su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digenous Languages and Communication,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台灣的東南亞族裔地景與媒體再現

張春炎*

本文引用格式

張春炎 (2022)。〈台灣的東南亞族裔地景與媒體再現〉，《傳播、文化與政治》，15:87-112。

投稿日期：2022 年 2 月 9 日；通過日期：2022 年 5 月 4 日。

* 作者張春炎為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副教授 e-mail：
cychang@mail.ncnu.edu.tw

《摘要》

本文旨在探索東南亞族裔地景的多元意義，以及反思其作為新文化公共領域的可能。本文首先運用數據說明，東南亞移民/工在臺人數增加是構成東南亞族裔消費地景主要動力。其次透過回顧既有的經驗研究，本文釐清東南亞族裔消費地景所具備的多元意義。第三是透過分析有關族裔消費地的媒體再現，反思台灣的接待社會文化。研究發現，主流平面媒體再現，反應出台灣社會過於對於東南亞族裔的想像缺乏；新媒體的再現則凸顯了，族裔地景對於接待社會具隱蔽意涵的公共空間，正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具公共互動性的新文化公共領域。在結論中，本文指出，是過去研究者的知識行動、在地非營利組織以及晚近可見的東南亞族裔的自主行動，促成了這樣的新文化公共領域成為可能。

關鍵詞：地景、東南亞移工、東南亞移民、族裔消費地、媒體再現

壹、前言：東南亞異鄉人與台灣街景

多數人到台中旅遊，可能會到火車站前的新潮冰淇淋店宮原眼科，卻不會踏入對街殘舊的第一廣場。一棟被社會遺棄的大樓，卻意外承接移工流浪的心情。每個星期日，他們一週中唯一的休息日，聚會在大樓裡吃飯、唱歌、泡妞、做愛，唯有這些時刻，讓他們重新感受自己像個人，而不是一枚無差異的勞動力（簡永達，2016年6月16日）。

這已經是許多台灣人熟悉的經驗，在南來北往的島內交通中，在都市的漫遊裡，我們越來越常與東南亞移工在街頭擦身而過、看見他們在車站的身影。尤其是到了假日，各大城市的火車站內外，多能看見東南亞移工聚集的景象。我們是否想過，這群不論是沈默坐在一處，或用著異國語言放聲聊天，又或者是席地吃食的異國勞動者們，是如何出現並重構台灣的社會風景？若你曾經注意過他們，那是在哪裡？當時你又是怎麼看待眼前所見的這個景象？

本章開頭引用了一小段新聞內容，被報導的地點是台中東協廣場，原名台中市第一廣場，就是一個假日會聚集大量東南亞移工的地點，也是近年來特別受到矚目的東南亞族裔消費地點。在 1990 年代初期，這個地方原本是中部地區年輕族群常會去消費和休閒的綜合百貨，1990 年代中期因為種種因素不再吸引台灣人前往。故事如同其他東南亞族裔消費聚集地的發展一般，當台灣人不去了，原本以服務當地人為主的商業或公共空間開始沒落、蕭條，建築空間就開始逐步衰敗，直到東南亞移工走進、填補了這個空間，才又活絡。

換言之，東南亞移工的聚集，是讓被遺棄的地理空間又有了新生命。故事不同點在於，從閒置、衰敗，直到移工進入才又重獲生命力的第一廣場，不僅是中部最大的東南亞族裔地景（Southeast Asian ethnosapes），它更有著劃時代的意義。因為 2015 年第一廣場被正式更名為「東協廣場」，作為地方政府一項重要的文化政策，東協廣場這個空間被標舉出一個新的空間意

義，是力求實踐文化多元主義理想的新文化公共領域，藉此呼應台灣作為移民社會應有的文化價值。

偉大的城市要善待新移民，成為可以築夢、圓夢的新故鄉，市府有責任把他們當作兄弟姐妹與家人，「台中之美在於多元共榮，彩虹之美在於多色並存」，台中因為他們而豐富（台中市政府，2015年8月31日）。

根據哈伯瑪斯的看法，公共領域是一種「私人會合成為公眾，並隨時準備迫使公共威權在輿論的合法性基礎上運作」（Habermas, 1989；轉引自李丁讚，2004，頁1），是強調由私人匯集而成一種公共意見，也就是「社會中的私人經過理性辯論，相互對焦後所產生的會合和統整，代表著社會的自我反省和轉化，也因此形成類似規範的權威」（李丁讚，2004，頁13）。如此，則台中市政府打造東協廣場成為多元文化主義的空間，或許相當程度是面對台灣市民社會的一種文化政策的反應，反應了東南亞族裔地景，不僅僅是一種東南亞移民/工為主體的族裔經濟或族裔消費地，而是從族裔消費空間轉變成為展現多元文化、相互包容的「新公共空間」。要瞭解這樣的意義轉變如何而來？則應該從瞭解東南亞族裔地景所具備的文化意涵開始。因此本章接下來首先透過回顧自2000年前後發展的經驗研究，以此來釐清和說明東南亞族裔地景所具備的意義轉變。

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注意到，儘管地方政府高度宣揚了東協廣場的意義，一如開頭引述《報導者》的專題報導所述，東協廣場對於廣大的台灣民眾而言，卻常是「地下社會」般的存在。本文認為，地下社會的比喻，正是捕捉了現實上台灣社會長期以來對於東南亞族裔地景的文化刻板印象。地下社會意味著不被多數人所熟知、經驗和理解，甚至有點危險；地下社會連結著台灣社會普遍的歧視想像，想像著地下社會有著不整潔，而這違反多數台灣人所信仰的文明樣子；在刻板印象的想像裡，地下社會還是由一群人的佔領、混亂秩序，違反多數台灣人對於公共空間的認知。這樣的想像與台中市政府打造東協廣場成為新文化空間的政策理念，明顯有所落差。值得反思的是，這樣的大眾想像又是如何而來？

回到哈伯瑪斯對於公共領域的論述概念，他將媒體視為是建立私人會合成為公眾、建立公共議題的一項重要的機制（李丁讚，2004，頁 7）。相應的，過去傳播研究也常檢視媒體作為一種建立公共領域的機制，可能出現的問題。如洪貞玲、劉昌德（2004）的研究便指出，20 世紀以降，資本的壟斷和國家強化控制侵蝕了大眾媒體扮演公共領域角色的潛能（洪貞玲、劉昌德，2004，頁 333）。則關於東南亞族裔地景的社會想像建構，跟大眾媒體的關係為何？本文將藉由分析於東南亞族裔地景的大眾媒體再現，說明東南亞族裔地景作為一種文化公共領域的社會想像與現實的落差。最後，針對東南亞族裔地景作為新「文化公共領域」的發展，本文亦將進行一些反思。

貳、概念與現象：東南亞族裔地景

具族裔特色的聚集生活區，是移民社會經常會出現的景象。過去研究常會以族裔經濟（*ethnic economics*）的概念來分析其意義，強調少數族裔作為移居者在接待社會的生活處境與經濟行為（Pécoud, 2010），以及常見其從事主流社群較不願意做的工作，包括從事危險、骯髒及低薪的勞動現象（Ojo & Shizha, 2018; Qadeer & Kumar, 2006）。抑或採取族裔飛地（*ethnic enclave*）的概念研究，強調內部有各類的族裔創業、店家或產業，來服務自己的族裔市場需求（Fong & Shen, 2011; Kaplan, 1998）。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族裔飛地或族裔經濟，其聚焦於族裔特色的經濟行動，較缺乏對文化意義面向的關懷。因此，本文以族裔地景來作為概念的聚焦討論。

所謂東南亞族裔地景，是指一個空間或場所，聚集一定人數的東南亞族裔者。這些族裔者主要是來臺工作的移工，他們來到這個場所交誼互動、購買日常所需、從事各種休閒活動等等多元的消費景象，便構成了東南亞族裔地景。不僅是移工構成東南亞族裔地景，少數的東南亞新住民，也是構成族裔地景的重要行動者。還有在台灣取得身份證的東南亞移民，以及台灣當地人，在這樣的消費場所開設東南亞料理店、雜貨店或者提供東南亞族裔種種消費需求的商品和服務（王志弘，2011）。

地景作為一種概念，不僅是針對特定空間、實體景象的解釋，同時是偏向將「地景詮釋為由人群的活力和實踐所塑造，以符合其文化」（Crang, 1998 / 王志弘等譯，2003，頁 35）。這說明了，運用地景這樣一個概念，不僅是用來指稱可輕易觀察到的物理景象，更是指涉東南亞族裔消費地的景象背後，所呈現的社會關係、文化意義。面對全球人口移動日益普遍，Appadurai（1996）提出族裔地景的概念，強調移居者進入接待社會或形成一種群體認同的地景。王志弘（2006）引用這個概念藉以分析在台灣的外籍移工在特定空間或地方所形成族裔認同和消費實踐狀況。對移工而言，族裔地景空間具備身在異鄉卻猶如故鄉的慰藉，此空間也能短暫舒緩緊繃、充滿壓力的顧傭關係同時滿足異鄉生活的消費需求。對主流社會而言，則不時會出現對東南亞為主的勞工消費群聚、空間佔用的嫌惡，甚至是擔心影響地價房價、環境品質等（王志弘，2006，頁 151-152）。然而王志弘以桃園火車站周邊族裔地景為例，研究發現在此空間蘊含了「多元族群或共存合作、或緊張誤解的社會關係，展現為複雜的空間政治」（同上引，頁 170）。

由此可以說明，相對於「地下社會」的比喻，東南亞族裔地景實際上內涵著更動態與多元的意義。而當我們要認識東南亞族裔地景在台灣社會的動態意義轉變，便不得不認識東南亞移工和移民在台灣發展概況。易言之，當東南亞族裔人口增長與之相關的族裔地景便會相對增加，此外其內涵及被觀看的方式也會隨之轉變。

東南亞族裔地景的蓬勃發展，最主要跟 1990 年代以來東南亞移工和新移民人數快速增長有高度的關連性。移工人數的增加源於台灣對於勞動力的需求，自 1980 年代台灣政府因為推動 14 項重大公共建設，以勞力短缺為由，首次開放引進東南亞移工，後續可以從歷年統計數字發現，東南亞移工在臺人數，自 1990 年代初期的數千人，隨著 1992 年《就業服務法》通過陸續放寬各行業和職業合法雇用外籍勞工，開始以翻倍的數字增加。關注勞工權益的團體，針對東南亞外籍移工人數的歷年迅速攀升的現象，直接點出了政策的迷障：原來官方政策所宣稱的「補充性勞動力」，其實早已是台灣不可或缺的「替代性勞動力」（孫友聯，2013）。

從勞動部的相關統計數據，確實可以發現，2003 年東南亞移工總數已突破三十萬、2011 年突破四十萬、2014 年突破五十萬，2016 年突破六十萬，2018 年底人數來到六十七萬，2019 年後就已突破七十萬人（請參照下表一）。

表一：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歷年統計（2003年-2020年）

年	總計	印尼	菲律賓	泰國	越南	其他
2003	300,150	56,437	81,355	104,728	57,603	27
2004	314,034	27,281	91,150	105,281	90,241	81
2005	327,396	49,094	95,703	98,322	84,185	92
2006	338,755	85,223	90,054	92,894	70,536	48
2007	357,937	115,490	86,423	86,948	69,043	33
2008	365,060	127,764	80,636	75,584	81,060	16
2009	351,016	139,404	72,077	61,432	78,093	10
2010	379,653	156,332	77,538	65,742	80,030	11
2011	425,660	175,409	82,841	71,763	95,643	4
2012	445,579	191,127	86,786	67,611	100,050	5
2013	489,134	213,234	89,024	61,709	125,162	5
2014	551,596	229,491	111,533	59,933	150,632	7
2015	587,940	236,526	123,058	58,372	169,981	3
2016	624,768	245,180	135,797	58,869	184,920	2
2017	676,142	258,084	148,786	61,176	208,095	1
2018	677,698	258,703	149,433	61,085	208,476	1
2019	718,058	74,764	126,661	59,013	196,162	1
2020	709,123	263,358	150,786	58,135	236,835	9

資料來源：〈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人數〉，勞動部，2020年12月，取自 <https://reurl.cc/YvzLqX>。

表一的歷年數字變化充分說明了，歷年來臺的東南亞移工，基本上是以越南、泰國、印尼、菲律賓四個國籍為主。因為來臺工作的移工數量年增快速，其來臺種種生活需求也隨之快速增加。相應的，東南亞族裔消費地的發展，可以視為是為了滿足不同國籍的移工在異鄉之生活需求。

整體而言，台灣各大東南亞族裔消費地景的形成，主要是起因於來自東南亞的移工具有族裔特性的消費需求而產生。少數例外是位於新北市中和區的華興街，該消費地景是以移居台灣的東南亞華人為主。華興街一帶素有小緬甸之稱，該地之所以形成，主要是因為國民黨政府過去的僑民政策，吸引了原來住在緬甸、為躲避緬甸軍事獨裁的華人來臺。這些移民來臺的緬甸華人，雖為華人但卻因為保有對於滇緬飲食、用品和語言文字的習慣，因此也造就了中和小緬甸的族裔地景（翟振孝，2005；張春炎，2011）。

東南亞族裔消費服務的供應商家，是構成台灣的東南亞族裔地景的另一類重要行動者。在台灣要成為店家經營者，往往需要具備公民身份。因此經營者除了是台灣人之外，也包含在東南亞具有生活經驗的華人移民，以及因為婚姻入籍的新移民-外籍配偶。尤其是東南亞外籍配偶，因為擁有台灣與東南亞國家的文化素養和語言能力，又具備公民身份，不僅能夠成為消費需求者，也能夠成為滿足經營東南亞商店的賣方。因此，這群新移民在臺的人數累積，是初步理解東南亞族裔地景何以形成和擴大的數據資料（請參見下表二）。

表二：台灣歷年來東南亞四國外籍配偶統計（2004年-2020年）

年	所有國籍的總計	東南亞四國的 總計	印尼	菲律賓	泰國	越南
2004	336,483	85,105 (25.29%)	24,446 (7.37%)	5,590 (1.66%)	8,888 (2.64%)	68,181 (20.26%)
2005	364,596	115,046	25,457	5,899	9,675	74,015

台灣的東南亞族裔地景與媒體再現

		(31.55%)	(6.98%)	(1.62%)	(2.65%)	(20.3%)
2006	383,204	117,448 (30.65%)	26,068 (6.8%)	6,081 (1.59%)	9,426 (2.46%)	75,873 (19.8%)
2007	399,038	119,206 (29.87%)	26,124 (6.55%)	6,140 (1.54%)	8,962 (2.25%)	77,980 (19.54%)
2008	413,421	121,127 (29.3%)	26,153 (6.33%)	6,340 (1.53%)	8,331 (2.02%)	80,303 (19.42%)
2009	429,495	123,725 (28.81%)	26,486 (6.17%)	6,694 (1.56%)	8,166 (1.9%)	82,379 (19.18%)
2010	444,216	126,084 (28.38%)	26,980 (6.07%)	6,888 (1.55%)	7,970 (1.79%)	84,246 (18.97%)
2011	459,390	128,956 (28.07%)	27,261 (5.93%)	7,184 (1.56%)	8,262 (1.8%)	86,249 (18.77%)
2012	473,144	130,842 (27.58%)	27,684 (5.85%)	7,465 (1.58%)	8,336 (1.76%)	87,357 (18.46%)
2013	486,703	133,067 (27.34%)	27,943 (5.74%)	7,707 (1.58%)	8,375 (1.72%)	89,042 (18.29%)
2014	498,368	135,779 (27.25%)	28,287 (5.68%)	8,021 (1.61%)	8,467 (1.7%)	91,004 (18.26%)

2015	510,250	138,991 (27.24%)	28,699 (5.62%)	8,326 (1.63%)	8,525 (1.67%)	93,441 (18.31%)
2016	521,136	142,813 (27.40%)	29,064 (5.58%)	8,670 (1.66%)	8,633 (1.66%)	96,446 (18.51%)
2017	530512	147,647 (27.83%)	29,451 (5.55%)	9,075 (1.71%)	8,703 (1.64%)	100,418 (18.93%)
2018.02	532208	148,367 (27.88%)	29,497 (5.54%)	9,149 (1.72%)	8,714 (1.64%)	101,007 (18.98%)
2019	557450	158,708 (28.47%)	30,483 (5.47%)	10,102 (1.81%)	9,126 (1.64%)	108,997 (19.55)
2020	565,299	161,202 (28.52%)	30,840 (5.46%)	10,375 (1.84%)	9,328 (1.65%)	110,659 (19.58%)

資料來源：〈統計資料〉，中華民國內政部移民署，2020 年 12 月，取自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lp.asp?CtNode=29699&CtUnit=16434&BaseDSD=7&mp=1>。

因此，表一、表二可見東南亞族裔人數增長數字，是一個很重要的基礎動力，造就 1990 年代後東南亞族裔地景日漸成為台灣社會的「另類主流地景」。若以主要族裔文化特色來看，目前在台灣的東南亞族裔地景，主要是以越南、泰國、印尼、菲律賓和緬甸（華人）族群為主。進一步依照不同東南亞族裔的消費特定，以及規模大小，全台灣可以標示出許多個東南亞族裔地景，這些地景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王志弘，2011；陳建元、張凱茵、楊賀雯，2016；陳坤宏，2008, 2012）：

(一) 單一東南亞國家族裔聚集：諸如位在臺北中山北路的小菲律賓（聖多福教堂及金萬萬名店城）、臺北火車站附近的小印尼、中和華新街的緬甸街，這些地點主要是由單一國家族群聚集而被命名的地景。

(二) 多元東南亞國家之族裔聚集：也有以越南、泰國、印尼和菲律賓這四大主要移工混雜聚集的族裔地景，諸如桃園後火車站周遭，台中東協廣場及周遭、臺南火車站周遭、臺南國賓大樓，高雄火車站區的外勞街。

(三) 城市外圍或鄉間的小規模、零星聚集：在各縣市的鄉間、工業區及港口周遭，因為移工勞動力需求的引進，也不乏有較小規模的東南亞族裔地景的存在，例如台中工業區，以及高雄港、南方澳漁港等。

值得關注的是，作為一個外在客觀事實，東南亞族裔地景的增加和類型的說明，仍然不能充分解釋東南亞族裔地景的社會意義。換言之，若要理解東南亞族裔地景的存在意義，應從東南亞移工來臺的勞動處境來進行分析，以此更認識東南亞族裔地景對族裔群體的生活需求的意義。既有研究發現，對於一個離鄉背井的移工而言，能夠在休假時光，到一個地點，不用再承受因為語言溝通困難而帶來的生活壓力，顯然極為重要。而語言也代表著相對熟悉東南亞文化的店家能夠提供上述族裔消費的滿足，因此族裔地景往往也是一個充滿族裔文化符號商品的景象。由於新移民的文化背景，其往往比本地人更具販售族裔文化商品、服務的能力，因此日漸增加的移民人數，也成為構成消費族裔地景的另一類重要行為者（王志弘，2011）。

整體而言，對於東南亞族裔者而言，東南亞族裔消費群聚地，充滿著不為人知的現實。因為來臺工作的東南亞移工，經歷著國族和階級的雙重弱勢。他們在臺生活和基本需求由此得到滿足，同時也能夠短暫逃避來台灣社會的生活壓力。誠如過去研究所指出的，移工到東南亞族裔地景的主要動機是期待能夠享受家鄉味的飲食用品、購滿慣用日常用品，並且能夠有一個地方自由使用母語與同鄉自由互動，享受難得的心理和生理的需求滿足（吳挺鋒，2002；吳永毅，2007；陳坤宏，2008）。

參、族裔地景的多元意義

由上節可知，東南亞族裔消費地景的存在，顯現的是備受工作和生活壓力的東南亞移民/工，能在非常有限的休假時間裡，完成所有生活必須的消費、匯款和需求滿足，同時也能滿足鄉愁的消解獲得歸屬感，甚至是有打黑工、增加收入機會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研究也關注到接待社會與東南亞族裔之間的文化關係，藉此分析解釋族裔地景所具備的社會意涵。這些研究多指出，台灣社會往往未能體察或認真看待前述的意義，反而是多存在的負面觀感與歧視，來看待東南亞族裔消費群聚。諸如早期研究發現，東南亞族裔消費地景會受到台灣報以刻板印象，將東南亞族裔地景視為是一種衰敗、髒亂和容易犯罪滋生的問題地，這樣的過程又稱為空間的病理化（邱淑雯，2007）。這樣的研究也凸顯出主流社會對於位居階級弱勢、邊緣少數的外來族群，抱持對立、不友善的姿態。

然而自 2000 年以來有越來越多研究者，採取移工為主體的立場，以同情式的理解角度來研究東南亞族裔消費地景。這些研究發現，移工在東南亞族裔地景之中的日常飲食、商品交換、語言群聚現象，並關心其如何在台灣社會重建其文化慣習，建立移民/工社群的情感網絡與認同（翟振孝，2005；藍佩嘉，2006；王志弘，2006；王志弘等，2009）。有些研究者則發現到，東南亞移工消費地景的意義，是彰顯了缺乏私人空間的移工，放假生活處境是讓「外翻口袋」，也就是必須在公共空間進行私人活動，如我們常會看到的街頭隨地休息的移工（吳永毅，2007）。雖然移工佔用公共空間是東南亞族裔消費地景之一，然而這樣的地景也是使得移工能夠擺脫雇主的監控、抒解身心壓力的難得保障（王志弘、沈孟穎，2009）。

此外，亦有研究發現因為消費群聚產生的東南亞族裔地景，一方面顯現出東南亞語言、標誌符號的空間特色，往往利用交通便利和低租金的空間，建立以消費作為核心族裔互動和人際交流（王志弘、沈孟穎、林純秀，2009；陳建元、張凱茵、楊賀雯，2016）。不僅展現族裔經濟下的維生地景（王志弘，2011），同時是「在異鄉維繫故鄉」的族裔地景（張春炎，2011）。這樣的空間，對於台灣主流社會而言具有隱蔽性，不僅是因為東南亞族裔此持續以原居地消費和文化實踐來組織日常生活，達成一種的文化劃界的效果。

也因為台灣主流族裔具備公民身份，形成具社會經濟地位的階級優勢，使之成為「化外之地」(王志弘、沈孟穎, 2009)。

由前述這些的研究，一方面可以發現東南亞移工消費群聚所形成的族裔地景，它作為一種社會事實，不僅是一種東南亞移工們(局內人群體)所造成，也是一種接待社會結構與移工社群的權力交鋒與相互建構(陳建元、張凱茵、楊賀雯, 2016)。這些研究者不僅解釋了東南亞移居者消費群聚空間的過程、消費對移工的多層意義，也彰顯了群聚空間與台灣社會之間的張力，包括在主流社群與移工社群的劃界與越界，族裔消費群聚的迴避與納編，以及移居者群聚所展生的文化展演和社群群凝聚(吳挺鋒, 2002; 吳比娜, 2003; 王志弘 2006、2008; 陳坤宏, 2008; 王志弘、沈孟穎 2009; 張春炎, 2011)。

因此，東南亞族裔地景所內涵的主流族群和東南亞族裔之間的疏離關係，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從早期的客體化、排他性(exclusive)的族裔空間，進入到 21 世紀則開始有越來越多的容納性(inclusive)意涵的多元文化主義論述的建立。如王志弘(2011)的研究便以臺北都會區東南亞族裔地景為例，其認為過去已經逐步建立起保守的多元文化主義，在此基礎上則應該跨越到具批判也是更為進步的多元文化主義。所謂保守的多元文化主義，也就是使移工族裔地景展現出，主流社會對於東南亞族裔之「文化差異和身份認同在公共生活中得到寬容、承認和保障」(王志弘, 2011, 頁 76)，這意味著東南亞族裔地景的劃界和隱蔽性的存在，是受制於台灣國族國家為框架的保守多元文化主義，形成一種多元或容納差異的自我讚頌。由此王志弘(2011)也提出了更具進步性的批判多元文化主義，也就是「立足於普遍公平和正義原則上的承認、寬容和尊重差異(同上引, 頁 76)」，建立東南亞族裔地景空間作為跨族裔群體交流和差異共存的場域。

本文認為，這類研究同時呈現出東南亞族裔地景具有新文化公共領域的可能性。因為，這樣的研究常帶有強烈的公共議題討論的性質，也就是從研究場域的進入、發現與批判討論中，凸顯了台灣作為接待社會，在面對東南亞族裔遷徙進入後，出現的種種問題和應該改進的方向。

綜合而言，過去有關東南亞消費群聚的研究發現，反應出東南亞族裔地景存在於台灣社會的意義是：從漠視到發現，從單一理解到多元理解，從排

他到容納差異。更為重要的是，東南亞族裔地景也正從被視為客體化（他們）的空間凝視，朝向探討跨群體交流（我們）的新公共領域。箇中所彰顯的意義是，東南亞族裔地景逐步形成一種台灣作為移民社會，如何建立有關多元文化主義之公共議題發展的空間領域。

肆、族裔消費地景的媒體再現

本章在前面幾節，已說明在台灣的東南亞族裔消費地，對於東南亞移工、移民在台灣這個異鄉的生活，具備生命意義的重要性。而這樣的重要性構成了東南亞族裔地景的多元意涵。由此帶出另一層思考是，回到哈伯瑪斯對於公共領域的論述概念，其強調大眾媒體是一個建立更廣大公眾對於公共議題討論、交流和形成理性溝通的一項重要機制。反映在本研究主題，則由前述研究脈絡所呈現的東南亞族裔地景的意義發現，以及作為新公共領域之可能性，是否能透過大眾媒體而拓展形成更大範圍而有效的公共討論。因此，本文將檢視大眾媒體如何再現東南亞族裔地景？

為解答上述問題，本節將進一步進行東南亞族裔地景的媒體再現分析。進入具體分析前，讀者應該了解媒體再現，所具有的幾項重要社會意涵：首先，媒體作為一種想像的公共空間，扮演著促進意義流通和關係建構的機制，其會影響廣大社會成員怎麼看待一個對象、族群和議題，因此各個社會也往往會特別注重大眾媒體是否對於特定的族群、性別或者階級有無不適當的再現（Chouliaraki, 2010; Scott, 2014）。

其次是，媒體如何再現東南亞地景，可以用來檢驗台灣社會作為接待社會，其接待文化為何（張春炎，2013、2018）。尤其，近年來有越來越多人開始組織和推動東南亞移民工的認識與生活關懷，這些行動都體現出台灣社會朝向多元文化主義發展的努力。假如善待東南亞移工的接待文化運動已推展開來，那麼在接待社會文化之中，是否同樣正面體現在移工消費群聚的媒體再現？透過東南亞族裔消費地景的媒體再現分析，能夠用來檢視過去被視為是病理空間、充滿歧視角度看待東南亞族裔消費地景，是否仍存在負面刻

板印象，抑或有所改變。這樣的分析，也可以相當程度檢視，台灣社會如何面對東南亞移工在台生活。

本文搜集台灣主流平面新聞媒體，可以發現，《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等四個在台灣的主要大眾平面新聞媒體，對於移工消費群聚地點的新聞關注不高。即便有所報導，普遍的媒體再現往往是針對移工在台灣所引發的社會事件或現象來進行報導。然而亦可歸納分析出不同的媒體再現觀點。

一、正向理解的族裔地景再現

諸如《中國時報》在 1990 年代中期，曾報導彰化、桃園等地東南亞外籍勞工群聚現象，尤其是 1995 年 9 月 8 日《中國時報》有一則新聞標題〈桃園工業區 泰式餐廳林立〉，內文描述「供應泰國勞工家鄉味食物的需要，與日俱增；在價位、口味上配合一般勞工的消費水準，並附設卡拉OK 供晚餐歡唱休閒，深具異國風情，也相當值得本國民眾嘗試（中國時報，1995.9.8）」。

《聯合報》也有同樣的新聞媒體再現，也就是以異國風情的角度報導。如 1999 年 7 月 25 日《聯合報》一則新聞標題〈異國風味飲食撲鼻香〉，內文報導「許多在台菲勞，星期天除了到多幅天數教堂望彌撒，飲食也是休閒的一項重要工作....這幾年由於菲勞在星期天大量湧入，附近也增加不少專賣菲律賓菜的自助餐廳、附設卡拉 OK 可以喝啤酒的 PUB、烤肉店即賣炒米粉的路邊攤，專門提供菲勞的需求.....老老少少的菲勞在異地的麥當勞用餐，原本不認識，由於共同的語言及背景，有的人很快就打成一片，共同分享座位，在享用美食的同時，也大聲用著共同的語言聊天（聯合報，1999.7.25）」。

前述報導，彰顯兩項特色，首先是抱持正面看法，持平描述移工增加帶來的消費需求和群聚現象。這樣的媒體再現特色，是傾向去理解東南亞族裔的消費需求。同時也鼓勵台灣社會，應在正面看待之餘，前往該地景體驗。更有媒體再現，是針對台灣社會對待外籍移工的不合宜制度，予以批判。《聯合報》一則新聞標題〈不堪其擾 聖多福教堂抗議〉（聯合報，1996.3.31），

報導警方經常在聖多福天主教堂趁機臨檢、查緝非法外勞，造成了教堂秩序大亂，為此教堂向外交部和警政署抗議。

二、社會問題化的族裔地景再現

然而東南亞族裔消費群聚的媒體再現，更常出現「社會問題化」的情況，諸如同樣報導中山北路的小菲律賓。《聯合報》一則新聞，便以〈外勞假日群聚 擬設專區解亂象〉作為新聞標題，內文討論了大量菲律賓移工群聚、吸引流動攤販所帶來的環境問題，「流動攤販不但製造環境衛生的髒亂，……老是和警方捉迷藏，晴光市場攤商一再向區公所反應，要求是政府應設法解決大批外勞聚集的相關問題（聯合報，1999.3.15）」。

此外一旦有犯罪問題，新聞往往會凸顯犯罪嫌疑犯所具有的特定東南亞特定族裔身份。這樣的媒體再現是反應出主流社會慣於凸顯犯罪行為與少數族裔的連結關係。如《中國時報》報導台中第一廣場發生的一樁暴力案件，便以〈越勞疑遭同鄉刺殺〉作為標題。由此可見，這樣的媒體再現是針對東南亞族裔身份的偏見再現。相對的，我們很少會在媒體上看見，主流社會群體所具有的族裔身份和其犯罪行為的連結再現，諸如我們幾乎不會看到新聞以「台灣本省人涉嫌犯下一樁案件（中國時報，2009.1.30）」這樣用語來呈現，足見這類犯罪新聞的再現所隱含的歧視意義。

有時媒體再現方式，則是採取同質化的報導，以外勞代稱並形成負面刻板印象，諸如《中國時報》以〈車資衝突 六外勞涉搶奪〉為標題，報導一群外籍移工搭計程車到彰化火車站的衝突事件，這類新聞都凸顯外籍勞工這樣的身份所帶來的酒後鬧事或者暴力逞兇危害治安的問題（《中國時報》，1994.10.4.）。第三種典型的媒體再現，是指涉東南亞族裔地景為犯罪滋生地，諸如《聯合報》以標題〈走私貨充斥 違禁品亂竄〉，報導「中山北路三段每逢假日之所以吸引大批菲律賓外勞聚集，除因當地有聖多福天主教堂這個望彌撒的精神『聖地』外，還有許多物質因素，例如這裡可以買到走私進口的菲律賓煙、酒、藥物，也有很多『地下銀行』可以用較高的匯率把臺幣匯回菲國，更有台灣的餐飲業者開專車接送菲勞到店裡連假消費，替違禁品找到更好的流通管道（聯合報，1999.7.25）」。

上述新聞在結語最後提到「從另一觀點來看，菲勞平日工作辛苦，又缺乏正當娛樂場所，只要不再 PUB 鬧事，警察並不會大驚小怪。」，雖然新聞在結語部分使用了看似同情理解的角度報導，但無法免除標題和大部分內容的刻板印象化的媒體再現，也就是指稱或暗示小菲律賓這個東南亞族裔消費地景充滿犯罪和不法行徑，或者是治安死角等。

綜合而言，我們可以發現，雖然早在 1990 年代台灣新聞媒體就已經能夠對於東南亞移工來臺生活有所關照。然而主流平面媒體有關移工消費群聚地的再現，仍然缺乏足夠多的報導，報導也無法有效呈現該地景所具有的多元意涵，更未能採取同情式的理解移工的角度，來再現東南亞族裔消費地景。

不僅如此，既存的新聞，仍然不時採取一種刻板印象式的媒體再現模式，將東南亞族裔消費地景刻板印象化為是一種異國情調，抑或是「髒亂、治安死角」。則這樣的媒體再現，都將更傾向以單調且輕薄的想像，想像東南亞族裔消費地景是異國美食街，或者犯罪滋生區。這類典型的媒體再現所帶來的社會想像，恐怕只是一種簡化或負面標籤化東南亞族裔地景。

伍、新公共領域的可能？各種嘗試

一、族裔地景媒體再現的去多元化與接待社會文化

本章嘗試與讀者共同瞭解東南亞族裔消費地景之所以形成，跟東南亞族裔在台灣的人數攀升有關。形構東南亞族裔消費地景的主要行為者，大多是以移工身份短暫來臺工作的東南亞移工，或者透過婚嫁方式來臺的東南亞移民。這些人來臺生活或工作，往往具備異鄉人的特質，而產生族裔團體相聚和購買故鄉商品的需求。尤其是東南亞移工，來臺前往往往沒有充足語言訓練，而語言不通或溝通障礙，也構成了他們在臺工作和生活的沉重壓力。一旦放假，東南亞移工就更需要消解思鄉情緒、安心休息的空間，他們需要有一個地方，能夠和來自相同故鄉的人、用故鄉的語言互動聊天。此外，對於東南亞移工而言，購買具有故鄉味道、習慣使用的物品，是消解鄉愁及生活壓力的重要管道，這也構成了東南亞族裔消費地景的首要意義。因此，東南

亞族裔地景的構成意義，不僅是移工的消費聚集，更像是一種思鄉的文化實踐。

其次是構成東南亞族裔地景的台灣空間實體，多半是在老舊、在地消費人口流逝的台灣都市空間。這類空間景觀上往往較為破敗或髒亂，較容易讓台灣人退避、不願進入。因此，台灣商場、街道或公共空間的衰敗，反而成為東南亞移工躲避在臺生活壓力的機會，也是這群異鄉人能夠購買思鄉產品的消費場所。對於經營的商家而言，破敗的地點讓租金比較低廉，彌補了平日-移工上班日就無顧客收入的窘境。低廉租金也讓販賣較為低價東南亞商品、平日無顧客的商家能夠維持經營，這才使得具東南亞族裔特色或者能夠滿足異鄉需求的商品，能夠持續存在，並滿足了思鄉、高異鄉生活壓力、高工時又無太多可支配所得的東南亞移工之需求。

從本章第二、三節的文獻回顧可見，過去有諸多研究深刻地探討了，東南亞族裔消費地景所蘊含的多元意義。本文認為，這些進入東南亞族裔地景的研究與發現，不僅是知識也是一種行動，包括促成了與多元文化主義發展相關的公共議題被討論。諸如如何讓東南亞族裔地景的意義被更多人認識？如何保存族裔地景？族裔地景應該如何發展？等等。這些持續不斷形成的相關公共議題，環繞在東南亞族裔地景的同時，也確實驅使了文化政策行動開展。諸如本文開頭所提，地方政府將第一廣場從小東南亞重新定位為發展多元文化主義的場域，因此重新命名第一廣場為東協廣場。而東協廣場的建立，也成為一個被期待的新文化公共領域。

值得反思的是，在主流平面新聞的媒體再現上，卻仍然呈現種種的缺乏，包括了缺乏足夠的報導量，同時也缺乏多元意義的呈現。這也說明了，縱然歷年來相關研究揭開了意義的面紗，發現東南亞族裔地景具備多元文化主義議題發展的新公共領域意涵，然而傳統的報紙新聞媒體，則尚未能有效扮演串連意義討論的機制，無法實踐己身成為公共議題討論與串連的公共角色。

由此，不免需要再想想 Appadurai 的論點，當大眾平面新聞媒體對於東南亞族裔消費地景的再現，經常傾向是將之想像成是一種「視而不見」的存在或者單一化的負面刻板印象（Appadurai, 1996／鄭義愷譯，2009）。那麼

東南亞族裔消費地景，則會被經常綁定在一種負面的想像裡，也讓我們見不到東南亞移工作為的人的人權需求和寶貴的社會貢獻。換言之，原本該是友善移工，使東南亞移工能夠利用短暫假日實踐人權、社會生活權利的族裔地景，就隨著媒體再現，在台灣主流社會文化中，成為一種看不見的地景。

媒體再現作為一種反思社會的基礎，呈現出本文要談的另一項關鍵的意義。作為接待社會，我們在主流平面新聞媒體再現中所不易看見的東南亞族裔之人權和社會意義，也讓台灣社會形成一種習慣性的對於自身社會文化素養的視而不見，視而不見自身「將移工視為勞動機器」的扭曲文化。換言之，如果媒體再現導引著特定的社會想像，那麼不免令人憂心的是，這樣的社會想像將持續維持一個社會事實，也就是台灣的接待文化是更傾向作為「一個不友善東南亞族裔」的社會事實。

二、新媒體與新公共領域的契機

值得關注的是，在這個新媒體的影響力量正在看俏的年代，新媒體再現是另一個可期待的社會想像力來源。本章一開頭引用近年來崛起的台灣新媒體《報導者》的專題報導，在該系列報導的媒體再現中，就是以東協廣場為主軸，呈現的生活其中的東南亞移工作為人的事實，再現其具有慾望、物質和休閒的需求和種種人權，因此「東南亞族裔消費地景的媒體再現」，其所傳達的是：東南亞移民、工在臺生活，是離鄉背井的生活，有種種需求難得在東協廣場這樣的空間被滿足的景象。

除此之外，就文化意義的層面，新媒體的報導更傳遞了體認東南亞移工是生活在台灣的異鄉人，需要被尊重、理解。因此這類新媒體再現，一方面再現出在台灣的東南亞移工未被善待的意義；另一方面則是開啟了台灣接待文化內涵的自我反省。

在上述的討論脈絡下，也不應該忽略的是，東南亞族裔地景並非始終處於有待被再現的被動角色。以筆者過去幾年在台中東協廣場執行教學和研究計畫為例，可以發現自 2016 年起，有越來越多台灣在地團體投入友善、理

解和推動東南亞族裔權益的行動，包括台中在地原生組織 1095（壹零玖伍文史工作室），¹以及長年維護勞動權的 TIWA（台灣國際勞工協會）至東協廣場設立辦公室。²筆者所任職的學校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以東南亞學系、東南亞研究中心為主要成員的師生在東協廣場設立 SEAT 南方實驗室，搭建台灣與東南亞移民工的「文化交流平臺」。³這些從知識到行動的團體，不僅代表台灣社群與東南亞族裔持續進行正向的交流與互動，並在這個東南亞族裔空間搭建起更多相關文化公共議題的討論。此外，這些團體也常會透過現場行動、新媒體影響大眾媒體傳播，藉此引發社會對於東南亞族裔地景相關之公共議題的關注與討論。諸如 TIWA 在 2019 年經由臉書，以現場直擊的方式發布訊息，傳播台中警察於晚間驅離坐在東協廣場的移工，並且藉此事件嘗試提出相關公共議題的討論與反省：

¹ 1095 臉書粉絲頁強調，「建立更多元的文化認知，豐富國人的國際觀，藉此改善外籍人士在台的社會待遇與勞動環境」，資料來源：

<https://www.facebook.com/MigrationTaichung/>

² TIWA 曾經針對東協廣場一些不友善移工的舉措進行抗議，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QLKrQ5>

³ SEAT 南方實驗室 <https://www.facebook.com/seataichung/>，係「結合臺中市政府與在地社會團體力量，正式成立服務東南亞移民工與臺灣友善社會的交流溝通平台-『東協廣場溝通互動平臺』」，資料來源：

<https://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07000.aspx>



影像擷取自 TIWA Taichung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台中辦公室(2019.07.14)《誰的東協？誰的廣場？》，資料來源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366411864073203>

正是上述這一則臉書文及現場影像紀錄的發布，使 TIWA 台中辦公室成為此事件的消息來源，隔日受到《中央社》報導，⁴中央社新聞稿同步引發公廣集團華視新聞，⁵以及數家網路新聞媒體《新頭殼》、⁶《關鍵新聞網》、⁷

⁴ 中央社（2019年7月15日）。〈網傳驅離東協廣場移工 中市警：勸離有醉意移工〉，資料來源 <https://www.cna.com.tw/news/asoc/201907150188.aspx>

⁵ 華視新聞（2019年7月15日）。〈"東協廣場"聚會 移工控警惡意驅趕〉，資料來源 <https://news.cts.com.tw/cts/local/201907/201907151967687.html>

⁶ 新頭殼（2019年7月15日）。〈網傳驅離東協廣場移工 中市警：勸離有醉意移工〉，資料來源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9-07-15/272927>

⁷ 關鍵評論網（2019年7月15日）。〈網傳驅離東協廣場移工 中市警：勸離有醉意移工〉，資料來源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22136>

《芋傳媒》的報導。⁸而這一連串新聞，不僅呈現此新聞事件，內容更提出了多元文化主義相關的公共議題討論。彰顯台灣人進入東南亞族裔地景，形成友善、共容互動，以及建立多元文化主義的公共討論論述。

除此之外，也可以發現東南亞族裔自主發動社會議題的能力。如印尼移工 Pindy，自動發起同鄉移工一同打掃緊鄰東協廣場的綠川和周邊街道，這樣的活動同時受到網路媒體報導。在接受採訪時 Pindy 提到「台灣是我們第 2 個家，想要一起做對社會有幫助的事」，引發諸多媒體報導，相應提出公共議題的討論，包括應該打破對移工誤解及刻板印象，減少社會對於東南亞移工的歧視。此外，Pindy 也聯合台灣朋友一同維護彼此的生活環境。彰顯出東南亞移工的自主再現的能力，以及愛環境愛台灣，相互平等包容、不分彼此的公共論述。⁹

由此凸顯了在東南亞族裔地景之中，從昔日對族裔內部有特殊意涵，但對接待社會具隱蔽意涵的公共空間，正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具公共互動性的新文化公共領域。這樣的發展動力來自於過去研究者的知識行動、在地非營利組織以及晚近可見的東南亞族裔的自主行動，持續促成了文化政策的落實與發展。

陸、結論

在結論中，本章鼓勵讀者正視在我們生活周遭的東南亞族裔地景，並且反思其存在的意涵與自身經驗，進而共同來持續關注一系列的問題，包括：

⁸ 芋傳媒（2019 年 7 月 15 日）。〈網傳驅離東協廣場移工 中市警：勸離有醉意移工〉，資料來源 <https://taronews.tw/2019/07/15/403213/>

⁹ 此移工自主再現的行動和公共議題擴展，同樣受到一連串媒體報導，包括李文潔（2018 年 3 月 9 日）。〈台中最美背影—印尼移工揪團掃綠川〉，資料來源 <https://www.taiwannews.com.tw/ch/news/3380286>；中央社（2018 年 4 月 12 日）。〈台灣也是家 印尼移工主動清理綠川〉，資料來源 <https://www.cna.com.tw/news/aloc/201804120360.aspx>；關鍵評論網（2018 年 4 月 28 日）。〈印尼移工揪團清理台中綠川：「台灣是我們第二個家」〉，資料來源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94545>；陳孟萱、林品鑫（2018 年 5 月 13 日）。〈這就是愛台灣！印尼移工清綠川〉，《華視新聞網》，資料來源 <https://news.cts.com.tw/cts/local/201805/201805131924369.html>。

面對多元、跨國移動頻繁的世界，移民社會為體質的台灣社會，是否具備待客之道？能否平等看待各種在台灣社會內部所形成的各種族群文化？我們是否展現追求多元文化主義的理想，也就是尊重、平等看待各種族群的文化價值？

本文認為，對於東南亞族裔地景的正視以及文化理解是一個開始，後續東南亞族裔地景如何能夠成為一種對文化政策更具影響力的新文化公共領域，端賴於其是否能有效幫助生活在台灣的各種文化族裔和人們，藉此檢視台灣的多元文化主義發展（王志弘，2011）。而東南亞族裔消費地景的媒體再現，在此過程扮演重要角色，值得受到檢視與觀察，這也關係到未來台灣如何發展更進步的接待社會文化。

參考文獻

- 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等譯（2003）。《文化地理學》。台北：巨流。（原書 Crang, M. [1998]. *Cultural geography*. London, UK: Routledge.）
- 鄭義愷譯（2009）。《消失的現代性：全球化的文化向度》。台北：群學。（原書 Appadurai, A. [1996].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王志弘（2006）。〈移置認同與空間政治：桃園火車站週邊消費族裔地景研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61：149-203。
- 王志弘（2008）。〈族裔-文化經濟、謀生策略與認同協商：臺北都會區東南亞風味餐飲店個案研究〉，《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報》，39：1-44。
- 王志弘（2011）。〈我們有多元文化城市嗎？臺北都會區東南亞族裔領域化的機制、類型與作用〉，《台灣社會研究季刊》，82：31-84。
- 王志弘、沈孟穎（2009）。〈疆域化、縫隙介面與跨國空間：臺北市安康市場「越南街」族裔化地方研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3：119-166。
- 王志弘、沈孟穎、林純秀（2009）。〈族裔公共空間的劃界政治：臺北都會區外圍東南亞消費地景分析〉，《台灣東南亞學刊》，6(1)：3-48。
- 吳比娜（2003）。《ChungShan—：台北市菲律賓外籍勞工社群空間的形成》。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位論文。
- 吳永毅（2007）。〈無 HOME 可歸：公私反轉與外籍家勞所受之時空排斥的個案研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66：1-74。

- 吳挺鋒 (2002)。〈台灣外籍勞工的抵抗與適應：周休做為一個鬥爭場域〉，《香港社會科學學報》，23：103-150。
- 李丁讚 (2004)。〈導論：市民社會與公共領域在台灣的發展〉，收錄於李丁讚編《公共領域在台灣：困境與契機》(頁 1-62)。台北：桂冠。
- 邱淑雯 (2007)。〈「移民區病理 vs. 網絡集結點」的衝突與克服：以在越南女性的店家為例〉，《教育與社會研究》，13：95-120。
- 洪貞玲、劉昌德 (2004)。〈線上全球公共領域？網路的潛能、實踐與限制〉，《資訊社會研究》，6：341-363。
- 孫友聯 (2013)。〈移動中的剝削：台灣外勞人權問題剖析〉，《台灣人權學刊》，2(2)：113-128。
- 張春炎 (2011)。〈從異鄉人到「藝」鄉人：中和市小緬甸美食街的文化景觀和象徵展演〉，《台灣東南亞學刊》，8(2)：139-170。
- 張春炎 (2013)。〈東南亞的自然災難與他者化過程：2011 年泰國水患的媒體再現之初探研究〉，《亞太研究論壇》，59：89-119。
- 張春炎 (2018)。〈他者化的受難？菲律賓海燕風災的新聞論述分析〉，《思與言》，56(4)：145-193。
- 陳坤宏 (2008)。〈台南縣市、高雄縣市都市商業地區東南亞外籍勞工消費型態之初步比較〉，《建築與規劃學報》，9(3)：211-234。
- 陳坤宏 (2012)。〈東南亞移工聚集之空間分割感受的社區觀點：台南市、高雄市、台中市的經驗研究〉，《環境與世界》，26：33-75。
- 陳建元、張凱茵、楊賀雯 (2016)。〈台中第一廣場暨周邊地區東南亞族裔空間形成與轉變〉，《都市與計劃》，43(3)：261-289
- 翟振孝 (2005)。《遷移、文化與認同：緬華移民的社群建構與跨國網絡》。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藍佩嘉 (2006)。〈合法的奴工,法外的自由:外籍勞工的控制與出走〉，《台灣社會季刊》，64：109-110。
- Appadurai, A. (1996).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Chouliaraki, L. (2010). Global representations of distant suffering. In N. Coupland (Ed.), *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globalization* (pp. 608-624. Malden: Wiley-Blackwell.
- Fong, E., & Shen, J. (2011). Explaining ethnic enclave, ethnic entrepreneurial and employment niches: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in Canadian immigrant gateway cities. *Urban Studies*, 48(8), 1605-1633.
- Kaplan, D. H. (1998).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urban ethnic economies. *Urban Geography*, 19(6), 489-501.
- Ojo, T.H., & Shizha, E.(2018). Ethnic enclaves in Canada: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residing within. In E. Shizha, R. Kimani-Dupuis & P. Broni (eds.), *Living beyond borders: Essays on global immigrants and refugees*

(pp.162-179).Peter Lang

Pécoud, A. (2010). What is ethnic in an ethnic econom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1), 59-76.

Qadeer, M., & Kumar, S.(2006). Ethnic enclaves and social cohesion. *Canadian Journal of Urban Research*, 15, 1-17.

Scott, M. (2014). The mediation of distant suffering: An empirical contribution beyond television news text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6(1), 3-19.

Southeast Asian Ethnic Landscape and Media Representation in Taiwan

Chun-Yen Ch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diverse meanings of Southeast Asian ethnic landscapes and to reflect on their potential as a new cultural public sphere. This article first uses data to illustrate that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Southeast Asian immigrants/workers is the main driving force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ethnic consumption landscape in Taiwan. Secondly, by reviewing the existing empirical studies,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diverse meaning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onsumption landscape. The third is to reflect on Taiwan's hospitality society and culture by analyzing media representations of Southeast Asian consumption landscape. The study found that representations of mainstream print media reflect the lack of imagin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ethnic groups in Taiwanese society; representations of new media highlight that the public space where ethnic landscapes have hidden meanings for the host society is gradually developing into a public space with an interactive new cultural public sphere. In conclusion,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it is the intellectual actions of researchers, local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the autonomous actions of Southeast Asian ethnic groups that have been seen in the past, which together make such a new cultural public sphere gradually take shape.

Keywords: ethnoscape, landscape, media representation, Southeast Asian migrant workers, Southeast Asian immigration

* Chun-Yen Cha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媒介化理論與政治經濟學的思考對話： 以學術傳播的媒介化為考察場域*

劉忠博、冼楚橋**

本文引用格式

劉忠博、冼楚橋（2022）。〈媒介化理論與政治經濟學的思考對話：以學術傳播的媒介化為考察場域〉，《傳播、文化與政治》，15:113-137。

投稿日期：2022 年 3 月 29 日；通過日期：2022 年 5 月 8 日。

*本文系廣州市哲學社科規劃項目「學術傳播背景下英語文獻中的廣州研究」（項目編號: 2019GZGJ14）的階段性成果。

** 作者劉忠博為華南理工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冼楚橋為華南理工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2019 級碩士生，e-mail：liupublius@gmail.com。

《摘要》

媒介化理論由歐陸學者提出之後，論者有意或無意地將政治經濟的因素排除在理論的建構過程之外，從而忽視媒介化理論與政治經濟學的聯繫。這點從媒介化陣營中近年來提出的分析概念可看出，無論制度論或社會建構論者，他們在解釋「為何有些場域能夠媒介化，另一些則否」的問題時，都留有缺陷，而考察這個問題背後的政治經濟因素，正好能填補理論解釋力的不足。立基於此，本文首先說明媒介化陣營中近年來提出的分析概念，除了對這些概念進行批判性的理解，也說明它們與政治經濟學的可能聯繫。其次，聚焦學術傳播的媒介化，我們將以西方期刊資料庫公司為例，說明資料庫原本作為一種計算引用率的媒介，然而在它建構傳播形構的過程中，將學者、圖書館、大學機構與政府單位等行動者納入形構，從而轉變為認證知識生產力的媒介。其後果是讓資料庫的名稱及其影響力的數值烙印在學者們的發表記錄之中，而技術的符號也因此銘刻在學術期刊的版權頁裡，成為學術傳播的常態性實踐。透過學術傳播場域的說明，本文認為媒介化研究應該從政治經濟的角度提問，並指出未來可能的三項關鍵議題，藉以更好地拓展媒介化理論的研究範圍。

關鍵詞：深度媒介化、媒介邏輯、傳播形構、傳播政治經濟學

壹、研究背景及意義

媒介化理論從歐陸學者提出至今，討論的層次不僅有理論思辨，亦有許多經驗研究予以實證（參考 Hjarvard, 2013, 2017; Couldry & Hepp, 2013; Hepp, 2020; 唐士哲, 2014a, 2014b; 方念萱, 2016; 侯東陽, 2018; 王琛元, 2018; 戴宇辰, 2021）。在理論的思辨上，為了回應 Deacon 與 Stanyer（2014, 2015）曾質疑媒介化理論是否過於籠統以及能否實證的可行性（參考方念萱, 2016），媒介化陣營的學者近年來發展出許多分析概念，試圖在抽象理論體系與具體的案例之間，找出介於其中並可加以操作、比較的概念，藉以指引更多的經驗研究。不過這些論述仍有局限，特別是處理政治經濟的議題時，它們傾向將之視為一種既定的背景，而未能適當地納入理論建構的過程。

如 Murdock（2017）所言，媒介化理論家引述 Schulz（2004）的看法，強調媒介在技術、符號與經濟上的特性，然而後繼的研究卻只重視前兩者，經濟議題反而鮮少著墨。姚建華（2021）也指出，媒介化理論欠缺與政治經濟權力的討論勾連。假使如 Couldry 與 Hepp（2013）所言，媒介化研究強調的是媒介與社會文化之間的共變關係，那麼忽視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勢必造成理論上的瑕疵，特別是媒介化的概念無法對於政治經濟的議題提出有效解釋。方念萱（2016）引述 Deacon 與 Stanyer（2014）的說法，認為媒介化研究的焦點見諸於「化」這個過程，而資本主義如何與媒介共同推進這個「化」？捨此將難以拼湊媒介化的完整樣貌。

另一方面，本文以學術傳播領域為媒介化理論的考察場域，其考量如下：學術傳播的內容是知識，而知識作為研究客體，它具有雙元的特性：一來知識作為一種觀念，理論上某人使用某種觀念，並不仿礙他人同時使用，因此它可由世人共用（例如議程設置理論）。二來，承載觀念的形式則有使用上的限制。當某人自圖書館借走了某本書時，他人只能另謀管道，或擇日再閱（例如《議程設置：大眾媒介與輿論》這本書籍）。如今這兩種特性因為數位技術的作用而模糊化了，但學界對於學術傳播的媒介化議題卻少有申論。更重要的是，學術傳播早已離不開媒介。Borgman 與 Furner（2002）認

為學術傳播是學者透過正式和非正式的管道來傳播與使用資訊。從早期學者們私下非正式的書信往來，到透過印刷術正式出版的書籍，再到今天新媒體平台的傳播，學術傳播歷來都與媒介纏繞，沒有理由忽視這一領域的媒介化過程。

綜上所言，本文首先介紹媒介化理論中重要的分析概念，如媒介邏輯、媒介動力與傳播形構等等，並探討將之應用的研究。其次，這些概念欠缺將政治經濟的運作納入理論建構之中，而本文將論述它們與政治經濟學的可能聯繫。再者，我們以學術傳播為例，說明期刊資料庫原本作為一種論文資源配置的媒介，而這種媒介的功能僅是在搜尋相關文獻時提供便利性，然而在獲得政治經濟的驅力之後，便躍升為界定研究生產力的權威性媒介，並影響著學者們的傳播實踐，從而改變了學術傳播文化。最後，憑藉政治經濟學的視野，本文也針對媒介化研究的未來發展，提出三項討論議題。

貳、制度論與社會建構論中的媒介化觀點

Hjarvard 與 Li (2016) 認為，媒介化 (mediatization) 是「通過媒介在文化和社會中的重要性，改變和強化不同社會制度以及文化領域變得依賴媒介及其邏輯的過程」 [12]。更為直白的定義是，「媒介化隱含社會與文化行動的核心成分（如：工作、休閒或遊戲等），逐漸披上媒介的形式」(Hjarvard, 2004)。Hepp (2019) 指出，媒介化的研究並不處理個別媒體內容的效果，而是關注社會與人類實踐的方式被媒介日益增加的普遍性所改變。

儘管學界目前對於媒介化理論的重要性逐漸形成共識，然而對於該理論如何擴展至經驗研究仍有分歧。目前處理媒介化理論大致可分為兩種傳統：制度論與社會建構論。一方面，制度論認為媒介化研究關注的是社會上不同的領域逐漸適應或實行媒介機構的規則。另一方面，社會建構論是從日常生活中的行動者出發，探討當人們的社會和文化實踐逐漸與媒介交纏 (entangled) 時所發生的變化 (Hepp, 2019)。本文主旨並非教科書式地統整

兩種傳統的論點，而是聚焦它們各自發展出指導經驗研究的理論概念，並對其進行批判性的理解。

一、制度論中的媒介動力

作為一種觀察媒介、文化與社會領域發生相應轉變的理論，有學者認為媒介化可比肩全球化、個人化與商業化，成為架構人類社會發展的元過程（meta-processes; Krotz, 2017）。儘管媒介化陣營中的學者都同意，由於媒介對於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滲透及其社會文化的轉變已成現實（Lundby, 2014），然而媒介化究竟如何鑲嵌於社會之中運作？又該如何觀察這個過程？面對這些問題，Schulz（2004）從反思早期的媒介化研究著手，指出早期研究善於觀察大眾媒體，然而這類媒體幾乎支配所有的傳播資源，如今在新媒體的挑戰下，這種資源集中化的局面被打破，Schulz 轉而提問：媒介化研究倘若還停留在分析特定的（大眾）媒介，是否導致「媒介化（理論）的終結」（Schulz, 2004, p.94；括號字為筆者所加）？

Schulz 的看法是，思考媒介化理論時要超越特定的媒介，並「參照媒介在傳播過程中基本的表現與功能，來解釋媒介化」（Schulz, 2004, pp.98-99）。對此，Schulz 試圖提出媒介能夠改變人與人之間交流（或互動）的四種類型：（一）媒介在時間與空間之中延伸了人的溝通能力；（二）媒介替代了人們面對面的社交活動；（三）媒介活動與非媒介活動相融合，媒介也因此滲透進人們的日常生活；（四）不同領域的行動者不得不調整其行為以適應媒介的評估或慣例。

將媒介化從針對特定媒介的討論，轉換成媒介的功能性及其社會過程為思路，Schulz 的論點被 Hjarvard 延續下來，不過後者更重視將媒介化放在高度現代性的脈絡下，檢視媒介作為半獨立機構與其他機構互動時，產生的社會文化之變化。在 Hjarvard（2017, p.67）看來，「媒介化是指媒介在文化、社會和不同社會制度中的重要性被改變和強化、以及眾多的文化領域逐漸依賴媒介及其邏輯的過程。」。就此而言，媒介邏輯被定義為一組規則與資源，社會上不同機構（或個人）若依此規則行事，就能獲得媒介提供的資源來成

事。久而久之，也就將媒介的規則內化為自身的規則。媒介邏輯一詞可追溯至 Altheide 與 Snow (1970) (參考唐士哲, 2014b)，而 Strömbäck (2008) 也用此概念分析政治媒介化的四個階段的特徵：第一個階段是媒介成為人們接收政治消息的主要來源；第二個階段是媒介逐漸獨立於政治機構，而記者也獲得更高的自主權；第三個階段是政治機構開始主動適應媒介機構的邏輯；第四個階段政治機構不僅主動適應，甚至還會內化媒介邏輯。

Hjarvard (2017) 認為 Strömbäck 運用媒介邏輯時，過於將媒介邏輯與其他機構的邏輯截然對立，二者就像玩一場零和遊戲，不是你贏就是我敗。捨此，Hjarvard 將媒介邏輯與其他機構邏輯的互動予以刻度化，不同邏輯之間無論此消彼長、互動強弱，都會形塑出不同樣貌的媒介化，如同量尺的刻度般，媒介邏輯越強，社會互動的媒介化刻度越高。進一步的問題是，如何觀察媒介邏輯的作用？Hjarvard 指出，媒介邏輯能從媒介具體的慣有做法 (modus operandi) 中得到體現，也就是說研究者透過觀察這些做法，便能從中窺探出媒介邏輯如何介入社會互動。簡言之，Hjarvard (2017, p.71) 認為媒介邏輯可以從以下三個面向，來考察它們的慣常做法：技術面向 (典型的做法如大眾傳播、網路傳播)、美學面向 (典型的做法如戲劇化、框架、風格)、以及制度 (典型的做法如立法、組織形式)。

媒介邏輯的概念適用於考察單一類型的媒介，然而社會上的媒介是複數的，前述的媒介邏輯無法覆蓋不同媒介在匯聚層次 (aggregate level) 上的影響，因此他改以「媒介動力」(media dynamics) 的概念，捕捉媒介匯聚時引發的媒介化過程。就此而言，媒介具有以下三種作用：放大 (amplification)、框架與表演能動性 (framing and performative agency) 與共構 (co-structuring) (Hjarvard, 2017)：放大是指透過 (各種) 媒介釋出資訊之後，其傳播的速度、次數都會瞬間增加，而這也會影響人們捲入傳播的程度；框架是指媒介使用的語言往往能替議題定性，而表演能動性代表了一種戲劇手法 (dramaturgy)，意指傳播或被報導的事件會如(預先設定好的)劇本呈現；共構是指媒介實踐既是鑲嵌在社會結構之中，也會反過來構成社會結構，這點從權力關係的角度來考察特別明顯。例如新聞媒體採訪消息來源時會選擇位高权重的人士，因為在媒體看來，這些人在社會結構中擁有支配的地位，其

所掌握的資訊一般人不易獲取，卻又影響著整個社會。然而在這些握有權力的人眼中，媒介的採訪無疑進一步鞏固他們的地位。換言之，媒介與有權者共構了既有的權力關係。

Hjarvard 與 Lundby (2018) 以《查理週刊》(Charlie Hebdo) 於 2015 年 1 月遭受恐怖襲擊為例，說明媒介動力如何發揮作用。首先，就放大的作用來看，襲擊事件爆發之後，資訊便透過傳統媒體與社交媒介在全球範圍內傳播，後續也引發人們對於恐怖主義的示威抗議活動，並支持查理週刊的言論自由。其次，就框架與表演能動性而言，媒介在此次襲擊事件之中，連結「伊斯蘭教」與「恐怖主義」兩種不同的概念，而作者認為這種「話語上的耦合」(discursive couplings) 成為整起事件的主導框架，(西方主流的) 新聞媒體借此形塑自身為反恐怖主義與捍衛言論自由的行動者／表演者。然而，犯罪者也會利用媒介的這種框架作用，宣傳自身的理念，並繼續製造恐懼。媒介就像一座表演的舞臺，行動者展演其中。最後，就共構權力關係而言，《查理週刊》原本是法國較為邊緣、小眾的新聞媒體，但事件發生之後，由於整個主導框架使然，它忽然躍身為捍衛言論自由的鬥士，並與西方主流媒介站在同一陣線，成為既有權力結構的一部份。與此同時，許多穆斯林也在社交媒介上發聲，譴責恐怖襲擊，試圖劃清界限，重新融入既有的權力結構。

無論是媒介邏輯或媒介動力，Hjarvard 都認為它們並不是單方面從媒介這一端發出作用，繼而另一端的社會機構就會被影響；它們毋寧是在與其他機構互動之中才能被觀察到的現象。用 Hjarvard 的話來說，媒介化「可被描述為一種媒介邏輯與其他機構邏輯相互適應的過程」[1]。在相關的批評方面，Hepp (2020) 認為制度論的觀點過於側重媒介本身的影響力，並傾向認為這種影響力是先天內建的，因此有何結果早已事先明瞭，後續的發展變化顯得次要，這種分析過於靜態，難以捕捉現實的複雜過程。舉例而言，Hjarvard 將媒介邏輯分為物質、美學與制度性的規則與實踐，雖然能幫助研究者檢視經驗現象，但已預設了媒介化的過程難以跳脫這三種維度。此外，這些維度在實際運作的過程中，也非個別獨立的作用，而可能是並行不悖的發生。例如社交媒介有其技術性（如演算法），也有制度性的規則（例如運營媒介的公司的商業邏輯），更有美學／象徵的框架（例如社交媒介的文類，比方

Twitter 的短文)，用戶並非只受到單一維度的影響，而這三種維度的劃分，對於動態運作的觀察不啻為阻礙，而非助力。

二、社會建構論中的「傳播形構」

作為社會建構論陣營的學者，Hepp（2013b）提出「傳播形構」（communicative figurations）來分析媒介化的過程。形構的說法可溯自 Elias（1978），它是指「個人的網路」（networks of individuals），而 Hepp 除了延續這種定義之外，也將網路視為一種將個人、集體與組織連結起來的分析單位：由於個人的、集體的或組織的網路時有交疊，因此網路的構成不僅有其相對穩定的狀態（例如個人的人際網），也有動態發展的過程（例如個人的人際網與所屬企業的組織網彼此交織）。Hepp 認為，當今形構的建立過程已離不開媒介的使用（例如人際網依靠社交媒介來溝通，企業組織仰賴電子郵件來溝通），因此傳播形構是人們透過各種媒介所進行的傳播實踐而建立的（Hepp & Hasebrink, 2014）。

為了讓傳播形構的觀察更具操作性與可比較性，Hepp 等人指出，傳播形構有三種特徵（Hepp, et al., 2018, p.30）：

- （一）每個傳播形構都是由行動者叢（constellation of actors）構成。
- （二）每個傳播形構有一個主導的框架，而這些框架是用來指導人們的傳播實踐。
- （三）傳播形構中的傳播實踐是與媒介組合（media ensemble）交織在一起。

Kannengießer（2018）以德國的「維修咖啡館」（repairing cafe）為例，說明如何應用傳播形構分析媒介化的過程。維修咖啡館是一種新的活動形式，人們聚在一起修理日常生活中的損壞物品，例如手機、紡織品等，而媒體技術物是最常修理的用品之一。Kannengießer 指出，首先就行動者叢的構成來看，參與維修活動的人可分為組織活動者、尋求協助者與提供維修者。

其次，主導行動者的框架包含意識到媒介技術物的生產過程是有害的（如對自然資源的耗盡）、防止浪費、以及樂於助人等等，然而從許多參與者都提及批判媒介技術物的消費，並透過維修舊物來避免購買新品來看，Kannengießer 提煉出「消費者批判」（consumer criticism），是為整個維修活動的主導框架。最後，由於參與者大部份是透過面對面傳播的形式，而組織者則會在不同場合的維修活動之中穿針引線、張貼海報或散發傳單，藉以推廣並保持與其他參與者的聯繫，此時電子郵件、電話與海報構成了維修咖啡館所涉及的媒介組合。

更重要的是，維修咖啡館作為一種傳播形構，它不僅有自身的媒介化過程，與此同時還牽涉社會文化的變化。Kannengießer 論證，這種傳播形構的媒介實踐（一方面是維修舊有的媒介技術物，另一方面參與者聯繫彼此的媒介組合）代表的是環境的可持續性（sustainability），它與消費社會中的媒介實踐（即熱衷購買新的媒介物，但使用壽命往往短暫）迥然有異。換句話說，透過這種傳播形構所傳達的「維修文化」（culture of repair），是一種可持續的社會運動，如此也印證了 Couldry 與 Hepp 對於媒介化的看法：媒介化是一方面媒介與傳播的轉型，另一方面是文化與社會的轉型（Couldry & Hepp, 2013, p.197）。

總結而言，媒介邏輯（與媒介動力）和傳播形構作為媒介化理論的重要概念，它們在分析媒介與社會互動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分析角色，然而不同的是，媒介邏輯是站在媒介這一端來檢視人與人之間的社會互動，在此脈絡下，媒介邏輯或動力是植入（insert）互動之中，從人們互動時的變化，來觀察社會文化的相應轉變。另一方面，傳播形構則是站在人的傳播實踐這一端，檢視人們的媒介實踐與新傳播網路形成的關係。然而，對於制度論與社會建構論而言，媒介化之所以發生的前提，在於與日俱增的媒體逐漸滲透至人們的日常實踐中，從而對於社會文化的轉變產生影響（Hepp, 2019; Lundby, 2014），但是對於這些媒介為何會與日俱增？以及所有媒介都會產生媒介化的過程嗎？這些問題並未深入探究。如果換個方式提問，對於為何有些場域能夠發生媒介化，另一些則否的問題，制度論與社會建構論都沒有妥善地處理。這些問題必須要回到制度論與社會建構論者的媒介視角，檢視他

們如何理解媒介，以及藉此論證他們在概念上的漏洞。

參、媒介化理論中的媒介及其政治經濟基礎

由於制度論與社會建構論的學者對於媒介的定義不同，如此也影響他們討論媒介化之所以發生的過程。就制度論陣營的學者而言，Hjarvard 將媒介視為一種 “institution”，而在英語的語境下，“institution” 可以翻譯為機構，亦可譯為建制／制度。當 Hjarvard 將 “institution” 指涉為機構時，此時媒介是具有一定自主程度的社會機構，它能對社會上其他機構施以影響力。例如前文提及的媒介邏輯，它能介入社會上其他機構的運作。另一方面，當 Hjarvard 將 “institution” 指涉為制度時，這種制度是指日常生活之中那些具有常態性的、會反復出現的、甚至形成慣例性的傳播實踐，而在此語境下，媒介是達成這種常態性傳播實踐的資源（Hjarvard & Lundby, 2018）。

無論是機構或制度，這兩者在制度論者看來是可以統合的。例如，科學界為了宣傳自身的發現以維持其正當性，它們需透過新聞媒體的公共傳播來達成此目的，而媒體報導的標準就成為科學界必須適應的邏輯（Peters, 2012）。就此而言，科學期刊－科學家－記者－媒體公關之間的關係，逐成為一種新的互動方式。換句話說，新聞媒介作為一種機構，它們自身的邏輯（或動力）能植入人們的社會互動之中，形成某種常態性的傳播實踐。

然而當媒介邏輯植入於互動的過程時，Hjarvard 也認為並非所有的社會行動者都會受到影響，有些能創造出常態性實踐，另一些則否，這取決於不同的場域。Hjarvard 指出，「媒介化的程度可以根據各自場域的自律在多大程度上被消滅得以衡量」（劉君等譯，2018，頁 41），這代表媒介邏輯介入其他場域的社會機構之後（如新聞媒體的報導判准介入了科學期刊的選題），後者的自主性會被改變，而這也意味著媒介機構在介入的過程中，取得了其他場域中的主導權力。然而，媒介究竟如何取得權力？這似乎不是自然的過程，Hjarvard 雖然借用 Bourdieu 的場域理論來說明媒介化，卻沒有針對權力的議題繼續深化其論述。

在經驗研究之中，也有論者發現媒介化的過程並非整齊劃一的平整。例如唐士哲（2014）探討台灣政治媒介化的議題，以臺灣電視政論節目與政府、政黨、立法機構之間的互動為考察，發現後三者會調適自身的慣例以適應前者的邏輯。另一項探討台灣社區媒介化的研究，黃順星（2020）卻發現社區報紙並未讓其他機構反過來適應其媒介邏輯，而只是做為這些機構的工具。這一正一反的例子說明，在不同場域的媒介化過程推動與否的原因，已非制度論者眼中的媒介邏輯（或動力）能夠單獨地涵蓋。如同唐士哲（2014，頁31）所言，政治媒介化有其結構性的因素：

政黨藉由外圍基金會組織試圖承製政論節目、政論名嘴跨界成為政治人物，或資深媒體人成為名嘴，以及政府各部門對於政論反映輿情的重視與監控等現象，皆使得政論節目扮演的，是既有權勢階級政治的延伸。作為一個富有論述權力的建制化實踐，其映照出的是更大範圍政治與社會脈絡演變的過程。在這個脈絡中，電子媒介在解嚴之後的過度商業化發展、以選舉勝選為首要目標的政黨競爭文化、政府治理思維中以媒介輿論作為民意的依歸等結構性因素……

黃順星（2020，頁165）也說，

在報禁解除後臺灣進入去管制的多元媒介體系，透過社區報引發的媒介化過程，反倒因技術、資本以及政策方向轉變而弱化社區報／媒介的重要性。Couldry（2003a）引入後設資本分析媒介是否產生跨場域的效應並未在社區報上出現，而是國家權力場域及經濟場域持續影響媒介。

媒介化在不同場域之中能否取得主導的權力，無法全然與政治與經濟的力量分割，或說政治經濟的因素反而是讓媒介化的過程得以展開的重要原因；Murdock（2017，p.8）甚至有言，媒介邏輯的說法只是結果，而非原因。

從制度論者的媒介觀點來看，媒介邏輯（或媒介動力）究竟與政治經濟因素之間的關係為何？似乎有必要深化論證。

相對而言，社會建構論的媒介觀點較為動態與複雜。Hepp（2020）將媒介視為一種「過程」（process），它是人類社會在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與物質化（materialization）交織中一個暫時的行經點（points of passage in social practice）。這即是說，媒介首先是從人們日常中的傳播實踐開始發展起來，人們會用自己習慣的（某個）媒介來傳播／溝通，同時期望他人也會如此使用（某個）媒介，從而形成某種常態性的傳播實踐，此即制度化之意；而這種常態性的實踐會銘刻於（inscribed in）某種媒介技術或（數位）基礎設備之中，此即物質化之意。Hepp 認為，所有的媒介都是從人們既有的常態性實踐中開始形塑。例如電視，在它普及之前，演員表演與觀眾欣賞戲劇（如舞臺劇）已成為常態性的實踐，而電視在此基礎上成為一種新的說故事媒介，此即是制度化的過程。其次，電視有其電波收發站、機房等物質技術設備，這是為了服務前述的制度化實踐。因此，在 Hepp 看來，電視作為一種媒介，是制度化與物質化結合的結果。

此處的關鍵在於，Hepp（2020,p.159）將物質化的過程連結至當今的數位技術與設備，其中包含軟體與硬體，而這對於媒介化的影響尤其深遠：當我們在使用數位媒體時，它遠非只能作為完成傳播／溝通任務的工具，同時也是數據的生成器，使用者每一次的使用，都會形成數位追蹤（digital traces），而這些原本屬於個人所有的瀏覽紀錄，又會被演算法抽繹出來，重新與其他人的紀錄一起分門別類，借以服務廣告商或其他科技公司。Hepp（2020, p.11）認為，這種將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規則寫入演算法之中，而這些算法又被重新應用於它們所收集資料的社會現象，即是「重複的轉變」（recursive transformation）：演算法作為一種規則，不斷重複地應用至生成它的實體之中，它本身就變成了社會轉變的因素。Hepp 認為，數位媒體的數據蒐集與演算法，已讓我們進入「深度的媒介化」（deep mediatization）。

在深度媒介化的脈絡下，Hepp 也擴展了「傳播形構」的概念。簡言之，在家人、朋友、或同事的傳播形構之中，個人運用數位媒體的傳播實踐，會讓數位追蹤的紀錄不只由個人自己所創造，也能由其他人創造，例如被同事

標註自己姓名的相片。這些由形構為單位而發動的傳播實踐，透過算法又能形成一種物以類聚的檔案庫。在此擴展下，Hepp 已將傳播形構的概念連結至監控資本主義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Zuboff, 2019) 與數據殖民主義 (data colonialism; Couldry & Mejias 2019)，然而在華文世界，除了姚建華 (2021) 將媒介化與數位勞動進行對話之外，還有從傳播形構的視野來觀察次文化的研究 (唐樂水, 2020)、反性騷擾的研究 (曹琬玲, 2020) 以及臺灣同性婚姻公投的研究 (陳品丞, 2020) 等等，至今仍欠缺將傳播形構或 (深度) 媒介化連結至政治經濟結構的研究。

本文認為，在深度媒介化的脈絡下，傳播形構的概念雖然連結至政治經濟結構，不過在 Hepp 筆下，這種連結方式仍有以下三點值得商榷：首先，目前傳播形構之中的行動者，主要是以一般民眾的日常傳播實踐為主，相對而言企業、資本家等行動者所構造的傳播形構缺乏討論。例如 Mosco (1996 / 馮建三、程宗明譯, 1998) 便認為商品也是由複雜的社會網絡所構成，其中包含資本家與消費者，然而這種傳播形構的分析目前較為少見。其次，儘管 Hepp 提及形構與形構之間可能彼此重疊，但他的焦點過度集中於形構如何形成的問題，形構之間的衝突較少著墨，包含資本家之間、資本家與其他社群的衝突。最後，他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焦點應該「從媒體內容的政治經濟轉向數位基礎設備的政治經濟」(Hepp, 2020, p.23)，這種呼籲過於將內容與設備二分，因為在政治經濟學的視野下，除了生產與消費過程的分析之外，媒體內容是以所有權的角度去討論，就此而言媒體內容與數位技術設備無異，都是資本家的資產，缺乏技術設備難以產製內容，而缺乏內容又無法進行演算。換句話說，如果將分析焦點全部從媒體內容移轉至數位技術設備，反而忽視兩者之間的連動關係。

立基以上三點的反思，作為一種初探性的嘗試，本文將從政治經濟學的取徑出發，思考未來媒介化研究可能的三項研究焦點。下文將以學術傳播的場域為例，首先說明資本建置的媒介 (期刊資料庫) 如何構造出自己的傳播形構，從而影響學者的傳播實踐，其次則處理不同傳播形構之間的衝突，最後則解釋為何當今的媒介內容仍是關鍵，捨此將難以掌握深度媒介化的全貌。

肆、從學術傳播觀察未來媒介化研究的三項議題

一、資本在傳播形構的建構力量：商業期刊資料庫的擴張運動

二戰之後，科學文獻的數量飛漲，論文品質參差不齊，加之新學科湧現，傳統書目學已無法有效記錄，於是 E. Garfield 設計一種追蹤文章引文（citation）的方法，而這套方法日後發展成知名的科學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以下簡稱引文索引）。引文索引在計算期刊的影響因數上展現成效，而高引用率的期刊可稱為核心期刊。Garfield 原本只想在繁雜無章的科學期刊之中建立某種秩序，但卻無心插柳，引發以下兩種非意圖後果：第一，大學圖書館鑒於購置館藏的經費有限，在優先順序考慮下，會先購置核心期刊（Nisonger, 2007; Smith, 1981; Enger, 2009）。Pancheshnikov（2007）指出，自 1960 年代以降，以引文索引來界定核心期刊的方法，已成為圖書館採購不同領域的學術期刊之依據。第二，對於商業出版商來說，他們看到學術期刊的市場屬於「非彈性市場」（inelastic market），即市場並非按照供需來調節，而是買方（圖書館）有定期向賣方（出版商）購買的需求，因此有利可圖（Guédon, 2014；劉忠博，郭雨麗，劉慧，2020）。

由於大學圖書館是學術期刊最大的購買方，圖書館界定期刊資源的方式就非常重要，尤其是涉及核心期刊的認定。當學術期刊被收錄在引文索引時，出版這份期刊的單位就等於確保了經濟來源。2004 年，全球最大的出版集團 Elsevier 也推出類似 SCI 的引文索引資料庫：Scopus，這表示對於出版商來說，若能涉及認定核心期刊的業務，那麼在非彈性市場的結構下就立於不敗之地。

資料庫的功能在於收錄學術期刊與計算其影響力，這對於研究者而言具有便利性。一般來說，大學圖書館也有自己的搜尋系統，但出版商建置的資料庫擁有海量的期刊文獻，加上系統能計算期刊（與文章）的引用率與相關的文獻網路，使用者能在短時間尋得所需資源，這導致圖書館自建的搜尋系統逐漸被資料庫取代。Elsevier 曾發佈一份報告指出，圖書館訂購的電子資

源，能有效提升研究人員的論文生產力，而其中一名受訪者的訪談如下 (Tenopir, 2010, p.21)：

電子資料對圖書館資源來說...具有必要性，過去尋找與新主題最相關的文獻會耗費一整個下午，而使用電子資料只要 15 到 30 分鐘。

除了堪稱便利的資訊搜尋系統之外，出版商也會積極地向全世界推銷其產品。例如 Elsevier 於 2010 年便在亞洲地區包含日本、越南、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新加坡等多個國家舉辦推廣活動，且 2011 年時其 Scopus 還獲得澳大利亞官方的「研究委員會」(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認證為唯一書目資訊供應平台。截至 2021 年，Elsevier 的產品已在全球獲得超過 2.5 萬個政府與學術機構使用¹。

此外，當引文索引方法成為圖書館認定核心期刊的依據時，這代表原本只是作為知識資源配置系統的資料庫，再得到了公共機構的承認之後，便超越了其技術性媒介的角色，轉變為學術傳播之中涉及評價學術聲望的媒介，而評價的標準即是影響因子：期刊的影響因子越高，越能代表期刊的學術地位；期刊論文的引用率越高，也越能代表這篇論文及其作者的影響力。

近年來，這種認定更是超越大學圖書館館藏購置的權限，從而與大學排名掛鉤。英國 QS 公司與上海交通大學世界一流大學研究中心發佈的排名榜單便是一例²。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家單位對於鑒定排名的標準之一，就是審視各大學的論文發表與引用率：QS 是看 Elsevier 公司旗下的資料庫產品 Scopus，而上海交大則是看 Thomson Reuters 公司旗下的 SCI 與 SSCI 資料

¹ 參見

https://www.elsevier.com/__data/assets/pdf_file/0008/928016/ELS_digital_collateral_corp-broch_CH2.pdf

² 有關 QS 的排名標準，請見：

<http://www.topuniversities.com/qs-world-university-rankings/methodology?page=1>；有關上海交大的排名標準，請見：

<http://www.shanghairanking.com/ARWU-Methodology-2014.html>。

庫。特別就後者的指標來說，評估大學的指標有四，分別是「教育品質」(Quality of Education)、「教職員研究表現」(Quality of Faculty)、「研究產出」(Research Output)、以及「整體表現」(Per Capita Performance)，然而研究產出系指包含在(一) Nature 與 Science 等學術期刊發表的論文，以及(二) SCI 與 SSCI 等資料庫發表的論文，這兩者占了 40% 的比重，是所有指標之最，由此不難推知，這些收錄在資料庫的期刊便成了各大學(及其學者)投稿的兵家必爭之地。

2011 年 7 月，中國大陸教育部更將大學發展與資料庫論文的發表掛勾，發布「十二五科技發展規劃」，其中將國際論文發表及其引用率，列入國家科技發展戰略的政策文字之中；這項規劃是如此界定國際科學論文被引用次數：

國際科學論文被引用次數是指被科學引文索引 (SCI) 收錄的學術論文在發表後的一段時間內被引用的次數之和。該指標是評價國際科學論文品質的重要指標，也反映了一個國家或地區國際科學論文的影響力。³

這項規劃使得各校進行「獎酬」發放時變得「有理有據」，甚至有學者認為「在科研專案申報與結題、科研成果評審、職稱榮譽評定、人才引進和業績點考核等政策中，存在重視 SCI/SSCI 期刊的程度比中文權威核心期刊高得很離譜的現象」(朱曉華、何書金、王岱、孫楓、汪德根，2016，頁 681)。

然而關鍵在於，當大學排名與資料庫論文構連時，資料庫躍升為一種規範學術社群傳播活動的主導框架，它不再只是單純的論文資源分配，也是認定論文重要性的權威性媒介。如今，在許多學院的網站以及教師的介紹網頁中，列出發表的期刊論文及其總數、收錄的資料庫名稱、以及相關的影響因子已是常態，這表示資料庫作為一種媒介，已植入學術社群的發表記錄之中，成為制度化的學術傳播實踐，而技術的符號(如 Scopus, SCI)更銘刻在

³ 詳見「十二五規劃」的附錄：「重要指標和名詞解釋」，網址 <http://www.most.gov.cn/kjgh/>

期刊的版權頁之中，成為一種期刊的認證標記。這些傳播實踐之所以看似合理，Stack（2016）認為是資料庫已成為界定何謂「研究生產力」（research productivity）的媒介，即資料庫取得了認證知識生產力的權威性。

總結而言，從商業資料庫的擴張來看，Elsevier 與 Thomson Reuters 等公司於世界各地舉辦說明會並推銷系統之下，其所建構的傳播形構，首先行動者叢除了包含學者們與各大學圖書館，也將許多政府單位納入其形構之中，而這些行動者的學術傳播實踐，便是圍繞在這些公司所建置的資料庫。其次，更重要的是，在這個傳播形構之中，宰制行動者的主導框架，系將發表收錄在期刊資料庫的論文，視為研究生產力的象徵。再者，使用這些資料庫的媒介組合，除了這些公司本身的網站之外，從圖書館的網頁也可以連結至資料庫本身，而這種連結是以一種授權的方式為之，即每個學校都有自己的帳號，學者登入之後便可開始使用。從資本建構的傳播形構來看，我們觀察到媒介化的過程並非自然而然的形成，而學者們的學術傳播實踐（即自己發表或下載他人的論文），多半沒有太多的選擇。

二、傳播形構之間的衝突

由於商業出版商建置的資料庫所費不貲，各大學圖書館漸漸無力負荷，故而有別於這些公司建構的傳播形構便應運而生。由「開放社會研究院」（Open Society Institute）、學者、各大學圖書館等行動者建構的傳播形構，其主導框架是知識的公有性，亦即他們認為受公共補助的學術研究應該免費公開與共享，而非如商業資料庫一般，將論文視為商品，以付費牆形式阻隔人們的使用。這種傳播形構的媒介組合，可分為學者個人建置的論文網站（如哈薩克神經學家 Alexandra Elbakyan 建置的 Sci-Hub）、學科型典藏網站（如以物理學為主體的網站 ArXiv）以及機構型的典藏網站（如政治大學機構典藏）。透過這些網站上傳自己或下載他人的論文變得簡單可行。Karaganis（2018）將這種新興的傳播網絡名之為「影子圖書館」（Shadow Libraries），用以捕捉另類學術傳播管道在形成的同時，所歷經來自主流媒介（出版商／資本）的抵抗，以及如何創造出適應新媒體環境的可能性。

從 Hepp (2020) 分析的青少年的傳播形構與媒介組合來看，他認為可以從這些人使用媒介的過程之中，觀察出他們對於不同傳播形構的融入程度。例如對於家庭的形構而言，臉書是主要的使用媒介，而對於朋友的形構來說，twitter 或 Instagram 則較為重要，而從他們減少臉書、並增加 twitter 的使用來看，可觀察他們對於何種傳播形構的重視。然而，從政治經濟學的視野來看，傳播形構的建構無法忽視資本（家）的作用，並且媒介組合的形成本質上是行動者與資本鬥爭下的產物。例如 2017 年時 Sci-Hub 就被 Elsevier 公司提告，紐約地方法院判決該網站須賠償該公司 1500 萬美元的侵犯著作權損失 (Schiermeier, 2017, June 22)，⁴而未來 SCI-Hub 勢必會不斷面臨這類挑戰。

又如 2019 年 2 月，加州大學圖書館決定停訂 Elsevier 公司的期刊資料庫，這是由於 2017 年時，前者購買資料庫的經費已超過 1150 萬美元，嚴重排擠該校購置其他資源的預算，財政負擔沉重，於是雙方展開數月議價，爾後協商以失敗告終。⁵無獨有偶，早於加州大學兩年，台灣大學已於 2017 年 1 月停訂 Elsevier 的 ScienceDirect 資料庫，而台大的說法是「目前全校訂購近 4,700 種期刊，其中 Elsevier ScienceDirect 的 784 種期刊占訂購種數 17%，所需費用卻逾期刊採購總金額 33%。又本校訂購 Elsevier ScienceDirect 期刊雖已由 2008 年的 833 種，減少為 2016 年的 784 種，但是訂購費用卻增加為 143%」⁶同年 6 月，雖然台大宣布與 Elsevier 議價成功，並續訂 ScienceDirect 資料庫，不過仍表示「三年後的下一回議價談判，仍是我們必須持續努力的」⁷。

儘管台大目前已恢復訂購該公司的資料庫，然而 2017 年停訂的事件已引發國際學界注意。全球最大的開放獲取出版商「公共科學圖書館」(The 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 在 2018 年 7 月發佈一篇文章指出，台灣於同年已與德國、瑞典、祕魯等國家，共同組成「不與 Elsevier 交易專區」(No Elsevier

⁴參見 <https://www.nature.com/news/us-court-grants-elsevier-millions-in-damages-from-sci-hub-1.22196>

⁵參見 <https://www.library.ucla.edu/news/uc-ends-negotiations-elsevier>

⁶參見 <http://www.lib.ntu.edu.tw/node/2969>

⁷參考 <http://epaper.ntu.edu.tw/view.php?listid=34&id=25965>

Deal Zone)，而台灣、德國與瑞典還是 OECD 組織的成員，其研究支出佔了 35 個會員國的 9%，而她們的決定預料會引發後續的影響，不交易專區也有可能進一步擴大。⁸假使未來不交易的作為成真，那麼大學圖書館就無法使用這些商業數據庫，從而影響人們的媒介組合。簡而言之，只要資本建構或主導的傳播形構越強勢，那麼未來這種鬥爭就越有可能持續上演。

三、新舊媒介對於內容所有權的合縱連橫

儘管媒介化研究的重點不在於媒介內容的效果，然而媒介內容的所有權卻無法忽視，特別是在深度媒介化的脈絡之下。如前所述，深度媒介化是基於數位設備的普及與演算法的規則，而人們每次的媒介使用都被記錄下來，其數據則透過演算法進行歸類。在學術傳播的場域之中，學者們也開始應用社交媒體來傳播自己的論文。例如 ResearchGate 的平台，使用者可以用它來發布自己的研究成果（論文）、追蹤研究興趣與其他研究者、評論和分享他人的研究成果、以及要求他人提供論文電子全文。此外，該平台還會建議有相似興趣的人建立聯繫。

ResearchGate 原本由兩位科學家及一名醫師所創建，然而在獲得資本的投資後，逐漸轉型為一家能實現營利的社交平台，而該公司的商業模式，即是追蹤使用者的使用數據，並將這些個人數據轉換成商品。在演算法的驅動下，「你最終會看到（學者們的）表現與出版品，因為它們會（自動）出現在你眼前」（DE OLIVEIRA, 2018, p.113；括號內字為筆者所加）。

有別於傳統的商業資料庫公司是以學者提供自己論文內容的方式，來建構書目索引系統並打造其傳播行構，ResearchGate 這類新興的社交平台是讓學者提供自己的社會資本（DE OLIVEIRA, 2018），論文內容只是讓學者之間聯繫彼此、從而建立社會關係的工具。不過，由於這個平台讓使用者有權發布自己的論文之外，也可以要求他人提供全文，於是這就衝擊到商業資料庫

⁸ 參考

<https://blogs.plos.org/absolutely-maybe/2018/07/30/europe-expanded-the-no-elsevier-deal-zone-this-could-change-everything/>

公司的核心利益。2017 年，Elsevier 公司與美國化學學會（ACS）在德國慕尼黑地區法院對 ResearchGate 提起訴訟，聲稱後者免費提供的論文，實則都是受著作權法所保障，故而涉嫌侵權。時至今年（2022）三月，慕尼黑地區法院宣判，ResearchGate 平台上的部分論文侵權，並指出該平台也要為使用者上傳的內容負責（Kwon, 2022, March 22）。

不過，並非所有出版商都排斥社交媒體平台。2019 年 3 月，出版商 Springer Nature 與 ResearchGate 展開合作計畫，ResearchGate 的使用者只要透過該平台認證擁有 Springer Nature 的機構帳號，即可在平台上閱讀和下載 Springer Nature 出版的論文全文。目前 Springer Nature 旗下有 40 本期刊、超過 5 萬篇論文透過如此方式讓 ResearchGate 的使用者利用。⁹綜合而言，Elsevier 與 Springer Nature 對待社交媒體的方式截然不同，這表示資本在建構傳播形構的過程之中，尤其在考量組建行動者叢時，哪些行動者能被納入（或排斥），內容的所有權實乃關鍵因素。

伍、代結論：媒介化研究中的政治經濟轉向

本文從學術傳播的媒介化過程中指出，期刊資料庫之所以能介入學術傳播文化（即媒介化的「化」字能夠成功），關鍵是資本在構造傳播形構時所展現的權力，而這種政治經濟式的思考，往往也是歷來媒介化研究較少討論的議題。媒介化理論近年來結合行動者網絡理論（如方念萱，2016；陳品丞，2020）、物質性（如戴宇晨，2021）等理論，如此的討論似乎有邁向微觀分析的發展趨勢，然而這是否意味著媒介化理論與政治經濟學全然沒有對話的基礎？唐士哲指出（2014b, 頁 27-28），其實兩者都關心社會權力的運作：

媒介化概念與政治經濟學同樣主張傳媒的物質意涵是特定社會權力關係的來源，然而政治經濟學往往把人為控制的因素，作為探究傳

⁹ 參見 ResearchGate 的網站說明，網址：
<https://explore.researchgate.net/display/support/ResearchGate+and+Springer+Nature+partnership>

媒特定權力關係的起點...相較而言，媒介化的思維卻是採取一個反向的推論：即是由社會菁英或權勢階級的個人或組織的日常思維、行止中，推斷傳媒過程在權力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傳媒涉入的符號流通如何對於社會生活產生整體、累積的效應。換句話說，同樣關切傳媒作為理解社會權力運作的基本單位，政治經濟學著重鉅觀、結構性的傳媒經營架構；媒介化傾向由微觀、個體的傳播實踐或溝通行動著手...

進一步而言，如果政治經濟學的強項在鉅觀的結構分析，而媒介化理論則從微觀的傳播實踐出發，那麼這是否意味兩者不能結合？答案也未必如此。Jensen (2013, p.214) 探討媒介化理論時，借助 Giddens 結構化理論的視角，將媒介視為社會中的結構與行動之外的第三種元素，其功能在於憑藉能夠「跨越時空的傳播，來中介結構和能動性」(communication mediates structure and agency across time and space)。換言之，在構連鉅觀與微觀、結構與能動之間，媒介已是社會能持續運作所不可或缺的角色。一個從媒介來連結鉅觀與微觀的嘗試是，van Dijck (2013) 在分析社交媒體平台時，將平台的特性區分為二：技術文化與社會經濟結構，前者重視使用者、技術與內容的分析，而後者側重在所有權、經濟結構與商業模式的討論，而這種區分的合理性即是建立在結合微觀的行動者網絡理論與鉅觀的政治經濟學。

本文認為，媒介化研究可將政治經濟學取徑納入討論，亦即將媒介化的過程安置在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之中。就此而言，我們試圖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出發，結合傳播形構的概念，提出以下三項可供未來思考的議題：資本（家）在建構傳播形構中的作用、傳播形構之間的衝突、以及媒介內容的所有權議題。作為一篇初探性的研究，本文希冀能對媒介化的政治經濟學取徑，拋磚引玉，希冀增添知識上的積累。

參考書目

- 方念萱 (2016)。〈媒介化、行動化：媒介化理論與行動者網路理論的對話〉，《傳播、文化與政治》，4: 55-83。
- 王琛元 (2018)。〈歐洲傳播研究的「媒介化」轉向：概念、路徑與啟示〉，《新聞與傳播研究》，5: 5-26。
- 朱曉華、何書金、王岱、孫楓、汪德根 (2016)。〈SCI/SSCI 期刊與中文權威核心期刊論文的學術價值評價—基于地理工作者的感知分析〉，《地理學報》，71(4): 680-692。
- 侯東陽、高佳 (2018)。〈媒介化理論及研究路徑、適用性〉，《新聞與傳播研究》，5: 27-45。
- 姚建華 (2021)。《數字勞動：理論前沿與在地經驗》。江蘇人民出版社。
- 唐士哲 (2014a)。〈重構媒介？「中介」與「媒介化」概念爬梳〉，《新聞學研究》，121: 1-39。
- 唐士哲 (2014b)。〈從政治化媒介到媒介化政治：電視政論節目作為制度化的政治實踐〉，《中華傳播學刊》，25: 3-41。
- 唐少傑，齊心譯 (2015)。《社會理論與社會結構》。南京：譯林。
- 唐樂水 (2020)。〈當媒介化遇到次文化：一種歷時性研究的思路〉，《中華傳播學刊》，38:99-138。
- 曹婉玲 (2020)。〈媒介化與跨媒介敘事想像：#MeToo 如何交織故事世界〉，《中華傳播學刊》，38: 50-97。
- 陳品丞 (2020)。〈從二元本體論到行動本體論：媒介化的行動者網絡理論轉向與實作〉，《中華傳播學刊》，38: 9-47。
- 馮建三、程宗明譯。(1998)。《傳播政治經濟學—再思考與再更新》。台北：五南。(原書 Mosco, V. [199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Rethinking and renewal*. London: Sage.)
- 黃順星 (2020)。〈媒社區：以媒介化理論檢視臺灣社區報發展〉，《中華傳播學刊》，38:139-176。
- 劉君等譯 (2018)。《文化與社會的媒介化》。上海：復旦大學。
- 劉忠博、郭雨麗、劉慧 (2020)。〈「掠奪性期刊」在學術共同體中的形成與省思〉，《新聞與傳播研究》，10: 95-109+128。
- 戴宇辰 (2021)。〈媒介化研究的「中間道路」：物質性路徑與傳播形構〉，《南京社會科學》，7: 104-112+121。
- Borgman, C. L., & Furner, J. (2002).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and bibliometrics. In B. Cronin (Ed.), *Annual Review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 36, pp. 3-72). Medford, NJ: Information Today, Inc.
- Couldry, N. & Hepp, A. (2013). Conceptualising mediatization: Contexts, traditions, arguments. *Communication Theory*, 23, 191-202.

- Couldry, N. & Mejias, U.A. (2019). Data colonialism: Rethinking big data's relation to the contemporary subject. *Television & New Media*, 20, 336-349.
- DE OLIVEIRA, T. M. (2018). Mediatization of science: reconfiguration of the paradigm of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and academic work in the digital era1. *Sao Paulo-Brasil*, (3), 101.
- Deacon, D. & Stanyer, J. (2014). Mediatization: Key concept or conceptual bandwagon?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6(7),1032-1044.
- Deacon, D. & Stanyer, J. (2015). 'Mediatization and' or 'Mediatization of' ? A response to Hepp et al.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7(4),655-657.
- Dombrowski, T. (1988). Journal Evaluation Using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as a Collection Development Tool. *Collection Management*, 10(3-4), 175-180.
- Enger, K. B. (2009). Using citation analysis to develop core book collections in academic libraries.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31(2), 107-112.
- Franzen, M. (2012). Making science news: The press relations of scientific journals and implications for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In Rödder, S., Franzen, M., Weingart, P. (Eds.), *The sciences' media connection: Public communication and its repercussions* (pp. 333-352): Dordrecht, Netherlands: Springer Science.
- Guédon, J. C. (2014). *The future of the academic journal*. UK: Chandos Publishing.
- Hepp A. (2013b). The communicative figurations of mediatized worlds: Mediatization research in times of the 'mediation of everything.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8(6), 615-629.
- Hepp, A. (2019). Mediatization. In Schnettler, B., Tuma, R., vom Lehn, D., Traue, B., & Eberle, T. S. (Eds.). *Kleines Al(e)phabet des Kommunikativen Konstruktivismus*. (pp.301-306).
- Hepp, A. (2020). *Deep mediatization*. London, UK: Routledge.
- Hepp, A., Brieter, A., & Hasebrink, U. (Eds.). (2018). *Communicative figurations: Transforming communications in times of deep mediatization*. Gewerbestrasse,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 Hepp, A., & Hasebrink, U. (2014). Human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ve figurations: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atized cultures and societies. In Lundby K (ed.). *Mediatization of communication: Handbooks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pp. 249-272).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 Hjarvard, S. (2004). From bricks to bytes: The mediatization of a global toy industry. In Ib Bondebjerg & P. Golding (Eds.), *European culture and the*

- media*. Bristol, UK: Intellect Books.
- Hjarvard, S. (2017). *The logics of the media and the mediatized conditions of social interaction. Media logic(s) Revisited*.
doi:10.1007/978-3-319-65756-1_4.
- Hjarvard, S., & Li, Z., (TRANS.) (2016). I X. Wu (red.), *International Media Industry Review*. Shanghai: China International Radio Press.
- Hjarvard, S., & Lundby K. (2018). Understanding media dynamics. In Lundby K. (Ed.). *Contesting religion: The media dynamics of cultural conflicts in Scandinavia*(pp. 51-64). Berlin: De Gruyter
- Jensen, K. B. (2013). Definitive and sensitizing conceptualizations of mediatiza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23(3), 203-222.
- Karaganis, J. (2018). *Shadow Libraries: access to knowledge in global higher education*. The MIT Press.
- Krotz, F. (2007) The meta-process of mediatization as a conceptual frame.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3(3), 256-260.
- Kwon, (2022, March 4). ResearchGate dealt a blow in copyright lawsuit. *Nature*.
Retrieve from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2-00513-9>
- Lundby, K. (ed.). (2014). *Mediatization of communication: Handbooks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 vol. 21*.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 Pancheshnikov, Y. (2007). A comparison of literature citations in faculty publications and student theses as indicators of collection use and a background for collection management at a university library. *The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33(6), 674-683.
- Peters, H. P. (2012). Scientific sources and the mass media: Forms and consequences of medialization. In Rodder, S., Franzen, M., and Weingart, P. (Eds.), *The sciences' media connection: Public communication and its repercussions* (pp. 217-240). Dordrecht, Netherlands: Springer.
- Schulz, A. (2004). Reconstructing mediatization as an analytical concept.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 87-101.
- Schiermeier, Q.(2017, June 22). US court grants Elsevier millions in damages from Sci-Hub. *Nature*. Retrieve from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ature.2017.22196>
- Strömbäck, J. (2008). Four phases of mediatiz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3(3), 228-246.
- Stack, M. (2016). *Global university rankings and the mediat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Hampshire, UK: Palgrave Macmillan.
- Van Dijck, J. (2013). *The culture of connectivity: A critical history of social med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Zuboff, S. (2019).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the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 Profile Books, London.

A Dialogue Between Theory of Mediatization and Political Economy: Taking the Mediatization of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as Research Field

Zhongbo Liu & Chu Qiao Xian

ABSTRACT

After the mediation theory was put forward by European scholars, the scholars excluded the factors of political economy from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theory intentionally or unintentionally, thus ignoring the possibl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mediation theory and political economy. This can be seen from the recent discussions of concepts of mediatization, whether institutionalist or social constructionists, they have failed in explaining the question of “why some fields can be mediated and others are not”, and examining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actors behind this problem can fill the gap of theory in this regard. In response to the above question, firstly this paper introduces key concepts proposed in the mediatization theory community in recent years, and not only provides a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se concepts, but also illustrates their possible connection with political economy. Secondly, focusing on the mediatization of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e will take a western journal database company as an example to illustrate that the database was originally used as a medium for calculating citation rates, but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the communicative figurations, the publishers integrated scholars, libraries, Universities and government units into the formation, thereby transforming into this medium for certifying knowledge productivity. The consequence is that the name of the database and the numerical value of its influence are inscribed in the publication records of scholars, and the symbol of technology is also inscribed in the copyright page of academic journals, which has become a normal practice of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of the field of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mediatization research should sta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we also try to point out three possible future key issues, so as to better expand the research scope of mediatization theory.

Keywords: communicative figurations, deep mediatization, media logics,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 Zhongbo Liu,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e-mail: liupublius@gmail.com. Chu Qiao Xian, master student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十五期
2022 年 6 月

烏克蘭的軍事情境

包亞克 (Jacques Baud) *

譯註：馮建三**

本文引用格式

馮建三譯註(2022)。<〈烏克蘭的軍事情境〉，《傳播、文化與政治》，15:139-159。

投稿日期：2022 年 4 月 5 日；通過日期：2022 年 6 月 5 日。

*包亞克 (Jacques Baud) 是瑞士參謀本部的退役上校，曾經擔任瑞士戰略情報分析工作，是東歐專家。他在美國與英國情報服務單位受訓，曾經擔任聯合國維和工作的政策主任。他以聯合國法治與安全體制專家的身份，領導聯合國情報單位在蘇丹的多國團隊。他曾經在非洲聯盟工作五年，在北約負責打擊小型武器的擴散。蘇聯解體後，他參與了歐洲與俄羅斯軍方及情報官員的最高層之討論工作。在北約的工作是，他密切注意烏克蘭 2014 年危機以後的變化，其後參與協助烏克蘭的工作。他有多本著作，都與情報、戰爭與恐怖主義有關，特別是 *Le Détournement* (由 SIGEST 出版) 與 *Gouverner par les fake news* 與 *L'affaire Navalny*。他最近的一本書是 *Poutine, maître du jeu?* 由 Max Milo 出版。這篇文章先以法文在 3 月 14 日發表在「法國情報研究中心」(Centre Français de Recherche sur le Renseignement)，作者曾更新至 28 日。

**馮建三，政大新聞系教授，e-mail: jsfeng@nccu.edu.tw。中譯說明：謝謝盧倩儀告知本文，英譯出版於 *The Postil* (2022 年 4 月 1 日)，5 月與 6 月 1 日，它另刊登包亞克兩次訪談文章。*Postil* 雜誌自詡「古典人文主義」(classical humanism)，植根在「信念與理性」的基督世界 (<https://www.thepostil.com/about/>)。凱西 (B. D. Cathey) 略編輯 *Postil* 的譯文並隨文短評，轉載於 *The Unz Review* (<https://www.unz.com/>)，它聲稱「蒐集美國主流傳媒大抵排除，但有趣、重要且有爭議的視野」。凱西說本文讓「真相大白，水落石出」，譯者無力作此宣稱，但該文披露的事情與觀點，與歐美主流明顯不同，譯者學習杭士基 (Noam Chomsky) 的就事論事，予以逐譯，或可讓人在探詢俄國入侵烏克蘭的原因時，能有不同的說法做為參考。杭士基在 2022 年 4 月 27 日表示，他說過美國前總統川普 (Donald Trump) 很危險，但這與他肯定川普主張烏克蘭局勢當由外交斡旋早日結束，並不衝突；重點不是川普，是「我們理當老實」，特別是拜登團隊「似乎無意支持和平談判」(Krishnankutty, 2022 May 12)。杭士基反對川普的排外、綠能及低社福取向，但他也同時質疑民主黨主流及不批評其主張的傳媒。

壹、第一步：通往戰爭

許多年來，從馬利 (Mali) 到阿富汗，我的工作都與和平有關，為求和平，我的生命有著風險。因此，不是要談戰爭是否能夠正當化這個問題，是要瞭解，是什麼導致戰爭。

烏克蘭衝突的根源挺多，我們先得予以檢視。首先，過去八年來不斷有人說，烏克蘭東部的東巴斯 (Donbass) 地區出現了「分離主義派」或「獨立派」。這是名詞誤用。該地區的 盧甘斯克 (Lugansk) 與 頓內茨克 (Donetsk) 是自稱共和政體 (republic)，是在 2014 年 5 月通過公民投票 (referendums) 為之，但他們不是追求「獨立」，雖然是有粗心大意的記者作此聲稱。實際上，這兩個公投是「自決」或說「自主」的公投。還有，外界用「挺俄羅斯的」(pro-Russian) 這個詞彙，原是要釐清，卻會讓人以為俄羅斯這個國家參與了這場衝突，惟俄國並沒有參與，該詞若改為「說俄語的人」，會是更誠實的表述方式。另得注意的是，普亭反對前述兩個地區的人公投，但公投仍然進行。

究其實，這兩個共和政體並沒有試圖要從烏克蘭分離出去，她們是要有自主的地位，確認她們能夠在烏克蘭政府認可俄語也是官方語言之一的情境下，使用俄語——2014 年 2 月 23 日在美國資助下，(經由民主選出的) 總統亞努科維奇 (Victor Yanukovich) 遭推翻後，授予俄語也是烏克蘭官方語言之一、在 2012 年頒行的語言法 (the Kivalov-Kolesnichenko Law)，就遭廢除。

¹ 這就有些像是瑞士德語區出現了盲動群體，決定要讓法語及義大利語，再

¹ 譯註：二〇〇一年的人口普查顯示，烏克蘭裔的烏克蘭國籍人約佔 77.8%，俄裔約 17.3%。支持俄語作為官方語言之一的烏克蘭全國人口比例，在 1995 是 52%，顏色革命後一年(2005)降至 48.7%，2014 廣場事件後再減到 32.2%，2018 是 30.8%。分區計算，已被俄羅斯併入的克里米亞未調查，其他六個區最低的是西部 2.1%、中部是 19.6%、基輔仍有 33.1%、東部是 46.6%，而南部是 53.9%，東巴斯是 63.3%。再者，烏克蘭民族的人(原文未指明，但可能是 2016 或 2018 年，)約有半數在家主要是說烏克蘭語，25%說俄語，25%兩種都用。但俄羅斯裔的烏克蘭人在 2018 年主要在家主要說俄語已從 2012 的 80%減至 68%，說兩種則是 17%增加至 27%，雖然歷史上俄裔烏克蘭人在家還說烏克蘭語的人不到 5%。母語是烏克蘭語

也不是瑞士的官方語言之一。

這個決定在說俄語的地區，掀起了風暴。接著就是政府開始鎮壓這些說俄語的地區，如奧德薩（Odessa）、聶伯羅（Dnepropetrovsk）、哈爾科夫（Kharkov），盧甘斯克與頓涅茨克。這些行動起自 2014 年 2 月 24 日，然後是軍事對抗，在俄語區出現了駭人聽聞的屠殺，特別是在奧德薩與馬立波（Mariupol）。

在這個階段，烏克蘭的一般軍士的手法過度呆滯，完全是教條式操作，雖然壓制了對手，但並沒有真正佔到上風。（反之，）自主派發動的作戰，是用輕武器，採取高度機動的操作。這些反叛基輔政府的群體採取了更有彈性，沒那麼教條的作法，他們利用了烏克蘭軍方的惰性，不斷讓他們「進入陷阱」。

我在 2014 年時，仍在北約服役，負責打擊小型武器的擴散，同時也得試著偵測，俄羅斯人是不是運送武器給反叛群體，藉此確認莫斯科有沒有涉入這場衝突。我們當時取得的情報，幾乎完全來自波蘭情報單位，這與來自「歐洲安全與合作機構」（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的資訊，並不「吻合」—這些宣稱相當粗糙，但**俄羅斯確實沒有運送武器進入烏克蘭**。

實情是，烏克蘭軍隊說俄語的單位叛變，向追求自治的反叛群體提供武器。隨著烏克蘭軍方的失利，坦克、大砲與整個防空營隊的裝備，這才在自主派群體間，四處充斥。在自治區的武器增多之後，烏克蘭政府（有了變化，於是有後來在 2014 年 9 月的）走向承認明斯克協議（Minsk Agreements）²之簽訂。

的人，60%主要說烏克蘭語，15%說俄語 25%雙語（Veira-Ramos & Liubyva, 2020, pp.218-222）。

² 譯註： *Ukraine and Russia* 的作者 Antolia Lieven（2021/11/15）說，該協議是讓兩地取得如同美國聯邦之下「州」的自治地位。政大民族系教授趙竹成（2022/3/1）也說，明斯克協定是要讓烏東地區內戰熄火，由聯合國安理會在 2015 年確認，有兩個層次。第一層次是德法俄烏四國總統協商後，進入第二層次，由歐安組織及俄國代表見證，由基輔與頓內次克及盧甘斯克代表共五人簽字，規定烏東地區選舉「根據」烏克蘭法律，沒有否認烏克蘭在該地的主權，但至戰爭發生，基輔都未執行選舉。

凱西的評論：以上文字讓人震驚。我們一直認定，烏東地區的自主派至少得到「一些」來自俄羅斯的武器。畢竟西方傳媒不停報導，從基輔在東巴斯地區投入「反恐操作」的第一天開始，「俄羅斯人就已經入侵烏克蘭。」我們的這些媒體不斷表示，假使真正要自由，就要挺身戰鬥……。

但在簽署「明斯克協議 1」之後不久，烏克蘭總統波洛申科（Petro Poroshenko）發動大規模反恐行動對付東巴斯。在北約官員的低品質諮詢後，烏克蘭人在德巴爾切夫（Debaltsevo）大敗，烏克蘭政府只好參與「明斯克 2」協議。

這裡，我們理當記得，無論是明斯克 1（2014 年 9 月）或明斯克 2（2015 年 2 月）的協議，都沒有說東區兩共和政權要分離獨立，都只是要在烏克蘭的架構內，給予自治。已經讀了兩次協議的人（，真正完整讀完的人很少，）應該就會知道，兩個政權的地位歸向何處，得由基輔與兩個共和政權的代表在協商後才能決定，這是烏克蘭在內部解決自己事務的方案。

由於是烏克蘭內部的事情，俄羅斯因此從 2014 年以來，都是很有系統地要求，理當落實明斯克協議，同時也拒絕參與協商。在另一邊，也就是西方，則在法國也很有系統地介入下，想要以「諾曼地方案（Normandy format）取代明斯克協議，這就使得俄羅斯人與烏克蘭人得面對面（商定）。不過，這裡我們得記得，在 2022 年 2 月 23 至 24 日之前，從來沒有俄羅斯軍隊在東巴斯地區出現。再者，OSCE 的各個觀察員在這個日期之前，完全沒有在東巴斯地區察覺到有任何一丁點的俄羅斯軍事單位的運作。這裡可以舉《華盛頓郵報》作為例子，該報在 2021 年 12 月 3 日刊登美國情報地圖，其中沒有顯示東巴斯地區存在俄羅斯軍隊。

烏克蘭國安局（the Ukrainian Security Service, SBU）格里察克（Vasyl Hrytsak）局長在 2015 年 10 月承認，他們在東巴斯地區察覺僅有 56 位俄羅斯戰鬥人員。這個數字完全與 1990 年代時，瑞士人進入波士尼亞，或與法國人今日進入烏克蘭戰鬥的人數，可以相提並論。

那個時候的烏克蘭軍隊狀況堪虞。在四年內戰後，烏克蘭軍事檢察長馬

季奧斯（Anatoly Matios）在 2018 年表示，烏軍在東巴斯地區喪失 2700 人：891 人死於疾病、318 人因車禍意外去世、其他意外致死 177 人、175 人中毒（酗酒與藥物）死亡、172 人操作武器不慎喪命、101 人違反安全規定、228 人遭謀害，另有 615 人自殺。

實際狀態是烏克蘭軍隊因幹部腐化而衰敗，不再有烏國人的支持。英國內政部在 2014 年 3/4 月曾有報告，指軍方召回後備軍力時，百分之七十在第一季沒有報到，第二季是 80%，第三季是 90%，第四季是 95%。到了 2017 年 10/11 月，稍前發起的「2017 年秋季」回營召集動員，仍有 70% 的人沒有報到。計算這個比例時，還不包括自殺與脫隊的人（通常是加入要求自治的群體），這些人最多可以佔了（譯按：烏克蘭人稱之為）「反恐區」（Anti-Terrorist Operation Zone, ATO）（譯按：也就是東巴斯區）工作人力的三成。烏克蘭年輕人拒絕前往東巴斯地區作戰，他們寧可移民，這就至少也局部解釋了烏克蘭的人口赤字現象。

烏克蘭國防部於是尋求北約協助，想讓軍隊行伍的生活顯得更有「吸引力」一些。先前，我在聯合國的規範架構內，曾經有在類似項目的工作經驗，北約因此要我參與，重建烏克蘭軍方的形象。這個過程原本需要很長時間，但烏克蘭軍方希望要能加快。

這樣一來，烏克蘭政府為了快速補充欠缺的兵源，就轉向招募「准軍事民兵」（paramilitary militias）。**根據路透社報導，這些民兵在 2020 年佔了烏克蘭軍力大約四成，總計約 10 萬 2 千人。**美國、英國、加拿大與法國提供武器與資金，武裝了這些來自 19 個國籍的民兵。

這些得到西方的支持民兵從 2014 年以來，就已存在。即便有人想要論稱這些人未必是「納粹」，但這些民兵相當暴力、意識形態讓人作嘔，同時惡毒地反猶太，卻是不爭的事實，組成這些民兵團營隊的人，一個個都是狂熱殘暴之人。其中，最知名的就是「亞速營」（Azov Regiment），它的徽章讓人憶起二戰時期納粹德國武裝親衛隊，在烏克蘭，卻有人尊敬這個標誌，指它在 1943 年從蘇維埃手中解放了哈爾科夫（Kharkov），又在 1944 年執行了法國奧拉杜爾（Oradour-sur-Glane）的大屠殺！

有人說烏克蘭民兵是「納粹」或「新納粹」，純屬俄羅斯的宣傳。但《以

色列時報》(Times of Israel)或「西點軍校反恐中心」(the West Point Academy's Center for Counterterrorism)可不這樣看待。《新聞週刊》(Newsweek)在2014年的報導則似乎說這些民兵與「伊斯蘭國」(the Islamic State)有更多的關係。相信哪一種呢？就請自行選擇。



這些民兵自從2014年以來就對平民犯下無數罪行，姦淫、拷打酷刑與殺戮…，西方国家給予支持，也不斷提供武器給他們。

有的人認為，這些民兵整合進入烏克蘭的國民警衛隊之后，已經「去納粹化」，但根本不是這樣。有許多例證可以說明，就說亞速營的階級徽章，應該就能讓人恍然大悟：

在2022年，與入侵的俄羅斯入侵者作戰的烏克蘭軍隊，其組成是：

(一) 國防部直屬的軍隊，有三個軍團 (corps)，並有能夠參與演習的軍事裝備如坦克、重火砲與飛彈……等等。

(二) 國民警衛隊 (National Guard)，由內政部提供給養並分成五個地方指揮區。

因此，國民警衛隊是地方自衛隊伍，不是烏克蘭軍隊的一部份。這些國民警衛隊包括准軍事民兵，名稱是「志願營隊」(volunteer battalions)，也有人以意有所指的「復仇營隊」(reprisal battalions)相稱；同時也有步兵，主要是訓練來從事都會區戰鬥，目前負責哈爾科夫 (Kharkov)、馬立波

(Mariupol)、奧德薩 (Odessa) 與基甫 (Kiev) 等地的防務。

貳、第二步：戰爭

退休前，我是瑞士戰略情報機構分析華沙公約組織軍力的組長，對於我們提供的服務，不再能夠有助於瞭解烏克蘭的軍事狀態，我有哀傷，但不驚訝。就在我們家家戶戶的電視銀幕，宣稱自己是「專家」的人鎮日遊走不斷傳輸，所說無他，就是聲稱俄羅斯人（以及普亭）沒有理性。我們得先跳出這個圈子說話。

一、戰爭爆發

美國人從 2021 年 11 月起，持續地對外有威脅之言，指俄羅斯就要入侵烏克蘭。不過，烏克蘭人起初似乎並不同意這個說法，為什麼不同意？

這得從 2021 年 3 月 24 日說起。當天，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Volodymyr Zelensky) 下達命令，要重新取回克里米亞，並開始部署軍力至烏國南部。就在這個時候，北約也在黑海與波羅的海之間，舉行多次演習，連帶出現的是，沿著俄羅斯邊界飛行偵測的次數顯著增加。俄羅斯於是執行了數次演練，測試自己的軍隊是否隨時可以運作，這也是對外展示，俄羅斯在跟進情勢的變化與發展。³

在俄羅斯的 the ZAPAD 21 演習結束後，事態平靜了下來，這時是 10 月、11 月，只是外界認為這些軍隊的行動，是在強化攻擊烏克蘭的準備。不過，即便是烏克蘭當局都拒絕作此判斷，並不認為俄羅斯在備戰，烏克蘭國防部長列茲尼科夫 (Oleksiy Reznikov) 都有聲明，指烏國邊境從春天以來，就沒有什麼變化。

³ 譯按：外界似乎僅說俄羅斯軍演，沒有提及本文所說的北約軍演。因此，歷來反對美國軍事帝國的人與網刊，就只是這樣陳述：普亭在 2021 年 4 月「增加兵力 12 萬人，部署在烏克蘭邊境，發動軍事演習。當時，華府甚至已經說這是『戰爭威脅』」。(McCoy, 2022, April 19)

烏克蘭違反明斯克協議，在東巴斯區以無人機操控多回空中行動，包括至少有一次攻擊加油站，時間是 2021 年 10 月。美國傳媒報導了這則新聞，但歐洲人沒有報導；**歐美都沒有譴責這些違規行動。**

事情在 2022 年 2 月來到了危機關頭。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在 2 月 7 日訪問莫斯科，再次承諾普亭，表示會履行明斯克協議，次日，他與澤倫斯基會面時，也重複這個承諾。但是，「諾曼地方案」的多位政治顧問 2 月 11 日在柏林會談九小時以後，並無具體結果：烏克蘭人仍然拒絕履行明斯克協議，很顯然是有來自美國的壓力。普亭則心理有數，馬克宏開了空台支票，西方國家無意落實協議，八年以來，對於這個協議，西方都是維持這個立場，無意執行。

烏克蘭在接壤區的準備持續進行。俄羅斯國會有了警覺；接著是 2 月 15 日，杜馬國會就要普亭承認兩個共和國的獨立地位，而早先他是拒絕這個作法。

「拜登總統在 2 月 17 日宣布，俄羅斯即將攻擊烏克蘭」。他怎麼知道？這是個謎。不過，16 日起，轟炸東巴斯區的砲彈急速增加，OSCE 的每日報告都有記載。可想而知的是，西方的傳媒、歐盟或北約，以及任何西方政府，都沒有反應也沒有介入，其後西方只是說，這個消息只是俄羅斯的不實資訊。然而，真實的情況似乎是**歐盟與一些國家刻意對此保持沉默，不提屠殺東巴斯人群這回事，知道這將挑起俄羅斯的介入。**

這個時候，東巴斯地區出現破壞行動的報告，已經多回。東巴斯區的戰鬥人員攔截到破壞隊伍，這些人說波蘭語，配有西方裝備，打算在哥羅夫卡（Gorlivka）製造化武事件。這些人可能會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傭兵，由美國人及烏克蘭人或歐洲戰鬥人員在內的人領導或提供「諮詢」，目標就是在東巴斯兩個共和政權執行破壞行動。

拜登其實早在 2 月 16 日就知道，烏克蘭政府已經開始對東巴斯區的平民區狂炸猛轟，這是要為難普亭，使他進入難以抉擇的困境：協助東巴斯的軍隊同時也就必然弄出國際問題，或者袖手旁觀眼睜睜看著東巴斯說俄語的人被弄得粉碎。如果他決定介入，普亭便可引用「保護責任」的國際義務。但是，**他知道介入的性質或規模大小，都同樣會引發制裁風暴。因此，究竟**

俄羅斯是要將介入限定在東巴斯地區，或對西方施加壓力就烏克蘭地位有個決斷，俄羅斯需要支付的代價，將是相同。這就是他在 2 月 21 日講演所做的解釋。在同一天，他同意杜馬國會的要求，承認兩個東巴斯共和國的獨立，與此同時，他也與兩國簽署了友誼及協助協議（譯按：這就在程序上，符合由獨立的國家請求俄羅斯進入的國際法要求）。

烏克蘭持續轟炸東巴斯平民區，然後，兩個共和國在 2 月 23 日要求俄羅斯給予軍事協助。俄羅斯在 2 月 24 日就引用聯合國憲章第 51 條，亦即在防衛聯盟的架構下可以互相提供軍事協助。

為了要讓公眾以為俄羅斯介入，似乎完全非法，西方這些強權刻意隱匿實情，不讓戰爭早在 2 月 16 日就已經發生的真相，為外界所知。烏克蘭軍隊想要攻擊東巴斯地區，早在 2021 年就已經有所準備，對此，有些俄羅斯與歐洲的情報服務也是一清二楚。

普亭在 2 月 24 日的演講陳述這次行動的兩大目標：烏克蘭的「去軍事化」與「去納粹化」因此，並沒有什麼接管烏克蘭，也沒有甚至有人假想中地那般，要佔據烏克蘭；當然更不是要摧毀烏克蘭。

當日至今，我們對俄羅斯的操作所知，就相當有限：俄羅斯人的軍事操作有絕佳的安全部署（OPSEC），他們的計畫詳情外界無從得知。但整個操作的路徑算是相當快就已經顯露，我們因此可以瞭解俄羅斯的戰略目標，轉化為操作層次的面貌。

去軍事化：

- 摧毀烏克蘭航空地面設施、防空系統與偵察設備；
- 指揮與情報結構（C3I）及深入該領土的主要後勤路線維持中立；
- 包圍集結在東南區的大部分烏克蘭軍隊。

去納粹化：

- 摧毀哈爾科夫、馬立波、奧德薩等城市的「志願營隊」，或使其中立，以及摧毀這些地方的軍事設施。

二、去軍事化

俄羅斯的進攻，以非常「古典的」方式推動。起初一如同 1967 年以色列的前例—就是在最初幾小時內，摧毀烏國停留在地面的空軍。接著，根據「水流」原則，俄軍沿著多個軸線同時推進：那個地方抵抗弱就先進抵，放著城市（若要用部隊拿下，那可是高難度）稍候再說。在北方，**車諾保（Chernobyl）電廠很快就落入俄軍手中，這是為了防止破壞。**烏克蘭與俄羅斯軍士攜手一起保護電廠的畫面，當然不會出現。

俄羅斯想要接管首都基輔、想要消滅澤倫斯基，典型是來自西方的說法。但是，普亭從來沒有想要射殺或推翻澤倫斯基。俄羅斯反而是希望他繼續掌權，以包圍基輔作為手段，將他推向談判桌。**俄羅斯要的是烏克蘭中立化。**

西方有很多評論家倍感驚訝，俄羅斯人不捨協商解決之途，卻又同時推進軍事運作。答案就在俄羅斯的戰略容貌，從蘇聯時代就是這樣。若在西方，政治手段結束才是戰爭的開始。然而，俄羅斯的路線來自克勞塞維茲的（Clausewitzian）啟發：戰爭是政治手段的延續，從此端到彼端，自然可以順暢流動，即便仍然在交戰中。這可以讓我方施加壓力於敵方，將渠推向協商。

從實際的運作層面看，俄羅斯的進攻是示範，展現了事前的行動與計畫：在六天內，俄羅斯拿下了面積與英國等大的領域，**推進的速度比納粹軍隊在 1940 年達到的水平，來得要快。**⁴

⁴ 譯註：作者此處指俄羅斯的軍事思維與西方不同，能速戰則速戰，不能則緩慢推進。英語及台灣出版品則絕大多數指陳俄羅斯挫敗。與本文看法相同者，譯者僅看到兩篇，一是台灣戰略研究學會理事長李黎明（2022 年 5 月 3），二是新加坡智庫人員指越南軍事戰略專家亦持該看法（Ha & Luong, 2022, May 13）。支持聯合國 2022 年 3 月 2 日譴責俄羅斯要求撤兵有 141 國、35 國棄權，僅 5 國反對。但支持美歐制裁俄羅斯的國家少了很多，北美歐洲紐澳之外，亞洲僅有台日韓新等國，中印巴西印尼等等非洲中南美洲與亞洲百餘國，並沒有響應，原因可能是戰略與經濟考量、殖民歷史記憶，以及認定俄羅斯入侵當譴責，但北約而特別是美國不是沒有責任...等等。在這些地方，是否存在與本文作者相同的見解，另得探詢。不過，在西方主流新聞指俄羅斯損失慘重而烏克蘭勝利的報導聲中，最慢從 5 月 19 日起，似乎出現新的形

烏克蘭大量軍隊部署在國境之南，準備要在東巴斯區遭遇俄軍。出於這個原因，俄羅斯軍隊從三月一開始，就能圈住「斧頭狀」(cauldron) 這塊區域，亦即斯拉夫揚斯克 (Slavyansk)、克拉馬托爾斯克 (Kramatorsk) 以及北頓涅斯克 (Severodonetsk) 之間的地帶，在東邊，俄軍通過哈爾科夫，在南邊則從克里米亞推進。同時，來自盧甘斯克與頓內茨克這兩個共和國的軍力，是對俄羅斯的補充，這是來自東邊的另一股推進力量。

到了這個階段，俄羅斯軍力放慢了腳步，開始緊縮袋口，但已經沒有任何時間壓力或進度時程。他們的去軍事化目標差不多都已經完成，僅存的烏克蘭軍隊再也沒有操作與戰略的指揮結構。

那些在媒體現身的「專家」則認為，俄軍「慢了下來」是因為後勤作業不良，但這其實是俄人已經達成其目標的結果。俄軍無意佔領整個烏克蘭領土。就實情論斷，俄羅斯人似乎是要試著限縮，只是前進至該國的語言區邊境。

在我們這邊的媒體，說的是俄軍轟炸平民區，不分青紅皂白，特別是在哈爾科夫，看了就讓人驚恐的照片影像大肆傳送。然而，有位拉丁美洲特派員力拉 (Gonzalo Lira) 住在那裡，他提供的描述是在 3 月 10 日與 11 日，城市是平靜的。⁵在這個大城市，我們所見不是所有的現場，這是真的——

態，當天《紐約時報》社論罕見地質疑美國的烏克蘭戰略，〈烏克蘭戰爭日見複雜，美國尚未完成準備〉，三日後紐時再使刊登於紙版 (Editorial Board, 2022, May 19)。一週後，《華盛頓郵報》指〈烏克蘭志願軍在東部有被遺棄的感覺〉，因為僅能日食馬鈴薯，躲在壕溝只有輕武器，外頭是俄羅斯砲火猛烈 (Raghavan, 2022, May 26)。紐時外稿專欄的評論員在 31 日更說〈烏克蘭戰爭發展至此，美國難辭其咎〉 (Caldwell, 2022, May 31)。《經濟學人》至 6 月上旬都未曾出現類似質疑，反而說烏克蘭「被低估了」；「烏克蘭的士氣還是樂觀」，若讓步而俄羅斯取勝，「遲早就會誘惑 (俄羅斯) 對烏克蘭再咬第三次，或咬其他地方如喬治亞，摩爾多瓦，或甚至波羅的海的一個國家」；若烏克蘭割地求和，未來發生核武戰爭的機會就增加 (Economist 2022, May 21, 28; June 4)。以輸贏說戰爭，未能投入更多努力兼顧和平與正義，不智且殘忍。李特 (Ritter, 2022, June 25) 則考察雙方軍火數量與戰術的數字與分析多方說法，指俄羅斯贏定了，認為醜陋的和平仍是減少傷亡的出路。

⁵ 譯註：力拉是智利裔美國人，4 月 15 日被烏克蘭 SBU 押走，失蹤七日後再次出現 (新聞也傳到了玻利維亞中西部、第三大城市哥查班巴 (Cochabamba) 由工會擁有及經營的收音機電台 Radio Kawsachun Coca。該台在 2007 年創辦，2019 年 5 月再創 Kawsachun News 英語新聞網，它在 2022 年 4 月 21 日發佈新聞，並引述智利 CNN

但力拉在當地的現身說法，似乎顯示我們不斷從電視螢幕得到的總體戰爭印象，並不準確。至於東巴斯兩個共和國的人，他們已經「解放了」他們自己的領土，已經在馬力波進行城市作戰。

三、去納粹化

在哈爾科夫、馬立波與奧德薩這些城市，烏克蘭的防務是由准軍事民兵負責，他們知道「去納粹化」主要就是針對他們。對於攻擊這些都會地區的軍隊來說，平民會是問題。俄羅斯人尋求建立人道走廊，要讓這些城市的平民離開，僅讓民兵在內，與他們交戰就容易得多。

反之，這些烏克蘭民兵則試著要讓平民留在市區，不是要讓他們撤退，目的是勸阻俄羅斯軍隊不要在這裡開戰。這就是他們不願意執行人道走廊協議的原因，他們盡其所能，就是要確保俄羅斯人的這些努力無法成功——他們使用大量市民當作「人肉盾牌」。很多影像顯示平民想要離開馬立波，卻遭亞速營的戰鬥人員毆打，當然，西方媒體老早就仔細地把這些影像檢查過了。⁶

臉書原本將亞速營與伊斯蘭國（ISIS）列入相同的一類，都要接受該平台「對危險的個人與組織之政策」限制。因此，這類來源假使「上傳」美化其活動的內容，會遭系統性作法予以拒斥。但是，臉書在 2 月 24 日改變這個政策，容許上傳有利於亞速營民兵的內容。與此作法相同，到了三月，臉

報導，指智利外交部聯絡了烏克蘭相關單位。該則新聞並發佈力拉在 3 月 26 日以手機發佈在推特的圖文，上面寫著「你想知道澤倫斯基政權治下的烏克蘭嗎？用谷歌搜索下列名字。」然後列出當時已經失蹤多日的八位記者名字，該圖文最後說：「假使你在 12 小時或更長時間沒有看到我的推文，請將我的名字放入前面這個名單。GL」（Kawsachun News 2022, April 20, 22）

⁶ 譯註：《華盛頓郵報》批評俄羅斯殺害平民，不過，該報也刊登一篇烏克蘭在平民區部署防務的新聞（Raghavan, 2022, March 28）。兩日後，洪毅（2022 年 3 月 31 日）的編譯納入這則報導，指〈美媒批烏克蘭於居民區布防〉，致使「俄軍轟炸砲擊烏克蘭城市，讓俄國面臨蓄意攻擊平民、違反戰爭罪等指控。美媒批烏克蘭於居民區布防俄軍轟炸砲擊烏克蘭城市，讓俄國面臨蓄意攻擊平民、違反戰爭罪等指控。」

書授權前東歐國家若有人上傳內容，要人謀殺俄羅斯軍人與其領導人，是可以的。⁷激勵、鼓舞我們的價值，原來就只是這樣。

我們的媒體廣傳一種浪漫的形象，顯示烏克蘭人民大力抵抗。這個形象導引歐盟提供金援買武器送入烏克蘭群眾。**我曾經擔任聯合國維和隊伍的指揮，負責保護平民。我們的理解是，平民遭到暴力對待，只在非常特殊的情境下，才會出現。特別是武器充斥，卻沒有指揮系統（譯按：予以分配及管理）。**

這些指揮系統才能確保軍火的本質：他們的功能是將軍火引導至特定的目標。若以隨機方式武裝民眾（這是目前的狀態），**歐盟是把民眾變成戰鬥員，這就造成重大效應，會使民眾變成潛在的遭攻擊目標。**還有，沒有指揮系統、欠缺操作目標，軍火的分配無可避免地，有人會拿來算舊帳，也會流落至幫派盜匪手中，這些會是更致命的事情。戰爭變成是多種情緒的宣洩。武力變成暴力。在利比亞的塔瓦加（Tawarga），從 2011 年 8 月 11 至 13 日，有三萬非洲黑人被屠殺，武器就是從法國（非法）空投過來的。⁸還有，（譯按：在戰爭爆發前一個月，）英國皇家戰略研究所（the British Roy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RUSI）的研究已經指出，送武器進入烏克蘭並不會增加任何價值。

再者，運送武器至交戰國，會遭另一方認定是好戰份子，也就讓自己陷入危險。俄羅斯在警告運送武器將被視為敵意目標後，2022 年 3 月 13 日就對尼古拉耶夫（Mykolayev）的空軍基地展開空襲。

⁷譯按：臉書這個雙重標準，引發批評（如 Biddle 2022, April 14）。

⁸譯按：戰爭武器下落不明、無法掌握的新聞，時有報導，如《紐約時報》長篇文章追蹤，指美國入侵阿富汗（2001）、伊拉克（2003）以來，十多年累計發出 145 萬件軍火（槍枝與機關槍...等等），但僅 75 萬件可以核實，消失者「數以十萬計」（Chivers 2016, August 24）。在烏克蘭戰事，張佑生（2022 年 4 月 21 日）的編譯指出，〈缺乏核實 美軍援去向不明（美在烏缺乏部隊 軍援下落難追蹤 對烏要求只能照單全收）〉，「美國提供的軍備主要經由波蘭運入烏克蘭，至於如何使用和在何處使用，都由烏克蘭自己決定。」在美國參眾兩院以絕對多數，於 2022 年 5 月 10 日通過 400 億美元軍援烏克蘭之後，反對該案的共和黨眾議員二十多位發表公開信，要求總統拜登注意武器流向，因 2017 年的調查顯示，2013 至 2015 年間，美國送達的 30 萬小型軍火在烏克蘭消失，僅找回 13%，烏克蘭情治單位在 2019 年發現軍人販售手榴彈...等等軍火（Greenwald, 2022, May 23）。

納粹德國在柏林戰役的最後時刻，歷經災難，歐盟正在重複這個經驗。戰爭必須讓軍人肩負，一旦戰敗，就得承認。假使還要抵抗，必須要有領導也要納入結構。但是，我們現在的作為剛好正相反——我們正把平民推在前面並戰鬥，與此同時，臉書授權讓人在其平台呼籲謀害俄羅斯軍人與領導人。激勵、鼓舞我們的價值，原來就只是這樣。

在有些情報人員眼中，這個不負責任的決定，是用烏克蘭人當作砲灰與普亭的俄羅斯作戰。比較好的方法是進入協商，因此也就確保平民百姓的安全，不是火上加油。用別人的血作戰，歷來容易。

四、馬立波的婦產科醫院

在說明之前，重要的提醒是，防衛馬立波的行伍，並非烏克蘭正規軍隊，是亞速營民兵，其中並有外籍傭兵。

紐約的「俄羅斯聯合國領事館」在 2022 年 3 月 7 日總結情勢，這樣陳述：「住宅區報告指烏克蘭軍方驅逐馬立波市立嬰兒第一醫院，然後在醫院內部設置戰鬥點。」3 月 8 日俄羅斯的獨立媒體 Lenta.ru 刊登了馬立波民眾的證詞，表示亞速營民兵團已經接管這家婦幼醫院，他們以其武器威脅市民，驅離這些原先在醫院的民眾。這些陳述證實了俄羅斯大使幾小時前的陳述。⁹

這家馬立波醫院佔有一個優勢，亦即在此裝置反坦克武器並觀察動靜，再好不過。俄羅斯軍隊在 3 月 9 日摧毀醫院。根據 CNN 報導，有 17 人受傷，但影像沒有顯示建築物內有人受到傷害，也並沒有證據指認受害者與這次攻擊有關。新聞是說到了兒童，但事實上，什麼都沒有。雖然有這些事實，但

⁹ 譯按：根據維基百科的資料，本文作者說的 Lenta.ru，可能沒有那麼獨立。該網媒在俄羅斯很受歡迎，但 2014 年解雇 30 多位記者後被指為親官方，2020 年則由俄羅斯聯邦儲蓄銀行（Sberbank）蒐購，2022 年 4 月 21 日查閱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enta.ru>。不過，也有人提醒，在地緣政治事件，維基的記錄與解釋常有爭議，甚至已達「我們來告訴你怎麼思考」的地步」（Cole, 2021）。Lenta.ru 的前述性質，使作者的引述可信度，可能會打折扣，但美國調查記者 Blumenthal（2022, March 18）引述更多的消息來源，倒是同樣證實本文的說法。

沒有阻卻歐盟領導人將這件事，說成是「戰爭罪」。這也讓澤倫斯基有了底氣，呼籲要在烏克蘭上空設置禁航區。

真確地說，我們並不知道究竟發生什麼事。但若將事件連串排列，可以發現比較可能的進展，是俄羅斯軍隊攻擊了亞速營的所在，並且，婦幼醫院當時沒有平民。

問題在於，馬立波等城市的守軍，也就是准軍事民兵得到國際社區的鼓勵，也就不遵守戰爭的規則。似乎，烏克蘭人已經再次演出 1990 年科威特婦幼醫院的場景。當時，偉達公關顧問公司（Hill & Knowlton，譯按：1927 年在美國俄亥俄州創辦）承包了（譯按：科威特政府的）1070 萬美元的項目，策劃了整個事件，¹⁰目的也是要让聯合國安理會相信，然後通過決議，於是有了「沙漠之盾行動」（Operation Desert Shield/Storm）介入伊拉克。¹¹

烏克蘭東巴斯地區的平民遭受攻擊八年，西方政治人物沒有採取任何行動，沒有制裁烏克蘭政府。我們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進入一種動態關係，西方政治圈在這個變化中，犧牲了國際法，就只為了達成他們弱化俄羅斯的目標。

參、第三步：結論

我是退休的情報專業人員，震驚的第一件事，在於西方情報服務完全缺席，沒有正確呈現過去一年的情勢。真相似乎是整個西方世界的情報服務，無不臣服於政治人。問題在於，那捏政策的人是政治人——舉世最優秀的情報服務也會無用武之處，假使決策者無意傾聽。在這場危機，應運而生的場

¹⁰ 這起醜聞的較記載與剖析，參見 Stauber & Rampton (2002, pp.167-175)，該段文字亦可在下列網址讀到 <https://www.prwatch.org/books/tsigfy10.html>。該書有白舜羽、劉粹倫（2011）中譯本。另可參見 Fingrut（1993），以及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itizens_for_a_Free_Kuwait。該事件是科威特人的造假，但美國政府造假求戰，例子同樣不少，最大宗有二，一是 1964 年 8 月 4 日宣稱北越非法在公海攻擊美國艦艇，這就為次年美國升高越戰製造了藉口（Herman & Chomsky, 1988／沈聿德譯，2021，頁 268-272）；二是 2003 年謊稱伊拉克擁有大量毀滅武器而入侵（見譯註 11）。

¹¹ 該次戰爭的局部紀錄，參見成令方編（1991）。

面，就是這樣。

是這樣的局面，很多情報服務是有非常準確與理性的局勢分析，另有一些情報服務提供的圖像，則與我們的傳媒所做的宣傳，一模一樣。問題在這裡出現，依據經驗，我發現後面這類情報的分析水平，相當低劣——他們黏住了教條，欠缺知識份子與政治的獨立執守，也就無從提出具有軍事「品質」的評估。¹²

第二，有些歐洲國家的政治人在回應局勢時，似乎刻意擁抱意識形態。這次危機從一開始就很不理性，原因在此。我們應該意識到，在這場危機，所有呈現在公眾面前的文件，來自商業來源而由政治人提出。

凱西的評論：情報服務業已受制於「負面篩選」的過程，意識形態在此比客觀原則更受採用，隨之就出現病態現象，一旦這些現象積累到了一個門檻，各個國家機關之內就進入人以群分的邏輯，同類人可能就會逐漸佈滿於整個政體。至此，民主就病態橫生，開始自我毀滅。

有些西方政治人顯然想要看到衝突的出現。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hony Blinken）向聯合國安理會提出的攻擊劇碼，是專為他工作的「老虎團隊」想像出來的產物——他的作法與（前國防部長）倫斯斐（Donald Rumsfeld）如出一轍，他在 2002 年也「繞開」CIA 及其他情報服務機構，情治人員對伊拉克是不是有大量化學武器，並沒有那麼肯定。¹³

今日我們還在目睹的戲劇化發展，是有原因的，我們知道，但拒絕去看：

¹²政治考量凌駕外交專業與情報分析在美國的情況是，2008 至 2016 年核心外交經費減少近四分之一，外交任命的專業減弱，以捐款等考量任命駐外大使，比例至川普年代增加至 43%。職業外交官晉升助理部長以上的比例，從 1975 年的 60% 減少至 30%（Economist, 2020, August 15）。美國聯邦層級的多種情報工作，年薪少於民間 2-5 萬美元或更多，批川普的人指他任總統四年，重創美國情報單位的「名聲」，（Economist, 2018, March 3; 2020, December 5）但將問題都導向川普，顯非全豹。

¹³ 2003 年 3 月 19 日，美國以伊拉克有「大量毀滅武器」為由，在沒有聯合國授權但英國支持下，出兵入侵伊拉克。事後證實沒有這些武器，次年，《紐約時報》在十版（The Editor, 2004）、《華盛頓郵報》（Kurtz, 2004）在頭版先後撰文，正式為自己沒有查證而接受政府說法並助長戰爭道歉。布朗大學的「戰爭的成本」研究項目說，「無人能夠確認多少人在美軍入侵後，多少人死亡。不過，我們知道直接死於戰爭暴力有關的平民人數...至 2019 年 10 月是 18.4382 至 20.7156 萬人」，不含美軍或伊拉克軍警及記者、NGO.....等等人數（Brown University, 2021）。

- 戰略層次：北約的擴張；
- 政治層次：西方拒絕執行明斯克協議；
- 運作層次：過去幾年來，東巴斯地區的民眾持續遭受反覆攻擊，且在 2022 年 2 月下旬急遽增加。

換句話說，我們扼腕並且譴責俄羅斯的攻擊，這自然是會的。但是，我們（那就是指美國、法國與歐盟）卻創造了導致衝突爆發的多種情境。我們對烏克蘭人民及逃離的兩百萬難民（譯按：至 3 月），感同身受。這些都很對。但是，八年來，因為他們自己的政府之屠殺而逃離東巴斯地區的相同人數之烏克蘭人民，假使我們能夠也有一點同理心，現在的這些災難的任何一樣很可能就不會發生。

東巴斯地區的人遭受的苦難是不是可以用「種族滅絕」(genocide)，可以任人討論。這個詞通常是用來指涉更大規模的案例（比如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 Holocaust 等等）。但是，假使援用這個詞在《種族滅絕公約》(the Genocide Convention) 的定義，以其寬鬆的界說，可能就算是了。

這場衝突很顯然讓我們歇斯底里。多式多種的制裁似乎已經成為我們外交政策的偏好工具。假使我們早已堅持烏克蘭遵守明斯克協議，這個衝突就無從發生，這個協議可正是我們（譯按：歐洲人）參與協議並且背書。對普亭的譴責也是對我們的譴責。事後的抱怨於事無補——我們早就應該採取行動。然而，馬克宏（法國總統，同時也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德國總理蘇茲（Olaf Scholz）或者澤倫斯基，沒有一人尊重並信守他們的承諾。這就造成一種結果，真正的輸家，是沒有聲音的人。

歐盟過去沒有能夠提振明斯克協議的執行——剛好相反，烏克蘭東巴斯地區的平民遭到自己的政府轟炸時，歐盟並沒有反應。假使歐盟對此已有反應，普亭就沒有必要反應。沒有在外交層面現身，歐盟凸顯自己身份的方式，反而是火上加油。烏克蘭政府在 2 月 27 日已經同意與俄羅斯協商。但幾個小時後，歐盟投票同意以 4.5 億歐元的預算，購買軍火送達烏克蘭，這就是火上加油了。這個時刻開始，烏克蘭人覺得他們沒有必要與俄羅斯達成協

定。亞速營民兵在馬立波的存在，甚至還讓歐盟加碼，增加 5 億歐元的武器支援。

在西方政府的祝福下，烏克蘭人內部贊成協商的人已經被拔除得一乾二淨。這就是發生在基里耶夫（Denis Kireyev）身上的事，這位烏克蘭談判代表之一在 3 月 5 日被烏克蘭 SBU 暗殺，因為他對俄羅斯太友善，被認定是叛徒。同樣的命運也降臨在德米延克（Dmitry Demyanenko）身上，他是 SBU 基輔市及其地區主要區域的副首長，也因為太過贊成與俄羅斯協定，在 3 月 10 日也遭暗殺——動手的人，來自號稱「和平使者」（Mirotvorets）的民兵集團。與「和平使者」有關的民兵，其網站列舉了「烏克蘭之敵」，張貼了他們個人資料、住址與電話號碼，要讓任何人可以騷擾或甚至消滅他們，這個作為在很多國家都構成犯罪，會遭處罰，但在烏克蘭，政府並不追究。聯合國與有些歐洲國家是提出關閉這個網站的要求——但是烏克蘭的「拉達」（the Rada），也就是國會，予以拒絕。

結局會是代價很高，但普亭可能會達成他所設定的目標。我們已經將普亭推向中國，他與北京的連結會強化。中國正在以這場衝突的中介者身份出現。美國人開始接觸委內瑞拉與伊朗人，想要走出他們自己弄出來的能源僵局——美國必須低聲下氣地撤回對其敵人的制裁。

有些西方政府的部會首長想要讓俄羅斯經濟崩盤，要讓俄羅斯人受苦，或甚至呼籲要暗殺普亭，這就顯示（即便他們已經局部翻轉了他們言詞的形式，但實質意思沒有改變！）我們的領導階層，比起我們所憎恨的人，沒有來得更高明——制裁殘障奧運會的俄羅斯選手或者俄羅斯藝文人員，這與對普亭的戰鬥，一點關係也沒有。

相較於我們在伊拉克、阿富汗或利比亞的作為，烏克蘭衝突在哪些地方需要讓人更給予譴責？對於那些對國際社區刻意說謊，就只為了要發動不正義的、沒有正當性的，也殘殺人們的戰爭，我們採取了哪些制裁手段？對於那些供應武器給葉門衝突的企業、政治人或國家，我們可曾採取任何一種制裁？世有公論，以葉門戰爭為「最糟糕的人道災難」。

參考書目

- 白舜羽、劉粹倫譯(2011)。《有毒污泥愛你好：揭開黑心公關的祕密檔案》。台北：紅桌文化。(原書 Stauber, J., & Rampton, S.(2002). *Toxic sludge is good for you: Lies, damn lies and the public relations industry*. Common Courage Press.)
- 成令方編(1991)。《戰爭·文化·國家機器》。台北：唐山。
- 李黎明(2022年5月3日)。〈西方不解的俄羅斯戰略〉，《聯合報》，A13。
- 洪毅(編譯)(2022年3月31日)。〈美媒批烏克蘭於居民區布防〉，《聯合報》，A8。
- 沈聿德譯(2021)。《製造共識：媒體政治經濟學》。台北：野人文化。(原書：Herman, E. S., & Chomsky, N. (1988).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Pantheon.)
- 張佑生(編譯)(2022年4月21日)。〈缺乏核實 美軍援去向不明〉，《聯合報》，A10。
- 陳韻涵、李京倫(編譯)(2022年4月4日)。〈俄軍一邊撤離基輔 一邊埋地雷〉，《聯合報》，A8。
- 趙竹成(2022年3月1日)。〈明斯克協議 誰出賣烏克蘭?〉。《聯合報》，A10。
- 潘勛、李京倫(編譯)(2022年4月5日)。〈400平民遭屠 歐美籲加強制裁俄〉，《聯合報》，A8。
- Biddle, S. (2022, April 14). *Facebook's Ukraine-Russia moderation rules prompt cries of double standard*. From <https://theintercept.com/2022/04/13/facebook-ukraine-russia-moderation-double-standard/>
- Blumenthal, M. (2022, March 18). *Was bombing of Mariupol theater staged by Ukrainian Azov extremists to trigger NATO intervention?*. From <https://thegrayzone.com/2022/03/18/bombing-mariupol-theater-ukrainian-azov-nato-intervention/>
- Brown University (2021). *Cost of war: Iraqi civilians*. From <https://watson.brown.edu/costsofwar/costs/human/civilians/iraqi>
- Chivers, C. J. (2016, August 24). *How many guns did the U.S. lose track of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Hundreds of thousands*. From <https://www.nytimes.com/2016/08/23/magazine/how-many-guns-did-the-us-lose-track-of-in-iraq-and-afghanistan-hundreds-of-thousands.html>
- Caldwell, C. (2022, May 31). *The war in Ukraine may be impossible to stop. And the U.S. deserves much of the blame*. From <https://www.nytimes.com/2022/05/31/opinion/us-ukraine-putin-war.html>
(本文兩日後有中文譯版〈烏克蘭戰爭發展至此，美國難辭其咎〉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220602/us-ukraine-putin-war/zh-hant/>)

- Cole, T. J. (2021). *We'll tell you what to think: Wikipedia, propaganda and the making of liberal consensus*. Independently published.
- Economist (2018, March 3). *Spooks for hire*. p.31.
- Economist (2020, August 15). *America's State Department: the dereliction of diplomacy*. pp.48-50.
- Economist (2020, December 5). *Shadow business*. p.39.
- Economist (2022, May 21). Ukraine: the relief of Kharkiv. pp.47-48.
- Economist (2022, May 28). Ukraine: don't stop now. pp.8-9.
- Economist (2022, June 4). Thinking the unthinkable, pp.15-17.
- Editorial Board (2022, May 19). The war in Ukraine is getting complicated, and America isn't ready. From <https://www.nytimes.com/2022/05/19/opinion/america-ukraine-war-support.html>
- Editor (2004). From the editors: The Times and Iraq'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6, Section A, p.10.
- Fingrut, D. (1993). Operation desert storm: Outright disinformation scheme. Retrieved 2022, April 21, from <https://msuweb.montclair.edu/~furr/Vietnam/gulf-war-fingrut.html>, 由 Grover Furr 在 1999 補充與說明。
- Greenwald, G.(2022, May 23). *Twenty-Two House Republicans Demand Accountability on Biden's \$40B War Spending*, <https://scheerpost.com/2022/05/23/greenwald-twenty-two-house-republicans-demand-accountability-on-bidens-40b-war-spending/>
- Hedges, C. (2022, April 18). Hedges: American Commissars, 2022, 4 19 讀取自 <https://scheerpost.com/2022/04/18/hedges-american-commissars/>
- Human Rights Watch (2022, April 21). Ukraine: Russian Forces' Trail of Death in Bucha. From <https://www.hrw.org/news/2022/04/21/ukraine-russian-forces-trail-death-bucha>
- Kawsachun News(2022, April 20). Chilean and US authorities silent on Gonzalo Lira. From <https://kawsachunnews.com/chilean-and-us-authorities-silent-on-gonzalo-lira>
- Kawsachun News(2022, April 22). Chilean Gonzalo Lira was taken by SBU, says he's "OK". From <https://kawsachunnews.com/chilean-gonzalo-lira-was-taken-by-sbu-says-hes-ok>
- Krishnankutty, P. (2022, May 12). Under fire for praising Trump's Ukraine stance, Noam Chomsky says US ex-president 'not the issue', the Print. From <https://theprint.in/world/under-fire-for-praising-trumps-ukraine-stance-noam-chomsky-says-us-ex-president-not-the-issue/951672/>
- Kurtz , H. (2004). The post on WMDs: An inside story.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2, Front page.
- Lieven, A. (2021, November 15). Ukraine: The most dangerous problem in the world but there's already a solution. *the Nation*. From

-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world/ukraine-donbas-russia-conflict/>
McCoy, A.(2022, April 19). How to end the war in Ukraine: A solution beyond Sanctions. From <https://tomdispatch.com/how-to-end-the-war-in-ukraine/> , 次(20)日轉載於 <https://www.counterpunch.org/2022/04/20/how-to-end-the-war-in-ukraine-a-solution-beyond-sanctions/>
- Raghavan, S.(2022, March 28). Russia has killed civilians in Ukraine. Kyiv's defense tactics add to the danger. From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2/03/28/ukraine-kyiv-russia-civilians/>
- Raghavan, S. (2022, May 26). Ukrainian volunteer fighters in the east feel abandoned. From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2/05/26/ukraine-frontline-russia-military-severodonetsk/>
- Ritter, S.(2022, June 25). The fantasy of fanaticism. From <https://consortiumnews.com/2022/06/25/scott-ritter-the-fantasy-of-fanaticism/>
- Stauber, J., & Rampton, S. (2002). Toxic sludge is good for you: Lies, damn lies and the public relations industry(pp.167-175).Common Courage Press. Chapter 10. From <https://www.pwatch.org/books/tsigfy10.html>.
- Veira-Ramos, A., & Liubyva, T. (2020). Ukrainian identities in transformation. In A.Veira-Ramos, T. Liubyva & E. Golovakha (Ed.). *Ukraine in Transformation: From Soviet Republic to European Society*(pp.203-228). Palgrave Macmillan.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十五期
2022 年 6 月

不實資訊、廣場事件與戰爭責任： 理解烏克蘭

馮建三*

本文引用格式

馮建三 (2022)。〈不實資訊、廣場事件與戰爭責任：理解烏克蘭〉，《傳播、文化與政治》，15:161-201。

投稿日期：2022 年 4 月 5 日；通過日期：2022 年 6 月 10 日。

* 作者馮建三為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e-mail：jsfeng@nccu.edu.tw。盧倩儀、傅大為、郭力昕...等等朋友提供部分資料，在此致謝。

《摘要》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西方國家與俄羅斯相互指控，宣稱對方的新聞傳播不實。通過「布查鎮」屠殺疑雲，本文具體呈現雙方提出的「事實」或質疑之後，進入「廣場事件」真相的探討。烏克蘭首都基輔在 2013 年底爆發示威抗議，原本和平，2014 年初轉暴力，近百人遇害後，政府垮台，爆發內戰，八年後有今日戰爭。本文評估美國、烏克蘭極右派在俄入侵過程的可能角色。根據這些文獻探勘，作者同意烏裔加拿大學者的「廣場」分析，是有特定力量刻意轉和平示威為血腥事件，這是俄烏爆發戰爭的重要遠因之一。有了這些理解作為基礎，佐以其他事實與研判，作者最後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責任歸屬，提出看法。

關鍵詞：不實資訊、俄烏戰爭、烏克蘭極右派、廣場事件、戰爭責任

壹、前言

入侵烏克蘭以來，俄羅斯強化對其海內外新聞的管制；同時，谷歌與臉書也將俄羅斯傳媒的各種內容下架，歐盟稍晚發佈禁令之後，推特跟進。接著，西方不滿對岸平台（比如，抖音），成為「普亭戰爭的宣傳工具」（White, 2022, March 11），同時，「中媒買臉書廣告 幫俄洗白」（張沛元編譯，2022年3月11日）等新聞，也陸續傳出，然後是「大翻譯運動」是反映或抹黑中國大陸的爭論登場。（陳君碩 2022年3月14日；陳成良編譯，2022年3月14日）《經濟學人》另有報導，指俄羅斯蒐集挺西方、反戰的藝文人員、記者與演員作家等等，說他們是叛徒並且將其名單上網公告（Economist, 2022, March 19）。獨立記者則報導烏克蘭在開戰前七、八年，已在查禁政黨、蒐集「不夠愛國」份子的名單，同樣也是上網，差別是，已有人遇害（Blumental and Krishnaswamy, 2022, April 17）。

再看俄羅斯國營電視台第一頻道女編輯奧斯雅尼可娃（Marina Ovsyannikova）在晚間新聞播報時，突然現身主播後面高舉反戰標語，畫面傳遍全球。不過，在受罰約合台幣八千元後，她已獲釋、多次受訪，並拒絕出國，僅在過了兩週，傳出她已接受德國斯普林格傳媒集團（Axel Springer）邀請，成為自由撰稿人。（莊蕙嘉編譯 2022年3月27日；經濟日報，2022年4月13日）這位女編輯的故事似又顯示，俄羅斯戰爭期間的言論與新聞管制，尚存迂迴空間。戰前，則有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莫斯科特派員魏爾強調，「儘管西方有預存立場，老是指俄羅斯媒體如同往日的蘇維埃傀儡，但實際上俄羅斯的新聞圖像相當多樣。」當俄羅斯以管制假新聞為由，頒行系列新法時，莫斯科傳媒的反應是群起抨擊政府（Weir, 2018, February 6; 2019, March 20）。這個評價得到《經濟學人》的反向證實，開戰後，該刊先前的俄羅斯是「相對開放的威權」（Economist, 2022, May 21b）。

回到西方對俄羅斯不實資訊的管制。美國國務院在 2022 年 4 月成立「不實資訊治理局」（Disinformation Governance Board），使得建制刊物很快有了

憂慮，擔心行政權力成為黑手，箝制表意空間（Saul, 2022, May 5; Golinkin, 2022, May 12; Allsop, 2022, May 20）。另類媒體則已經有了實質的困擾或傷害，比如，無法收到捐款、遭人抹黑、被演算法過濾與刪除特定內容...等等（Laurin, 2022, June 9）。此外，十餘位國防與情治機構離退人員聯名稱讚臉書、谷歌、推特，指它們具有強大中央化資訊流通的檢查能力，對美國國家安全至關重要（Greenwald, 2022, April 21）。在英國，竟有醜聞爆出，知名記者馬森（Paul Mason）與外交部聯手對付他們認定的不實資訊，手法包括評估可否繞過英國誹謗法，有效抹黑特定對象，如「解密英國」(Declassified UK) 網站（Klarenberg, 2022, June 13）。

貳、不實資訊：布查鎮民遇害事件的爭論

在這些真實與虛假資訊與新聞的爭論中，引發更大爭論的第一起事件，是布查（Bucha）鎮民遇害及其消息的真偽虛實。

烏克蘭與俄羅斯在土耳其和平協商後的第二天，也就是烏克蘭當地時間 2022 年 3 月 30 日，俄軍撤離基輔北方數十公里，人口 3 萬餘的布查鎮。五天後台灣外電開始報導，指該鎮「屍體橫陳，二百八十名...烏克蘭國防部...表示俄軍在當地處決平民...俄國國防部則稱這是假訊息...」（陳韻涵、李京倫，2022 年 4 月 4 日）次日死亡數字增加至四百以上，過了 40 多天，BBC（2022, May 16）的報導以說遇害者達一千人。

烏克蘭控訴這是「種族滅絕」，俄羅斯則「反咬抹黑 要求聯合國安理會討論」（潘勛、李京倫，2022 年 4 月 5 日）。六日外電報導則稱〈俄稱屠殺造假 美媒衛星圖作證〉，指「紐約時報檢視衛星空照圖，發現 3 月上旬俄軍占領期間布查街頭就已出現這些平民遺體，推翻俄國的造假說法。」同日，另一家報紙以更顯著的圖文指「布查街頭屍橫遍野」、「...美國馬薩爾科技公司 3 月 19 日和 21 日布查空拍照片清楚顯示顯示...已有多具屍體...紐約時報...3 月 9 日至 11 日的衛星照片...已出現與人類屍體類的..的黑色物體，戳破俄...反控烏方『假造』...的說詞。」（自由時報，2022 年 4 月 6 日）

不過，愛爾蘭都柏林大學衝突研究的副博士、比利時 HOWEST 大學研究員麥坎（McCann, 2022, April 4）發現，4 月 2 日《紐約時報》已從布查鎮發佈長篇新聞，僅說首批進入的烏克蘭兵士是亞速營的人，是看到了死屍，但未提大屠殺。但就在「烏克蘭全國及國際傳媒注意到有大屠殺消息的前幾小時」，美國與歐盟贊助的研究單位網站宣布，「特種兵已經開始在布查鎮展開清除行動」，然後，頃刻間屠殺的圖片開始傳遍全球；並且，維基百科的「布查鎮屠殺」（Bucha Massacre）條目在一天內就完成撰寫！前《華爾街日報》與《波士頓環球報》及《週日泰晤士報》調查記者，也曾經擔任《紐約時報》特約撰述 19 年的勞力亞（Lauria, 2022, April 4），在他主編的《聯盟新聞》（創辦於 1995 年）提出另一種疑問，表示紐時所報導的衛星照片得通過「無偏私的調查，才能確認可否作為證據」。

德國之音指「對假新聞作戰」（War On Fakes）是俄羅斯散播不實資訊的網站，（DW, n.d.）但該網站逐日從 3 月 30 日起記載布查鎮的大事，符合麥坎的發現：（一）鎮長 31 日講話時還很快樂，若有慘事，應該不會有此反應。首批進入布查鎮的烏克蘭國民兵播放戰鬥人員拍攝的影片，顯示軍隊平靜穿過大街小巷，沒有「堆積如山的屍體」。烏克蘭警方在 4 月 2 日發佈布查鎮報告，沒有隔日開始出現的屍體之消息與照片。《紐約時報》指極右派亞速營民兵在 4 月 1 日與 2 日已經進入布查鎮，而西方傳媒開始大肆報導慘殺事情起於 4 月 3 日；在此之前，任何類似的指控，並不存在。（二）在俄羅斯異端創辦、保密優於臉書與推特等平台的「電報頻道」（The Telegram Channel），俄羅斯專門聚合全球地緣政治衝突新聞的 Intel Slava Z 從俄軍入侵開始，就詳細跟隨俄軍記錄，顯示俄羅斯到的城市，很多居民都帶著白繃帶以示沒有參與戰鬥，而烏克蘭公布的屍首大多都帶著這些白色繃帶（Orinoco Tribune, 2022, April 5）。

對於很多死者手臂有白繃帶一事，李特（Scott Ritter）這位前美國海軍陸戰隊情報官員、曾在聯合國負責執行軍備控制任務及武器檢查，並以美國入侵前就再三告誡伊拉克並無大量毀滅武器而有名聲的人，另有補充（Flowers & Lombardo, 2022, April 8）。他指出，在作戰時，平民與戰鬥員死傷經常是 1：1，但在烏克蘭是 1：7，平民遇害比較少。原因是俄羅斯人進

入市區後，與平民維持物資交換關係，並無或少有敵對。俄軍離開後，反而慘事發生。這是因為，烏克蘭政府先前有令，與敵人合作就得處罰。是有影片反覆播放，顯示烏克蘭警方說，4 月 1 日將有「清除行動，消滅合作者」，並且有資深政治人物在社交媒體發佈影片，警示居民不要外出，因清除工作即將執行。更可議的是，執行殺害合作者的亞速營，為此還取了個名字「狩獵單位」(Safari unit)！衛星照片說 3 月 19 日就有屍體橫陳，但李特提醒，在華氏 50-60 度（按：約攝氏 10-20 度 C）十多天，屍首會是腐敗血腫的可怕模樣；不過，墨西哥記者在 4 月 2 日獲准入內，他拍攝的影像，屍身顯得遇害未久 (fresh)。李特認為，遇害者是在 4 月 1 日（含）以後被殺的。美國共和黨籍參軍 31 年的上校、後出任參議員的布雷克 (Black, 2022, April 27) 也以豐富的軍旅及戰場經驗提出質疑，認為俄軍未曾猛烈攻擊，是要爭取民心，並沒有動機作此犯行。

李特提出前述分析之後，他的 4 千推特跟戶很快增加到 1.4 萬。推特將他停權兩次。第一次停權時，跟戶已有 6 萬，第二次被停權之前，將近 10 萬。他認為這是演算法偵測其言詞，自動予以停權。他說，對於烏克蘭，他的熟悉程度不如他對伊拉克的瞭解，但基於多年的訓練及資料研判，他仍自信這些研判更接近真實。

BBC 收音機第四頻道 (Radio 4) 在 5 月 31 日製播 36 分鐘的〈烏克蘭：不實資訊的戰爭〉，兩日後上網供下載 (BBC, 2022, June 2)。這個節目的前十餘分鐘以布查鎮殺戮作為例子，批評史羅斯伯格博士，認為「有些學者、記者與名人...質疑西方政府對戰爭的敘述，卻助長了俄羅斯的不實宣傳。」BBC 沒有在節目中討論李特等人提出的質疑。史羅斯伯格是英國「傳媒改革聯盟」(Media Reform Coalition) 前任理事長，同時是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 (Birkbeck College) 新聞傳播副教授，主持「捍衛真相研究室」(Truth Defence)，他次日隨即推文批評 BBC 抹黑 (Schlosberg, 2022, June 1)。美國政論雜誌旗艦《國家》(the Nation) 的發行人霍伊費爾 (Heuvel, 2022, May 24) 在華郵撰文，呼籲「不要抹黑...要就烏克蘭戰爭，來一場辯論。」她引述主流媒體尊崇的李普曼 (W. Lippmann) 之警語：「思考若相同，就是沒人要思考。」

烏克蘭民主社會主義組織的成員，也是政治及史學家、反對北約東擴的皮拉什（Denis Pilash）受訪時，表示北約僅是俄羅斯入侵的藉口，布查鎮...等地的殘殺平民，顯示這是〈帝國主義的戰爭，如同美國入侵伊拉克〉（Goodman & Nermeen, 2022, April 21）。聯合國秘書長與印度先後呼籲聯合國組織團隊入內調查，但安理會迄未決議。紐約的「人權觀察團體」（Human Rights Watch）4月4日派員前往布查鎮從5至10日訪談35位居民，21日發佈新聞，指「發現大量證據」，顯示3月4日至31日佔領該鎮的俄軍「犯下明顯的戰爭罪行」（HRW, 2022, April 21）。HRW在中東與拉美的調查數度引來偏頗的批評，但HRW在本案是否不公，無法確認，唯該報告，以及至2022年6月7日的維基百科條目「布查鎮屠殺」，也都沒有徵引、討論或否定前述質疑。

真相仍然不明，惟很重要，即便未來的調查證實俄羅斯軍隊沒有在布查鎮殺戮，是另有兇手，但俄羅斯入侵在先，才有後來的布查鎮民在內的許多人喪生，是不爭的事實。動手殺人是兇手，造成有人動手殺人也是犯罪；以北約東擴造成生存威脅而入侵是罪行，但長年以來，假使有人、有政府、有跨國組織讓烏克蘭誤認，或者自行挑釁乃至設圈套讓俄羅斯入侵，就不是犯罪嗎？

參、極右派在烏克蘭

愛國人士、民族主義者可以有兩種內涵。一種內縮排外，強調血液、民族（nation）、文化的純粹乃至優越與經濟利益的優先，於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一種外張廣納，因為愛己所以及人，希望達到愛人者人恆愛之的境界，發展為博愛之心與休戚與共的能力。

世人僅有一種內涵者，應該很少，多數兼具二者，只是比例不一。前者若過度張揚，今人往往稱之為極右派，成分若再更多一些，就向納粹或法西斯

斯靠攏，於是在西方產生「白人優越與至上論」的現象，這個質素加上其他原因，近年來數度衍生殺害有色人種乃至同樣是白人的災難¹，識者憂心。

在烏克蘭，今日的極右派可以從 1941 年說起。當時，納粹德國入侵蘇聯，1929 年成立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Organizat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ists, OUN) 大約有八萬人(來自西部為主)與納粹合作，殺害 15 至 20 萬住在烏克蘭的猶太人。當時 OUN 最常呼喊的口號，包括「希特勒萬歲... 殺死猶太人與共產黨人！」(Simpson, 1988, p.164)

但二戰之後，他們未受審判，因為得到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庇護。本世紀初陸續解密的文件顯示，CIA 的前身最慢從 1946 年起就聯繫 OUN，1948 年有文件記載班傑拉(Stefan Bandera)，1949 年底，CIA 多次派機低空飛抵中亞與烏克蘭，會合 OUN 遊擊隊，持續與蘇聯戰鬥至 1950 年代初。OUN 的若干要員在 CIA 協助下，安抵美國無恙度過一生(Michel, 2022, May 11)。CIA 也另設文職機構，提供大量出版與財務資源，支持民族主義派與反政府者從內對付烏克蘭共產黨，直至蘇聯解體前夕(Kuzio, 2012)。蘇聯總書記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 1954 年在沒有立法情況下，以總統令將幾百年來都是俄羅斯共和國的克里米亞(Crimea)省，送交烏克蘭共和國，《真理報》僅以 81 個英文字報導。有人說，這是「禮物」，紀念烏克蘭與俄羅斯合併三百年；並且，大飢荒(1931-34)年代蘇聯的各個加盟共和國，合計致死 500 多萬人，其中 390 萬是烏克蘭人。克里米亞歸屬的重新釐定，是出於這些歷史考慮，或者僅只是新政權通過領土重劃，宣告蘇聯要分權而減少中央集權，同時標誌對史達林的修正？無法確認(Calamur, 2014, February 27; Applebaum, 2022, May 8)。

在 OUN 各派別中，班傑拉不是最知名、影響力也並非最強大，但在 1959 年遭蘇聯派人暗殺於德國後，他成為烏克蘭納粹的象徵。尤先科(Viktor

¹ 根據 Maryland 大學的 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 之統計，在美國，恐怖攻擊在 2000 年約 40 餘次，原因起於白人至上論的比例是 14%，該百分比至 2019 年(70 餘次恐攻)，已經上升至 50%。美國之外，白人至上論或極端右翼民族主義殺人的最大事件，是 2011 年 Anders Behring Breivik 在挪威殺 77 人，遇害者多是挪威工黨夏季青年營人員，2019 年 Brenton Tarrant 在紐西蘭基督城清真寺射殺 51 位穆斯林(Economist, 2022, May 21a; AP, 2021, July 19)。

Yushchenko) 總統的妻子是白宮前官員，2010 年元月，他即將卸任，卻迅速以總統令，授予班傑拉國家英雄的尊稱。此舉在國內引發爭議，海外也有歐洲議會、多個俄羅斯及波蘭與猶太政治人與組織，群起譴責；同年四月，尤先科卸任後兩個月，法院取消該頭銜，次年正式吊銷。烏克蘭國會在 2019 年 8 月仍然否決給予班傑拉這個頭銜的提案 (Wikipedia n.d.1)。至今，有人說班傑拉是解放者，貢獻烏克蘭的獨立建國；另有烏克蘭人譴責他是法西斯份子戰犯，要為屠殺波蘭平民而特別是烏克蘭的猶太人屠殺負責。

蘇聯在 1980 年代末倡導「改革與開放」，烏克蘭在 1991 年底獨立，極右派人群同樣集結，成立多個政黨。至今，僅有獨立前幾個月創辦並在 1995 年改名「自由黨」(Svoboda)，在 2004 年起由醫生加尼伯克 (Oleh Tyahnybok) 擔任黨魁以後，才在 2009 年於西部人口 20 餘萬的捷爾諾波爾 (Ternopil) 市贏得 120 民代席次的 50 席 (Shekhovstsov, 2011)。自由黨在 2010 年成為「加利西亞」(Galicia) 區域的主要政黨，(Katchanovski et.al., 2013, p.189)。2012 年取得一席國會議員席次 (Stern, 2012, December 26)，其後已無斬獲。所有新法西斯政黨的全國選票加總，從未超過 5%，有些人因此以為極右群體的作用不大，但廣場事件爆發，可能因為這群人的作用，烏克蘭出現了獨立之後，最大的政局變化。

肆、是廣場革命，還是政變？

這是指 2013 年 11 月的和平抗議活動，後來出現暴力並有槍手狙擊，造成百人遇害、總統下台，克里米亞公投獨立並加入、形同是遭俄羅斯合併的事件。當時，對於這次事件的稱呼已經不同，大英百科全書的條目使用中性的詞句「廣場抗議運動」(Editors of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n.d.)；稱之為廣場 (Maidan) 或「尊嚴」(Wikipedia, n.d.2)「革命」的人，凸顯出發點是正當的抗議的同時，淡化或無意探討，抗議後期是否可能已經是美國所支持的「政變」(Mearsheimer, 2014)；以政變相稱的人著眼於後期及結果，忽視

前期的自發性質，致使與暴力無關的大多數抗議者，可能為此而難以接受變政的論述。

不同的用詞，可能也標誌了兩類人群的文化與階級差異。著有《烏克蘭的民主、民粹與新自由主義》的貝沙（Baysha, 2022）教授出身烏克蘭，1990年代初任烏東電視台記者，她與朋友都是西化派、以文明代理人自居，勞工階級反對他們贊成的改革，他們無感與瞧不起，兼而有之。多年以後，貝沙已至基輔電視台負責歷史記錄片監制，思維開始變化，本世紀初她前往美國攻讀碩、博士學位，後以媒體批判的視野，回顧祖國獨立後的歷史。似乎，親西方但同時要與俄羅斯切割的一邊，會有較高比例使用「革命」；反之，其對立面未必就是勞工階級，但顯然很高比例會用「政變」。

事件起源於 2013 年 11 月 21 日，有一記者在臉書發文，指總統亞努科維奇（V. Yanukovich）拒絕與歐盟簽約，不讓烏克蘭與歐盟創制自由經濟貿易區。當日午夜，「超過一千位有高教背景的都會青年來到廣場」抗議，他們認定加入歐盟是烏克蘭脫離腐敗、走向經濟現代化，改善生活水平的必經道路。這是如同節慶一般的歡樂集結，11 月 30 日，政府以耶誕節將到，要在廣場布置大型聖誕樹為由，下令警察清場。這個決定與行動，激起更多人前來聲援，達到 35 萬！歐美於是施壓基輔政府，總統轉向，從俄羅斯取得 150 億美元貸款。到了次（2014）年元月底衝突升高，2 月 18 日是第一個高峰，12 位抗議者與警察遭槍枝射殺，到了 20 日，「政府下令狙擊手射殺抗議人群，致死人數很快就超過一百人。」歐盟見狀制裁，凍結中央政府有關官員的資產與旅行簽證，各地寡頭企業眼見放在西方銀行的資金無法動用，也就讓受其支配的國通過決議對抗行政權，這是政權垮台的開始。2 月 21 日歐盟代表由波蘭外交部長領軍，與朝野協商，條件之一是總統大選提前在年底舉行，亞努科維奇知道大選必輸，當晚連夜逃離基輔，據說捲款幾百萬美元；次（22）日國會投票予以罷免，俄羅斯讓他入境。這是當時新聞界的主要報導內涵，（Boyd-Barrett, 2016; Liu, 2019）也是維基條目的敘述（Wikipedia, n.d.2）。

這些敘述得到很多專家的背書或轉述。比如，哈佛大學史學家、烏克蘭研究所所長浦洛基（Ploky, 2021, p.191-3），以及在學術界有一定聲望的牛津

大學出版社之系列「人人都應知道」當中，有關烏克蘭一書的說法（Êkel'čik 2020, p.119-20）。另外，2015 年完成，並由「網飛」購入放映的紀錄片【凜冬烈火：烏克蘭為自由而戰】，其維基百科的條目顯示，眾多專業評論及業餘反應是佳評如潮；在 2017 年委內瑞拉反政府的行動，以及 2019 年香港反送中集會，該片得到多次播映機會（Wikipedia, n.d.3）。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網飛無償釋出在 YouTube 播出（Netflix, 2022, March 5），「一天點閱率近 20 萬」（TVBS, 2022, March 6）。該片結構單純、容易看容易懂，提供的資訊、知識或觀點不多，最鮮明的印象可能是影片開始與結束，陽光年輕男性無畏衝突與殺戮，表示會持續抗爭，傳達政府殘暴不仁，而示威群眾信念不動如山：「我們不入歐就不自由，我們是歐洲國家」。

對照之下，次年由史東（Stone, 2016）製播的【戰火中的烏克蘭】比較複雜。該片交代近千年而特別是二戰前後的烏克蘭歷史，它也鋪陳與討論重要議題，如烏克蘭 2004 年的總統大選爭論、誰擁有烏克蘭電視新聞頻道、亞努科維奇最後沒有與歐盟簽約是否因為俄羅斯干預、和平示威轉為百人遇害的兇手是誰、2015 年奧德薩工會大樓（見後文）事件是否預謀、喬治亞前總統何以出任奧德薩州長，以及誰擊落大馬客機...等等。另外，該片應該是刻意要批評主流敘述，因此該片最後以字幕強調，「知識是力量。有能力能夠適時識別（警訊），可能可以救別的國家或你自己...因為今日的戰爭不僅是有坦克和炸彈，還伴隨...媒體...。」²【戰】片在 2021 年 8 月放入 YouTube，（Stone, 2021, August 20），2022 年 3 月遭下線十天後放回，至 2022 年 6 月 4 日累計 87.3231 萬次點擊、3 萬以上按讚與 7643 則留言。至相同一日，放入 YouTube 僅三個月的【凜】片有 101.6655 萬次點擊、3.1 萬以上按讚與 5180 則留言（Netflix, 2022, March 5）。

【戰】片提出，【凜】片等等主流敘述不追蹤的重要問題是：亞努科維奇真是因為俄羅斯介入而轉向嗎？歐盟的自由貿易條款真對烏克蘭有利嗎？亞努科維奇即便知道 2015 年底大選必敗，有什麼理由必須倉皇落跑，是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外逃才能捲款嗎？

² 影片的 92 分 45 秒至 93 分 03 秒。

【戰】片的調查與訪察所提出的答案，同樣得到眾多專家支持。比如，普林斯頓政治學教授、專治俄羅斯柯亨（Cohen, 2019 part I）指出，歐盟的方案在經濟上根本不可行。一是提供的財政協助太少；二是要求烏克蘭政府採行苛刻的財政緊縮措施，包括出售國有資產；三則這些作法必然大舉削弱烏克蘭與俄羅斯的長期且重要的經濟關係。經濟之外，歐盟方案另有政軍盤算，要求烏克蘭遵守歐洲的「軍事及安全」政策，這是不提北約，但其實是鋪路，要讓北約軍武進入烏克蘭。這些條款迫使已有深刻分裂的烏克蘭，只能二選一，有俄羅斯，無西方，反之亦然。與此同時，俄羅斯另提對案，建議俄羅斯、歐盟及美國合作協助烏克蘭，不使其財政崩潰，這是加法，不是減法，歐美卻又拒絕。至于總統棄國，有無捲款無法得知，但若捲款，連夜逃離並不合常理。一是沒有類似 2021 年阿富汗總統專機載送鉅款逃離的可信報導（羅方好編譯，2021 年 8 月 19 日）。二是在史東紀錄片的訪問中，亞努科維奇聲稱他有人身安全的威脅，不火速離境則命危；這個說法是否可信是可質疑，但主流敘述不予討論，無助澄清真相。三則類似事件在所多有，最近的例子是 2019 年，玻利維亞總統莫拉雷士（Evo Morales）被錯誤指控選舉舞弊，遭到威脅的同一天已經搭機飛抵墨西哥得到庇護（Farthing & Becker, 2021, p.48-9）。

更重要的關鍵，和平示威在 11 月 30 日出現大規模鎮壓後，是不是給予有心人有機可乘？致使有後來的重大流血案件發生，特別是 2 月 20 日的致死人數更多，累計上升至百人。誰是狙擊手？

相當重要的一則新聞與一篇學術調查，早就可能已經提供了解答，或者，至少是通向答案的線索。

先說一則新聞。

美國的烏克蘭大使皮亞特（Geoffrey Pyatt）與美國歐盟助理國務卿盧嵐（Victoria Nuland）的四分多鐘談話，顯示兩人形同是在安排廣場事件之後，烏克蘭的內閣組成、權力的部署。這段錄音配上圖片，在 2014 年 2 月 4 日出現於 YouTube，三天後，BBC 記者馬庫斯（Marcus, 2014, February 7）將其轉為文字加上自己的評論，以獨家新聞的方式，全文在 BBC 網站刊登兩人的對談。

美國從未否認外洩影音的真實性，甚至還因為盧嵐講出了“Fuck the E.U.”這樣的粗話，使得國務院發表聲明向歐盟致歉。當時的主流媒體幾乎完全在報導諸如此類的下流話語，卻對談話所透露，美國已在干預或想要安排烏克蘭總統以外的內閣之人事，略而不談或少談。除了確認副總統拜登會在適當時刻現身，鼓舞廣場派，兩人提及的三位烏克蘭重要政治人物，後來完全如同對話指出的方向，「各就其位」：亞采紐克（A. P. Yatsenyuk）擔任總理（兩年多），盧嵐指不適合選總統的前世界重量級拳王克里契科（W. Klitschko）棄選總統、轉選基輔市長並當選，兩人表示不適合入閣的自由黨魁加尼伯克，確實是沒有官位。但是，美國《外交政策》在 3 月 18 日發布以色列人的分析，指出美國重量級參議員麥肯（John McCain）於四個月前至廣場對抗議人群講演，高呼「自由世界與你們同在，美國與你們同在」時，站在他身旁的就是加尼伯克；並且，新政府有四分之一閣員（包括國防部長、副首相、檢察總長與國會副議長）來自「自由黨」，而加尼伯克是其黨魁。這是新的情勢，美國國務院卻避重就輕，表示極右派在烏克蘭國會沒有代表；俄羅斯電視頻道（RT）指烏克蘭有新納粹成分，該台主播華爾（Liz Wahl）覺得噁心而當眾辭職，西方媒體不是說 RT 所言屬實，是表揚華爾很勇敢。（Foxall and Kessler 2014/3/18）廣場事件後的新內閣，也是烏克蘭首次有外國（美國）公民亞列西科（N. Jaresko）出任閣員（財政部長）、立陶宛人阿布羅馬維丘斯（A. Abromavičius）執掌經貿部長，喬治亞人科維塔什維利（A. Kvitashvili）擔任健保部長。這些外國人出掌本國政務，並非來自烏克蘭的邀請，是「國際貨幣基金會」與「世界銀行」等組織的「推薦」（Baldwin, 2022, April 28）。北約秘書長托騰伯格開戰後三個月在「世界經濟論壇」演講，頗見得色，他說：「2014 以來，北約...特別是美國加拿大與英國...一直都在提供裝備並訓練烏克蘭軍隊，人數以萬計...」（Stoltenberg, 2022, May 24）歐美傳媒「驚訝」俄羅斯軍力不如預期強大，其實《華爾街日報》提供了答案：〈烏克蘭軍事成功的秘密：北約多年的訓練〉，各種軍事教程與科目已經讓數以萬計的士兵，加上軍事將領與國會監督軍力的隊伍脫胎換骨，從蘇聯時期的呆板風格，搖身成為現代化的靈活軍隊（Michaels, 2022, April 13）。

BBC 揭露的錄音顯示，在 2 月 18 日抗議者與警察共 12 人遇害的前兩週，或甚至更早之前（因皮亞特與盧嵐兩人的談話時間，無法確認，但必然早於 2 月 4 日），美國高官已經開始討論變天後的烏克蘭政局。外界無從知道的是，美國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積極介入，是起於 11 月 30 日警方清場引起民眾強大反彈，或是更早？或者，更晚一些，在 2014 年 1 月 19 日大量街頭暴力在基輔市中心出現以後？無論早晚，兩位高階外交官的談話足以證明美國介入烏克蘭政局，惟這是在推動政變嗎？是或不是，要看怎麼界定政變。但很清楚的是，假使不是主動，美國至少是趁虛而入且見獵心喜，積極要讓自己屬意的人選掌控新的政權。BBC 記者馬庫斯評論兩人的談話，這樣說：「美國各層官員都在企圖召集與組織烏克蘭反對派...副總統拜登顯然已經摩拳擦掌，即將上場，在合適時候給予...鼓勵。」（Marcus 2014, February 7）新聞界因為工作常規（或說陋習）以及其他原因，不肯或無法追蹤事件的新事證，致使是否政變沒有成為追蹤報導與討論的題材，民眾也就形同遭致蒙蔽；美國政府不尊重他國，並且可能參與或主導政變，卻已搖身變成見義勇為、伸張民主之人。黑白在此顛倒。

再看兩篇學術調查與報告，焦點分別是「廣場事件的槍殺」，以及「2015 至 2016 年的調查與審判」。

廣場事件後，不但大多數新聞，大多數學術著作也集中抨擊政府的暴力行動。雖說也有多數人表示抗議者也有暴力，但規模很小，最重要的是，執政團隊下台，來自非暴力示威所賜。

學術論文指政府倒台，也有可能出自極右派的暴力行動的第一篇，是分析這個可能性，不是堅定提出這個觀點（Popova, 2014, p.69）。作者說，烏克蘭司法受制或聽命於行政權的問題由來已久，廣場事件前三年多，更加嚴重，這就使得抗議人群失去最後一個制度管道推進訴求，極右派暴力行動者因此有機可乘。同時，該文認為極右派「也許不是暴力升高的引動者（trigger），他們可能也是因為警方...的慘忍、法外手段的殺人與綁架與毆打，以及 1 月 16 日國會通過鎮壓性質更濃的法律，於是挺身而出。」

真正確認極右派是兇嫌的首論文，出自烏克蘭移民、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後於加拿大渥太華大學政治與傳播系任教的察諾維斯基教授在次（2015）

年 9 月完成，且隨即上傳學術網站的〈狙擊手在烏克蘭廣場的屠殺〉(Katchanovski, 2015)。

這是迄今最詳盡的舉證與論述，該文第一版發表後，亞速營戰士前往其烏克蘭住家搜索與威脅，後來「有很多組織的獨立調查及眾多影音證據都支持察諾維斯基的發現，包括德國《法蘭克福匯報》、英國 BBC...等等 (Hahn, 2008, p.198)。此外，另有學者不只是引述，而是自行進行經驗研究，運用不同的資料庫與方法 (如 Ishchenko, 2016, p.4)，或者運用部分相同部分不同的素材，並採取「質化分析以求追蹤行動者決策的相互因果關係」(如 Kudelia, 2018, p.502)，他們也都得到與察諾維斯基相同的結論。

烏克蘭的新政權遲至 2015 年元月，這才啟動對涉案人員的調查與起訴工作，檢察總署在 2019 年將各種資料移轉調查局，由後者執行後續工作。到了 2021 年 11 月，完成所有調查與審判。

針對廣場殺戮及其後續審調，察諾維斯基總計發表論文 6 次，並隨進展而有材料擴充與論文更新，包括紙版形式 2 次而篇幅較短 (Katchanovski, 2016, 2020a)，紙版發表的篇幅，可能不及 4 次電子版合計篇幅的六分之一 (Katchanovski, 2015, 2017, 2020b, 2021)。若是計算「社會科學研究網」(SSRN) 4 篇電子版 (實則是兩篇，另兩篇的主題與論點是隨時間而有材料增加後，前兩篇論文的新版本)，至 2022 年 6 月 11 日它們的合計下載數是 6956 次；最晚完成的論文是 2021 年底，上傳是 2022 年 3 月。2021 年 8 月 8 日，作者上傳的前述論文，另有兩個影音附錄。A 是「狙擊手在烏克蘭廣場的屠殺」，約 80 分鐘；B 是「百名證人有關烏克蘭廣場狙擊手的現身說法」，約 57 分鐘。兩部附錄影音至 2022 年 6 月 2 日，分別有 1540 與 1362 人次點擊。通過影像，文字描述的不具體，得到補足，現場的真實狀態配合旁白與字幕，清晰讓人看到廣場示威群眾控制的 20 餘個空間，正是 2 月 20 日 49 位抗議者與警察遇害之所 (ibid.)。

兩次主題運用的資料，數量相當龐大，都是從已經公開的資料來源蒐集與整理。兩個主題各有前後的兩個版本，它們的資料來源及結論，先後編譯如後。

第一個主題是「廣場狙擊」的質化分析，取材包括 150G 的眾多影音實況錄影，來自事發期間不同國家約一百多位新聞人員，以及更多社交媒體用戶上傳的現場影音圖文，包括 5000 張照片，以及，攔截各個狙擊手、軍警維安情治人員的無線通話錄音將近 30G。再者，作者親往殺戮現場實際蒐集，取得了抗議群眾與政府人員的雙方說法，加上兩造證人與目擊者提交的報告。對於當時及後續政府官員的多種說法，另以時序定位與剖析，得知不同殺戮事件與雙方狙擊手的藏身地點，至少有 20 餘處，槍擊時刻則有多個。通過這些程序，作者確認了將近 50 位遇害者的中槍時刻。最後，察諾維斯基援用「理性選擇論」及韋伯的「工具理性」概念，檢視被推翻之政府（亞努科維奇總統）及其高階官員、警察與維安情治人員，以及廣場抗議群眾（特別是 2013 年 11 月成立的「右區」（Right Sector）、成立較早的「自由黨」（Svoboda），加上寡頭支持的政黨如「祖國」（All-Ukrainian Union Fatherland），何者更可能及實際上執行「這個嫁禍事件」（a false flag operation）。作者回顧美國、蘇聯與俄羅斯在多種地緣政治衝突事件中（包括 2013 年敘利亞動用化武疑雲，以及 2014 年大馬民航機遭擊落...等等），以及廣場事件的百位西方記者之報導以後，信心十足，認定是廣場的暴力極右派之理性計畫下，槍殺自己的群眾以嫁禍，達成推翻政府並奪取政權的目標。（Katchanovski, 2015, 2018）

第二個主題是針對罪刑「調查與審判」的分析，材料有三個來源：（一）烏克蘭法庭裁定資料庫的 2500 多次記錄，共有幾百小時的影音；（二）檢視抗議受傷者與遇害者的親友、檢察官與被告證人，還有前政府高階官員的證詞；（三）法醫的槍傷及醫學檢察及實驗的分析結果，包括審判期間對外公開的廣場屠殺照片與影音。這六年來的材料表明，2014 年 2 月 20 日的 4 位遇害及數十位受傷員警，以及至少 49 位遇害及 157 位受傷的抗議者，全部發生在廣場群眾控制的各大建築與地區。這些證據來自受傷抗議者、數十位控方證人，並有廣場派狙擊手當中 14 位出面坦承。審判期間提出的影音顯示，絕大多數抗議者遭射擊的時間，與金雕員警的射擊時間並不相同，法醫的醫學檢視也確認絕大多數抗議者被擊中的部位，來自其後方或其兩側。檢視遇害或受傷抗議者的彈道，發現它們與金雕員警擊發所傷害或殺害的抗議

者之彈道，並不相同。法醫檢視又發現，金雕員警是在「烏克蘭飯店」(Hotel Ukraine) 內部向廣場抗議人群上方或(躲在其附近的)樹木與柱子的狙擊手射擊。然而，這場審判有歷史上最多影音圖文紀錄、眾多抗議者與警員隕命，但七年多結案時，沒有任何被告被逮捕或定罪。作者的結論是，檢方拒絕承認有任何狙擊手藏匿在廣場派控制的大樓內部，因此，這些調查與審判，目地僅是掩飾，未能揭露極右派群體預謀殺人的責任，新政府想方設法，就是要讓對自己不利、要將使自己難堪的消息與真相，不為外界知悉。西方政府與民間組織對廣場事件的調查與審判興趣不大，僅有歐洲協會(Council of Europe) 在 2015 年發表報告，指基輔政府調查結果與官方公開聲明存在矛盾，以及聯合國在 2019 年表示，基輔尚未制裁任何犯下殺人與暴力致死的人(Katchanovski, 2021)。

廣場事件發生的當下，如果事未易察，則事後真相已經大白，但事發期間主流傳媒的報導與評論的效果持續存在，仍然以其設定的框架及意識領導，阻止真相外傳。

諷刺或說值得肯定的是，已有博士論文發現，俄羅斯傳媒在廣場事件發生時，報導相對開放，西方新聞反而封閉。劉自修博士(Liu, 2019, p.xii, 124, 136-7, 146-7, 165) 的研究顯示，作為俄羅斯主要英文日報的《莫斯科時報》(Moscow Times)，確實同時受制於國家與商業壓力，但「從車臣戰爭至傳媒檢察，都對政府立場採取批判視野」。就廣場事件來說，該報說政府鎮壓是烏克蘭危機升高的主要原因；該報有 21% 內容指政府不與歐洲簽約引爆了抗議；該報也說烏克蘭持續混亂，是烏東說俄語的人口反對廣場示威並要分離獨立所造成。這些內容與西方傳媒並無不同。但英國傳媒如《泰晤士報》與《衛報》... 等等更為一面倒，沒有出現常見於俄羅斯的反廣場派之觀點，並且，它們傳達反俄羅斯的意向，已至誇張的水平。劉自修認為，對比英俄傳媒對廣場事件的報導與評論，再次證實赫曼與杭士基知名的「宣傳模式」，仍然適用(Herman & Chomsky, 1988/沈聿德譯，2021)。

自由體制的新聞媒體以專業看門口自詡，監督權勢的運作，可褒可扁，只要屬實。但在廣場事件時，這些媒體並無監督職能，其報導視野與評論觀點，口徑吻合西方政經與傳媒菁英的說法，既然如此，想要在副總統拜登

(Biden, 2017) 的回憶論，或者美國烏克蘭大使館當時高階官員對事件的建構 (Smith, 2022)，坦承白宮的角色，也就無異緣木求魚，兩本書當然也就完全不提 BBC 的獨家揭露，更不可能意識到察諾維斯基論文的存在。至於「維基解密」的狙擊手條目，絕口不提察諾維斯基的研究 (Wikipedia n.d.2)，也許反映了真相外傳的規模仍然還沒有大到足以反映在維基百科；或者，如同柯爾斯 (Coles, 2021, p.35) 所說，「維基並不開放，群眾智慧無法予以平衡。維基是美國國家-軍事-財團的宣傳工具」？

伍、奧德薩慘案：平衡報導，但受害者似乎承受較多譴責

歐美主要傳媒對廣場事件的呈現，以反俄為主軸、也就明顯偏頗。數個月之後，2014 年 5 月 2 日發生在「黑海明珠」奧德薩 (Odessa) 的另一慘案，雖有平衡，但受害者似乎仍遭譴責 (blame the victim)。奧德薩是百萬人口的美麗港都，也是烏克蘭第三大城市，法國導演高達 (Jean-Luc Godard) 的《電影社會主義》(Film socialisme)，有豪華郵輪航行地中海，月也來到奧德薩。

慘案發生一個多月之後，「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辦事處」發布調查報告，顯示事件的大致過程如後。(OHCHR, 2014, p.9-10)

事發當天下午兩點，約有 300 位「反廣場派」³的人集結，走向 450 公尺外、有 2000 人的「挺廣場派」集結之主教座堂廣場 (Sobornaya square)，包

³ 依據維基百科的烏克蘭條目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kraine>)，烏克蘭這個「國家」(country, state) 在 2001 年有 4116.7 萬人，烏克蘭族 (nation) 佔 77.8%，俄羅斯族 17.3%，兩族語言及宗教近似，俄裔多在東區。坊間多以挺廣場 (pro-Maidan)、挺烏克蘭 (pro-Ukraine) 等詞彙稱呼支持在 2004 年廣場事件以後執政、親歐的政府；另以反廣場 (anti-Maidan)、挺俄羅斯 (pro-Russian)、分離主義者 (separatist) 稱呼另一群體。這些用語以「挺廣場」及「反廣場」較為準確，因此下文在翻譯時，主要就以這兩個詞彙為主。挺烏克蘭或俄羅斯或分離主義者各自有缺點，「挺烏克蘭」一詞使其對立面變成不挺烏克蘭，亦即國籍是烏克蘭人者不支持自己的「國家」(country)，「挺俄羅斯」與「分離主義者」在此語境下變成如同克里米亞的情況，是要脫離烏克蘭這個「國家」(state, country)。但烏東頓涅茨克州 (Donetsk) 與盧干斯克州 (Luhansk) 因廣場事件，在 2014 年 4 至 5 月宣布並公投獨立，但沒有得到任何國家 (包括俄羅斯的) 承認，其後則在 2015 年明斯

括是日早晨甫從第二大城哈爾可夫（Kharkiv）抵達、大多是挺廣場派的 600 位足球迷。挺廣場派先前已經表明，5 月 2 日三點將從集結地開始遊行。兩派都有活躍份子帶著頭罩，攜帶斧頭與金屬或木質棍棒。由於兩派可能對峙的消息早前已經外傳，警方前一天表示，將加派警力 2000 人巡邏以防止生事，二日當天三點，是有 15 位警察、另有兩部巴士載著警察停在主教座堂廣場。

三點十五分，反廣場派走近挺廣場派，形同挑釁，兩派起了衝突，秩序很快失控，警員是有增加，但不足以阻止暴力；到了六點半，警方及雙方群眾共有六人隕命。在挺廣場派追打下，反廣場派 60 人躲入阿夫納（Afina）購物中心，稍後抵達的警方帶走 47 人，其他人奔向反廣場派集結、約有 200 人的花園廣場（the Kulikovo Pole square）帳棚區。這個時候，挺廣場派有政治人物呼籲支持者走向帳棚區，反廣場派閃躲，遁入附近的工會大樓。七點三十分，挺廣場派開始燒毀反廣場派的帳棚，並向工會大樓丟擲汽油彈，躲在裡面的反廣場派也從內向外丟擲汽油彈。人權委員會的烏克蘭分會在七點四三分以電話聯絡 650 公尺外的消防隊前來救火，消防隊四十分鐘後才到，但已經有 32 人困在工會大樓內被燒死，10 人從窗子跳樓摔死。另有 24 人輕重傷不等，包括 99 人住院（含 22 位警察）。

聯合國報告的調查時間相對從容，可能比較接近真相，顯示（一）衝突雙方的挺廣場派的人數，是反廣場派人數的六倍以上；（二）受害者主要是反廣場派；（三）雖然預告但警方並沒有加派 2000 警力阻止衝突發生，原因不明；（四）近在咫尺的消防隊何以救火遲到，同樣無從知悉。

事件發生當時，新聞媒體受制於編採時間及其他因素，聯合國未曾解釋的（三）與（四），媒體同樣無法回答。但值得注意的是，新聞並未披露（一）

克（Minsk）協議下，同意仍是烏克蘭一部分，但與中央政府的關係改為如同美國聯邦制的州，擁有較高的地方自治權能（含讓俄語成為官方語言之一）。後來因為基輔政府在極右派要脅下（見後文），無法或不願意執行明斯克協議，致使俄羅斯在今（2022）年 2 月 24 日入侵烏克蘭前三天，承認兩州的獨立地位。另見本期〈烏克蘭的軍事情境〉開頭，作者包亞克（Jacques Baud）的說明。

的，這就使得下列引述的四家傳媒在看似「平衡」報導與究責之餘，似乎會有「譴責受害者」的傾向（二）。

比如，「德國之聲」(DW, 2015, May 2) 的報導是：雙方「在街頭撕打致使 6 人遭射殺...5 月 2 日...又有 42 人死了」、「雙方都以最殘酷手段相向」、「火焰已於門廳前的木質障礙物著火，雙方相互丟擲汽油彈」、「何以警方沒有採取行動？」有人提出的解釋是「警方驚嚇，不敢承擔責任。」法國 (France 24, 2014, May 2) 的公營電視新聞頻道說：「挺政府與反政府的活躍分子發生衝突，在奧德薩引發火勢，警方說死了 31 人。」英國的《衛報》(Amos & Salem, 2014, May 2) 有更多報導，指「親俄羅斯的活躍分子帶著棍棒與氣槍，攻擊挺廣場派集結人群後，衝突爆發」、「工會大樓在一日街頭戰鬥後失火」、「挺廣場派的活躍分子攻擊工會大樓，內有反對基輔政府並主張烏克蘭要與俄羅斯有更密切關係的抗議人群，致使超過 30 人遇害」；此外，《衛報》使用路透社的一張照片，顯示「親俄羅斯的活躍分子在奧德薩街頭衝突時，舉起手槍對準支持基輔政府的人。」BBC (2014, May 3) 的報導，指確實的事件時間次序還不清楚，但「據報，返廣場派進入大樓並設置障礙，雙方互丟汽油彈」。三天後 BBC (2014, May 6) 再以較長篇幅，表示「目擊者說，反廣場派的活躍分子襲擊走向足球賽場地的人，然後發生暴力」，BBC 也使用與《衛報》相同的路透社照片，表示「有些反廣場派活躍分子在暴動過程，舉槍射擊」。BBC 說，「反廣場派活躍分子手持棍棒及其他武器，但警方袖手旁觀」；又說，挺廣場的遊行人群隨後也以石塊丟向反廣場派群眾。最後，「似乎毫無疑問，槍響以及死傷消息傳出後，挺廣場派的人更加氣憤」。「維基百科」的「2014 年奧德薩衝突」(Wikipedia n.d.4) 引述聯合國的調查報告兩次，但未引本文作者編譯的原 (英) 文內容，而是在該條目第一段引另 4 個來源，這樣陳述「暴力在 5 月 2 日升高，反廣場的暴民 (mob) 攻擊挺廣場的活躍分子 (activists)，後者反過來迫使反廣場活躍分子 (activists) 進入工會大樓，接著就是大樓著火，因雙方相互丟擲汽油彈...造成 48 人死亡，大多數是反廣場示威的人...」。

陸、主流智庫與媒體說極右派

英語出版品談論烏克蘭極右派（含民兵亞速營），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作為分斷，前後不同。先前，雖然不多，也有淡化，但亦見不少擔憂之聲。

比如，美國的「自由之家」曾在 2018 年發布報告，指出除了「自由黨」等 3 個比較大的政黨擁有若干中央與地方民代席次，另有至少 10 個以上不參選，但在公共領域經常現身的團體。該報告區分激進派與極右派，激進派僅用和平手段，極右派除了通過組織，以社交媒體進行侵略性宣傳，最大的差異是它推動「街頭政治」，採取非法的暴力行動，試圖以強制力量將自己的觀點強加於人。若是在公共領域出現他們認定有害民族或他們難以接受的訴求，如「左派、女性主義者、自由派與 LGBT 活躍者、捍衛人權者，以及種族與宗教的少數派」的身影與主張，他們就會予以壓制與「清除」。雖然明顯操弄這些反民主的手段，但庇蔭於民族主義的符號與修辭，也因為他們參與了廣場戰鬥「有功」，這些極右派團體與政府而特別是執法單位。已經發展出和睦關係。總之，「在 2014 年廣場革命之後...極右派再也不是邊緣團體」（Likhachev, 2018, p.5）。

廣場事件後，基輔的新政權除了壓制多個反對組織及政黨，極右派也取得不成比例的內閣位置如前所述，他們並且在軍警情治單位大有斬獲。新政府又頒發勳章給 OUN 老兵、尊崇班傑拉，更以二戰期間極右派軍隊建軍的 10 月 14 日，作為烏克蘭軍事紀念日（Dubovyk, 2022, March 14）。

另一方面，更大的問題來自烏東兩州因廣場事件而宣佈獨立之後，即便未獲任何國家承認，但已經引爆內戰，在烏克蘭政府接受北約訓練與提供資源的過程，極右派民兵同樣從中獲得軍火與金錢，並已經產生多個組織，最知名的是亞速營（Azov Battalion）。單是美國，從 2014 年 2 月起不到 20 個月，為了「對抗俄羅斯的侵略」，白宮已經提供烏克蘭 20 億美元貸款保證，以及將近 7.6 億美元的「安全、特定項目及技術協助」經費。2015 年底在國防部壓力下，美國眾議院在半年前刪除的禁令，重新恢復，先前已經擴充的民兵，規模坐大，當年亞速營從 400 人增加至 2000 人。這等於是美國「贊助新納

粹」，「看到亞速營民兵以納粹標誌出場的影像，德國人相當震驚。」這是二戰以後，首次有納粹標誌的軍事團體在歐洲從事作戰，對象是烏克蘭說俄語的歐洲人（Carden, 2016, Jan. 14; Parry, 2015, June 12）。美國及英國另與戰略傳播公司合作，協助「激進民族主義派」，發動資訊戰對抗烏東俄語人群（Boyd-Barrett, 2019, p.45）。

對於極右派的暴力傾向與記錄，英美主流媒體並非沒有注意，雖然可能不多。早在基輔過渡政府成立一週左右，BBC（2014, March 1）已經以 6 分多鐘報導自稱與「自由黨」有聯繫的兩百多位極右派；BBC 指這是「一小批人但有組織」，是廣場抗議者當中「最有力量的一群」。他們認為想要親近俄羅斯的人，「就讓他們搬到俄羅斯...烏克蘭只能是烏克蘭人的...我們的任務是砍斷與...俄羅斯的所有連帶」。過了一年多，BBC（2015, July 23）再以 9 分多鐘的專題，指「右區」這個推廣民兵運動的極右政黨「威脅要推翻烏克蘭政府」。然後是兩年多後的《衛報》製作 13 分多鐘影片（Guardian, 2017, September 5），焦點是亞速營民兵已經投入戰鬥，並以舉辦兒童夏令營的方式紮根與擴張。德國的《時代週報》（Die Zeit）則有調查報導，指亞速營雖然僅只是烏克蘭眾多極右組織之一，卻已是「世界極端右翼網絡的中心」，相當特殊，「有政治議程，與政黨及民兵組織都有聯繫，也有夏季營隊訓練學童，並且也開始研擬國際戰略，邀請西方極右派訪問烏克蘭——『一起戰鬥』。」（Ishchenko, 2022, p.22）

北美方面，《紐約時報》曾在 2014 年 4 月 6 日報導新納粹民兵搶奪政府軍火，在廣場事件時，派出 600 民兵到基輔與警方戰鬥；雖然紐時沒有說，民兵攻佔市政廳之後，升起了納粹與白人至上的旗幟。4 月 12 日，紐時報導在廣場事件扮演要角、新納粹領導人之一穆茲科（O. Muzychko）兩週多之前與警方槍戰死亡。8 月 10 日該報則以一篇千餘字的最後 2 百字，提及烏克蘭正規軍轟炸頓涅茨克的反廣場派時，是要掩護 6 個民兵團攻入都會區作戰（轉引自 Parry, 2014, August 11）。《新聞週刊》則在 9 月以比較平淡的筆調，引述「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發佈的報告，指烏克蘭地方媒體出現受害者首級被割下的照片，至當時（9 月初）已經有超過 3000 人遇害。週刊說超過 30 個「挺民族主義」的民兵隊伍，其中有多個由烏克蘭商

業寡頭鉅子之一克羅莫伊斯基 (I. Kolomoyskyi) 公開資助，他也在 2014 年春懸賞，表示抓到說俄語的「破壞者」，一人一萬美元 (Sharkov, 2014, September 10)。

美加的 Vice (2018, May 25) 新聞製作了 22 分鐘的「失控：烏克蘭的流氓民兵」，四年以來累計將近一千萬點擊；該片指烏克蘭政府聲稱軍隊在其控制中，民兵已經解散。但該刊調查後，察覺部分民兵仍在戰鬥，無意放下武器。兩年多之後，美國《時代週刊》同時推出兩萬 (英文) 字的調查，佐以 8 分鐘的影音 (Shuster & Perrigo, 2021, January 7,9)，鋪陳烏克蘭極右派超級種族主義者民兵，通過運用臉書等手段，自我激進化也培植新世代。

主要媒介揭露烏克蘭極右派及其潛在暴力威脅的報導或評論，原本已經不多，俄羅斯入侵之後，幾乎消聲匿跡，甚至不再重要。還在開戰前幾日，紐時已經表示，俄羅斯不斷從事不實傳播，不僅內容可能錯誤，並且不實傳播還包括「所述雖然真實，但對當前事態，無關緊要。」(Goldmansour 2022, May 18) 這裡，應該知道的是，雖有「通俄門」(Russiagate) 一詞，紐時等美國主流媒體與民主黨同聲譴責俄羅斯製造不實資訊，試圖協助川普 (D. Trump) 當選總統，但除了美國自己查無實證之外，比較可信的反而是烏克蘭政府與民主黨合作，希望協助希拉蕊 (Hilary Clinton) 入主白宮！(Vogel and Stern, 2017)

現在，回到紐時所說，主要傳媒先前曾經報導，但現在變成無關緊要的事實是哪些？烏克蘭的極右派問題顯然是一種，開戰三個多月以來，似乎再無該類報導。(Goldmansour 2022, May 18) 另一種就是北約問題。早在 30 多年前，紐時刊登美國前蘇聯大使、也是圍堵政策制訂者肯南 (Kennan, 1997, February 25) 的評論，他表示「北約若東擴，將是美國後冷戰年代最致命的錯誤決定」。紐時專作家傅立曼 (Friedman, 1998, May 2) 隔年訪談，再次強調肯南這個觀點；今年俄羅斯入侵後，傅立曼三度通過肯南之口，表示『推動北約東擴...「俄羅斯當然會做出不好的反應，然後主張北約擴張的人會說俄羅斯人就是這樣」(轉引自莊惠嘉編譯，2022 年 3 月 14 日)。這是開戰之後罕見的再次提及，但大多數時候紐時不再「老調重彈」，而是指控俄羅斯用北約東擴等五種說法，試圖正當化其入侵。紐時之外，CNN、《華盛頓郵

報》與《新聞週刊》都有這個傾向（轉引自 Goldmansour, 2022, May 18）。比較明顯的一篇例外，出自《時代週刊》對巴西前總統、年底將再參選的魯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之專訪（Nugent, 2022, May 1；莊惠嘉編譯 2022 年 5 月 6 日）。魯拉批評美國總統拜登「煽動俄烏開戰」，但也批評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 Zelensky）。

澤倫斯基在 2019 年以和解俄羅斯，亦即執行德法參與的明斯克協議作為選舉訴求，3 月以首輪 30% 選票（居次者僅 15%）進入第二輪，再以 73% 選票當選並在 5 月 20 日就任總統。何以澤倫斯基沒有履行競選承諾，致使俄羅斯入侵？

澤倫斯基何以未履行承諾？若非自己無意執行、妥協或改變想法，就是遇到較難或無法克服的原因，以致不能執行。前一種可能，未見披露，也不合常理，雖然無法完全排除。後一種情況，亦即來自右派，以及，可能也存在的國的阻撓。澤倫斯基前一任總統波洛申科（P. Poroshenko），原本就不肯執行明斯克協定，他卸任後很快就發動「反投降」運動，繼續反對，即便民調顯示，僅有四分之一的人支持，卻有將近 50% 不支持這個訴求（Ishchenko, 2022, p.30）。除了波洛申科倡議反對，另有亞速營等極右派「展示實力」破壞協定。比如，早在 2015 年，群眾在國會外遊行，「自由黨」人投擲手榴彈炸死 4 位國家守衛，3 年後仍未被定罪。奧德薩市長特魯哈諾夫（G. Trukhanov）因土地開發洗錢案，在 2018 年初聽證會後，極端派以槍枝當庭攻擊並射傷一位員警，無人遭收押，而警方也消極以對（Likhachev, 2018, p.5）。柯亨教授在 2019 年 10 月受訪，表示「澤倫斯基以和平候選人勝出，擁有巨大使命要創造和平，因此他必須與普亭協商。但存在一個主要障礙。烏克蘭的法西斯派表示，假使他繼續採取與普亭協商的路線，他們會殺死澤倫斯基...除非美國支持澤倫斯基與普亭談判，否則...澤倫斯基沒有商談結束戰爭的機會...。」美國選擇的作法，在同年底眾議院審議軍援烏克蘭法案時表露無遺，眾議員西夫（A. Schiff）赤裸坦白：「美國必須援助烏克蘭...我們可以在那裡與俄羅斯作戰，我們不需在這裡與俄羅斯作戰。」極右派暴力的陰影與肆虐，以及澤倫斯基政府對付異端的嚴厲，在 2021 年更見升高。因為 2014 年在廣場事件扮演一角的拜登，已經就任美國總統。當年有三家挺

反對派的電視頻道遭關閉；6月時，政府制裁 538 個人與 540 家公司，美國國務院公開宣稱「支持烏克蘭對抗俄羅斯的惡質影響」。2022 年元月基輔政府關閉第 4 家電視頻道，澤倫斯基支持度跌至 23%，4 月，他再關 2 家頻道，接著下令合併所有頻道，僅存單一頻道說一種話（Baldwin, 2022, April 28）。

極右派方面，至 2021 年 8 月有更誇張的表現：武裝抗議者在總統府外面，打傷至少 8 位警員，無人被捕。俄入侵前兩週，紐時報導澤倫斯基即便僅僅只是表示要與俄羅斯商談，「都會有極大政治風險」，極右派會「破獲並甚至推翻他的政府」。華郵稍候也說，「基輔反對與說俄語的東區分離主義派協商，這是關鍵的障礙。」極右派領導人之一胡迪門科（Yuri Hudymenko）威脅澤倫斯基，「烏克蘭政府的任何人若要簽署和談文件，一百萬人就會走上街頭，政府就不會是政府。」澤倫斯基任命的國安局長丹尼洛夫（Oleksiy Danilov）也宣布，「執行明斯克協定，等於毀滅烏克蘭。」（以上轉引自 Aaron 2022, April 10；另見 Mearsheimer et.al. 2022, April 8）

廣場事件後，親歐政府在全國展開肅清，誰遭指為親俄，乃至不夠民族主義，都有遭殃之虞。澤倫斯基執政以後，這些作為持續。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及親西方的紐約人權組織雙雙發布報告，譴責烏克蘭情治機關酷刑對待政治異端。烏東地區，戰爭爆發後兩週內，已有 2 位烏東地區地方行政首長，以及基輔地區一位鎮長，因為與俄羅斯協商和平遇害；對此，澤倫斯基說「與俄羅斯合作的人，將有後果」。在極右派內部副部長格拉先科（A. Herashchenko）放行下，廣場事件後開始蒐集的「國家敵人」黑名單，其中已有多人遭致暗殺，包括知名記者布里納（O. Buzina）與反對黨議員（O. Kalashnikov）；該網站甚至列入友俄的外國政治人物，包括德國前總理施洛德（G. Schroder）。俄入侵之後，被逮捕的記者與人權工作者...等等名單與「罪名」，已有人蒐集並在 4/10 發佈（Blumental & Krishnaswamy, 2022, April 17）。

寡頭商人、親俄、女兒以普亭為教父，但反對俄國佔領烏克蘭領土的梅德韋丘克（V. Medvedchuk）在 2019 年入秋當選國會議員，次年 8 月亞速營以塑鋼子彈攻擊反對黨多人的坐車，2021 年 5 月他被指叛國而軟禁（Dickinson, 2021, May 13）。俄入侵之後，「反對派平台－為了生活黨」（The Opposition Platform for Life）這個最大反對黨（在 450 國會席次有 44 席，僅

次於執政「公僕黨」的 254 席，即便公開譴責俄羅斯入侵，仍然連同其他 10 個政黨，都被指為親俄而被解散（Sauer 2022, March 20）。一個月後，基輔政府再將該黨主席之一的梅德韋丘克投放入獄（DW, 2022, April 14）。

柒、俄羅斯的愚蠢犯行

美國《外交政策》季刊在今年初，曾有專文敘述普亭本來很「愛」西方，想要加入北約，但 2003 年以後，普亭突然轉向，原因可能是「他的內圈集團愈來愈封閉孤立，使得他們與現實失去了聯繫，於是開始相信他們自己的宣傳」（Braw, 2022, January 19）。這是美方的看法，普廷與俄羅斯的轉變，同樣或更可能的原因，是喬治亞與北約聯合軍演增加及 2003 年爆發「玫瑰革命」（Rose Revolution）而出現倒向美國政權等事件，但季刊不提。這個關係與美國提供的民主支持，是否存在因果關係，是有爭論（Mitchell, 2009, p.112-26）。

但是，另有一個觀點，認為俄羅斯從戈巴契夫（M. Gorbachev）、葉爾欽（B. Yeltsin），而特別是再到普亭，不是三度，是三任而多屆領導人都是「有心向明月」、要以大歐洲讓俄羅斯融入（Pozner, 2018），卻也落得一次、二次與三次「明月照溝渠」的下場。俄羅斯認定美國引起顏色革命，於是掉頭離去；西方（美國）自認是正當的民主支持，責怪俄羅斯自閉。

這個不同的認知，同樣展現在蘇聯解體之後，美歐自認有權東擴北約，但俄羅斯的理解是，這是對其生存威脅的舉動。俄羅斯在 2008 年與喬治亞發生戰爭，已有北約因素。今年俄羅斯同樣以這個主要理由，發動「特別軍事行動」，聲稱不是入侵烏克蘭，是要排除北約結合烏克蘭對俄羅斯產生的生存威脅，因此要使烏克蘭去軍事化與去納粹化（Putin 2022, February 24）。惟這些理由即便為人接受，無法改變俄羅斯是侵略者的事實，即便俄羅斯是長期遭受挑釁，受挑釁而認定這是先發制人的自衛行動，雖然可以理解（understandable），但是，要以入侵排解盛怒或解除危險，卻無法讓人接受這是正當的（justifiable）反應。開戰至今及往後，是會使得美歐軍政威脅擴

大還是減少，是會減少還是增加烏克蘭極右派力量，未必一定如同俄羅斯想要有的方向發展。何況，俄羅斯入侵已經暫時使北約更為「團結」且增加軍事預算而美國霸權似乎更為鞏固，無一是和平之福。

發動戰爭已經難以讓人認可其正當，更何況自由民主體制的傳媒，在重要時刻「製造共識」，效能勝於自由度較低的民主或半專制國家如俄羅斯；此時，發動戰爭的俄羅斯屢屢遭受挑釁的事實，在反俄共識更為鞏固之時，更難見諸天日。赫曼與杭士基的名作說得很清楚，美國媒體允許甚至是鼓勵積極的辯論、批評和唱反調，只要這些內容沒有超越菁英階層認同的前提（Herman & Chomsky, 1988／沈聿德譯，2021，頁 315, 366）。

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一事，這就是說，西方輿論不太可能有效傳達或是辯論北約東擴是否正當，北約是否長年來持續挑釁而造成危險。最多，只會出現少數的逸軌，並且這些不合常規的超越，除了不會撼動主流的常態敘事，有時也被用以錯誤地否定赫曼與杭士基等人的論證。主張西方要為克里米亞被併入俄羅斯，以及西方要為烏克蘭被入侵而負責的聲音，仍然可以出現在《紐約時報》（Caldwell, 2022, May 31）。多年以來，美國學界抱持前述看法的人不少，其中，最知名者可能是米爾斯海默（Mearsheimer, 2014; 2022, March 11），他的講演放入 YouTube 後，7 年累計點擊超過兩千萬（Mearsheimer, 2015）。然而，這些挑戰共識的少數言論，無法扭轉大局。杭士基在今（2022）年 4 月有一小的查詢，就有發現，即便「俄羅斯入侵烏克絕大多數是因為確鑿挑釁」而發生，但網路上「沒有挑釁就入侵烏克蘭」（Unprovoked invasion of Ukraine）高達 243 萬筆，遠遠多於 2003 年美國入親伊拉克，「沒有挑釁就入侵伊拉克」（Unprovoked invasion of Iraq）的 1.17 萬次（Polychroniou, 2022, April 28）。雖然，真實情況剛好相反，伊拉克根本沒有挑釁，遭入侵只是白宮片面宣稱伊拉克擁有大量毀滅武器；事後發現沒有，但已經造成伊拉克數十萬人死亡。

不但俄羅斯因為長期被挑釁而入侵，外界知悉者不多，並且，知悉者當中，可能也有相當高比例的人，傾向於認定這只是侵略者的藉口、未必是俄羅斯真正的判斷，從而這些知悉者也就在拒絕其入侵正當性的同時，無法考慮是否應該設身處地理解俄羅斯的立場與看法。西方傳媒在入侵之前，仍然

報導烏克蘭極右派之害，在戰爭爆發之後，這樣的聲音大致消聲匿跡如前所述，這就顯示俄羅斯的「特別軍事行動」即便最後在軍事上可以成功，也會讓人更難看到美國與北約挑釁的連帶責任。入侵是主犯，挑釁者的性質怎麼理解，後文就此討論。

捌、美國沒有責任嗎？

美國總統拜登從 2022 年 2 月初起，連番密集示警，聲稱「美情資」顯示俄羅斯即將入侵烏克蘭，至 12 日（美國時間）更明確預測〈俄 16 日攻烏〉（張文馨 2022 年 2 月 13 日）。兩日後，蘇聯時期美國最後一任大使馬特洛克講演，指「常識」可知，「終止北約東擴」危機就消失，美國卻不動聲色，致使他懷疑這是一場「被蓄意促成的危機」；他說，「也許我錯了，且錯得離譜，但我不能否認我們正目睹一場精心策劃的鬧劇，被美國輿論的知名人士嚴重放大，以服務於國內政治目的。」（Matlock, 2022, February 14）

這個看法讓人駭異，美國不承諾北約不東擴，就是要引誘俄羅斯入侵嗎？若依本期包亞克情報官的分析，是有可能（見頁 139）。但證據不算充足。《經濟學人》週刊同樣看到美國這次資訊戰，與過往不同，它稱讚拜登的示警手法高明，成效良好，是完美的超前部署。它說，美軍在韓戰期間研究抵制「洗腦」的方法，心理學家後來擷取其成果並提煉，指出資訊也可以成為病毒的形式；因此，如同注射疫苗能夠免疫，針對病毒資訊預先注入病原體，同樣足以讓人不受不實資訊之害。預知大事即將爆發，若是先行廣發大量事實，其後的不實宣傳就會較難得逞。去（2021）年 10 月起，白宮開始大肆宣傳俄羅斯即將入侵烏克蘭，12 月再有戰情，指出俄羅斯在 2022 年初，將會出兵 17.5 萬，又說俄羅斯已有推翻烏克蘭政府的方案。《經》高度肯定美國這個作法，認為國防部這次的透明前所未有，「似乎成功了...防止了北約與美國公眾被分化、設定了普亭將以何種藉口發動攻擊，甚至可能延緩了普亭的入侵時程」（Economist, 2022, February 26）。

《經濟學人》所描述的事實與馬特洛克的觀察，基本相同，差異是該刊支持北約東擴而認為戰爭發生不是美國的責任，馬特洛克則反對北約東擴而審慎懷疑美國蓄意製造戰爭。

另一個可能的理解方式是，假使套用杭士基的用詞，俄羅斯固然是有「侵略的犯行」，並且，結果還會「適得其反」，因此也就是「愚蠢」(Polychroniou, 2022, April 7)。那麼，美國夾北約的百般挑釁，是不是就是狡猾？犯有煽動或引誘罪責之嫌，至少是「極不道德」地讓烏克蘭以為進入北約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Meyerson & Cooper, 2022, February 25)，結果卻是支付慘痛代價，聽任兩個大國以第三國、也就是自己作為代理人，在第三國、也就是自己的領土發生戰爭？若是可以這樣看待，那麼，即便不能說美國蓄謀製造代理人戰爭，但假使說美國「樂觀其成」、願意看到俄羅斯因入侵烏克蘭而削弱自己的國力，也就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何況，後見之明，提供了兩個證據支持這個看法。

證據之一，就在眼前。開戰至今，美國力挺烏克蘭的動向已經支持這個判斷。參眾兩院在 5 月 10 日追加 70 億、責成白宮另以 400 億美元投入烏克蘭 (其中軍事援助約 315 億，人道援助約 85 億; Economist, 2022, May 14)。這就使得美國在開戰「十週」之內，累計已經承諾或送出 540 億美元至烏克蘭，但 (一) 美國撤離之前二十年，每「一年」投入阿富汗「僅」有 460 億美元，(二) 俄羅斯「一年」的全部軍事預算是 690 億美元 (Greenwald, 2022, May 14)。外界理當援助烏克蘭，外交斡旋、人道援助及軍事支持，需要三管齊下，惟美國毫無外交努力，卻以約合美國國務院整年、烏克蘭三分之一 GDP 的 540 億美元，投入軍事...等等支持，這個目標不再只是「防衛」烏克蘭 (Rana, 2022, May 23)，是〈華盛頓將與俄羅斯戰鬥直至最後一位烏克蘭人〉，使得白宮與克里姆林宮互以烏克蘭進行代理人戰爭的指控，(Bandow, 2022, April 14) 顯得不是空穴來風。烏俄專家李文 (Lieven, 2022, June 6) 則注意到，眼見美國有意利用這次衝突摧毀俄羅斯，反對俄羅斯入侵的俄國中間派知識菁英，已經出現變化，他們已在轉而支持普亭。

證據之二，前車可鑒。美國主戰不求和、甚至阻止和平談判的事例，不止一樁，但 1970 年代的阿富汗例子，目標正是蘇聯。

蘇聯以阿富汗親蘇政府的邀請為名，在 1979 年底入侵阿富汗打擊伊斯蘭基本教義派「聖戰士」(Mujahideen) 反叛軍。外界當時不知道的是，在 1978 年，美國已在部署，用意正是試圖增加蘇聯入侵的機率。

美國前國防部長蓋茲 (Robert M. Gates) 在回憶錄，最早揭露這段歷史。他以將近十頁鋪陳之後，結論是：「卡特總統與國安顧問布里辛斯基 (Z. Brezinski) 幾乎在蘇聯入侵一年之前，就已經看出蘇聯將要強化他們在阿富汗的角色。他們在九個月之前發動相關工作，在蘇聯大舉入侵前幾乎六個月，開始秘密提供資金，一切就為協助阿富汗反叛軍。」(Gates, 1996, p.149) 過了一年多，得知此事、巴黎發行的週刊《新觀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 訪問最重要的當事人，也就是布里辛斯基。美國資深記者布魯姆 (William Blum) 將這篇訪談英譯為〈布里辛斯基：是的，CIA 比俄國更早進入阿富汗〉之後，轉告吉布斯 (David N. Gibbs) 教授。到了 2000 年，吉布斯以書評論文〈阿富汗：回顧蘇聯的入侵〉的部分篇幅 (Gibbs, 2000, pp.241- 242) 予以披露，現編譯如後。

布里辛斯基：「正式的歷史說法是，蘇聯在 1979 年底入侵阿富汗之後，CIA 才從 1980 年起援助聖戰士。但真實情況完全不是這樣。卡特總統在 1979 年 7 月 3 日就簽署第一道指令，提供秘密援助給首都卡布爾 (Kabul) 反對親蘇政府的勢力。正就在那天，我給總統寫了便條，向總統解釋，這個援助可以引誘蘇聯派軍介入。」

問：「這樣做雖有風險，但你當時主張秘密行動，也許是你想讓蘇聯進入戰爭，因此就想辦法，要逞挑撥之能？」

布里辛斯基：「不完全是這樣。我們並沒有推動俄國人的介入，我們只是心知肚明，認為這個作法很有可能增加機會，讓他們介入。」

問：「當時，蘇聯以美國已經秘密介入阿富汗為由，因此他們進入對抗，就有正當性。這個說法彼時無人採信。但現在回顧，是有真實依據。今日再看，你一點都沒有悔意嗎？」

布里辛斯基：「為什麼要有悔意呢？秘密行動，太好了，這個點子產生了效果。『吸引俄羅斯人進入阿富汗陷阱』，你要我為此而萌生悔

意嗎？蘇聯人正式進入阿富汗國境當天，我有文字給卡特總統，主要是表示：『現在，我們有機會讓蘇聯也有個越戰。』事態確實往這個方向發展，將近十年，莫斯科不得不持續作戰，但蘇聯無法承受得起，這場衝突使蘇聯最後沒了士氣，蘇維埃帝國最後也就崩潰。」

問：「對於美國曾經支持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爾後這些人又將武器給予後來的恐怖主義者，並且向他們提供諮詢，對於這些，你也沒有悔意嗎？」

布里辛斯基：「放眼世界史，哪一個重要些？是塔利班（Taliban）（譯按：的出現）還是蘇維埃帝國的崩潰更重要些？一些燥動的穆斯林，還是中歐的解放與冷戰的終結？」

問：「一些燥動的穆斯林？」但一直有人不斷地說，伊斯蘭基本教義派是當今世界的主要威脅...」

布里辛斯基：「瞎說！有人說，西方有個對付伊斯蘭的全球政策。這樣認定很愚蠢：根本沒有全球的伊斯蘭。要以理性態度看待伊斯蘭，不能帶有蠱惑之心，也不能帶有情緒。伊斯蘭是世界的主要宗教，有15億信徒。但難道沙烏地阿拉伯的基本教義派、溫和的摩洛哥、好武的巴基斯坦，以及親西方的埃及，或者中亞的世俗派伊斯蘭，能有什麼共通性嗎？若有，也只不過是如同統合基督教國家的那種相同...。」

布里辛斯基的看法，狀似不同於韓廷頓（S. Huntington），後者說：「在這個新世界中，最普遍、重要而危險的衝突，不在社會階級、貧富或其他經濟團體的衝突上，而在隸屬於不同文化實體的族群間的衝突。」「回教徒和他們的鄰居沒有辦法和平共存...回教徒比較有暴力傾向。」（黃裕美譯，1997，頁7, 351-4）

但是，兩人相同之處，是製造敵人，這很可能是美國外交政策的特徵之一。在布里辛斯基於法國留下前述記錄三年之後，眾所周知，駭異聽聞、非常少數的極端分子，以穆斯林之名實則污衊穆斯林，引爆「9/11」恐怖攻擊，其後美國政府不肯反省，旋即以暴制暴、發動反恐戰爭。2001至2020年，根據布朗大學的研究，美國以反恐為名，從非洲到亞洲（菲律賓）發動的戰

爭，至少虛耗了美國納稅人在 85 個國家累計投入 8 兆美元，不是建設社會，是讓軍火商荷包豐厚，以各種戰爭殺死 92.9 萬人（含美軍 7050 人），並使 3800 萬人流離失所、家園破碎（Brown University, 2021）。

今（2022）年 2 月 24 日爆發的戰爭，俄羅斯是入侵主犯，美國為首的北約認定俄羅斯威權專制、天生就會犯罪，不惜多方挑釁以製造敵人，難道就沒有罪責、甚至是同樣或更重的罪責嗎？德法為首的其他北約盟國沒有歐洲自身的政策，就可將所有責任推向美國嗎？烏克蘭極右派使 2014 年和平的抗議活動轉變為暴力與狙擊殺人，致使原本可以同時交往西方與俄羅斯的烏克蘭，完全轉向西方，先引爆內戰，後遭入侵，這些極右派沒有責任嗎？澤倫斯基是因為被極右派夾持，或者在當選後自主放棄他在 2019 年選總統的和解俄羅斯之承諾，也有未能使戰爭引信拆除的責任嗎？

這些責任歸屬的澄清、辯論與認定是重要的，不釐清則來日戰爭再次以不同方式爆發，機會增加。預防、也就是不讓戰爭發生的重要一步，是要釐清真相。當前，死於戰爭的生靈、流離失所的生命、家園的毀損、人情親情友情的消逝與苦楚傷痛、生態環境的破壞、地球暖化求其調適與減溫的進度可能延遲、低收入人群更難承受的糧食危機，皆已橫陳在世人眼前。美國執掌政治權力的人及其支持者，真能因為願意看到俄羅斯的弱化而「樂觀其成」嗎？真能為沒有以宣布烏克蘭不入北約而聽任俄羅斯入侵為惡，就會心安理得而無道德虧損嗎？

參考書目

- TVBS（2022 年 3 月 6 日）。〈烏民爭自由...紀錄片【凜冬烈火】上 YT 一天點閱率近 20 萬〉，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jo8p5T0fGo>
- 自由時報（2022 年 4 月 6 日）〈布查街頭屍橫遍野 衛星照片打臉俄〉（編譯）。《自由時報》，A3。
- 沈聿德譯（2021）。《製造共識：媒體政治經濟學》。台北：野人文化。（原書：Herman, E. S., & Chomsky, N. (1988).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Pantheon.）
- 洪毅（編譯）（2022 年 4 月 6 日）。〈俄稱屠殺造假 美媒衛星圖作證〉。

- 《聯合報》。A8 版。
- 張文馨 (2022 年 2 月 13 日)。〈美情資 俄 16 日攻烏〉，《聯合報》，A1。
- 張沛元 (編譯) (2022 年 3 月 11 日)。〈不只大內宣 中媒買臉書廣告 幫俄洗白〉。《自由時報》，A4。
- 莊惠嘉 (編譯) (2022 年 3 月 14 日)。〈俄烏戰火 美國無責?〉。《聯合報》，A2。
- 莊惠嘉 (編譯) (2022 年 5 月 6 日)。〈巴西前總統批拜登：煽動俄烏開戰〉。《聯合報》，A8。
- 莊惠嘉 (2022 年 3 月 27 日)。〈奧斯雅尼可娃不當超級英雄 俄新聞製作人 闖直播反戰〉。《聯合報》，A8。
- 陳成良 (編譯) (2022 年 03 月 14 日)。〈社群「大翻譯運動」 揪出中國陪挺俄自由時報〉。《自由時報》，A4。
- 陳君碩 (2022 年 3 月 14 日)。〈推特大翻譯運動 揭大陸真實輿情〉。《中國時報》，A12。
- 黃裕美譯 (1997)。《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台北：聯經。(原著 Huntington, S.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Y: Simon & Schuster)
- 經濟日報 (2022 年 4 月 13 日)。〈德國 俄國營 TV 編輯持標語反戰獲世界報母公司延攬供稿〉，《經濟日報》，A8。
- 羅方妤 (2021 年 8 月 19 日) 〈流亡總統捲台幣 47 億 甘尼 逃到阿聯〉 (編譯)。《聯合報》，A2。
- Aaron, M. (2022, April 10). Siding with Ukraine's far-right, US sabotaged Zelensky's mandate for peace. From <https://mate.substack.com/p/siding-with-ukraines-far-right-us?s=r>
- Allsop, J. (2022, May 20). *Smears, opacity, and the implosion of a government disinformation board*. https://www.cjr.org/the_media_today/disinformation_governance_board.php
- Amos, H., & Salem, H. (2014, May 2). *Ukraine clashes: dozens dead after Odessa building fire*.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may/02/ukraine-dead-odessa-building-fire>
- AP (2021, July 19). *Norways July 22, 2011, terror attack: a timeline*, <https://apnews.com/article/europe-norway-bd6c9d2efd6ce2148c3d85cb79d73af9>
- Applebaum, A. (2022, May 8). (last updated) *Holodomor (Great Famine of 1932-33)* <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Holodomor>
- Baldwin, N. (2022, April 28). *The real Zelensky: from celebrity populist to unpopular Pinochet-style neoliberal*, <https://thegrayzone.com/2022/04/28/zelensky-celebrity-populist-pinochet-neoliberal/>

- Bandow, D. (2022, April 14). Washington will fight Russia to the last Ukrainian. *From* <https://www.Theamericanconservative.Com/Articles/Washington-Will-Fight-Russia-To-The-Last-Ukrainian/>
- Baysha, O.(2022). *Democracy, populism, and neoliberalism in Ukraine: On the fringes of the virtual and the real*. Routledge.
- BBC (2014, March 1). *Neo-Nazi threat in new Ukraine*. Fr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SBo0akeDMY>
- BBC (2014, May 3). *Ukraine crisis: Dozens killed in Odessa fire amid clashes*. From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27259620>
- BBC (2014, May 6). *How did Odessa's fire happen?* . From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27275383>
- BBC (2022, May 16). *Ukraine: The children's camp that became an execution ground*, From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61442387>
- BBC (2022, June 2). *Ukraine: The Disinformation War*, From <https://www.bbc.co.uk/programmes/p0cbjrtp>
- BBC (2015, July 23). *The far-right group threatening to overthrow Ukraine's government*. Fr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EKQsnRGv7s>
- Biden, J. (2017) .*Promise Me, Dad: A Year of Hope, Hardship, and Purpose*. Flatiron Books
- Black, R. (2022, April 27). *Col. Richard Black: U.S. Leading World to Nuclear War*, Fr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cP0TYx_eUI
- Blumental, M., & Krishnaswamy, E. (2022, April 17). “*One less traitor*”: *Zelensky oversees campaign of assassination, kidnapping and torture of political opposition*. From <https://thegrayzone.com/2022/04/17/traitor-zelensky-assassination-kidnapping-arrest-political-opposition/>
- Boyd-Barrett, O. (2016). *Western mainstream media and the Ukraine crisis: A study in conflict propaganda*. Routledge.
- Boyd-Barrett, O.(2019). *RussiaGate and propaganda: Disinformation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Routledge
- Braw, E.(2022, January 19). *When Putin loved NATO*. From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1/19/putin-russia-ukraine-nato-george-robertson/>
- Brown University (2021) .*Cost of war: Iraqi civilians*. From <https://watson.brown.edu/costsofwar/>
- Calamur, K. (2014, February 27). *Crimea: A gift To Ukraine becomes a political flash point*. From <https://www.npr.org/sections/parallels/2014/02/27/283481587/crimea-a-gift-to-ukraine-becomes-a-political-flash-point>
- Caldwell, C. (2022, May 31). *The War in Ukraine May Be Impossible To Stop. And the U.S. Deserves Much of the Blame*, From <https://www.nytimes.com/2022/05/31/opinion/us-ukraine-putin-war.html>

- (本文兩日後有中文譯版〈烏克蘭戰爭發展至此，美國難辭其咎〉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220602/us-ukraine-putin-war/zh-hant/>)
- Carden, J. (2016, January 14). *Congress has removed a ban on funding Neo-Nazis from its year-end spending bill*. From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politics/congress-has-removed-a-ban-on-funding-neo-nazis-from-its-year-end-spending-bill/>
- Cohen, S. F. (2019). *War with Russia_ From Putin and Ukraine To Trump and Russiagate*. Hot Books.
- Coles, T. J.(2021). *We'll tell you what to think : Wikipedia, propaganda and the making of liberal consensus*. URSA Major.
- Dickinson, P. (2021, May 13). Putin's key Ukraine ally charged with treason. From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ukrainealert/putins-key-ukraine-ally-charged-with-treason/>
- Dubovyk, Y. (2022, March 14). *Ukrainian leftist criticizes western war drive with Russia: US is using Ukraine as "cannon fodder"*. From <https://orinocotribune.com/ukrainian-leftist-criticizes-western-war-drive-with-russia-us-is-using-ukraine-as-cannon-fodder/>
- DW (2015, May 2). *The Odessa file: What happened on May 2, 2014?* From <https://www.dw.com/en/the-odessa-file-what-happened-on-may-2-2014/a-18425200>
- DW(2022, April 14).梅德韋丘克：普亭的烏克蘭親信被捕。
<https://www.dw.com/zh/梅德韦丘克普京的乌克兰亲信被捕/a-61475589>
- DW(n.d.).Ukraine war: How a "fact-checking" website is spreading Russian propaganda.From <https://www.dw.com/en/ukraine-war-how-a-fact-checking-website-is-spreading-russian-propaganda/a-61062940>
- Economist (2022, February 26). Reality against Putin: the administration is countering Russian disinformation, p.34.
- Economist (2022, March 19).Russia: the Zfactor, pp.46-47.
- Economist (2022, May 14). Ukraine: no ports in a storm, pp.48-49.
- Economist (2022, May 21a).Domestic terrorism: sickening theory and lethal practice, pp.32-33.
- Economist (2022, May 21b). The propaganda front: welcome to the Putin show, pp. 54-56.
- Editors of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n.d.). The Maidan protest movement.From <https://www.britannica.com/place/Ukraine/The-Maidan-protest-movement>
- Farthing, L., & Becker, T. (2021). *Coup: A story of violence and resistance in Bolivia*(pp.48-49). Haymarket Books.
- France 24 (2014, May 2). Ukrainian unrest spreads as dozens killed in Odessa. From <https://www.france24.com/en/20140502-dozens-killed-building-fire-ukraine-odessa-clashes-pro-russia-activists>
- Êkel'čik, S. (2020)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Ukrai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lowers, M., & Lombardo, J. (2022, April 8). Ukraine: A conversation with Scott Ritter, Retrieved 2022, April 18, from <https://popularresistance.org/ukraine-a-conversation-with-scott-ritter/> (119 分鐘多的訪談，引述自 1:02:04~ 1:06:08.)
- Foxall, A., & Kessler, O. (2014, March 18). *It's time for a frank conversation about some of the unsavory characters in Kiev*. From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4/03/18/yes-there-are-bad-guys-in-the-ukrainian-government/>
- Friedman, T. L. (1998, May 2). Foreign affairs; now a word from x. *New York Times*. section a, page 15.
- Gates, R. M. (1996). *From the shadows: The ultimate insider's story of five presidents and how they won the cold war*. New York, NY: Simon & Schuster.
- Gibbs, D. N. (2000). Afghanistan: The Soviet invasion in retrospect. *International Politics*, 37(2), 233-242.
- Goldmansour, L. (2022, May 18). Disinformation label serves to marginalize crucial Ukraine facts. From <https://fair.org/HOME/DISINFORMATION-LABEL-SERVES-TO-MARGINALIZE-CRUCIAL-UKRAINE-FACTS/>
- Golinkin, L. (2022, May 12). Meet the head of Biden's new. Disinformation governing board .From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politics/meet-the-head-of-bidens-new-disinformation-governing-board>
- Goodman, A., & Nermeen, S. (2022, April 21). Ukrainian Historian Says Putin's Invasion Is an Imperialist War Akin to U.S. Attack on Iraq, https://www.democracynow.org/2022/4/21/ukrainian_historian_putin_invasion_akin_iraq
- Guardian (2017, September 5) *Ukraine's far-right children's camp: 'I want to bring up a warrio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iBXmbkwiSw>
- Greenwald, G. (2022, April 21) *Former intelligence officials, citing Russia, say big tech monopoly power is vital to national security*. <https://greenwald.substack.com/p/former-intelligence-officials-citing?r=&s=>
- Greenwald, G. (2022, May 14) *The Bizarre, Unanimous Dem Support for the \$40b War Package to Raytheon and CIA: "For Ukraine"*, <https://greenwald.substack.com/p/the-bizarre-unanimous-dem-support-426?s=r>
- Ha, H. T., & Luong, D. Nguyen an (2022, May 13) *The Russia-Ukraine War: Unpacking Online Pro-Russia Narratives in Vietnam*, <https://fulcrum.sg/the-russia-ukraine-war-unpacking-online-pro-russia-narratives-in-vietnam/>
- Hahn, G. M. (2018) *Ukraine over the edge: Russia, the west and the new cold war*. North Carolina: McFarland & Company.

- Heuvel, K. V. (2022, May 24) *We need a real debate about the Ukraine war*,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2/05/24/ukraine-russia-war-biden-strategy-debate/>
- Ishchenko, V. (2016). Far right participation in the Ukrainian Maidan protests: an attempt of systematic estimation.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17(4), 453-472.
- Ishchenko, V. (2022) Interview: towards the abyss, *New Left Review*, Jan/Apr, 17-39.
- Katchanovski, I., Zenon E. K., Bohdan Y., N., & Yurkevich, M. (2013).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Ukraine* (2nd ed). The Scarecrow Press .
- Katchanovski, I. (2021) *The Maidan Massacre in Ukraine: Revelations from Trials and Investigation* (November 29, 2021).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4048494>
- Katchanovski, I. (2020a) "The far right, the Euromaidan, and the Maidan massacre in Ukraine." *Journal of Labor and Society*, 23, (1), 5-29.
- Katchanovski, I. (2020b) *The Maidan Massacre in Ukraine: Revelations from Trials and Investigations* (November 14, 2020).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3735661>
- Katchanovski, I. (2017). *The Maidan Massacre in Ukraine: Revelations from Trials and Government Investigations*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2994347>
- Katchanovski, I. (2016a). The Separatist War in Donbas: A Violent Break-up of Ukraine?,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17(4): 473-489
- Katchanovski, I. (2016b). The Maidan massacre in Ukraine: a summary of analysis, evidence and findings. *The Return of the Cold War: Ukraine, the West and Russia*. J.L. Black and Michael Johns (Eds.), (pp. 220-224). Routledge,
- Katchanovski, I. (2015). *The 'Snipers' Massacre' on the Maidan in Ukraine* (Last revised: 12 Feb 2018)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26582453,986>
- Kennan, G. F. (1997, February 5). A Fateful Error, *New York Times*, Section A, page 23.
- Klarenberg, K. (2022, June 13). *Leaked emails expose Paul Mason's collusion with senior British intelligence agent*. From <https://thegrayzone.com/2022/06/13/paul-masons-collusion-british-intelligence-agent/>
- Kudelia, S. (2018). When Numbers are Not Enough: The Strategic Use of Violence in Ukraine's 2014 Revolution. *Comparative Politics*, 50(4), 501-521.
- Kuzio, T. (2012). U.S. support for Ukraine's liberation during the Cold War: A study of prolog research an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Communist and Post Communist Studies*, 45, 51-64.

- Lauria, J. (2022, April 4). Questions about about bucha massac. From <https://consortiumnews.com/2022/04/04/questions-about-about-bucha-masacre/>
- Lauria, J. (2022, June 9). The plot against grayzone & suspicions about consortium news. From <https://consortiumnews.com/2022/06/09/the-uk-plot-against-grayzone-suspicions-about-consortium-news/>
- Lieven, A. (2022, June 6). Why Russian intellectuals are hardening support for war in Ukraine. From <https://responsiblestatecraft.org/2022/06/06/why-russian-intellectuals-are-hardening-support-for-war-in-ukraine/>
- Likhachev, V. (2018). Far-right extremism as a threat to Ukrainian democracy. From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analytical-brief/2018/far-right-extremism-threat-ukrainian-democracy>
- Liu, Z. (2019). *The Ukraine crisis and media systems: comparison of UK and Russian media coverage*.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 Matlock, J. F. Jr (2022, February 14). Today's crisis over Ukraine. From <https://usrussiaaccord.org/acura-viewpoint-jack-f-matlock-jr-todays-crisis-over-ukraine/> (筆名「深喉」的人中譯在3月1日以〈前美國駐蘇大使：烏克蘭危機是美國任性造成 古巴危機美國也秘密同意撤土耳其導彈〉為題，刊登於 <https://www.bastillepost.com/hongkong/article/10256139-前美國駐蘇大使-烏克蘭危機是美國任性造成-古巴>)
- Marcus, J. (2014, February 7). *Ukraine crisis: Transcript of leaked Nuland-Pyatt call*.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26079957>
- Mearsheimer, J. J. (2014). Why the Ukraine Crisis Is the West's Fault: the Liberal delusions that provoked Putin, October. *Foreign Policy*.
- Mearsheimer, J. J. (2015) Why is Ukraine the West's fault? Featuring John Mearsheimer. Fr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rMiSQAGOS4&t=291s>
- Mearsheimer, J. J. (2022, March 11) *John Mearsheimer on why the West is principally responsible for the Ukrainian crisis*, <https://www.economist.com/by-invitation/2022/03/11/john-mearsheimer-on-why-the-west-is-principally-responsible-for-the-ukrainian-crisis>
- Mearsheimer, J. et.al. (2022, April 8) *John Mearsheimer on War in Ukraine with Katrina vanden Heuvel, Ambassador Jack Matloc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H3s7MRJkAI>
- Meyerson, H., & Cooper, R. (2022, February 25) Worse Than a Crime; It's a Blunder, <https://prospect.org/world/worse-than-a-crime-its-a-blunder-russia-ukraine-lieven-interview/>
- Michaels, D. (2022, April 13). The secret of Ukraine's military success: Years of NATO training. *Wall Street Journal*. From

- <https://www.wsj.com/articles/ukraine-military-success-years-of-nato-training-11649861339>
- Michel, C.(2022,May 11) *The Covert Operation to Back Ukrainian Independence that Haunts the CIA*,
<https://www.politico.com/news/magazine/2022/05/11/covert-operation-ukrainian-independence-haunts-cia-00029968>
- Mitchell, L. A. (2009). *Uncertain democracy US foreign policy and Georgia's Rose Revolution*.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Netflix (2022,March 5). Winter on fire: Ukraine's fight for freedom.Fr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zNxLzFfR5w&t=2904s>
- Nugent, C.(2022). Lula talks to TIME about Ukraine, Bolsonaro, and Brazil's fragile democracy.From <https://time.com/6173232/lula-da-silva-transcript/>
- OHCHR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2014).*Report on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Ukraine*.From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ountries/UA/HRMMURReport15June2014.pdf>
- Orinoco Tribune(2022,April 5).Staged massacre in bucha.From
<https://orinocotribune.com/staged-massacre-in-bucha/>
- Parry, R. (2015,June 12). *When US house saw Ukraine's neo-nazis*.From
<https://consortiumnews.com/2015/06/12/u-s-house-admits-nazi-role-in-ukraine/>
- Parry, R. (2014,August 11). When western media saw Ukraine's Neo-Nazis.From
<https://www.commondreams.org/views/2014/08/11/nyt-discovers-ukraines-neo-nazis-war>
- Plokhly, S. (2021). *The frontline: Essays on Ukraine's past and pres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olychroniou, C.J. (2022, April 7). Chomsky: U.S. Policy Toward Russia Is Blocking Paths to De-escalation in Ukraine', Truthout,
<https://truthout.org/articles/chomsky-us-policy-toward-putin-assures-no-path-to-de-escalation-in-ukraine/>
- Polychroniou, C.J.(2022, April 28). Noam Chomsky: Propaganda wars are raging as Russia's war on Ukraine Expands. From
<https://truthout.org/articles/noam-chomsky-propaganda-wars-are-raging-as-russias-war-on-ukraine-expands/>
- Popova, M. (2014). Why the orange revolution was short and peaceful and Euromaidan long and violent.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61(6), 64-70.
- Pozner, V. (2018).*How the United States Created Vladimir Putin* , a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Yale Universit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X7Ng75e5gQ&t=939s>
- Putin, V.(2022, February 24).*Address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7843>

- Rana, A. (2022,May 23). *Left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Heart of Empire*,
https://www.dissentmagazine.org/online_articles/left-internationalism-in-the-heart-of-empire
- Sauer, P. (2022,March 20). *Ukraine suspends 11 political parties with links to Russia*,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2/mar/20/ukraine-suspends-11-political-parties-with-links-to-russia>
- Saul, I. (2022,May 5). The disinformation governance board.From
<https://www.readtangle.com/disinformation-governance-board-alejandro-mayorkas/>
- Schlosberg, J. (2022,June 1).Last night, @BBCRadio4 aired a documentary...,
<https://twitter.com/jrschlosberg/status/1531889802001391616>
- Sharkov, D.(2014, September 10). *Ukrainian Nationalist Volunteers Committing 'ISIS-Style' War Crimes*,
<https://www.newsweek.com/evidence-war-crimes-committed-ukrainian-nationalist-volunteers-grows-269604>
- Shekhovstov, A.(2011). The Creeping Resurgence of the Ukrainian Radical Right? The Case of the Freedom Party, *Europe-Asia Studies*. 6(2:203-228).
- Shuster, S., & Perrigo, B. (2021,January 9) *Inside A White Supremacist Militia in Ukrain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y910FG46C4>
- Shuster, S., & Perrigo, B. (2021,January 7) *Like, Share, Recruit: How a White-Supremacist Militia Uses Facebook to Radicalize and Train New Members*. <https://time.com/5926750/azov-far-right-movement-facebook/>
- Simpson, C. (1988). *Blowback: America's recruitment of Nazis and its effects on the cold war*. Weidenfeld & Nicolson.
- Smith, C. M.(2022) .*Ukraine's revolt, Russia's reveng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Stern, D. (2012,December 26). *Svoboda: The rise of Ukraine's ultra-nationalists*.From <https://www.bbc.com/news/magazine-20824693>
- Stoltenberg, J.(2022, May 24).*Davos 2022: Special address by NATO Secretary-General Jens Stoltenberg*,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2/05/special-address-nato-secretary-general-jens-stoltenberg-davos-2022/>
- Stone, O. (2016). 《戰火中的烏克蘭》(Ukraine on Fire), 中文字幕影片可在日本網站收看, <https://www.nicovideo.jp/watch/sm40211290>
- Stone, O. (2016). (2021,August 20) *Ukraine on Fir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KcmNGvaDUs>
- Vice (2018,May 25). *Out of control: Ukraine's rogue militias*.Fr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MMXuKB0BoY>
- Vogel, K. P., & Stern, D. (2017). Ukrainian efforts to sabotage Trump backfire. From <https://www.politico.com/story/2017/01/ukraine-sabotage-trump-backfire-233446>

- Weir, F. (2018,February 6). *Russia's media scene: not just a state affair*,
<https://www.csmonitor.com/World/Europe/2018/0206/Russia-s-media-scene-not-just-a-state-affair>
- Weir, F. (2019,March 20). *Fake news' in Russia: State censorship elicits an outcry*. From
<https://www.csmonitor.com/World/Europe/2019/0320/Fake-news-in-Russia-State-censorship-elicits-an-outcry>.
- White, E.(2022,March 11). China's tech platforms become propaganda tools in Putin's war. From
<https://www.ft.com/content/d460c6f6-ffc7-4d61-9350-bef378fcc5c5>
- Wikipedia (n.d.1). *Stepan Bander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tepan_Bandera
- Wikipedia (n.d.2) .Revolution of dignity.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volution_of_Dignity
- Wikipedia (n.d.3). Winter on fire: Ukraine's fight for freedom.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nter_on_Fire:_Ukraine%27s_Fight_for_Freedom.
- Wikipedia (n.d.4). 2014 Odessa clashes.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2014_Odessa_clashes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十五期
2022 年 6 月

評析《運動—批判社會學的視野》

陳子軒*

書 名：運動—批判社會學的視野
作 者：Richard Giulianotti 著 劉昌德 譯
出版日期：2016 年英文二版，2021 年 8 月中文譯版
出 版 社：五南

本文引用格式

陳子軒（2022）。〈評析《運動—批判社會學的視野》〉，《傳播、文化與政治》，15:203-206。

投稿日期：2022 年 1 月 7 日；通過日期：2022 年 2 月 20 日。

* 作者陳子軒為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教授，e-mail: tzuhsuanchen@gmail.com

在《運動—批判社會學的視野》(Sport- A Critical Sociology) 這本運動社會學教科／入門書中，Richard Giulianotti 採取在前三章中，先建立起母學科古典社會學的大架構，再引入「運動」與社會學的連結方式。本書架構上以理論與議題交錯，此為較大膽的寫作方式，一般運動社會學教科書中較常見的，乃以社會議題中的單一面向為軸，次序開展。例如，由 12 位台灣學者共同撰寫、黃東治主編(2021)的《運動社會學概論》就涵蓋了包括全球化、政治、國族主義、媒體等議題為軸；國內也有譯著、由 Maguire, Jarvie, Mansfield 與 Bradley 所著之《運動世界的社會學》(黃東治、邱金松譯, 2008) 亦是以議題為軸，再導入相關社會學理論或相關研究。近年在北美影響最鉅、由 Jay Coakley(2021)所著的 Sports in Society: Issues and Controversies 一書，已經歷 13 版的更新，也是以社會化、兒童、偏差行為、種族等議題為軸，再導入相關理論的爬梳與對話。以議題為軸，多少將運動社會學這個社會學與體育學交錯的次學門視為應用領域，讓對於運動實務場域有興趣的讀者，有較容易的切入點。

因此，Giulianotti 書中，雖說以理論或學派為章節，仍不乏相對應的主要議題，但本書中卻有理論與議題為章節標題的混見狀況，前三章以古典社會學理論為主軸，介紹功能論、詮釋性社會學、與馬克思主義，在各章節篇幅有限的情況下，對於初接觸運動/社會學理論的讀者與學生而言，並不容易直接上手（對照之下，Jay Coakley 甚至在該書尾聲「運動的未來」一章中才「提及」馬克思），尤其對於來自非社會學相關領域的讀者，在閱讀本書的前面數章時，可以想見會有一定的進入障礙，因此，本書或較適合已對社會學理論有初步認識、並進一步想將相關理論應用在運動場域的讀者。

理論與議題兩種不同的主軸，正是運動社會學作為兩種母學門交會處，選擇不同切入點後難以迴避的矛盾。但在 Giulianotti 本書的書寫中，又在兩個軸線間游移，時以學者、理論為章節分野（1-4 章、9-10 章），時又以議題為章節（5-8、11-12 章），究竟該堅持單一流派理論的統整、或是援引不同學者分析相同現象以進行對話？這時矛盾就容易出現了。在第 9 章中，特別將 Norbert Elias 的型態社會學獨立出來，第 10 章則聚焦在 Pierre Bourdieu 的論述上，兩者無疑都在運動社會學長流中有其關鍵影響力與重要性，或可

解讀為在某些議題與論點上，這些學者已然奠定一家之言，成為該議題必然參照的典範，但是某些議題上，可能就欠缺了多元並陳的碰撞，例如在運動與文明進程中，Elias 的觀點與 Allen Guttmann(1978)的 *From Ritual to Record* 若能並置，或可激發出不同史觀的論辯，或是在第 10 章中，加入更多關於 Thorstein Veblen ([1899]2001)以降有閒階級的形成，或是階序與社會化等等論點，或可給予讀者不同的視角。

除了架構上在理論與議題之間的取捨掙扎之外，本書立論紮實，論述精闢，案例合宜，無疑是目前台灣運動社會學中重要的教科/入門書。不過，與許多教科書採取較為中立、「平衡報導」的摘要式寫作不同，Giulanotti 在書中不吝宣稱其立場，他的批判不僅針對運動場上需要針砭的議題，更指向近年來在北美運動研究社群興起的身體文化研究（Physical Cultural Studies，簡稱 PCS，見第 4 章），對於該流派所倡議內視的「身體」視角轉向並不以為然，也認為 PCS 過於虛無飄渺，如此大力抨擊，也顯見運動社會學與 PCS 兩派的爭辯，十多年來依舊持續著(陳子軒，2012)。

自林文蘭(2009)評論當時台灣運動社會學教科書以來，十年間全球乃至於台灣的運動場域持續發生重大的變化，作為教科書，不論理論、議題或是案例總有緩不濟急的感慨，本書譯作的出版，可說是台灣運動社會學領域教科書的及時雨。

然而，既為譯作，在以英美為主流觀點的運動社會學教科書中，各自的舉例或是聚焦的議題，必然隨著各文化脈絡而有所不同，這也形成文化與理論轉譯的必然闕漏。誠如譯者在其序中所昭示的一般，「台灣之光」、「國球」等等名詞所體現的國族主義意涵，正是台灣運動底蘊中最重要的基調，在此書中卻未見獨立章節討論，至為可惜。美國運動社會學界，因其獨特的國際政經情勢與運動歷史脈絡，國族主義已是其數十年以來難以校正回歸的盲點（Coakley 書中同樣欠缺國族主義的章節），但過往在英、澳、紐、加等同為英語系知識輸出國的運動社會學論述中，通常並不會缺席的國族主義，Giulanotti 卻在本書中易外地忽略了。

除了國族之外，媒體也是本教科書中令人意外的缺席。媒體自無線/有線/衛星的線性電視年代，進入詭譎多變與多向流動的串流/OTT 時代，產製端

中不斷膨脹的轉播權利金，內容端的豐富多元，以及閱聽人端無所不在的媒介化運動感知經驗，再再都成為運動的時代精神，本書中未從媒體層面切入運動，至為可惜。儘管可以理解，一本教科書無法窮盡運動世界的所有面向，但國族與媒體，這兩項影響台灣運動發展甚鉅的面向的缺席，是無法忽略的憾事。但以譯者在其譯序中所述，翻譯本書的動念正是多年來本書做為其課堂使用參考，因此吾人反倒可以理解，畢竟此二面向正是劉昌德長年關注與著墨甚深的議題，因此，如同譯者的授課策略一般，適時地加入國族與媒體的本土議題與觀點，當是使用本書時所需的補遺。

同時，本書做為台灣運動社會學入門書籍，劉昌德的譯註可謂居功厥偉，翻譯的品質為相關領域教科書中的佼佼者，除了原著中的理論翻譯中規中矩之外，一些並不好翻譯的俚語與運動術語都能精準地傳達，甚至配合到運動台灣近年流行的語彙，無疑為本書再增添閱讀與參考的價值。

參考書目

- 林文蘭（2009）。〈不「運動」的社會學？評三本運動社會學教科書〉，《臺灣社會學刊》，42: 227-239.
- 陳子軒（2012）。〈邁向批判運動社會學／身體文化研究〉，《體育學報》，45(4), 267-278.
- 黃東治、邱金松譯（2008）。《運動世界的社會學》。台北：學富。（原書 Maguire, J., Jarvie, G., Mansfield, L. & Bradley, J. [2002]. *Sport worlds: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Champaign: Human Kinetics.）.
- 黃東治等（2021）。《運動社會學概論》。台中：華格那。
- Coakley, J. (2021). *Sports in Society: Issues and Controversies* (13 ed.): McGraw Hill.
- Guttmann, A. (1978). *From ritual to record : the nature of modern spor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Veblen, T. ([1899]2001).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2001 Modern Library ed.). New York, NY: Modern Library.

訂 閱

零售：每期新台幣 500 元

個人訂閱：國內一年兩期 1000 元

海外一年兩期 1500 元(或 50 美元)

機構訂閱：國內一年兩期 2000 元

海外一年兩期 3000 元(或 100 美元)

以上均含掛號郵資

郵政劃撥戶名 社團法人媒體改造學社

郵政劃撥帳號 50313103

Sponsor

Campaign for Media Reform, CMR

Editorial Advisory Committee

Jin Cao	Fudan University
Chin-hwa Cha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Yu-liang Chang	Nanhua University
Wei-Xing Chen	China Media University
Yong Hu	Peking University
Guang-shiash Hu	Shih Hsin University
Yu Hua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g Kong
Yng-ruey Jiing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Liangwen Kuo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Chin-Chuan Le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Jing-Ling Lin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ung-Tai Li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Yuan-huei Li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ailong Liu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Xinyu Lu	Fudan University
Yen-Yuan Ni	Ming Chuan University
Linchuan Qiu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Bo Shan	Wuhan University, China
Ping Shaw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bin Shi	Tsinghua University, China
Chunquan Wang	Northwest University, China
Song-In Wang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Yu-Li Wang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Bu Wei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ina
Shieu-Chi Weng	Shih Hsin University
Yu-min Wu	Shenzhen University
Yuezhi Zhao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Canada
Jiang Zha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Guo-Liang Zha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Zhian Zha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China

Editorial Committee

Editor-in-Chief
Shih-Hung Lo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Editorial Board

Kuan-hsing Chen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Chien-san Feng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Fu-Mei Lin	Shih Hsin University
Chen-ling Hu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ditorial Assistants

Chung-Po Liu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ublisher

Publisher

Campaign for Media Reform, CMR

Address 3F-3., No. 102, Sec. 2,
Zhongshan N. Rd., Zhongshan
Dist., Taipei, Taiwan (R.O.C.)

Phone +8862-2522-1499

Fax +8862-2522-4970

E-mail: editor.2015ccp@gmail.com

Website: <http://ccp.twmedia.org/>

ISSN: 2411-4006

Calligraphy: Yun-Chi Huang

Cover Design: Yiche Feng

Subscription

Personal:

NT1000/per year

(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NT1500/per year(or US\$ 50/per year)

(inter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Institutional:

NT2000/per year

(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NT\$3000/per year(or US\$100/per

year)

(inter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Postal Giro Account

50313103, Campaign for Media Reform

Some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under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clauses.



Research Articles in general

- *New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in the digital era:
The Case of PTS+ in Taiwan*
- *A Swing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Digital Paradigm: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 Public Television Service*
- *Gender Cultural Spaces, Documentary Film and Publicity:
The Comfort Women Museum and Cultural Products*
- *Southeast Asian Ethnic Landscape and Media Representation in Taiwan*

Research Notes

- *A Dialogue Between Theory of Mediatization and Political Economy:
Taking the Mediatization of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as Research Field*

Past and Present

- *Jacques Baud:
The Military Situation In The Ukraine*
- *Disinformation, Euromaidan, War-and-Accountability:
Understanding Ukraine*

Book Review

- *The review of Sport :
A critical sociology*